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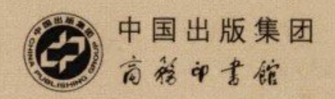
埃及史

从原初时代至当下

[美] 詹森·汤普森 著　郭子林 译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ISBN 978-7-100-08879-4

9 787100 088794 >

定价：5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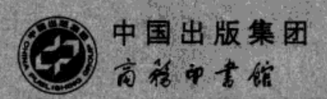
埃及史

从原初时代至当下

[美] 詹森·汤普森 著 郭子林 译

A History of Egypt: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史:从原初时代至当下/(美)汤普森著;郭子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100-08879-4

Ⅰ.①埃… Ⅱ.①汤…②郭… Ⅲ.①埃及-历史 Ⅳ.①K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0281号

责任编辑 倪 乐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00千字
印 次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

"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纪念我的埃及妈妈——泽那布·哈桑·穆尔甘

致　谢

在我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潜心于埃及史的这些年里，我得益于自己与很多学者的友谊和合作，这些学者研究埃及历史的方方面面。这种经验在多个方面丰富了这部书，我对此十分感激。我特别感激美国开罗大学出版社的主任马克·林茨，他最早建议我写作这本书，而且当我最初试图放弃此书的写作时，他与副主任尼尔·赫威森一起坚定不移地鼓励我完成这项任务。很有价值的读者评论和对手稿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纠正是由这些人提供的：约翰·拉斐尔、穆罕默德·威廉斯、安吉拉·汤普森、玛格丽特·朗格、尼尔·朗格和吉尔·卡梅尔。亚罗斯塔乌·多勃罗沃尔斯基和迈克尔·琼斯在这本书的照片方面做出了贡献，而罗伯特·文森特和约翰·菲尼也做出了同样的贡献，他们都应该得到永远的感谢。我也必须表达对我的埃及家庭成员的挚爱感激之情，他们是巴巴·阿赫迈德、哈比巴、阿姆那以及其他所有人，他们允许我与他们一起居住在开罗靠近苏丹卡特巴的陵墓的房子里，我在这里完成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由于这些颇有价值的帮助和支持，对于这样一部篇幅庞大的著作必然存在的缺点，我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推托借口。

ix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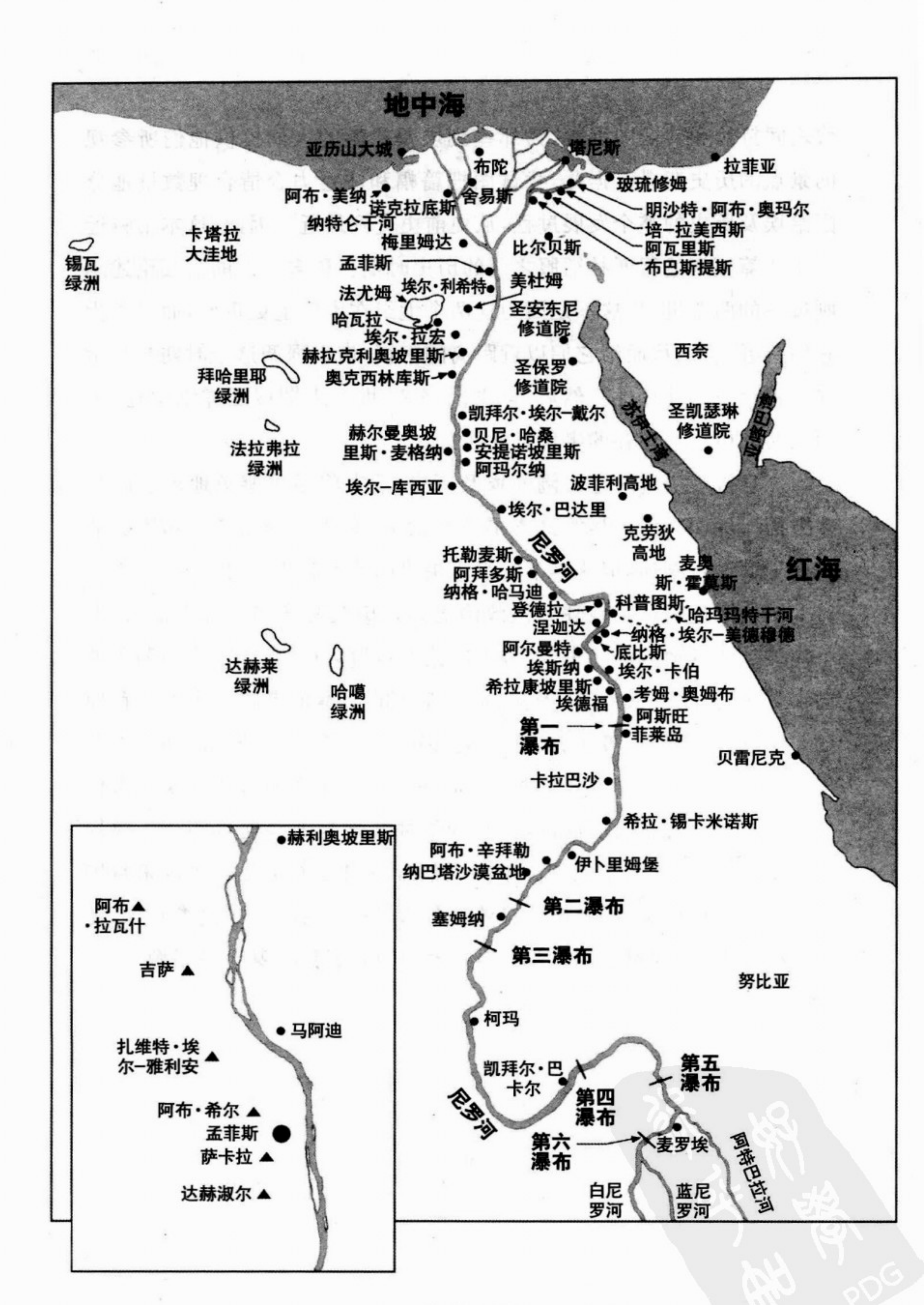
x 单一作者写作的关于从原初时代至当下的埃及史的单卷著作直到最近也未出现。埃及是世界上获得文字描述最多的国家之一，是作者无穷无尽的灵感的源泉，是读者无穷无尽的兴趣的源泉。已有的大量关于埃及历史的著作，它们几乎都集中探讨某个特殊时期，似乎埃及历史的诸多阶段都是滴水不漏的车厢，彼此完全隔离开来。然而，几乎没有任何领土像埃及那样，拥有如此多的串联整个历史经验的连续线索。尽管国家几乎毫无疑问地变化了，但人们一再面对自相矛盾的观点（事实上是完全的矛盾观点），即埃及文化的很多方面在几千年里都显而易见地保留了，并能够被证明。埃及恢弘的历史的显著标志总能提供现成的信息。

埃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法国和英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两倍还要稍长一些，而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常常占据一卷本的篇幅。但篇幅本身是一种障碍，我们可以通过内容的选择和研究领域之深度的调整来超越这种障碍。埃及历史的丰富多样性是如此多的高度专业化的学者研究的主题，这使得埃及历史变得更适于综合和全面的表述。

挑战历史编纂方法是我同意写作该书的动机之一。一些问题远不是肤浅的，而是极端微妙的。广泛概括通常比详细描绘更困难。我写作的目标是，向求知若渴的读者介绍埃及历史主要时代以及在各个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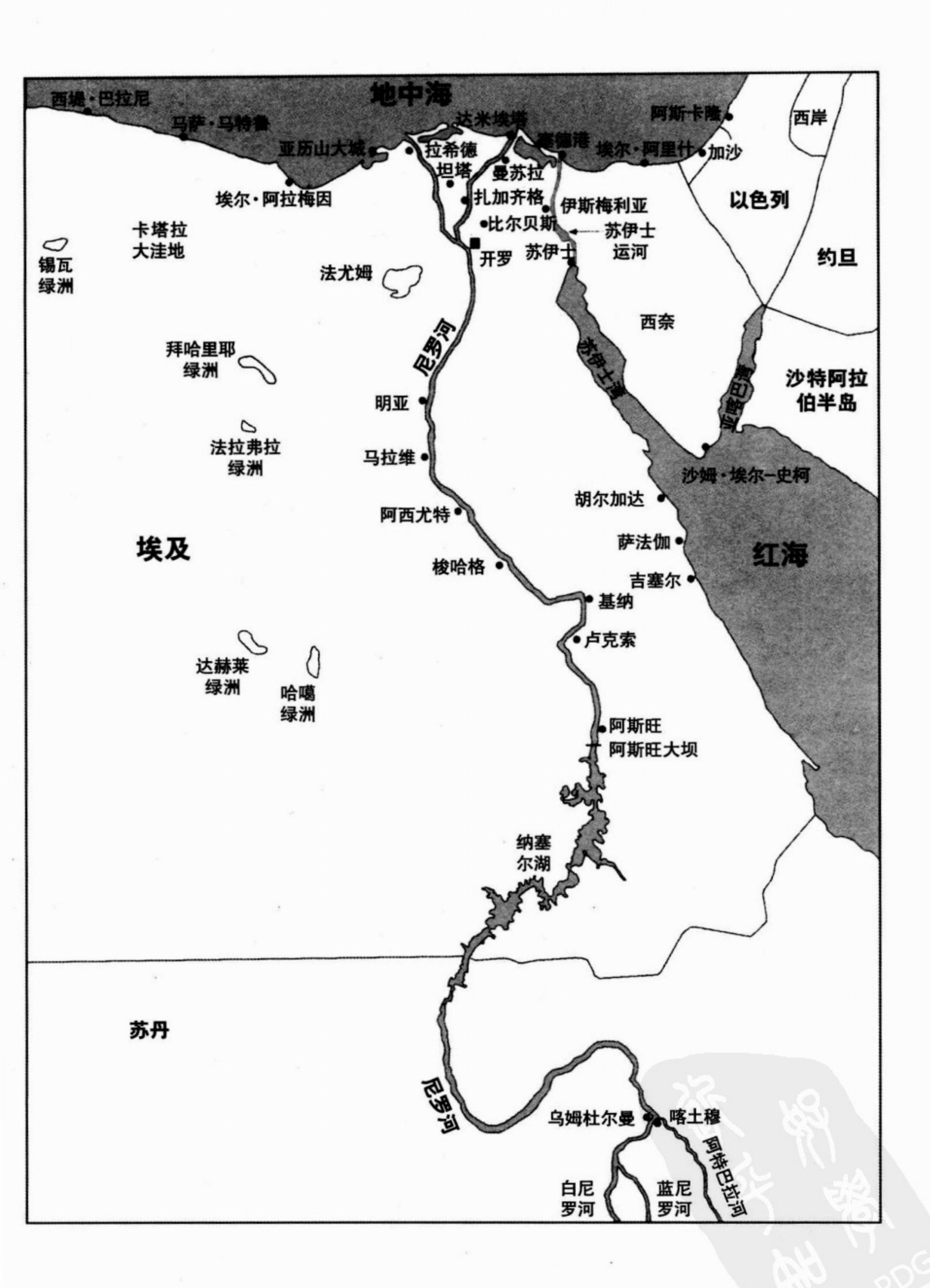
代之间持续和转变的因素，为那些到埃及旅游的人们提供他们所参观的景点的历史背景。据此，我试图把篇幅和注意力合情合理数量地分配给埃及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从史前史直到最近。因此，这本书将近一半的篇幅阐述穆斯林征服之前的历史时期。稍多一点的篇幅论述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这不是因为这两个世纪在本质上更重要，而是因为它们接近当下，从而给它们以近距离的审视，借以强调这个时期与整个埃及古代史的连续性。然后，该书围绕20世纪末期展开详细叙述，因为当时的历史与现在的事件息息相关。

一旦被吸引进时空广阔的埃及历史，读者将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很多方面所深深吸引。尽管这本书也对社会、文化、宗教、经济和历史的其他方面进行阐述，但这本书的组织主要以政治为中心，这是为了维持行文结构和进行连贯叙述。但政治史只是历史写作的一种方法，读者也应该钻研其他方法。书末“推荐阅读书目”部分仅仅是一个很简单的图书目录，只是进入广阔、多样、永远迷人的书本世界的几个点。首要的是，我鼓励读者积极地、批判地提出问题，并尝试着进行概括。埃及历史是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过程，是每个人都能玩的游戏。埃及人使他们的历史环绕在自己周围，而且他们慷慨地与那些通过阅读了解埃及历史的人们、那些参观其国家的人们分享自己的历史。所以来自国外的我们应该谨记：埃及历史最终是埃及人们（无论是古代埃及人，还是现代埃及人）的财产，我们应该给予它应得的尊重，甚至是崇敬。



地中海
亚历山大城
布陀
塔尼斯
拉菲亚
玻琉修姆
阿布·美纳
舍易斯
诺克拉底斯
明沙特·阿布·奥玛尔
纳特仑干河
培-拉美西斯
阿瓦里斯
卡塔拉
大洼地
梅里姆达
比尔贝斯
布巴斯提斯
锡瓦
绿洲
孟菲斯
美杜姆
法尤姆
埃尔·利希特
圣安东尼
修道院
哈瓦拉
埃尔·拉宏
西奈
赫拉克利奥坡里斯
奥克西林库斯
圣保罗
修道院
拜哈里耶
绿洲
凯拜尔·埃尔-戴尔
圣凯瑟琳
修道院
苏伊士湾
亚喀巴湾
赫尔曼奥坡
里斯·麦格纳
贝尼·哈桑
安提诺坡里斯
阿玛尔纳
法拉弗拉
绿洲
波菲利高地
埃尔-库西亚
埃尔·巴达里
克劳狄
高地
尼罗河
托勒麦斯
阿拜多斯
麦奥
斯·霍莫斯
红海
纳格·哈马迪
登德拉
科普图斯
哈玛玛特干河
涅迦达
纳格·埃尔-美德穆德
阿尔曼特
底比斯
达赫莱
绿洲
埃斯纳
埃尔·卡伯
哈噶
绿洲
希拉康坡里斯
考姆·奥姆布
埃德福
阿斯旺
第一
瀑布
菲莱岛
贝雷尼克
卡拉巴沙
希拉·锡卡米诺斯
阿布·辛拜勒
伊卜里姆堡
纳巴塔沙漠盆地
第二瀑布
塞姆纳
第三瀑布
努比亚
柯玛
第五
瀑布
凯拜尔·巴
卡尔
第四
瀑布
尼罗河
第六
瀑布
麦罗埃
阿特巴拉河
白尼
罗河
蓝尼
罗河
赫利奥坡里斯
阿布
·拉瓦什
吉萨
马阿迪
扎维特·埃
尔-雅利安
阿布·希尔
孟菲斯
萨卡拉
达赫淑尔

古代埃及



地中海
西堤·巴拉尼
马萨·马特鲁
亚历山大城
拉希德
达米埃塔
塞德港
阿斯卡隆
埃尔·阿里什
加沙
西岸
以色列
约旦
坦塔
曼苏拉
埃尔·阿拉梅因
扎加齐格
伊斯梅利亚
比尔贝斯
苏伊士
运河
卡塔拉
大洼地
开罗
苏伊士
锡瓦
绿洲
法尤姆
西奈
尼罗河
苏伊士湾
亚喀巴湾
沙特阿拉
伯半岛
拜哈里耶
绿洲
明亚
法拉弗拉
绿洲
马拉维
沙姆·埃尔-史柯
胡尔加达
阿西尤特
埃及
萨法伽
红海
梭哈格
吉塞尔
基纳
卢克索
达赫莱
绿洲
哈噶
绿洲
阿斯旺
阿斯旺大坝
纳塞
尔湖
苏丹
尼罗河
乌姆杜尔曼
喀土穆
阿特巴拉河
白尼
罗河
蓝尼
罗河

现代埃及

目录 Contents

我将详细叙述埃及，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

——希罗多德





第一章　尼罗河的赠礼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地图上发现，今日的埃及是东北非一个带棱 1
角的楔子和西南亚的一大块土地。它覆盖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在 21 世纪初，埃及居住着大约七千五百万人口。埃及的首都开罗拥有六百多万人口，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城市。

但是，要想历史地想象埃及，要想理解埃及的地理要素，你必须首先考虑世界上最长的那条河——尼罗河，而且尼罗河流经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公元前 5 世纪，希腊旅行者希罗多德把埃及描述为尼罗河的赠礼时，他或许是在重复一个已然用旧了的说法，但自从历史记忆之前很久的时候开始，这个说法表达的是事实，而且直到现在也依然如此。降雨在尼罗河河谷微少，在三角洲也不丰富，结果几乎整个埃及的水都来自尼罗河，甚至在地中海和红海港湾过去几十年获得惊人的发展之后，埃及 95% 的人口仍生活在尼罗河两岸几英里宽的范围内。埃及的可耕地有大约三万四千平方公里，几乎都位于尼罗河谷和三角洲。

埃及的尼罗河有三个主要水源。最大的水源是白尼罗河。这条河 2
的水源直到 19 世纪中期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理学秘密之一。白尼罗河的水源位于非洲内陆，尤其湖泊地区。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湖为白尼罗河的水源做出了最大贡献。当白尼罗河流过 6400 公里

进入地中海时,它穿越了10个当今的国家,经历了地理的变化。在苏丹南部,白尼罗河陷入了苏德沼泽,这个巨大的沼泽地使它缓慢下来,并使大量水因蒸发而丢失,尽管苏德沼泽也起到了调节河流泛滥的作用,因为大沼泽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释放河水。由于苏德沼泽和这样的事实,即维多利亚湖的集水区域终年得到降雨的供给,所以埃及的尼罗河河水从不断流。

埃及尼罗河的其他主要水源是蓝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蓝尼罗河在苏丹的喀土穆与白尼罗河汇合。阿特巴拉河在苏丹更北的地方流入尼罗河。它们造成了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后者是埃及历史上的主要地理学特征。它们的支流源自埃塞俄比亚高原,夏季季风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倾倒下大量雨水,雨水迅速流淌,携带着从埃塞俄比亚火山山脉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黏土。尽管流向趋于把尼罗河的水源与白尼罗河和中非的湖泊区域联系起来,但在到达埃及的尼罗河河水当中,84%源自埃塞俄比亚。

与太阳年保持完全一致,尼罗河在埃及于夏至日开始升高,于秋分日达到最高,从6月初每天不足5000万立方米上升到9月泛滥高峰期的70000万立方米。当澎湃的河流到达埃及广阔的泛滥平原时,它溢出河岸,浸泡富饶的冲积土壤,洗净有害的盐分,有害的盐分是诸如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古代水力文明的长期羁绊。当洪水撤退时,河里留下水池和优质的沉积物以及矿物质层。干旱的土地会裂开,使土壤暴露于空气中,这样完成更新的循环过程。转变过去状态的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阿斯旺大坝的构建结束了埃及的尼罗河泛滥。

3

尼罗河泛滥给埃及以冲击性的生命力。所有事物都依赖于尼罗河的泛滥,而且依赖于尼罗河泛滥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如果泛滥太低,或者完全没有泛滥,那么土地便得不到足够的灌溉。尼罗河连续发生低水位是灾难性的事情,不仅导致饥馑,还导致极广泛的政治和经济混乱。但泛滥过高甚至更糟糕,因为它冲垮和毁坏那些建筑在高于河水预期高度之上的护堤上的房屋,摧毁或损坏灌溉堤坝和水闸,而且把水

留在土地上，致使土地在耕种季节得不到耕种。

尼罗河特殊的节奏在埃及创造了一种不寻常的农业周期。大多数河流在春季达到最高峰，而在天气变暖时减退，但尼罗河却恰恰在一年当中最炎热的夏季升高并达到顶峰。庄稼在秋季种下，在冬季成熟，在初春收获，然后允许土地处于休耕状态几周的时间，直到尼罗河泛滥再次淹没耕地。当尼罗河泛滥在6月末到来时，洪水使庄稼免于酷热的烘烤，使人们免于在土地上的必要劳动。古代埃及人意识到了三个季节：泛滥季、耕种季、收获季。

尼罗河在阿斯旺的第一瀑布和三角洲之间大约九百公里的河段适于不间断地航行，这对于埃及的统一和持续繁荣是很重要的。尼罗河对于航船是理想的。往北航行，船只受到稳定的河流的推动。因为盛行的风是从西北方吹来的，所以船只通常也能够沿着河流往南方航行。如果没有风，那么船员能够通过沿河岸的河道牵引船只。人们可以在尼罗河上无处不在的小帆船上航行，仍可以获得一种鲜活的航海感觉，这些小帆船雅致的三角帆在河流的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埃及人非常依赖于尼罗河，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尼罗河是远程交流、商业和运输的主要通道。尼罗河为人们远距离运送像建筑石料这样的巨大而沉重的物体提供了道路，然后每年的泛滥能够把大驳船恰到好处地带到建筑工地旁边。古代埃及人相对晚的时候才使用轮车，一个原因是埃及缺乏公路；公路需要的地方不得不从有限的肥沃土地中获得，所以这些公路始终很短、很窄。当尼罗河可以穿过整个埃及时，当每个人之间几乎相隔几公里的距离时，谁还会需要远距离高速公路呢？

在开罗以北不远处，尼罗河散开，流入广泛的三角洲地区。现在，尼罗河有两条主要渠道可以穿过三角洲、罗塞塔和达米埃塔；在古代，4 尼罗河有七条主要渠道。三角洲就是下埃及。上埃及是三角洲与位于阿斯旺的第一瀑布之间的一段区域。上埃及与下埃及的不同取决于这样的事实，即河流从南往北流动，在地图上地势较高的地区不是北方。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因为人们通常的想法与此相反，错误地认为上埃

及一定在北方，而下埃及一定在南方。严格来讲，对于从开罗往南旅行到达卢克索或阿斯旺的人来说，说他们“往上游走”到达这些地方，仍是正确的，尽管现在很少有人这么说了。三角洲的可耕地是上埃及可耕地的两倍，在埃及早期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但三角洲的很多有形记录已经被洪涝性的土地所隐藏或淹没，这常常令三角洲地区的考古工作极为困难，因此人们偏重于从上埃及获得证据，上埃及的证据保存条件和道路条件都比较好。

尼罗河谷的多岩石性也决定着上埃及的地理特征。从阿斯旺往北直到凯拜尔·埃尔－希尔希勒的一段距离（这里的努比亚砂岩支配和控制着尼罗河谷）以后，尼罗河进入一大段松软的石灰石区域，这允许河流形成较宽广的洪水平原，这种平原十分适于农业。在大基纳湾与开罗之间，山丘和山脉在尼罗河西岸减退，使肥沃的洪水平原在河流的这一侧变得更宽阔，尽管尼罗河东岸的山脉靠近河流，限制了尼罗河东岸的农业，有时使尼罗河东岸的农业生产完全不能进行。上埃及的这个部分有时被称作中埃及。

尽管现代埃及国家的疆域更往南了，但或许可以说，埃及的土地结束于第一瀑布，即恰恰在阿斯旺城镇的上游（即南方）。白尼罗河与蓝尼罗河在喀土穆汇合，在阿斯旺和喀土穆之间，总共有六个这样的瀑布。这些瀑布并不是这个单词在字典中的意义上的大瀑布，它们仅仅是瀑布似的河流，因为它们水流湍急，所以阿拉伯人称它们为大瀑布。第一瀑布是由一段升起的花岗岩岩床和大石头形成的，岩床和大石头把尼罗河水分成了大量快速流淌的溪流，并使阿斯旺成为一个重要的花岗岩产地。古代采石标记和铭文仍清晰地出现在阿斯旺的渠道当中[5]耐久的石头上。船只能够穿过第一瀑布，但非常困难，所以它是一个航行的障碍，也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文化和政治屏障。在 20 世纪初，第一瀑布一部分被阿斯旺水坝淹没。第二瀑布也在 20 世纪中期被纳赛尔湖水淹没。

努比亚位于第一瀑布之南。埃及的努比亚，或者下努比亚（因为在

埃及，下是北方，上是南方)，是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的努比亚地段，第二瀑布位于哈尔法干河。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阿斯旺大坝的构建，下努比亚被纳赛尔湖水淹没。直到那时，下努比亚都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和地理区域，在政治上也常常是特殊的区域。努比亚人与埃及人讲不同的语言，后来又与阿拉伯人讲不同的语言。与埃及相比，努比亚人的土地极大地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尼罗河谷的大部分都在埃及，埃及松软的石灰石和其他因素允许尼罗河扩展开来，并形成宽阔而肥沃的洪水平原。与埃及不同，努比亚覆盖着较为坚硬的沙石，这允许尼罗河通过一条狭窄的沟壕穿越努比亚。山脉经常刚好歪到河水里，形成陡峭的河堤，结果沿着河堤，只有很小的地段可能适于耕种，有时根本就没有适于土地开垦的地段。这意味着努比亚从不能供养堪与埃及相比较的大规模人口，也不能生产大量过剩的农业产品，而过剩的农业产品是埃及文明的经济基础。

尼罗河谷的鸟瞰景观是令人难忘的：一条郁郁葱葱的绿茵带纵贯荒无人烟的沙漠。这种对比在陆地上也是突出的，你可以一只脚站在肥沃的土地上，一只脚踩在贫瘠的沙地上。耕作地带通常是十分明显的，从而古代埃及人称耕地为黑土地(*kemet*)，因为数千年来每年的泛滥洪水都为耕地储存上肥沃的泥土；古代埃及人称沙漠为红土地(*deret*)，因为沙漠是泛滥的洪水不能到达的地方。

埃及的东沙漠位于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它的最重要地貌是红海山脉，红海山脉由北往南纵贯东沙漠。东沙漠崎岖的山峰是由地面的升高和腐蚀造成的，构成了地球上最令人难忘的景观之一。山脉因大量干河谷而分离出来。干河谷是干燥的河床，这些干河谷大多呈东西走向，通往红海或尼罗河。尽管雨水在东沙漠很稀少，但当雨水降下来时，干河谷就会形成怒吼的洪流。一些干河谷是由古代河流形成的，例如巨大的基纳干河谷。干河谷陡峭的河壁和冲积河床形成了穿越恶劣地形的通道。这些干河谷当中最重要的是哈玛玛特干河谷，它为尼罗河上的吉夫特与红海上的吉赛尔之间提供了一条交流线。东沙漠是石

6

头和某些珍稀金属的重要来源,从而自从古代就被开采和挖掘。贝多因人早就居住在这里,但沿海地区在20世纪后期才获得高度发展。

西沙漠或者利比亚沙漠的地理是更多样的,而且是更大的,占埃及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尼罗河与利比亚边界之间的整个地区。这个地区的很多地方是由露出地面的岩层和多沙或多石的荒地构成的。西面是大沙海,西南面是大吉勒夫高原。西沙漠的地貌特征是大量的大洼地,包括巨大的卡塔拉大洼地,其最低点位于海平面以下133米处。这个沙漠也包括几个肥沃的绿洲,包括北方的锡瓦绿洲和中央绿洲:拜哈里耶绿洲,法拉弗拉绿洲,达赫莱绿洲和哈噶绿洲。其中最大的是达赫莱绿洲。自从旧石器时代以来,达赫莱绿洲就一直有人居住,因此是特别重要的考古地址。

西沙漠的一个洼地是众所周知的法尤姆地区。尽管法尤姆经常被描述为绿洲,但它与尼罗河灌溉系统联系密切,其所有的水都通过哈瓦拉水渠从最靠近的河流获得,哈瓦拉水渠是尼罗河谷西岸陡壁中的一个小开口。法尤姆显然是肥沃的,它的生产力因复杂的灌溉系统而提高,结果水从尼罗河流入法尤姆,然后通过每个较小的渠道扩散开来,沿着洼地南部的缓坡往下流淌,最后到达巨大的湖泊——加龙湖。这个湖的规模自古王国时代以来随着对水流的控制而极大地变动;它目前的表面位于海平面以下大约45米。加龙湖的北面受到较陡峭贫瘠的斜坡的限制。埃及的地图有时堪与植物荷花相似:尼罗河是植物长长的茎,三角洲是植物的花,而法尤姆就是植物的叶子。

7 西奈半岛的南部是由山区高原构成的,高原急剧落入东南方的亚喀巴湾,缓缓地落入西南方的苏伊士湾。与东沙漠相似,半岛的这部分长期以来一直是诸如铜和绿宝石这样的材料的出产地。西奈半岛北部是一个宽阔的沿海平原,这个平原为埃及与西南亚的联系提供了一个走廊,尽管它稍稍受到其沙漠地况的制约。

埃及的两个海岸是北部的地中海和东部的红海。尽管地中海海岸比埃及其他地区获得更多的雨水,而且它在历史上是人口低密度区,但

最近它的大部分地区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它没有自然港湾，而且直到亚历山大城建立以后才有了港口，三角洲的地理环境也不方便它与海洋进行交流。

1869 年以后，红海才通过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联系起来。之前，穿越苏伊士地峡的陆路运输是艰难的，而且很少使用。红海在南方可以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然而，在埃及的大部分历史上，这并没有提供埃及与东方联系的可行而持续的纽带，事实上，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障碍。主要困难是强烈的北风，这种风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吹向红海。这就是为什么托勒密王朝在红海的港口尽可能建在往南的麦奥斯·霍莫斯和贝雷尼克，而非建在北方的苏伊士。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北风，港口建在苏伊士应该是更方便的。尽管把红海与地中海联系起来的沟渠在古代就受到重视，但通过这样的沟渠和红海的正规而大规模的航行直到蒸汽时代才得到实践。尽管这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埃及地理状况的很多因素长期以来倾向于把埃及隔离开来，而非把埃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结合起来。

我们对尼罗河谷最早阶段的人类定居状况了解甚少，其原因部分是因为研究的缺乏，部分是因为尼罗河的水文状况，尼罗河淹没和冲刷掉了大部分考古证据。埃及东沙漠和西沙漠的考古发现，尤其西沙漠的考古发现，提供了连续而可比较的信息框架，但它们还不得不与尼罗河谷的考古发现保持一致。然而，如果人类都起源于东非的说法可以接受，那么当人口在非洲扩散并往北进入西南亚及其之外的地区时，尼罗河谷和其周围地区应该是一些人逗留的地方。

8

人类沿埃及尼罗河谷的活动可以通过粗糙的石头工具来验证，这些工具可以上溯至大约公元前 30 万年前，甚至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而且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但尼罗河谷不一定是最明显或最值得人类定居的地方，因为在旧石器时代的很长时间里，东北非与现在的状况完全不同。当时的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一个树木繁茂的丘陵地，郁郁葱葱的平原，布满了溪流和大量湖泊，丰富的动植物适于食

物采集民族的生存。尽管尼罗河谷是一个植物茂密的地区,是一个非常适于渔猎的地区,但困难重重,因为在一些时候,尼罗河有比现在高很多的怒吼的洪水,而在其他一些时候,它却变得干涸了。

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之后,大约公元前 10000 年,随着全新世时期的开始,降雨方式在东北非发生了变化,干燥过程开始了,接下来的几千年造就了撒哈拉沙漠。这个干燥过程并不稳定,期间被几次"湿润时期"打断,以至于干旱的大草原在最终被沙漠代替之前覆盖了很多地区。这些气候变化基本上与文化和技术进步保持同步,从旧石器时代的砍削石头工具和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到大约公元前 7000 年末期新石器时代动物驯养、植物栽培和更持久定居点的发展都是如此。尼罗河越来越正规的定期行为将使尼罗河谷成为明显的农业地区。

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最早的埃及主要新石器遗址是最近发现的,不是发现于尼罗河谷,而是发现于西沙漠的南部。这就是纳巴塔沙漠盆地遗址,位于曾经的古代湖泊的湖畔,这个湖泊位于阿布·辛拜勒以西 100 公里的地方。纳巴塔沙漠盆地遗址的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 6000 年或更早的时候,由几百个旧石器时代的露营地、大量埋葬土墩(坟墓)、立石(独块巨石,有的巨石高达 2.75 米)和巨石建筑物构成。遗址的挖掘者可能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至少古代埃及人的信仰、魔法和宗教的一些根源"在纳巴塔沙漠盆地遗址表现出来了。这些明显表现在很多巨石硕大的队列中,我们可以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们如此排列巨石的初衷是使它们成为神庙。这些根源也在其他事物的神人同形同性的(人形的)自然状态中表现得很明显,这些事物可以解释为死者的纪念物。这些根源还在丧葬活动中表现出来,丧葬活动强调了身体的保存。从尼罗河谷进口的货物的出现表明纳巴塔沙漠盆地的人们已经与沿尼罗河的更多农业定居者发生了相互联系。这种文化联系大约在公元前 3350 年崩溃,此时纳巴塔沙漠盆地文化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沙漠化的打击。

全新世时期的湿润阶段被超干旱阶段不时地打断,这稳步地迫使

人们和动物离开撒哈拉，到南方或者东方寻找更适宜的地区，那里的尼罗河提供了丰富的水和优质土壤。人们曾天真地但合情合理地认为，这种人口在诸如尼罗河这样的小地方集中，与这个小地方的巨大农业潜力一起，创造了一种关键物质，这种物质爆炸成了文明。这种简化的观点不再被接受，但到大约公元前6千纪埃及前王朝开始时为止，埃及的大多数人口已经迁移到了尼罗河谷。尼罗河谷开始表现出一些特征，这些特征明显使这里的人们与周围的人们区别开来。尼罗河谷最终发展成古代埃及文明特征。

第二章　埃及文明的诞生：前王朝和早王朝埃及

11

古代埃及的年表

在钻研古代埃及历史之前，我们必须谈谈与埃及年表的结构有关的事情，这个年表体系主要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现代学者设计的。尽管在很多方面不是很令人满意，但这个体系被如此严格地确定下来，以至于要想在古代埃及历史的小道上遨游，至少要对这个体系的独特性有基本的认识。这个体系以公元前 3 世纪的历史学家马涅陀（见本书第七章）的著作为基础，他把埃及人的历史表述为系列国王和王朝，总共 31 个王朝，从第一王朝的第一个假设的国王美尼斯到亚历山大大帝。不幸的是，马涅陀的《埃及史》（*Aegyptiaka*）虽然利用了很多已经不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史料，但它仅仅在后来的作家准备的摘要、简短摘录或大纲里保留下来，例如弗拉维乌斯·约瑟夫，他在公元 1 世纪为了写作《驳阿比翁》（*Contra Apionem*）而改编了《埃及史》很多部分的内容，旨在驳斥希腊古代史中的夸张表述。结果这个年表经常是模糊的和不完整的，有时确然是错误的，但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年表。

现代学者采用了马涅陀的王朝框架，并把这个框架组织成系列时

期，最终产生了如下模式： 12

前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5300—前2950年

早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2950—前2613年

　第一王朝—第三王朝

古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613—前2160年

　第四王朝—第八王朝

第一中间期，大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

　第九王朝—第十一王朝

中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2055—前1640年

　第十二王朝—第十四王朝

第二中间期，大约公元前1640—前1550年

　第十五王朝—第十七王朝

新王国时期，大约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十八王朝—第二十王朝

第三中间期，大约公元前1069—前715年

　第二十一王朝—第二十五王朝

后期埃及，大约公元前715—前332年

　第二十五王朝（后期）直到第三十一王朝

不妨概括地讲，古代埃及年表为个人选择和科学判断提供了空间。例如，第三王朝经常被分配给古王国，而第二十五王朝也经常被分配给第三中间期。更重要的问题是，随着认识的增加，这些时期中的大多数时期的正确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但与马涅陀的王朝框架相似，它们已经变成了规范。当然，古代埃及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时期划分，自然不曾认真思考他们经历的时代。

就古代埃及年表来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个年表的所有年代（甚至到后期埃及）几乎都是不确定的，没有绝对的数据可以用于确定

这些年代,因此埃及学著作经常使用“大约”这个词。另外,存在很多断代体系,尤其到处都有所谓的年表。这些就是各埃及学著作中的年代常常不同的原因,但年代不同通常只是几十年的时间,相对于古代埃及史的庞大时间段而言,这是次要问题。

13

前王朝埃及

前王朝时期从大约公元前 5300 年延伸至前 2950 年,是古代埃及史中所有时代里面最不为人所熟悉的时期,然而它却是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埃及人从北非物质财富的庞大矩阵中出现,发展出了古代埃及文明的很多独特特征——政治统一、王权、文字、纪念性建筑、农业、大规模灌溉、艺术表达模式和社会组织。

直到 19 世纪晚期,现代学者才意识到前王朝埃及的存在,埃及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精力充沛的工作揭示出了前王朝埃及的存在。前王朝时期没有文字证据。直到很晚近的时候,埃及才出现了少量文字证据,但都是简短的,而且它们的准确含义通常很模糊。然而,通过对坟墓中出土的陶器进行有创造性的分类,皮特里设计了一个相对清楚的年代体系,这种年代划分法直到今日仍是前王朝埃及年表的基础。因为该时期的政治组织无从知晓,所以学者们根据“文化”对它的人们和社会进行分类,这些文化是根据那些可以代表文化身份的重要考古地址命名的。

在前王朝埃及的几个文化当中,两个文化对于理解古代埃及文明的发展是重要的。第一个是巴达里文化。之所以它被称为巴达里文化,是因为它被确定在埃尔－巴达里,位于中埃及的梭哈格城附近。巴达里文化至少到公元前 4400 年至前 4000 年就已经出现了,或许更早。尽管一些巴达里定居点已经发掘出来,但大多数关于巴达里文化的引人注目的信息则源自该文化的墓地,这与所有其他前王朝埃及文化一样。这些墓地没有表现出墓葬物品的差别,这表明了相当平均主义的

社会秩序。巴达里定居点似乎是短暂的,但尼罗河两岸自然堤坝上较大的和更持久的定居点可能被淤积的泥沙覆盖了,或者被河水冲刷掉了。在巴达里人的住处,巴达里定居点的居民在家具设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而且他们从事农业和动物管理。他们在广阔的尼罗河中钓鱼。开始实践造型艺术,最突出的是人物小雕像的制作。巴达里陶器的特征是陶器壁特别薄,这与埃及历史后来的各个时期的陶器不同。巴达里文化的范围不清楚,但它或许从北方的阿西尤特以北延伸到南方的埃尔-卡伯,其贸易和文化联系的范围更广。 14

前王朝时期的另一个主要文化是涅迦达文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涅迦达文化 I(又称阿姆拉文化),从大约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3500 年繁荣发展。涅迦达文化 I 遗址与巴达里文化遗址相似,但更大、更繁荣。尽管墓葬物品仍然很简单,但更多样化了,这是一种发展,这是由越来越复杂的重要社会组织造成的。金属制造几乎没有超越巴达里文化的金属制造技术,仍然制造小型的铸造成的物体。突出的进步显然发生在硬石的制作方面,例如花岗岩、斑岩和石灰石,而硬石制作技术在巴达里时代未获得发展。这表现于石质权标头和板岩化妆调色板的出现,它们远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具有了明显的仪式和地位的意义。

涅迦达文化 I 的陶器尽管在材料质地上不比巴达里文化的陶器好多少,但开始有了装饰图案,有时是几何图案或对植物、动物或人物的描绘。当人物被描绘在陶器上时,两个主题占主导地位:猎人和获胜的战士,这或许表明了有统治权的猎人—战士群体的出现。获胜的战士这一主题流行于整个古代埃及历史中对法老重击其敌人的描绘。

涅迦达文化 I 似乎比巴达里文化更具定居性。它本质上是一种生存经济,非常依赖于栽培谷物和豢养动物,谷物主要是大麦和小麦,动物包括山羊、绵羊、牛和猪,当然,野生动物和鱼也还是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巴达里文化相像,涅迦达文化 I 以沿尼罗河大基纳湾一段的中埃及为中心,但它比巴达里文化更宽广。

接下来的一个主要阶段是涅迦达文化 II(大约公元前 3500—前 3200 年),被描绘为前王朝埃及发展中的转折点。涅迦达文化 II 也被称为格尔塞文化,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一种简单的、平均主义的公社演变成了一种有阶层的社会,带有剥削性的精英越来越不同于其他人。随着这种财富和权力的分层,首长制度(chieftainship)出现了首领。这表现于住处和墓地的形制与规模的差别,少数个人拥有更精致的坟墓和更丰富的陪葬品,这是一种趋向,这种趋向萌芽于涅迦达文化 I 时期。大多数墓葬仍然很简单,但丧葬仪式变得更复杂了。

涅迦达文化 II 的物质文化也以冶金术的发展为标志,青铜工具变得更普通了;但燧石制作继续发展,生产出了精致波纹薄片刀。石头制作技术也继续前进,为法老在石头建筑方面的成就奠定了基础。越来越强烈的工艺专门化表明了原始工匠阶级的出现,这个阶级的成员至少能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制作手工艺品而非生产食物,因为他们得到了农业剩余品再分配的支持。劳动分工增加了社会分层,但这两种因素在前王朝后期和早王朝时期导致了创造与发明的巨浪,最终产生了法老埃及的精英文化。

令人震惊的发展发生在涅迦达文化 II 时期的视觉艺术领域,包括圆雕雕塑,圆雕制作方面的极为自由流畅的形式与法老时代的艺术不太相像。涅迦达文化 II 时期的调色板没有涅迦达文化 I 时期多,但装饰着复杂的浮雕,这些浮雕后来记录了叙述性的或纪念性的信息,并且使它们变成了前王朝晚期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档案,尽管它们的阐释具有很高的推测性。权杖标头也装饰着图案,变成了首领和初始国王政治权力的重要象征物。新型陶器出现了,其装饰主题是船只,这是越来越多的贸易和更广泛联系的证据。到涅迦达文化 II 时期结束时,下埃及的本土物质文化已经被涅迦达人造物品代替了,形成政治统一的文化前奏。

在涅迦达文化 II 时期,大多数人或许居住在沿尼罗河的成排小村庄里,但大人口中心也作为政治、宗教和贸易中心而获得发展,主要在

涅迦达、希拉康坡里斯和阿拜多斯。涅迦达的埃及名字是金城（Gold Town）。这个名字体现了涅迦达的经济作用，表明了涅迦达靠近东沙漠珍贵的金属矿和它在哈玛玛特干河谷西端的地理位置。涅迦达提供了从尼罗河谷穿越山脉进入红海的道路和很多贸易机会。涅迦达文化II时期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城镇人口得到了上埃及洪水平原越来越成功的谷物农业的供养，这里的二粒小麦和大麦非常高产，提供了较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涅迦达文化II遗址发现于从三角洲到阿斯旺的沿尼罗河地区。我们对这一时期埃及的政治组织几乎一无所知，但考古证据表明当时存在很多独立而竞争的权力中心。

16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前述内容几乎绝对地聚焦于上埃及。文明的推动力似乎确实源自国家的这个部分，但这个局面受到上埃及证据丰富的优势而发生了偏差，因为三角洲地理状况比较特殊，它给考古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这一点。即便如此，令人激动的前王朝时期的考古发现还是源自三角洲，例如对如下这些遗址的考察或再考察：开罗以南的马阿迪，东三角洲的明沙特·阿布·奥马尔，西三角洲的梅里姆达以及中北三角洲的戴尔·埃尔－法拉（古代的布陀）。接下来的内容更可期待，希望埃及史前史继续被更具代表性的信息所修改。

加速变化发生在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大约公元前3200—前3000年），这是前王朝埃及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埃及国家的统一和古代埃及文明的创造中达到高潮。当19世纪和20世纪的学者首先试图解释法老埃及的出现时，一个主要推测空间是法老埃及产生于埃及内部，还是源自外部。例如，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认为，一个亚洲“新种族”侵入埃及，征服埃及，并强加给埃及文明。还有其他流行的入侵理论，因为它们似乎是对那些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显而易见的解释。然而，随着考古证据的累积，埃及内部持续的发展过程变得清晰了，这表明古代埃及人的成就是本土成就，尽管一些外来征服、联系和刺激仍是可能的，但人们对这些内容的整个过程了解得非常少。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涅迦达文化晚期的关键时刻，今日伊拉克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刺激因素影响到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和很多相关艺术获得了较早发展。文化借用的可能区域是文字、船只设计、艺术惯例、冶金术和砖结构纪念性建筑物。证据包括几个容器和滚筒形印章，这些物件很久以前就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可能被直接进口到埃及。涅迦达文化晚期奢侈品上的大量艺术主题与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主题特别相似。涅迦达文化时期的坟墓具有壁龛式的砖结构建筑物，源自亚洲原型。尽管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和古代埃及文字看上去很不同，但它们包含大量基本的相似性。涅迦达在哈玛玛特干河谷（通往红海）西端的地理位置，尤其在扩张主义阶段和装备着适于航海的船只，为涅迦达与美索不达米亚接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涅迦达的金子和贸易机会强有力地吸引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金匠和商人。然而，即使存在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刺激期，这个时期也是短暂的，而且人们相信，前王朝后期的埃及人可能引进了一些美索不达米亚基本物质，并使它们变成了埃及人自己独有的东西。

另一个借用——相互影响或传播可能是更好的措辞——领域是生存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西南亚获得发展，其特征是持久农业定居点的人们对某些动植物的驯养和培植。这里联系的通道是三角洲。这是在前王朝时代相对长期的扩张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在其他事物中一样，古代埃及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经济模式进行调整以适应他们自己的环境，并以革新的方式进行调整。到涅迦达文化III阶段为止，那种维持古代埃及文明的水利灌溉组织获得了长远进步，人们构建了水渠和垂直堤坝。无论在哪里，泛滥一旦在自然水池里停留，那么人们便挖掘大盆地，把水保存起来，以便在必要时随时放水。盆地灌溉的发明传统上归功于第一王朝伊始的国王美尼斯，但盆地灌溉或许在他统治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无论如何这只是神话。根据零王朝的蝎子王杖标头上的一个场景的阐释，它展示出，在涅迦达文化III晚期，国王手持锄头，准备开始掘土建堤防。

如此巨大而复杂的灌溉系统的发展与维护显然需要相应庞大而复杂的行政组织,这导致了无法获得答案的"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即组织激发灌溉,还是灌溉引起组织。然而,一旦时机成熟,当灌溉社会提供更大量的和更加可预测的农业剩余时,那么两种发展就相互加强。接下来,这些发展便会支持正在成长的剥削精英,提供越来越不同的非农业技术,支持区域首领的野心,这些首领试图通过不断的扩张过程拓展他们对那些具有更多资源的地区的控制。

18

叙写涅迦达文化 III 时期的政治史,从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它的一些概要内容还是能够辨别出来的。在一个像埃及这样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社会里,首领与日俱增的要求只能通过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得以满足。当地方公社变得更大时,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导致更大的政治体的出现。希拉康坡里斯是上埃及的主要宗教中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拉康坡里斯的早期国王们似乎把首都迁到了阿拜多斯,阿拜多斯是另一个重要宗教崇拜中心,位于今日梭哈格以南 40 公里的地方;或者希拉康坡里斯似乎已经落入那些来自阿拜多斯的国王们的控制之下。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涅迦达文化 III 的早期阶段,上埃及的大部分地区或许被单一国王统治了,这个国王从阿拜多斯实施统治。

物质文化方面的进步与迅速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保持同步。惯例似乎变成了古代埃及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登记簿中对场景的描绘,地平线的使用,人物的相对尺寸和反复出现的主题。就像在涅迦达文化 II 阶段那样,这种物质文化扩展到了整个埃及。它的扩展方向显然是从南至北,但这种假设是以不完整的考古报告和从那些关于前王朝国王们的传说中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的。

地域的合并伴随着军事征服,这一点尤其由发现于希拉康坡里斯的调色板和权杖标头证明了。残缺的利比亚调色板可能描绘了遭受围攻的城镇,而蝎子王杖标头包含战斗的场面,尽管埃及学家们对这些物件的解释存在争论。其他调色板描绘了绑缚的战俘上面的神军旗,描绘了遭受屠杀的敌人被踩踏在脚下,并将被兀鹫和野兽吃掉。当一个

统治者获得了对沿尼罗河土地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时,这个过程到达了终点。埃及的政治统一最迟发生在大约公元前2950年第一王朝的国王那尔迈统治时期,那尔迈调色板是关于地域合并过程最著名的史料,但这个合并过程至少在实质程度上已经被涅迦达文化III晚期的国王们完成了。正因为这一点,学者们把存在争议的零王朝作为马涅陀的王朝安排的开端。

19

我们称之为统一的成就不一定根据传统的和简单的斗争观进行解释,即两个竞争的政治体——上埃及和下埃及——之间的斗争,最终上埃及获得胜利。这种观念主要以神话和古埃及人二元性的倾向为基础,不再被学者们接受,没有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尽管地域合并的主动者来自上埃及。然而,两土地的观念在古代埃及是极为重要的。国王戴着双王冠,每个王冠都代表一块土地。国王采用的王衔也把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象征物合并起来。

早王朝时期

统一的埃及国家的前三个王朝时代被视作早王朝时期(大约公元前2950—前2613年),或者有时被视作古风时期[①]。这是一个持续发展、试验和创新时期,与前王朝晚期的状况非常相像。作为古代埃及文明的特征,固定的政治、艺术和宗教标准仍在形成之中,尽管一旦它们得以形成,那么它们就会以这样的程度建立起来,以至于它们保持强烈明显的相似性达几千年之久,结果它们几乎是静态的。这种保守主义是高度创造过程的奇怪结果,但它表明古代埃及人发展了一些他们感到极为舒适的形式。我们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事物并不总是像它们外在表现的那样静态。正如一位埃及学家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一种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总是用保守的词汇表述,来达到掩饰的

① 一些划分方法把早王朝时期限定在前两个王朝。

目的”。

尽管埃及在零王朝时期被统一起来，但正是在第一王朝统治时期，发展的中心和政治权力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了北方，而且孟菲斯城在三角洲的顶点建立起来，位于今日开罗西南尼罗河西岸。孟菲斯变成 20 了埃及国家的管理中心。孟菲斯的埃及名字是荫奈布－海杰（Ineb－hedj），即“白墙”（White Wall）；孟菲斯的纪念性建筑策略性地坐落在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结合点，必定是强有力的政治的表述，尤其随着紧挨着孟菲斯城的沙漠高原上壮丽丧葬纪念物的发展。孟菲斯在接下来2500 年的时间里保持其在国家管理方面的重要性。

孟菲斯的极度重要性可能被强化了，因为除了石头碎片和碎石堆而外，我们今日几乎看不到孟菲斯的身影。孟菲斯从来就没有被正规地挖掘，但萨卡拉的大量毗邻墓地诉说了一些关于孟菲斯的故事。随着孟菲斯的兴起，阿拜多斯失去了它的政治职能，但它始终是主要的宗教崇拜中心。第一王朝所有国王的坟墓都在阿拜多斯，第二王朝的一些国王的坟墓也在这里，尽管他们的高级官员或许埋葬在萨卡拉高地边缘的巨大神龛式坟墓里。

“历史”时期被认为开始于第一王朝，但厘清早王朝时期的历史是非常不确定的任务。第一王朝国王们在阿拜多斯的坟墓是主要信息来源，因为虽然它们在古代就被广泛抢劫了，然后在 19 世纪被不称职的考古发掘者破坏，但后来的考古工作从这些坟墓里提取了有价值的信息。这些坟墓是前王朝晚期为有权力的个体提供更多、更富有的丧葬之倾向的继续。巨大的日干泥砖结构上层建筑物站在地下埋葬间和储物间上面。这种类型的坟墓被称为马斯塔巴（*mastabas*），广泛用于早王朝和古王国时期的精英丧葬。成对的石碑附着于阿拜多斯的坟墓，宣布了坟墓占据者的身份。储物间的内容经常记录在古朴象形文字标签上。一些石碑和标签已经被发现了。

考古学家因这样的发现而震惊，即第一王朝的国王们采取人殉的丧葬方式。当国王们死去时，他们令整个家族——卫兵、官员、妇女、侏

儒(早期国王们迷恋侏儒)甚至他们的狗——陪葬,以使整个家族在来
 世为他们服务。国王杰尔大约由六百个牺牲的家臣陪伴着,这些家臣被埋葬在卫星坟墓里,卫星坟墓围绕着国王的坟墓成行地排列。死亡显然是通过勒杀的方式造成的,旨在保持尸体的完整。第一王朝以后,人殉断断续续地实施。人被夏巴梯(*shabtis*)代替,这是一种小塑像,被认为能够提供永恒服务。为了实现永恒服务的职能,夏巴梯依附了魔法咒语而充满能量。魔法咒语后来被描述在《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里。《亡灵书》直到中王国末期才出现,是对进入来世的旅行者的指引。

第一王朝的国王当中最著名的是登王。考虑到他很长的统治时间,他一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登上了王位。他的精英阶层不寻常数量的坟墓(主要在萨卡拉,而非阿拜多斯)验证了蒸蒸日上的行政管理,尽管他的土地普查表明了更系统的资源(人口和农业)开发因文字艺术的迅速发展而成为可能,文字到前王朝时期末就已经出现了。证据表明了他在亚洲和利比亚对抗敌人的军事行动。更高水平的工艺技能在登王统治时期的艺术产品中可以辨别出来。两卷没有铭刻文字的纸草发现于登王的坟墓里,是最早的纸制造的证据。

相较于一般性的证据和知识与日俱增的趋势,第一王朝被相当好地整理出来,至少在统治者的序列方面是这样,但第二王朝是更模糊的。尽管第一王朝在阿拜多斯的墓葬已经很清楚了,但第二王朝的很多国王坟墓的地点还没确定下来。尽管第二王朝最后两个君主——帕里布森和哈塞海姆——的坟墓位于阿拜多斯第一王朝国王坟墓附近,但第二王朝的大多数国王埋葬在萨卡拉,这很可能,但绝不是确定无疑的。一些迹象表明从第一王朝向第二王朝的转变之间发生了混乱,而且更强烈的但仍不确定的证据表明第二王朝有一个混乱时期。分权主义势力还未被中央集权化的国王完全征服,或许重复主张分权,并且不得不在内战中被镇压。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历史的模糊性在第三王朝(大约公元前

2686—前 2613 年)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第三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是涅铁莱凯特。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左塞。他是所有早王朝国王当中最有声望的国王,但即使与他的统治有关的所谓的事实大多也是传说,这些传说是埃及历史的几个晚近时期出现的。然而,关于左塞王的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是,他在萨卡拉建立了阶梯金字塔,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巨大的石头建筑物,是从古至今敬畏的起源。这座金字塔展现了一种迹象,即统一的埃及已经获得了一定水平的技术掌控能力、经济权威和中央集权的控制力,这使得埃及能够实施纪念性建筑物的建构工程,工程的巨大规模是任何其他古代文明的工程无法匹敌的。

在最初的设想中,阶梯金字塔恰恰是另一个国王的马斯塔巴,只是在材料和规模上特殊而已,用石头而非泥砖建构。然而,随着建筑工程的进行,连续的修整把最初的设计方案转变成了与原有事物十分不同的形式,这对法老时代及之后的其他建筑物造成了深刻影响。规模被扩大,结果一块马斯塔巴被堆叠在另一块马斯塔巴之上,最后形成了一个拥有六个阶层的金字塔,高 60 米,占地面积是 121 米×109 米。

阶梯金字塔的地上建筑只是其很多特征之一。地下通道在第二王朝时期的国王坟墓中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但在阶梯金字塔下面延伸的并不是迷宫式的曲径,有大量走廊,最终通往巨大的中央竖井,竖井里面有大理石丧葬墓穴。一位埃及学家把阶梯金字塔的地下部分描述为“地下宫殿”,但阶梯金字塔的地下空间从来就不能与后来的金字塔相匹敌。金字塔被巨大的壁龛式石头围墙环绕着,这些围墙的很多部分已经被修复和重建。

阶梯金字塔不仅把永恒的荣誉授予左塞王,也授予他的维西尔伊姆霍特普,后者是金字塔的建筑师。伊姆霍特普因智慧而获得了这样的声誉,以至于他在后期埃及逐渐被崇拜为知识、语言和医学之神。埃及人把他与托特神和普塔神联系起来;希腊人把他等同于阿斯克勒庇俄斯神。朝圣者来到伊姆霍特普的崇拜中心萨卡拉,希望伊姆霍特普

治愈自己的病症,留下木乃伊朱鹭作为奉献祭品,木乃伊上刻着伊姆霍特普的名字,朱鹭是托特神的象征物。伊姆霍特普一定被埋葬在萨卡拉了,但他的坟墓迄今为止也未被识别出来,它可能还没被发现。

在第三王朝左塞王之后,没有任何国王能够重复左塞王的纪念性建筑的成就,尽管不乏实验者。左塞王的继承者塞凯姆凯特开始建筑阶梯金字塔,但这座金字塔从未离开过地面。这座金字塔就是著名的"地面金字塔"。塞凯姆凯特旨在使它比左塞王的金字塔更高,但他仅仅完成了地下通道和地基的建筑,或许因为他的统治是短暂的。另一座沉闷地失败的阶梯金字塔是"薄层金字塔",或许属于国王卡阿巴,位于萨卡拉和吉萨之间的扎维特·埃尔-雅利安。统治的短暂或许同样是金字塔未完成的原因。几座小规模的未完成的阶梯金字塔被暂时归于国王胡尼,他是第三王朝最后一位国王。这些阶梯金字塔分布在埃及各地,其中一个远在阿斯旺以南地区。

尽管左塞王的阶梯金字塔都是革新主义的产物,但无论从前面看,还是从后面看,它的基本观念仍是马斯塔巴的设计,是马斯塔巴的增加和扩大版。尽管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巨大石头建筑,但人们在建筑金字塔时,就像使用泥砖那样大量地使用石头材料,完全没有考虑石头的特殊性。显然,采石和运送巨大石块的技术仍未充分发展起来。真正的金字塔时代将在下一个王朝开始。

第三王朝的最后几年就像整个王朝那样模糊不清。现代学术把五个或六个国王安排在第三王朝,统治年限大约 75 年,而马涅陀列举了七个之多的国王,统治期限总共 200 年。马涅陀的时间范围太长了,而且他记录的从第三王朝向第四王朝的转变引起了问题,因为第三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胡尼是第四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斯尼弗鲁的父亲。没有明显的变化原因。然而,尽管马涅陀在年代学方面是错误的,但他很可能了解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第四王朝的开始也可以视作古王国(大约公元前 2613—前 2160 年)的开端。随着第四王朝的开始,古代埃及文明似乎突然在特别明显的形态中活跃起来,这些形态如此稳固

地确定下来，并如此持久——还如此万能和如此适应，以至于很多形态直到3000年以后还继续起作用。

第三章　古王国

25 古王国的埃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是稳固而自给自足的世界。我们可以将其视作文化绿洲。北方是大海，三角洲是通往大海的屏障，而不是联系点，因为一艘适于远航的船只很难驶进三角洲的支流。古代埃及没有海港。东面和西面是巨大的沙漠屏障。只有从东北方才有可能依靠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工具进入埃及，但没有强大的敌人从那个方向威胁埃及。在南方，第一瀑布阻止进一步航行，并为埃及提供一些保护。古王国的埃及之所以能够自给自足，是因为它的土地能够提供大量产品，例如谷物、水果、油料作物、织物、亚麻、纸莎草，而且当时的埃及人还能够驯养动物、狩猎和捕鱼。一个基本的不足是建筑木材的缺乏，这能够通过与黎巴嫩的贸易容易地解决，埃及人认真地控制着这种木材贸易。古王国大多数时候十分稳定的泛滥，这确保了土地的生产力。一份第五王朝的纸莎草写道："秩序井然，效力持久。自从奥西里斯时代以来，秩序就未受干扰。"

古王国的埃及不是一个扩张主义社会，但在努比亚的行动是例外，26 因为古代埃及人始终感到自己无论如何都对努比亚拥有所有权。艾利藩厅岛恰恰位于阿斯旺第一瀑布下游，在早王朝时期就设防了；在零王朝和第一王朝，埃及人的控制扩展到下努比亚，文献记载的军事行动远至第二瀑布。军事和贸易站点是否在早王朝时期建立起来，还不清楚，

但一个站点确实于古王国早期在努比亚建立起来。埃及人没有试图在努比亚建立省管理体系，努比亚的当地人口反复遭受埃及人入侵的破坏。在亚洲，设防的定居点于早王朝晚期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而且这些定居点在第一王朝继续存在，但之后便消失了。直到第六王朝，广泛的军事行动才在巴勒斯坦进行，主要是为了抵抗"沙漠居民"，保卫边界的安全。甚至埃及的三角洲东北部显然不是古王国省体系的正式组成部分，因为它不值得国家耗资耗神地维持。

古代埃及国家具体化为国王。国王也称法老，这个词的意思是"大房子"，最初指代国王的宫殿，后来应用于国王本人。国王作为神统治一个统一的上下埃及王国，是一位被赋予了某种超自然力的神；他被崇拜为神，也作为神而受到人们的服从。这个神王的职能是神与人类之间的中介，尤其在分配和调节玛阿特（*maat*）方面。玛阿特是古代埃及极为重要的概念。玛阿特可以翻译为几个不同的概念，例如"真理"、"秩序"、"正确行为"和"正义"；首要的是，它是埃及人的行事方式。国王甚至在死后还继续履行这种职责，而且因为所有的国王都是永恒的，所以他们的坟墓的重要性和丧葬崇拜与国王息息相关。

国王的权威是巨大的。在理论上，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实践中，他拥有埃及的土地，有资格拥有埃及土地的产品。国家税收制度到早王朝时代就已经确立下来。在古王国时期，这种税收制度被强有力地应用。为了使土地更具生产力，以满足宫廷越来越高的需求，古王国还采取了很多新措施。税务按实物征收，即根据产品的比例征收。货币直到托勒密时期才出现在埃及，法老时代没有货币税收。国王占有大批农业剩余产品，并按照他希望的方式再分配这些剩余产品，这是他的权力基础。通过所谓的强制劳役制度，国王能够为他的工程聚集大量工人。27 所有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服从国王的控制。中央政府是所有人的雇主和专员，人们的服务或产品的生产都有益于国王和社会精英。这是经济的驱动力。我们所说的商业在古王国占有较小的比重。普通人生产他们消费的大多数产品；其他必需品，例如盐、油和衣服，由不动产（国有

土地——译者注)提供。普通人在不动产上劳动,他们束缚于不动产。地方市场的规模很小,局限于它们的分配能力之内。

国家的事务数量越来越多,这需要有职业官员操纵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官僚机构。在第四王朝,国王的亲属控制了大多数最高政府机关,但大量普通人也开始占据管理职位。最高政府机关是维西尔。维西尔直接对国王负责,他的权力深入到国家管理的各个领域,宗教事务除外。某些部门收集和储存国王的税务收集者征收上来的农业剩余产品。赠品的主人(Master of the Largess)指导这些剩余产品的分配。另一个强有力的官员是王室工作的监督者(Overseer of Royal Works)。国王与其高级管理者的关系在吉萨金字塔中展示出来,吉萨的金字塔周围是秩序井然、纵横排列的高级官员的马斯塔巴。高级官员在活着时为国王服务,死后也要为国王服务。

上下埃及王国被分成很多省,上埃及有 22 个省,下埃及有 20 个省。这些省被称为诺姆,尽管"诺姆"这个词①直到托勒密王朝才得到使用。诺姆的长官,或者诺姆长,把办公总部设在省会城市。第五王朝设立了一个较高级的地区长官,他就是上埃及的监督者。诺姆制度是非常持久的,一直持续到罗马时代。

我们很难过高强调古代埃及文明当中王权制度和宫廷文化的重要性,尤其在古王国时期。文字的发展与国王管理的需要密切联系起来。国王需要协调和供给大群工人,保持税收记录,确定和分配产品,记录尼罗河洪水。这刺激了书吏官僚机构的发展。或许不到 1%或 2%的人口能够读写,但这些为数极少的具有读写能力的人获得了晋升和掌权的手段。结果,甚至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也为自己的书吏出身而感到自豪,并按传统的书吏姿态描绘自己:手中握着书写工具。书吏职业的吸引力在中王国的《职业的讽刺》(*Satire on the Trades*)中得到赞美:

28

① 一说法老时期如此称,埃及语是 spat。——出版者注

瞧，所有职业都有上司，
除了书吏；书吏就是上司。
因此如果你了解书写，
那么它将对你更有利，
与我给你讲的那些职业相比，
每个职业都比另一个职业更悲惨。[1]

在古王国的一篇《金字塔文》(*Pyramid Texts*)中，国王处于众神的神圣书吏的地位。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联系可能刺激了古代埃及文字的产生，尽管文字首先在哪个领域开始这一点还不清楚。即使其他人提供了关于文字的思想，古代埃及人随后便把它转变成纯粹原初而彻底的埃及语。埃及人最著名的文字形式是象形文字(hieroglyph)，这个词的意思是"祭司使用的文字"，这个词是古代希腊人用于描述埃及装饰性字体的。尚存纪念物或特别重要的文献便是用这种字体书写的。重要文献被书写在像纸一样的材料上，后者被称为纸莎草，是用埃及沼泽地中生长的植物的茎制作的。尽管这种字体看上去像图画，但古代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在本质上首先是表音字，尽管绝不是完全如此；换句话说，它们通常结合起来形成表音文字，与拉丁字母相像，尽管单个象形符号的作用仅仅是表意符号。表意符号代表物体，它们与物体相像，或更多地与概念密切相关。到第一王朝末期，象形文字已经失去了很多图画功能，并被用于书写完整的句子。

随着时间的发展，用于书写古代埃及语的两个其他字体发展起来。僧侣体是高度简化的，是更加草书体形式的象形文字，到早王朝末期就被使用了。它能够用笔书写，而非用凿子或毛笔书写，可以写在纸草之外的材料上，尤其陶片或陶瓷碎片，这些材料可以在任何固定地点周围大量地获得。另一种字体被称为世俗体，是在后期埃及设计出来的。世俗体比僧侣体更草书化，在那些未受过教导的人看来，世俗体文字就

像没有断句符号的文字排列，但它的用途却从纪念性建筑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它是著名的罗塞塔石碑的文字之一，是 19 世纪早期象形文字解读中的关键因素。

尽管它们书写起来笨拙，而且作为“字母”存在很多缺点，但象形文字一直很流行。在古代，象形文字是神秘的，甚至激发敬畏感，它们既是装饰符号，也起到了交流的功能。它们也是人类从托特神那里获得的礼物，因此象形文字的保持具有宗教原因，而且它们的魔法功效被认为比其他文字更强大。象形文字在整个法老时期一直得到使用，甚至使用到罗马时代。

国王的名字用象形文字书写，并以特殊的形式开始，这使它们立刻呈现为国王权力的表述，无论观看者能否读懂它。在前三个王朝时期，国王的名字被放在一个宫殿门面（*serekh*）里面，隼鹰站在宫殿门面之上。隼鹰是神荷鲁斯的象征，该神与国王联系密切。在后来的王朝时期，国王的两个主要名字（国王总共有五个名字）被放在椭圆形圈里面，这个圈被称为王名圈（*cartouche*）。图特摩斯三世在这方面做得最彻底，他使帝王谷中自己的埋葬间呈王名圈形状。甚至在法老时代之后，托勒密国王和罗马皇帝的名字都被放在王名圈里面，强调他们也是埃及正统的神王。

在古代埃及，口语和书面语是所谓的亚－非语系或闪－含语系的成员。这个大语系的其他成员包括闪族语言，例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北非的柏柏尔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任何研究过阿拉伯语和古代埃及语的人都会对大量明显特征产生深刻印象。在长时段的古代埃及史中，埃及语经历了很多基本变化，比从乔叟式英语或莎士比亚式英语向现代英语的转变更激烈，包括发音和词汇的变化以及从其他语言引进外来语。甚至在同一时代，埃及语也可能有不同，依赖于表述什么和谁在表述。例如，宗教文献使用古朴语言，而个人书信则用更口语的形式书写。证据表明埃及语存在不同的方言，以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为基础。

宫廷文化也是古代埃及艺术的驱动力。到古王国开始时，埃及文化的基本模式已经形成。这些模式在接下来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被调整和改变，但保持着明显的共性，结果是，甚至没有背景知识的观察者也可能一眼就看出哪些是古王国或新王国的物件，并本能地把它们都归为“古代埃及人的物件”。这种独特的表征部分上是严格艺术惯例的结果，现代学者称其为法则。例如，人物被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当人们从侧面描绘时，他们的肩成直角地转向前方，而他们的臀和腿与头相似，都转向侧面，这是一种不自然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姿势。同样地，国王的站像以很少变化的特征呈现出来，例如绝对固定地向前方凝视，紧握双拳，左脚向前迈出。与国王站在一起的可能是国王的妻子和女儿们的小雕像，最初几乎未引起重视，他们的相对大小的尺寸反映了他们在埃及社会中的相对重要性。

在古王国时期，艺术法则是最严格的。尽管古王国之后艺术法则的很多原则仍然强有力地保持下来，但资助人和艺术家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证明自己能够进行令人震惊的革新，即使在整个流行的艺术惯例范围内进行创作，也能做到这点。最戏剧性的偏离点将在新王国的艺术中发现，尤其在那个时期的贵族赞助的作品中和短暂的阿玛尔纳艺术插曲中可以发现这种偏离，阿玛尔纳艺术的特点是强烈的自然主义因素。在后期埃及，当古代埃及的伟大时代逝去时，出现了严格模式的回归，这些模式甚至是远古时代的，因为艺术家生产的作品以古王国的作品为模型，努力唤起人们对伟大过去的认识。

因为古代埃及国家强烈地需要艺术品来装饰宫殿和神庙，或奖赏管理人员，但首要的是用于丧葬，所以埃及国家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以至于艺术能够被描述为古埃及国家的一个职能这样的程度。艺术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它需要高水平官僚机构和大部分国家资源的投入，以监督和维持很多不同专业的生产，例如制陶业、珠宝业、金匠行业、木工行业、绘画和雕塑。单就雕塑业为例，不仅维持雕塑家的生活和其作坊的运转是必需的，还要监督石头或其他材料的开采

与运输以及未完成物体的合适安置。艺术标准不得不被理解和执行，因为艺术具有很强的功能目的，这导致一些人认为，官僚监督可能是古代埃及艺术具有相对静态性质的原因。

在古代埃及，艺术并不是为了艺术的发展而被实践，艺术家也不能享有特殊的地位，而艺术家在近代早期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享有特殊的地位。古埃及的艺术家是与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工匠，这在他们的丧葬中表现的很清楚。他们的丧葬是很普通的，除了偶尔包含一些他们使用过的工具，几乎没有其他陪葬品。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匿名劳动，尽管几个艺术家成功地留下了他们个性的标志，例如雕塑家的监督者尼安柯普塔，他把自己描绘在萨卡拉普塔霍特普小礼拜堂的浮雕里。然而，个人的身份低微没有阻止人们掌握高水平的技术。古王国时期保存下来的很多作品不是工匠的作品，而是杰出雕塑家的作品。拉赫特普王子和其妻子诺夫瑞特的等身雕像存放于美杜姆第四王朝早期的马斯塔巴墓，现在存放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穿越 4500 多年的时空隧道以后，向我们投射出强有力的写实感。

在古王国如此多的领域，国王在宗教领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他是宗教的功能部分，渗透到了古埃及人生活的每个方面。国王本身就是神，只有他才能与神进行直接交流。他是最高宗教官员。在理论上，国王在所有神庙中执行所有服务；祭司们以国王的名义行事。仅仅在较晚期，随着"个人的虔诚"可以导致个人与神接触等现象的发展，国王独一无二的特权才开始丧失。

古代埃及宗教包含如此多的因素，而且一些因素是相互矛盾的，所有因素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至于用系统的方法描述它，或者提供对埃及任何时期都有意义的全面的埃及万神殿，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任务。古代埃及宗教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特性之一是它的地方主义，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三角洲布巴斯提斯城的保护神是巴斯泰特，赫尔摩坡里斯·麦格纳的保护神是托特。它们仅仅是很多这类事例中的两个。神有时在主要崇拜中心被组织成父亲、母亲和儿

子关系的三联神。阿蒙、穆特和孔苏是与底比斯有关的三联神；孟菲斯的三联神是普塔、塞克麦特和尼菲尔泰姆；其他中心也有自己的三联神。当城镇的政治重要性增加时，它们的神的影响范围也得到扩展，就像孟菲斯的普塔神或底比斯的阿蒙神那样。在较早的时代，神被想象为动物：巴斯泰特被想象为雌狮子(后来被想象为猫)，托特被想象为朱鹭，哈托尔被想象为母牛，索贝克被想象为鳄鱼，等等。艺术惯例有时把它们表现为人和动物特征的结合体，因此荷鲁斯被描绘为人身隼鹰头的人，而塞克麦特表现为狮头妇女。神也被描绘为完全神人同形同性的形式，也就是说，被描绘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尽管这种描绘是高度理想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神通过汇合过程发生变化，两个或更多神的特征被融合成一个神的特征。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例是阿蒙神与拉神在新王国时期合并成了超然的阿蒙－拉神。

一个重要不同可能存在于这样两方面之间。一方面是“国家”宗教，另一方面是“家庭”宗教或“流行”宗教。国家宗教主要涉及王权事务和国家行为。家庭宗教聚焦于对个人和家庭的关心，尤其通过家庭灾难转移不幸，例如分娩死亡。家庭宗教无疑比国家宗教更直接地触及大量人们的生活，但它很少能在考古报告中呈现出来。贝斯和陶瑞特是重要的家庭保护神。

随着这种神与宗教涉及领域的混淆，古代埃及人发展了丰富的神学传说。很多神话在宗教肖像学中表现出来，但我们几乎没有足够的现存文献证据充分解释它们，并理解它们对那个时代的人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以连贯的形式幸存下来的神话是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荷鲁斯神话，虽然它是在很晚近的时候由罗马作家普鲁塔克保留下来的。这个神话根植于原初时代，对于古代埃及的王权制度至为重要。 33

根据这个神话，奥西里斯神与他的妹妹伊西斯结婚。奥西里斯是埃及的第一个国王，把他的人们带出蒙昧时代，教给他们文明的艺术。但他的弟弟塞特嫉妒他，觊觎王权，杀害了他，并肢解了他的尸体，抛散在尼罗河各处。悲痛的伊西斯把奥西里斯的尸体碎片集合起来，从而

制造了第一具木乃伊,并把生命吹到奥西里斯体内。在这个过程中,伊西斯怀上了他们的儿子荷鲁斯。当荷鲁斯长大成人时,他在绝望而血腥的战斗中打败了塞特。荷鲁斯变成了活人的统治者,复活的奥西里斯变成了死者的国王。当荷鲁斯去世时,他变成了奥西里斯,而他的儿子即下一个荷鲁斯继续这种生、死、复活和来生的过程。

法老以类似的方式在活着时等同于荷鲁斯,去世以后等同于奥西里斯,在两个王国实施国王的职能。后面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在国王木乃伊形态的描绘中频频体现出来,例如拉美修姆立柱上面和阿布·辛拜勒内部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那些国王木乃伊描绘,在这些描绘中,他被紧紧地包裹着,手握统治的象征物置于胸前,头戴明显的奥西里斯王冠。在早期时代,这种荷鲁斯-奥西里斯的层递绝对是国王的特权,但随着古王国以后开始的“来世生活的民主化”的发展,任何人都热望复活为奥西里斯。

古代埃及宗教信仰非常强调永恒的来世。为永恒来世做准备的工作是人们如此高度关心的事情,并消费如此大比例的国家资源,以至于一位埃及学家把丧葬纪念物的建筑和装备描述为古王国“唯一最大的工业”。大多数人埋葬在沙漠边缘的简单墓穴里,但精英的理想是优质坟墓。很多个人显然把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准备自己死后的居所。国王能够确保其臣民忠诚的一种方式是许诺为他们提供好的坟墓。坟墓绝不仅仅是纪念物,是有效的机构,以这样的方式保存尸体,以至于死者的卡(*ka*)和巴(*ba*)——古代埃及人的个人、灵魂和精灵观念,是相当复杂的——能够以必要的方式相互影响,形成阿克(*akh*),以便享有永恒的舒适和幸福。如果人们能够支付得起,那么他们就会为他们的坟墓捐赠,结果一个祭司和其后代将永远正规地提供食物和饮品以维持死者的卡,并执行指定的仪式。这是那些在埃及从法老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一直持续到今日的风俗之一,因为甚至在今日,人们经常访问去世亲属的坟墓,携带着装满食物和饮品的篮子,在坟墓当场消费掉,并伴随着对《可兰经》的吟诵。

永恒的存在不仅需要适宜精灵居住的地方，还需要保存身体，因此木乃伊制作被设计出来，用于阻止尸体的腐烂，尽可能把尸体保持在易于识别的状态。几周的准备之后，尸体被用亚麻绷带包裹起来，放在棺材里，棺材可能接下来被放进一个外棺里。这个过程被一群高度专业化的人执行，受到那些具有祭司职衔的人们的监督，伴随着复杂的魔法仪式。较便宜的木乃伊模式被提供给不太富有的人。但大多数人没有制成木乃伊就直接埋葬在沙子里。沙子的自然脱水往往把他们的尸体保护得极好，有时比木乃伊还好。

尽管木乃伊的制作在很多时代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但它再次表明古代埃及人对死亡和来世的极度重视并不是病态的表达。事实恰恰相反。他们享受生活，并想永远活着，但毫不担心饥饿、疲劳、疾病、遗失和老年。木乃伊的制作仪式结束后，祭司这样吟诵："你活着；你永远活着。瞧！你再度而且永远年轻！"

古王国时期，国王的管理对埃及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是金字塔的构建，金字塔是古埃及的精髓象征。为了建筑金字塔，国家的经济不得不组织起来，不得不最大程度地扩展。国王和剥削精英几乎能够通过税收掌握埃及所有可得到的剩余资源，能够聚集王室苦役劳力，并把它应用于金字塔的建筑，这个事实不仅是对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十分发达的官僚机构的效率的检验，还是对关于社会本质的意识形态在多大范围内被分享和它应该怎样起作用的验证。

35

斯尼弗鲁（大约公元前 2613—前 2494 年）是第四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最伟大的金字塔建筑者。他的儿子胡夫在吉萨建造的金字塔是埃及曾经构建的最大的金字塔，但胡夫仅仅建造了一座金字塔；斯尼弗鲁至少建造了两座或三座金字塔，它们的量合并起来远远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位法老的金字塔。斯尼弗鲁的金字塔在设计和规模上都是突出的。第三王朝晚期他的前辈们只是像左塞王那样尝试着建造阶梯金字塔，斯尼弗鲁与他们不同，他把阶梯金字塔转变成了真正金字塔，这种金字塔的底座呈正方形，具有光滑的四面，四个面在顶部最高点汇合。

转变并不是立即完成的。斯尼弗鲁的第一座金字塔在美杜姆,位于孟菲斯以南大约 60 公里的地方,以阶梯金字塔开始建筑,与萨卡拉的左塞王金字塔相像。当他被建成时,或者当它的第一阶段被建成时,斯尼弗鲁向北移动到更靠近孟菲斯的达赫淑尔。他在达赫淑尔不是建筑一座金字塔,而是建筑了两座金字塔。一个是弯曲金字塔或长斜方形金字塔。另一个是北方金字塔,也称红色金字塔,因为它的石头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玫瑰红色。弯曲金字塔是两个金字塔中最先建筑的,但当它达到高于预计高度的一半时,它的外面的角度被突然从 55°减少到 43°,使它表现出了古怪的形状。角度变化的原因还不得而知,但可能是结构变化的结果。斯尼弗鲁完成了弯曲金字塔,但开始建筑北方金字塔,这座金字塔不寻常低的 43°倾斜角可能是弯曲金字塔的经验所致。到他统治末期,斯尼弗鲁转向美杜姆,试图建筑另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把阶梯金字塔转变成了真正金字塔。然而,在某个时候,它的外层坍塌了,结果美杜姆的金字塔没有金字塔的外表,只是一座立于山丘上的塔。这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这是埃及学家们热烈争论的问题。一些埃及学家断言,它发生在金字塔构建过程中(并受到弯曲金字塔的影响);其他学者认为,它直到新王国甚或中世纪才发生。

斯尼弗鲁的继承者胡夫(大约公元前 2589—前 2566 年),也被称为基奥普斯,在吉萨高原上为他的金字塔选择了一个显著地点。这种事例被第四王朝后来的两位国王所效仿,他们是哈夫拉(大约公元前 2558—前 2532 年)和孟考拉(大约公元前 2532—前 2503 年),他们的金字塔与胡夫的金字塔略呈直线,这创造了埃及几个金字塔区中最著名的一个。胡夫的大金字塔最初高 147 米(它后来丧失了大约三米高),底座每边长 230 米。当人们考虑到大金字塔与所有古王国金字塔一样,也是更大的复合建筑的一部分时,这个成就更令人惊愕。复合建筑是第四王朝的又一大创新。除了大金字塔,还有一个卫星金字塔、三个王后金字塔,至少七个船坑(内有穿越天空绕太阳航行的船只)、一座与金字塔毗邻的葬祭庙、一条通往尼罗河谷的长长的甬道、一座河谷

庙、金字塔东西各一座庞大的死者之城，国王的高级官员埋葬在这里的巨大石头马斯塔巴墓里面，像现代城市街道那样一行行地排列起来。

金字塔想当然被设计为国王的坟墓。什么样的社会能把如此多的资源用于这样一种目的？这样的疑问是以对古王国和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误解为基础的。金字塔的构建方法曾经是一个大秘密，大部分已经被埃及学家们考察出来了，尽管一些方面仍不确然。很多石头是从附近开采的，较优质的石灰石是人们为了完成工程而从图拉经尼罗河运到金字塔工地的。最可能的情况是，石块沿着巨大的土坡被拖到适当的地方。很多工作是在泛滥季节完成的。在泛滥季节，尼罗河河水散布到洪水平原，提供了进入工作地点的便利通道，洪水造成的尼罗河河床比现在更靠近孟菲斯和吉萨，同时工人们也不需要在农田里工作。即使这样，过程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据估计，为了在胡夫统治时期完成大金字塔，显然也是这样完成的，在建金字塔的每个工作日里每两三分钟就有一块石头奇迹般地放置到准确的位置上。这些石头平均重2.5吨，而且一些石头更重。整个过程——采石、运输、建筑、聚集工人、然后为工人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一定把国家的经济压缩到了极限。最近在金字塔附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工人的生活提供了新洞察。

金字塔复合建筑物不仅仅是给予去世国王的纪念性建筑。它还是一种繁盛而持续的制度。尽管金字塔本身是金字塔建筑群的主要构成要素，但仅仅是很多要素之一，而且从功能观的角度看，金字塔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要素。所有神庙复合建筑都是为了维持国王的祭仪而建筑的，通常分布广阔，有时靠近金字塔，尽管它们可能距离金字塔有一段距离；或者它们依靠当政国库的持续税收生存。例如，斯尼弗鲁两个金字塔祭仪当中的每一个都是单独进行的，由一个祭司性的官僚委员会指导，这些官僚监督祭仪广泛的经济活动。尽管激发神庙祭仪的意识形态是为去世国王履行规定的仪式，为了维持国王的卡而提供必要的物质祭品，但祭仪变成了土地的整个经济组织中最重要的制度。

我们不可能准确地说出神庙祭司集团控制多少土地，但土地面积

很大，而且随着每个新金字塔的建立和对地方神庙的新捐赠而增加。与信徒对地方神庙的捐赠结合起来，神庙祭司集团是埃及资源的开发与再分配中的主要力量。祭品是为了去世的神－王而聚集起来的，当然未被神－王物质地消费。一些祭品被神庙职员保存起来；一些祭品被再分配给神庙的很多委托人。神庙中的官员职位被高度觊觎，因为官员或者通过分享神庙土地的收益而获得薪水，或者有权利耕种那些土地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土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王室农业地产，由中央官僚机构直接管理；一类是私有财产，大多数是由个人控制的大地产，这些大地产是国王奖励给个人的。

在这些土地上居住和劳动的人们到目前为止仍是埃及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很少被记录下来。他们可怜的墓穴几乎没有什么信息；他们的房屋几乎未被发掘出来；他们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只能通过精英的眼睛瞥见他们，因为农业生活的场景是私人坟墓礼拜堂的常见主题。这些场景经常被加上一些话语，这些话语可能是人们在从事家务劳动时说的，是远古时代的人们直接说的话。一位赶牛者警告说："注意你正在做的事情。"工头宣布："我正在告诉你们，男士们，大麦成熟了，而且谁能很好地收获它，谁就能得到它。"一位和蔼的牧人对躺在他身边的牛说："嗨！亲爱的，吃面包吧。"[2]

38 没有足够的证据幸存下来，以便确定农民的司法地位，但他们似乎在事实上被视作土地的组成部分。他们不能自由地离开土地，但他们也不是可以买卖的财产。从我们现在这种距离遥远的观点来看，农奴，而非奴隶，可能是埃及农民地位的特点，但与土地的简单的关联和融合可能是看待埃及农民的更好的方式。他们的生活通常是艰难的，有时甚至在最好的时代也只能维持生存，但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玛阿特（*maat*）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所有成员都有地位感和从属感，都感到自己有一些利害关系，然而这种利害关系却很小。我们关于金字塔的流行印象是，金字塔是由成群的奴隶在鞭子的驱使下工作而建筑起来的，这种印象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得不到支持了。强制劳动确实是

系统工程必需的，因为国王仪式性地拿着鞭子和牧羊人的弯柄杖，但埃及人们义务性的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工程从来就不可能完成，古王国的稳定也不可能维持多个世纪的时间。在古代埃及，奴隶制是相对次要的因素。战俘工人的偶尔驱使可能是在成功的军事远征之后，为了弥补长期的劳动力短缺而进行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被整体吸收进社会里，而非形成一个特殊阶级。

返回社会顶点，观察第四王朝巨大建筑物背后的内容，你会发现一种历史的空白。我们几乎对建筑金字塔的那些国王一无所知，而且传说和假设的素材不比可论证的事实多多少。据说，斯尼弗鲁是慈善而热心的人。胡夫和哈夫拉因残忍而著名。孟考拉是非常仁慈的。他是如此的仁慈，以至于冒犯了神灵，神对王国实施惩罚。孟考拉在吉萨建筑的金字塔的规模是相对小的，大约是胡夫大金字塔的十分之一，这自然引起了王朝衰落的推测，而这种推测又由他的继承者舍普塞斯卡夫更小的丧葬建筑强化，但有其他可能的解释。或许俊俏的规模不再是国王首要关心的问题。资源可能被用于其他地方。甚至当金字塔的规模衰落时，它们的附属神庙变得更复杂，它们的地产变得更大了。孟考拉也在他的金字塔中广泛地使用大理石，而那是更昂贵的建筑材料。他是迄今为止在丧葬遗物中被描绘最多的第四王朝国王。　39

孟考拉在完成他的金字塔建筑之前就去世了，把它留给自己的儿子舍普塞斯卡夫（大约公元前 2503—前 2498 年）去完成。舍普塞斯卡夫确实这样做了，尽管很草率。所有国王都意识到了人类生命长度的不确定性，他们渴望继续建造自己的金字塔，不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其他未竟事业上。然而，舍普塞斯卡夫脱离了古王国的实践，没有为自己建筑金字塔，而是在萨卡拉为自己竖立了一座非常巨大的马斯塔巴墓。探究他的这种举动的原因完全是推测性的，但一种合情合理的猜测是，它体现了一种危机，或许与宗教发展息息相关，宗教发展在下一个王朝表现出来。舍普塞斯卡夫之后的国王统治了两年，其名字已经丢失。那个简短而匿名统治的模糊性隐蔽了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转变的

原因。

根据中王国时代的韦斯特卡尔纸莎草保存下来的传说,第五王朝(大约公元前2494—前2345年)的国王们是太阳神拉与他的一个祭司的妻子拉杰迭特所生之子。无论这个故事背后的事实是什么,王朝的宗教政策必定是把太阳神提高到国家神的地位。太阳神的重要性由这样的事实证明了,即从第一个国王乌塞尔卡夫(大约公元前2494—前2487年)开始,第五王朝的大多数国王都为太阳神建筑神庙。这些神庙在规划上与国王的金字塔复合建筑相似,而且坐落在金字塔附近,这强调了国王与极为重要的拉神的关系。拉神是最高的造物主,是自然界的动力。尽管第五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乌塞尔卡夫在萨卡拉建立了金字塔,而且最后一位国王乌纳斯(大约公元前2375—前2345年)也这样做了,但与第五王朝关系更密切的遗址是萨卡拉和吉萨之间的阿布·希尔。

第五王朝的政治史是模糊不清的,但一些一般性趋势是相当清晰的。一个趋势是王氏家族从国家最高职位的撤离。在第四王朝时期,王子经常是维西尔,并占据其他重要职位;他们的坟墓经常靠近国王的金字塔。但到第五王朝,他们几乎全部脱离了管理职位,坟墓很谦逊,这一点尤其突出;事实上,识别国王男性亲属的身份越来越困难了,这种趋势在中王国和之后的时代继续。这或许是为了阻止大量敌对竞争者对继承权的诉求,为了阻止小王朝的形成,尽管如下这一点是令人称奇的,即随着王子在丧葬记录中变得弱势,公主的角色比以前更显著了。这种现象的解释或许在于行政管理的越来越复杂,不能完全依靠家族纽带的力量来维持了。不管怎样,在第五王朝,普通人获得了最高职位,包括维西尔职位。

同时,祭司和政府官员越来越少地依赖于国王。神庙崇拜制度在短期内加强了国王的权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祭司集团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的财富和权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国王捐赠和税务免除而稳步增长,神职人员经常被免除税务和强制的劳役。在每

一个统治终止时，不得不确立一个新的王室崇拜，而且太阳神庙的构建需要更多的捐赠，第五王朝至少建立了七个主要太阳神庙。王室土地的授予也被用于支付重要官员的薪水。

制度依靠自身运转。国王的权力最终依赖于他对土地资源的控制。随着这种权力转移到神庙和地方领主手里——国王与地方领主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国王的权威被逐步破坏。促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很多新掌权的个人运用他们的个人基础在政府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因此进一步削弱国王的权威，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国王更多地依赖于这些个人，而非个人更多地依赖于国王。国王对省的控制也被削弱，因为诺姆长的职位最初是由国王授予其有限的时间，或者允许诺姆长在有生之年掌握它，但在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这一职位变成了世袭职位，创造了省贵族阶级，他们的影响是地方的，他们依靠出身而非国王而获得地位。这在省贵族坟墓规模的越来越大和随葬品的越来越丰富中表现出来。更多的祭司和政府官员能够依靠自己而非国王的支持建造坟墓，他们把这一点看做生死攸关的事情。

然而，即使在国王的基础受到侵蚀时，第五王朝的国王仍然是强大的统治者。他们的金字塔比以前王朝的金字塔更小，但这至少部分上是缩小规模之趋势的结果，这种趋势在第四王朝后期就表现出来了。尽管第五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乌纳斯的整个金字塔复合建筑在规模上是谦逊的，但它是高超技艺的杰作，尤其它的走廊和神庙。乌纳斯的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文》的最早出现而著名，《金字塔文》是宗教话语或咒语的集合，为了确保国王永恒的生存与健康而吟诵。这个发明可能是受到如下渴望的刺激，即人们渴望更少地依赖于祭司集团的持久服务，因为祭司集团被证明不是永久可靠的。

乌纳斯可能没有留下继承者，这导致王朝一度混乱，这种混乱局面由第六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泰提（大约公元前 2345—前 2323 年）的登基而解决。重要的是，泰提把下面这句话作为自己的王名之一，即“他使两土地归于和平”。但事实并非如此。马涅陀指出，泰提被他的护卫杀

害，而且在泰提的儿子珀辟一世（大约公元前 2321—前 2287 年）掌握王位之前，是篡位者乌塞尔卡拉（大约公元前 2323—前 2321 年）的统治时期。然后，珀辟一世不得不面对他的一位王后的阴谋。尽管密谋被阻止，但珀辟一世感到通过与阿拜多斯一个强大官员的两个女儿结婚的方式加强自己的地位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宫廷之外和省内部贵族的权力继续增加，与第五王朝时期已露端倪的地方分权问题相伴而行。

第六王朝获得了一些成就。国王是广泛的建筑者。一条通过第一瀑布的渠道被挖通，旨在加强与努比亚的交流。军事远征被派往东北三角洲和南巴勒斯坦，以对抗贝多因人的入侵。埃及人也遇到了努比亚势力复兴的问题。珀辟二世的一个军队司令珀辟纳赫特·海凯布记录道："陛下派我征讨瓦瓦特和伊杰特之国。我按陛下称许的方式执行命令。我在那里杀了大量的人，包括首长的孩子和精锐部队的司令。我把大量人们作为俘虏带回埃及，而我作为英雄成为一支巨大而强大军队的首领。"[3] 显然，这些是紧急措施，但它们是必要的，这一事实表明边疆已经被忽略，而且远征措施没有导致努比亚或三角洲的持久安全。

年迈的兄长麦然拉简短的统治之后，珀辟二世（大约公元前 2278—前 2184 年）在六岁时登上王位，开始了古代埃及历史上最长的统治，他总共统治了 94 年，结果他的统治包括困难时期的儿童摄政和更糟糕时代的长期老朽统治，这两个时期都对埃及的政局造成了破坏。很多诺姆长在确保他们的地方控制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展他们的地方影响。中埃及和上埃及空前数量的岩窟墓表明地方管理者逐渐变成地方统治者。一旦事情开始土崩瓦解，那么这种进程就会因为埃及特有的地理环境而加速发展。人口在尼罗河谷的集中和尼罗河作为交流大动脉的职能既有利于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地方分权，因为国家沿尼罗河呈长条状。任何点的中断都会使整体的运转陷于停顿。

国王的财政和整个土地都因对神庙和个人的赐予而耗竭，又遭受

了系列低泛滥的破坏，低泛滥源于气候的根本变化。饥馑，甚至食人现象出现了。王室税收根据洪水的高度确定，因此在珀辟二世统治后期，几乎没有收集税务。国王被剥夺了资源，不再能够执行其正常职能。王国的处境在南萨卡拉珀辟二世金字塔周围拥挤的官员坟墓表现出来。那些泥砖结构的马斯塔巴墓最恰当的描述是：穷困的坟墓。

珀辟二世的儿子麦然拉二世的短暂统治之后，古代埃及最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由一位妇女统治（她可能是麦然拉二世的妻子）。根据马涅陀的记载，女王尼托凯尔悌（大约公元前2184—前2181年）“比她那个时代的所有男人都更勇敢，是所有女人当中最漂亮的人”。但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勇敢或美丽的女王能够扭转形势。随着珀辟二世的死亡，我们所划分的古王国时期不可避免地结束了。

第四章　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

43　古王国的崩溃并不是由外部因素导致的。它源自内部，与地方分权息息相关，至少部分上是由地方分权导致的，因为各个地区权力都漠视中央权威。埃及变得与前王朝末期政治统一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被称为第一中间期（大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

法老权威的一些主张曾经一度被第七王朝和第八王朝（大约公元前2181—前2160年）的一些国王保持在孟菲斯，但这些国王是短暂的、不成功的统治者。根据马涅陀的记载，第七王朝先后有70位国王，他们总共统治了70天，但这或许反映了史料的混乱和王朝的动荡。第八王朝更加坚固一些，但仅仅一位国王哈卡尔－伊比享有资源，并且是相对长命的（或许统治了两年），从而能够构建金字塔。相较于古王国巨大的金字塔复合建筑，这个金字塔很小。这些国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实施超越孟菲斯边界的权威。大约几十年以后，第八王朝就灭亡了。

44　北方真正的权力中心转向了法尤姆入口处附近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它的统治者是马涅陀笔下的第九王朝和第十王朝的国王。但他们的影响仅仅扩展到中埃及，而且他们不能阻止亚洲人向东沙漠的广泛渗入。甚至在他们控制的地区，赫拉克利奥坡里斯国王从未成功地发

展出与后来在南方出现的制度相似的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反而依赖于强有力的地方贵族的忠诚。

上埃及是自治诺姆的拼凑物，而且自治诺姆都是由地方领导者统治的地区，其中一些领导者表面上对孟菲斯名义上的中央权威效忠。当他们彼此激烈地竞争、聚集资源，或许从努比亚雇佣外国雇佣兵时，这些仅仅是他们要求独立的掩护。埃尔－卡伯的诺姆长安柯提斐的坟墓记录了他怎样"率领强大而可靠地军队顺流而下"，执行对抗底比斯诺姆的战斗。记录明显与以前的实践分离，甚至根本没有从名义上提到国王；相反，安柯提斐宣称："我是人类的开始与终结，因为没有人像我自己一样在我之前存在，也没有人会存在下去……我是无与伦比的英雄。"

一个南方权力中心比北方那个权力中心兴起的稍晚一些。这个权力中心的国王们以底比斯为基础，是第十一王朝的国王。底比斯迄今为止都是一个模糊的省的城市。第十一王朝与第九王朝和第十王朝并存，这进一步导致王朝年表的混乱。当这些国王的权威向北扩张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与北方国王相遇，进行长期冲突斗争，这最终在第一中间期末期以南方的胜利和埃及的再统一而结束。

早期埃及学家们通常把第一中间期描述为一个混乱、无政府状态和广泛穷困的时代，与秩序井然的古王国和复活的中王国形成明显对照。这幅凄凉的图画以大量古代埃及文学史料为基础。这些史料数目庞大，几乎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流派，对国家的灾难事件做出哀叹。贤人伊普味写道："大地像陶工的轮子一样旋转。"涅菲尔胡抱怨道："这块土地惊慌失措，没有人知道结果。"接下来是一系列的错误事件：小道是危险的，战斗在所有地方爆发，谋杀每日都发生，个人在自己家里都能被杀死，仆人是厚颜无耻的，社会秩序翻倒了，那些本来富有的人现在变成了穷人，而那些本来贫穷的人现在变成了富人，剥削成性的土地主强行征收重税，掠夺司空见惯，事态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生活变得不可忍受。"但愿这是人类的终结，没有孕育，没有出生！"中心主题是

玛阿特灾难性的失败。国王没有实施正确的职能。

在第一中间期,条件经常是艰难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没有有效的中央权威调节地方争斗和阻止地方政体之间的武装竞争,土地资源被浪费,人们遭受着不必要的灾难,财产被破坏。伊普味哀叹道:"事实上,南方人的船只轻飘飘地驶去。""城镇被毁,上埃及已经变成了空荡的废墟。"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解释为一个延长的内战时期,结果是秩序和安全的丧失。古老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对遥远而理想化的过去的怀旧之情是一种正常反应。

但是,一些关于第一中间期的为时甚久的观念已经受到质疑。学者们最近注意到很多最悲观的记录不是在第一中间期时期写作的,而是在接下来的中王国时期写作的。中王国盛行的意识形态是强调国王恢复了玛阿特。中王国鼓励对中央权威虚弱或不存在之时代进行恐怖的描绘。而且,第一中间期的政治分裂不应该解释为崩溃,而应该解释为连续,因为它是那种开始于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的趋势的合乎逻辑的扩展,当时诺姆长们变得越来越过于自信了。历史学家们有一种倾向,即把统一评价为固有的好事,而把不统一评价为固有的坏事。

观察确实在第一中间期出现的证据,很多问题和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北方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而言,最突出的事情是证据的缺乏。我们知道该王朝的国王非常频繁地更换,这意味着某种政治不稳定;而且,我们知道该王朝几乎没有丧葬纪念物的构建,这个事实或许是重要的,但在这种否定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历史谱系是不可能的事情。尽管三角洲部分地区的控制松弛了,但没有来自西南亚的大规模入侵,而且赫拉克利奥坡里斯国王们能够面对南方的敌人,同时维持他们控制的整个地区内古代孟菲斯君主国的面貌和一些现实。长期系列低泛滥曾使古王国最后几十年遭受折磨,它的结束为政府开发提供了更多资源,或许减轻了整个人口忍受的某些困苦。

46

在南方,国家的证据恰恰是相反的情况:证据更多,而且证据的性质更具多样性。但这不一定使证据更易于解释。几个因素说明了证据

的混乱。首先,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上埃及比下埃及能够保存更好的证据,我们也更容易从上埃及获得证据,尽管在中埃及北部和三角洲改善了的考古方法正在使三角洲定居点展现新光彩。其次,更重要的或许是诸如安柯提斐这样的地方长官的存在,他们有办法准备精致的坟墓,后者记录了他们所谓的事迹和个人能力。此外,一旦底比斯的统治者们建立了自己的地域王权,并扩展他们的权威,那么他们便享有更长的、更稳定的统治,从而留下更富有的记录,既有纪念物的记录,也有文字记录。

到荫特夫二世(大约公元前 2112—前 2063 年)登上南方的王位时,底比斯君主国统治了上埃及的大部分地区,这里的诺姆长已经被镇压,国王严格地实行个人对其领地的控制,而不依赖于地方长官。这种安全的权力基础使荫特夫二世能够攻击北方,他在那里攻下了阿拜多斯,甚至进一步往北深入阿西尤特,后者坚决效忠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的国王。这样,北方王国和南方王国敌对的时期开始了,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十年。

战争的细节是模糊不清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王朝的一次反攻可能一度再次获得了阿拜多斯,但北方所有这样的成功最好也是短暂的,因为主动权返回到了底比斯人那里。决定性的推进来自孟图霍特普二世①(大约公元前 2055—前 2004 年)。在戴尔·埃尔－巴哈里,战士坟墓包含 60 位在战斗中被杀死的战士,可能是这个冲突的最后阶段的一个结果。北方王国战败,它的丧葬纪念物被粉碎,它的首都或许也遭到洗劫。埃及再次统一起来,尽管在秩序完全恢复之前,暴力事件持续了一段时间。随着埃及的再度统一,中王国时期开始了。

中王国的第一阶段是以不寻常数量的精力充沛而有能力的统治者为标志的。他们统治时间的准确长度是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因为这些

① 孟图霍特普二世被一些作者视为孟图霍特普一世,而且这种二世到一世的数字变化也影响到了孟图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的顺序排列。

是中王国年表特有的问题,但大多数国王的统治时间是足够长的,可以实施野心勃勃的项目。古王国王权与中王国王权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差别,这个差别在国王的肖像画法中表现的很明显。中王国的国王雕像的描绘变得更逼真了。古王国君主的雕像是理想主义形象,雕像或许很少或根本不像实际的个人。但仔细观察诸如森沃斯瑞特三世或阿蒙尼姆赫特三世这样的中王国男人雕像,你很难相信你看到的不是对国王本人的准确描绘。

但中王国的肖像画法除了写实主义,还有更多的内容,因为写实主义是一种有意的人为的效果,有意地传达国王密切关心王国事务的印象,并为此付出了人性的代价。古王国的法老幸福地与日常世界分离开来,雕像的表情是平静的。代替古王国的平静,中王国君主是强壮的,但有时略带憔悴,似乎疲倦不堪地尽心执行其职责。他是一位"优秀的牧羊人",这是中王国文学中使用的公式。在中王国,国王也获得了个人发言权。代替古王国那种难以预测的遥远,中王国的国王开始陈述他在政府管理中的成就,假如陈述是由他自己创作的。

按照中王国的标准来判断,孟图霍特普二世为期 50 年的统治是相当长的。他在王权的每个领域都表现积极,增加了官僚机构的规模,创建新中央政府机关。他意识到诺姆长造成的危险,从而减少诺姆长的数量,逐步确保诺姆长对他个人的忠诚,他通过频繁的视察强化这种忠诚。国家收入通过实物税的征收和强制劳役而系统化。通过强制劳役,他的很多公共工程项目可以获得劳力。采矿和采石在尼罗河谷和东沙漠以及西奈半岛重新开始。边界安全依靠大量军事远征来保障。然而,孟图霍特普二世在亚洲的兴趣主要是商业方面的。埃及与叙利亚的贸易再次建立起来。在叙利亚,黎巴嫩的贸易城市拜布罗斯的统治者被称为"埃及的仆人"。同样,孟图霍特普二世远征努比亚,但他在这里的兴趣也是贸易,而非征服。南方的军事要塞在阿斯旺建立起来。孟图霍特普二世留给其继承者的国家是强大的、和平的和繁荣的。他作为埃及修建者的作用如此著名,以至于在几百年后的新王国末期仍

48

然受到纪念。

在孟图霍特普三世(大约公元前 2004—前 1992 年)的父亲如此长时间的统治之后,当他登上王位时,他是相对老的,但他很好地运用了自己 12 年的统治,继续他父亲建筑和维持强大边境防御的强有力的政策。他尤其积极地在南方推进贸易联系。但孟图霍特普四世(大约公元前 1992—前 1985 年)提供了一个历史谜团。在古代王名表中,他丢失了,他的统治仅仅被记录为七个空白的年份。记录的细节不足以重构事件,但它们表明他的维西尔阿蒙尼姆赫特不知何故掌握了王位,开辟了第十二王朝。

一旦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大约公元前 1985—前 1956 年)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那么他就把首都从底比斯迁移到了一个完全新的要塞城市伊提塔威。伊提塔威在孟菲斯和法尤姆之间的某个地方,它的遗址还未发现,但或许位于埃尔-利希特附近。这次迁都提供了大量利益:与过去彻底分离,把宫廷与那些以上埃及为根据地的个体地方力量分开,靠近富于资源的法尤姆,易于接近亚洲边界,首要的是这里是控制上下埃及的首选之地,这在城市名字伊提塔威中表现出来,即“两地的掌握者”。伊提塔威是埃及接下来三百年的首都。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远离第十一王朝的另一点是他在埃尔-利希特建筑了一座金字塔。第十一王朝的国王们葬在底比斯的坟墓里,其中孟图霍特普二世在戴尔·埃尔-巴哈里的坟墓是最突出的事例。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再次引入国王金字塔复合建筑,而他的继承人都效仿他。但自从金字塔被构建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几乎两个世纪了;技术已经丧失了,时间已经改变了,中王国金字塔留下了大量不同于古王国金字塔的特征。

主要不同是中王国金字塔不是完全用放置恰当的石块构建的。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金字塔有一个用非烤制的泥砖、碎石和沙子填充的内层,外面盖着仔细打理、认真结合的图拉石灰石,形成一个光滑的外层。因为下沉的问题,后来的中王国金字塔内部用十字交叉的石头墙

固定，但它们的内核是泥砖结构的。任何时候，一旦外层石头被剥离，这也是它们不可避免地面对的事情，那么内核就会恶化，这使现存中王国金字塔表现出了衰退而毁坏的外表；但它们是那个时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纪念物。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在埃尔－利希特的金字塔，与在埃尔－利希特附近他的前辈森沃斯瑞特一世的金字塔相似，现在是更加低矮、没什么特点的土墩，常常不被过往的旅行者注意，但它最初高达45米，它还有一个甬道和葬祭庙。中王国金字塔复合建筑是权力的有力说明。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也转向更具攻击性的军事态度。他运用自己的军队在三角洲对抗亚洲殖民者，并建立起了巨大防御体系，即所谓的统治者之墙，用于保护埃及东北边境。防御站点也在埃及其他地方建立起来。在努比亚，他改变中王国早期的政策。中王国早期的政策主要是向这一地区派遣贸易和采石远征队。他在这里进行征服战争和永久殖民政策。这些都是极残酷地完成的。在他死的时候，他已经向西方派遣一支重要远征队，对抗利比亚人。

在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统治的第20年，他令他的儿子森沃斯瑞特与他一起做共治王，建立了一种共治制度，这是他的另一个革新，被他的继承者们遵守，这也使古代埃及年表复杂化，因为官方文献不是用任何绝对体系记录时间，而是用君主的统治年份记录时间的。这种共治制度或许旨在维护继承秩序。就这一点而言，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可能留下了某种不安全因素。这种制度也可能旨在提供一个助手，因为阿蒙尼姆赫特一世一定是常年管理国家，而且当他掌握王位时，他几乎是中年人了。作为共治王，森沃斯瑞特积极地充当军事领袖，执行对埃及四周边境的远征。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王朝预防措施证明是正确的，因为他在统治第三十年的时候被谋杀，当时森沃斯瑞特在西方远征利比亚。继承显然受到争议，但森沃斯瑞特返回埃及，并迅速确保了自己的王位。

在森沃斯瑞特一世（大约公元前1956—前1911年）35年的绝对统

治期间，他展现了持续调整和增加革新的品质，这些是中王国的特点。50 在努比亚，他通过扩张和建筑要塞继续他父亲的政策。下努比亚变成了组织完善的埃及的省。但他的亚洲政策强调商业和外交关系的确立，而非地域扩张。广泛的采矿和采石为整个埃及全面的纪念物建筑项目提供了财富和原材料。大多数建筑物现在已经消失了，但他在卡尔纳克用小雪花石膏重建的精致的神庙提供了一个事例。在另一个长统治时期，阿蒙尼姆赫特二世（大约公元前 1911—前 1877 年）巩固了他前辈的事业。

根据中王国早期的标准来判断，森沃斯瑞特二世（大约公元前 1877—前 1870 年）的统治是短暂的，但它是和平而繁荣的，其特征是商业扩展到了西南亚和努比亚，这使他能够执行非常重要的公共工程项目，即法尤姆灌溉系统。一条巨大的堤防与一个水渠系统一起建构起来，把法尤姆与长长的水道优素福河联系起来，这条水道与尼罗河并行流淌，穿越中埃及的很多地区。这些系统提供了对进入肥沃洼地的大量水的控制，结果洼地底部的湖泊水平面保持较低的状态，让出更多的耕地，这些耕地依靠改善了的水渠系统灌溉。因此，法尤姆的生产力以及作为结果的中王国君主制的权力大大增加。法尤姆加强了的重要性由如下事实明显地表现出来，即森沃斯瑞特二世把他的金字塔复合建筑建在埃尔－拉宏，俯瞰从尼罗河谷进入法尤姆盆地的水渠。阿蒙尼姆赫特三世是中王国最伟大的建筑者，后来效仿森沃斯瑞特二世在稍微往西一些的哈瓦拉建筑了金字塔复合建筑。

长期统治由森沃斯瑞特三世（公元前 1870—前 1831 年）恢复，他在行政管理和军事上运用了自己的机会。中埃及和上埃及诺姆长的权力就像对古王国做的那样削弱着中王国的中央集权，从未被完全粉碎，事实上是复活了。这没有任何地方比贝尼·哈桑那些俯瞰尼罗河的巨大岩窟墓更明显了，这些岩窟墓属于第十一王朝晚期和第十二王朝早期“羚羊（第六）诺姆的伟大统治者”。这些非凡的纪念物无疑是对财富 51 和地位的表述，装饰着攻城的场景、亚洲贸易者、丧葬仪式和著名的摔

跤手队列。无论森沃斯瑞特三世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段,他确实降低了强有力的政府官员的势力,这由接下来省坟墓的衰落表明了。为了加强国王对王国的控制,他把王国分为三大行政区,一个管理北方,另一个管理南方,第三个管理阿斯旺和努比亚。每个大行政区都由一个维西尔领导,维西尔监督行政区内的所有地区,并直接向国王负责。

作为战争领袖,森沃斯瑞特三世至少执行了一次对叙利亚的远征,但他的军事活动的主要焦点在南方。在南方,努比亚的殖民地已经被逐渐往北侵占了,因为努比亚从它在古王国时期遭受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了。他的努比亚战斗以特别的残忍为特征,他在一个纪念石碑上鼓吹了这点:"我夺去了他们的妇女的生命,我夺去了他们的臣民的生命,填平了他们的水井,打死了他们的公牛;我收割了他们的谷物,还在那里纵火焚烧田地。"森沃斯瑞特三世扩展了埃及的南部边界,把它建在第二瀑布之外的塞姆纳,用警戒的卫戍部队镇守的系列坚固要塞确保安全,并严格地训诫他的继承者们把边界保持在那里。为了促进埃及与南方的交流,他在阿斯旺附近的第一瀑布扩大了古王国的水道。森沃斯瑞特三世对努比亚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新王国时期,他在那里被崇拜为神。

中王国的政治和军事成就堪与文学、艺术和建筑成就相媲美,而且经常由后面这些成就表达出来。这不太容易理解,部分上因为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中王国视作稳定的古王国和繁荣的新王国之间的插曲;部分上因为在那个自古代就开始了的抹杀过程当中,有如此多的中王国纪念物的记录被擦掉了。引用前面的一个例子,森沃斯瑞特一世在卡尔纳克的雪花石膏神庙被拆掉,用于填充第十八王朝的塔门。足够幸运的是,该神庙的石块保留下来了,可以对其进行重建[①]。中王国的文化远非那么普通,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对古代埃及历史的其他时代产

52

① 后来建筑对中王国纪念物进行抹杀的一个突出例外是森沃斯瑞特一世在赫利奥坡里斯的方尖碑,赫利奥坡里斯这个巨大宗教遗址上的其他纪念物(较早期的和较晚后的)都消失了,唯独这块方尖碑依然站立在那里。

生了深远影响。

文雅的简化和对称是中王国纪念性建筑的特征。尽管有意识地关注古王国的建筑模式,但中王国的建筑师是令人惊奇的创新者。哈特舍普苏特在戴尔·埃尔－巴哈里的非常令人羡慕的新王国神庙显然是受到了毗邻的中王国君主孟图霍特普二世神庙(也有平台)的启发,带有巨大通道和楔形坡道,紧靠西底比斯所有最令人胆寒的地理背景之一。中王国金字塔在几千年之后不能维持其形状,这并不能表明中王国的技艺很差,而是表明资源被明智地应用。中王国金字塔服务于它们时代的建筑者的目的,陷入废墟之前存在了很久。与古王国后期的情况一样,更多的精力赋予金字塔复合建筑的神庙,最著名的例子是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在哈瓦拉的葬祭庙。这座葬祭庙与如此多的中王国建筑物相像,也消失了。与古王国相比,在中王国时期,更多的神庙在省里建筑,例如森沃斯瑞特三世在底比斯以北纳格·埃尔－美德穆德为战神孟图建筑的神庙,是用森沃斯瑞特三世在努比亚战斗中获得的财富建筑的。它也被毁坏了。

中王国的绘画和雕塑有时无法与古王国的绘画和雕塑相比,因为第一中间期分权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艺术产品的控制力。这意味着在中王国早期艺术训练的不连续,高质量原材料的难以获得,确保标准得以执行的监督的缺乏,有时导致相对笨拙的作品。但这也意味着新艺术表现方法的出现和创造性地使用可得到的材料。不同的区域类型出现了,表现出了较大的创意,呈现出了更广泛的主题。外部世界的影响也在埃及艺术中体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提塔威的宫廷文化建立了标准,这些标准扩展到了整个王国,引进了新技术,例如为了产生人像描绘方面的一致而采用的格子图案。从森沃斯瑞特一世开始,刻纹的浮雕作品是特别优质的;中王国国王雕像在传递个性和力量方面的独特能力已经被注意到了。 53

中王国艺术特别突出的领域是珠宝。达赫淑尔和埃尔－拉宏王室妇女坟墓优秀的锻造珠宝属于古埃及曾经生产的最好的珠宝之列。第

十二王朝公主凯美特在达赫淑尔的墓葬里面有著名的“公牛镶嵌图案”垂饰，该图案受到了克里特图案的影响。技艺、图案和主题都以一流的方式结合起来，获得了惊人的美学效果。中王国珠宝一个最突出的品质是艺术克制。珍稀的材料被微妙地使用，而非依赖纯粹的规模。

与古王国前辈相似，中王国的艺术家更多地被视作“技术员”和“工匠”，而非今日我们理解的“艺术家”。他们几乎始终按照订单工作，把完备的技术应用于可接受的形式，直到他们去世以后，他们几乎不可能作为作品的创造者而被人们记得。但这没有排除他们对自己技术熟练程度的自豪。中王国雕塑家伊尔提森在阿拜多斯他的墓碑上宣称：

> 我是一位艺术家。在我的艺术领域，我是熟练的、卓越的，因为我了解它。我知道浮雕的法则，无论阴雕，还是阳雕，从而我的所有雕刻都恰到好处。我知道怎样表现男人的运动或女人的走动、被捕之鸟的姿势、一只眼睛瞟向同伴的俘虏的扭曲神态；我知道怎样展现敌人面部的恐惧神态、用矛刺杀河马的胳膊的姿势、奔跑者的动作。我知道怎样制作水洗不掉的镶嵌画。[4]

对于像伊尔提森这样的人们来说，当他们得知自己的一些作品幸存下来，并在今日受到很大赞美，他们一定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

中王国文化一个最辉煌的方面是文学成果，与古代埃及任何其他文学成果都不同。这里中央政府的影响再次成为生命力，因为书吏训练得到强调，旨在支持全国官僚传统的重建。很多训练文献从那个时代留存下来；这些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是对国王的忠诚。但较广泛的文学传统也因不同体裁的非常复杂的作品而发展起来，包括小说。《能言善辩的农夫的故事》(*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有一种与《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相称的结构设计。一位名叫德胡提-奈赫特的出身名门的官员掠夺了农夫胡纳努普的货物，农夫向首席干

54

事梅鲁腾斯请愿，但农夫的用词如此动人，以至于梅鲁腾斯使他在九次申诉中保持滔滔不绝地讲话，以便梅鲁腾斯和他的同事，甚至国王能够欣赏他丰富的隐喻和引人注目的诗歌式的比喻。这份纸莎草文献断掉了，但是断在人们得知它有一个愉快的结局之后：农夫胡纳努普不仅收回了他自己的财产，还获得了邪恶的德胡提－奈赫特的财产作为奖品。《船舶遇难的水手》（*Shipwrecked Sailor*）是关于一位在遥远的岛屿上遇险的人的故事，他遇到了一条巨大的能讲话的蛇。这是水手辛巴德的往事回忆。《辛努亥的故事》（*Tale of Sinuhe*）可以归入历史小说行列，提到了第十二王朝的宫廷生活、统治者之墙和辛努亥在叙利亚的冒险活动。与当时和现在的很多文学作品很像，《辛努亥的故事》包含很多标准的但曾经流行的戏剧性设计，包括辛努亥与可怕的叙利亚敌手之间激动人心的打斗场面。

在中王国，很好地呈现出来的另一个体裁是智慧文学，其突出的事例是《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教谕》（*Instruction of Amenemhet I*）。在这篇作品里，据称，国王告诉他的儿子森沃斯瑞特一世他是怎样被谋杀的，并给出了关于王权艺术的实践性建议。这明显是森沃斯瑞特一世聪明的宣传工具，这个事实并没有减少去世国王在阴间讲话的叙述方式的效能。在中王国使用的语言和文学有如此的影响力，以至于它始终是法老历史其他阶段的标准。一千多年以后，学生们仍然通过抄写中王国的文献来学习怎样阅读和书写。

尽管古代埃及艺术家是相对匿名的工匠，但他们的文学同伴却经常获得重要而持久的个人声誉。用古代文献的话来说：

> 至于那些博学的书吏，
> 他们的名字变得永恒了，
> 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生活，离开时，
> 他们所有的亲属都被人们遗忘了。
> 人腐烂了，他的尸体变成了尘埃，

55

他所有的亲属都腐烂了;
但一本书使他被人们记得,
通过它的朗诵者的口。
一本书比一座壮丽的房屋更好,
比西方的墓葬礼拜堂更好;
比坚固的大厦更好,
比神庙的石柱更好![5]

就像在古代埃及历史的所有时期那样,中王国的艺术、文学和纪念物的建筑都是精英非常偏爱的,考古学也是这样,但它们仍然使整个古代埃及社会的环境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而且是以比较早时期更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档案文献证据尽管仍是粗略的,但更丰富。我们对乡村生活和家庭事务的洞察源自第十二王朝农民赫卡纳赫特写的信件,他长期离家在外,不得不把他对田产和家族管理的关心清楚地表达给人们,否则人们可能不会注意他。坟墓壁画总是包含关于社会活动的生动的背景描绘,但中王国为社会模型在坟墓中的惯常做法是提供强烈的日常生活的画面。这些模型可能是房屋、店铺和船只,还伴随着居民、工人和水手。梅克特拉在底比斯的坟墓中描绘的牛普查模型是由几十个书吏构成的,他们坐在柱廊下面,牧人驱赶着他们的牲畜和有斑点的、有角的牛从书吏身边走过,以便书吏计数。第十二王朝由普通战士武装起来的行军队伍源自梅赛提在阿西尤特修建的坟墓。

尽管证据使我们获得古代埃及社会性质的某些有意义的信息,但对其数量的测算是不可能的。古代埃及的历史人口统计学仅仅是在最广泛的参数范围内进行猜测性的计算。很低的数字已经被安置给前王朝晚期的埃及人口,低至十万或二十万人口。在早王朝时期,随着农业资源的发展,人口数字想当然是更大一些,或许是两百万或更多。对于特别繁荣的时代,例如新王国的伟大时代,合理的估计是人口高达三百万或四百五十万。与埃及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一样,大多数人口居住在

乡村，在地里劳动。精英群体和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们是现存证据的主要人物，是整个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人。

中王国的文化顶峰在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大约公元前 1831—前 1786 年）统治时期来到。埃及是和平的和繁荣的，至少在他 45 年的统治时期的第一阶段是这样的。他完成了森沃斯瑞特二世在法尤姆的灌溉系统，他在法尤姆建筑了几个主要神庙和两个巨大的坐像，坐像曾经几乎高达二十米。与如此多的中王国纪念物一样，巨像被完全毁坏了，仅仅留下了它们的底座，现代旅游者最初误把它们当做小金字塔了。至于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的金字塔，他效仿他的前辈阿蒙尼姆赫特二世和森沃斯瑞特三世的事例，在达赫淑尔金字塔地区的东边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址。然而，当他的金字塔建筑工程进行时，严重问题随着地基和内部空间的扩建而发展。

阿蒙尼姆赫特三世意识到了达赫淑尔金字塔的问题，他转向法尤姆，在哈瓦拉开始建筑另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位于他祖父在埃尔-拉宏修建的金字塔西北不远处。以前那个金字塔遭遇的问题现在被避免了，哈瓦拉金字塔的构建比达赫淑尔的金字塔更雄伟；甚至在遗迹中，尽管它的石灰石外壳已剥离，但它仍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位于环形平台之上，现在高达三十多米，这大约是其原初高度的一半。它毗邻的丧葬庙，即所谓的拉比林斯迷宫，是古代世界奇迹之一。在它建成两千三百多年以后，希腊旅行者希罗多德写道：“我已经看到了这座建筑物，我无力描述它；它一定比希腊人建筑的所有城墙和公共建筑物所花费的劳力和金钱都更多……金字塔也是令人惊奇的建筑物，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等同于希腊很多最雄伟的建筑物；但拉比林斯迷宫比金字塔还壮观。”[6] 这个超越了金字塔的建筑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保存下来，除了沙子中的一些残片，因为大约几个世纪里，为了从它的石头里提取石灰，人们对它的石头进行了无情的开采。

社会裂缝在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统治结束之前已经扩散到了其政权的光荣大厦里。他的建筑项目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这促使我们猜测 57

它使经济过度紧张。也有迹象表明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尼罗河出现了低泛滥。因为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统治的时间特别长,所以他的儿子(或许是他的孙子)和继承者的统治时间很短暂。我们对阿蒙尼姆赫特四世(大约公元前1786—前1777年)大约九年的统治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他建筑了一些神庙,包括在法尤姆北边卡斯尔·埃尔-萨迦建立的不寻常的神庙。他或许与他的妹妹索贝克尼弗鲁结婚,后者在阿蒙尼姆赫特四世去世以后掌权并统治了四年。索贝克尼弗鲁可能是足够能干的;她实施了一些建筑项目,通过使用男性和女性称号而确保她的权威。但女性统治几乎始终是古代埃及王朝混乱的标志,而且随着她的简短统治,第十二王朝走到了尽头。

尽管第十三王朝持续了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但它有70位国王(如果把第十四王朝算在内,那么国王的数目会更多,第十四王朝或许至少部分地与第十三王朝同时存在),这表明第十三王朝的王权并不是特别有效。这在王朝的国王墓葬中反映出来,墓葬展现了穷困的君主国。第十四王朝的几个国王建筑了金字塔,但它们是小事件,而且一些金字塔甚至不能安排给特定的君主。国王阿韦布拉·霍尔(大约公元前1720年)被埋葬在一个小竖井墓里。某种连续是由管理制度提供的,管理制度是由中王国的伟大统治者发展起来的,这是在一个强大而能干的家族掌握了维西尔权力、维持中央集权和一定程度的内部稳定之后发生的,但中王国最后阶段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衰退中度过的。

在索贝克霍特普三世(大约公元前1744年)和他的两个继承者统治时期,王室命运的短暂复兴许诺了更好的事物,但不可能得到维持。在东部三角洲,王国不再能够维持严格的边境安全,导致西南亚殖民者的逐步渗入。这些是运动的前奏,这次运动将导致希克索斯人在第二中间期统治埃及。显然,统治者之墙制度没有维持下来。这在努比亚也是事实,在这里,曾经警惕的要塞卫戍部队处于自我管理状态,允许他们几乎变成独立者,而且在对抗当地叛乱时不起效用。在边境以外,一个强大的国家发展起来,这就是库什王国,它的首都位于第三瀑布附

58

近的柯玛。通过利用自己位于南方丰富的物质资源和北方贪婪的市场之间的战略性地理位置而增加了财富，柯玛的统治者们把握机会，向北扩张他们的控制范围，远至第一瀑布。气候再次介入其中，这次泛滥太高了，泛滥破坏了一切。

埃及中央政府最终的崩溃可能与伊提塔威的放弃和向底比斯的迁都密切相关，第十三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在底比斯进行统治。这个王朝大约在公元前1640年结束，标志着中王国的终结。

第五章　第二中间期和新王国

59　中王国末期，埃及再次从政治上分裂，开始了第二中间期（大约公元前 1640—前 1550 年）。这可能看上去与作为第一中间期之特征的分权主义相似，但这次有一个新因素，即一种外部势力，牵涉进来。马涅陀就此做如下描述，这段话见于约瑟夫斯的摘要：

> 我不知道原因，但神对我们愤怒，结果出身卑微的人们毫无预兆地从东方而来，大胆地侵入我们的国家，没有经过一场战争便征服了它。他们战败我们的领袖之后，野蛮地焚烧了我们的城市，夷平了诸神的神庙，非常残忍地处置人们，杀死一些人，还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掳去充当奴隶……他们想消除埃及人民。他们一般被称为希克索斯人（Hyksos），或者牧羊王，因为在神圣的语言象形文字中，“Hyk”的意思是国王，而在普通语言中，“sos”是牧羊者。[7]

60 我们必须谨慎地运用马涅陀的记载，尤其他的记载经过约瑟夫斯的过滤以后。甚至他的语源学都是错误的，因为“Hyksos”并不是“牧羊王”的意思；它是两个埃及语单词组成的复合词，意思是“外国的统治者”。然而，马涅陀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西亚的一支迁移人口利用中央权威的缺乏和东北边防的松懈，殖民下埃及，他们的一些领导者使自己成为环

三角洲的狭小地区的小国君主。在两代人的时间之内，这些希克索斯领导者变得足够强大，获得了对整个三角洲地区的控制，也控制了法尤姆和中埃及的很多地区。希克索斯国王，无论大小，都是马涅陀笔下的第十五王朝和第十六王朝的法老，这两个王朝几乎是同时期的。

希克索斯人的主要根据地位于东三角洲的阿瓦里斯。根据约瑟夫斯的摘录，马涅陀认为它由一支大约二十五万战士的卫戍部队镇守。这个数字可以肯定是胡说八道，但希克索斯人无疑是可怕的战士。埃及人不能抵挡他们优良的武器和眼花缭乱的战术。希克索斯人依靠马匹和战场进行极其迅速的攻击，这是他们的战术特点，这是埃及人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甚至当埃及人能够成功地获得几次胜利时，希克索斯人也能够迅速恢复元气，并到他们设防的营帐里寻找庇护，这种营帐是埃及人最初无从攻克的另一个发明。

但在第一中间期后期一个回忆往昔的过程中，一个当地埃及人王朝出现在底比斯地区，地方领导者在底比斯巩固他们的地位，并分别往北和南扩展其势力范围。在北方，希克索斯人掌握着霸权。在南方，它与正在扩张的库什王国对抗。在开阔的战场上，希克索斯人可能已经占据上风，因为他们的国王轻蔑地向底比斯国王写信，抱怨河马在底比斯池塘中制造噪音，要求它停止吼叫。希克索斯人所说的粗暴的河马是底比斯国王和他的宫廷。

然而，不久之后，底比斯国王们不得不被更严肃地对待，因为他们开始了对希克索斯人艰苦但最终成功的攻击，这场战斗记录在国王们和与他们一起战斗的贵族们的纪念物里。战斗开始于底比斯第十七王朝国王赛肯内拉·陶二世统治时期，他的木乃伊的毁伤程度似乎表明他是在战斗中被杀死的。赛肯内拉的儿子卡莫斯不太讲究的丧葬表明，他也是突然而意外地死去的。这个过程是由经验丰富的军队司令雅赫摩斯（大约公元前 1550—前 1525 年）完成的，他是第十八王朝的创立者。他攻占了孟菲斯，然后攻取了希克索斯人的首都阿瓦里斯以后，驱逐可恶的外来入侵者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随着埃及的再度

61

统一，一个被称为新王国（大约公元前 1550—前 1069 年）的时期开始了。

尽管埃及人后来用嫌恶的口吻提到希克索斯人，但希克索斯人的统治在很多方面有益于埃及，包括技术革新，在这个领域，埃及已经落在西亚一些社会后面了。希克索斯人带来了更好的金属加工技术，改善了陶轮和织布机以及动植物的适应能力；也带来了新武器，例如马拉战车、弯剑、混合弓和盔甲，埃及人学着把所有这一切都用于对抗入侵者。

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也改变了埃及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导致了新王国时期的扩张主义政策。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扩张主义政策比中王国时期的更具雄心。南方的库什王国不仅变成了重要的地区强国，还确立了对下努比亚的控制权，下努比亚曾经是埃及的一个省。库什王国与希克索斯王朝之间非常有可能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这迫使底比斯王朝在两线作战。新王国的法老们重新确立了埃及人在努比亚的霸权，他们在努比亚的第二瀑布重建了堡垒，并在尼罗河上游很远的地方建立了埃及人的殖民地，这样他们可以践踏库什王国所有的领土。埃及人在努比亚战斗的特点是残忍。图特摩斯一世不无残忍地鼓吹道："努比亚弓箭手倒在我的剑下，并被扔在他们的国土那边；他们尸体的恶臭充斥着整个河谷……他们的尸体碎片太多了，鸟儿都难以把这些猎物带到另一个地方。"

在努比亚的军事战斗以恢复埃及人的占领地为基础；同样，当埃及人转向亚洲时，他们的借口是追赶希克索斯人，但他们在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埃及帝国，或者至少在这样一个地区开创了政治/军事领地的范围，在这个地区，独立国家和半独立国家为埃及这样的中央集权强国提供了容易采摘的果实。在图特摩斯一世统治时期，埃及人的控制远及幼发拉底河，他在那里树立了一块纪念碑。第十八王朝早期和第十九王朝的国王们是真正的战争领袖，他们指导并经常亲自参与军事战斗。

埃及人通过每年的袭击和小卫戍部队控制他们的亚洲占领地，但

62

他们主要依赖于个体城市国家的统治者，经常把这些统治者的儿子带到埃及接受教育，借以控制人质，这些人质在他们的父亲死后返回自己的国土进行统治，在他们返回国土之前，他们已经埃及化了。这种方法最初很有效，但区域权力平衡政治最终把叙利亚转变成了外交的和偶尔军事的战场，持续变化的效忠和不断变化的联盟导致了持续不断的混乱。

新王国早期的国内改革非常少。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是等级结构的，有两个维西尔，一个管理上埃及，一个管理下埃及。维西尔直接向国王负责，监视他们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官职和行政管理。另一个官员的头衔是“国王的库什之子”(King’s Son of Kush)，管理努比亚，包括努比亚重要的金矿。他也受国王的直接领导。在他们之下是一个官僚机构，分成三个部门：军事部、宗教部和民政部。这三个部门并没有彻底分离，但军事部在埃及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强烈影响，在财富、权力和特权方面逐渐增加。在中王国，学生书吏学习书写和阅读的学校文献是引导美好生活和向国王效忠的，然而新王国的文献包括对战士生活之艰难的警告，表明军事生涯正诱使太多有前途的年轻人远离市政工作岗位。

我们确信新王国的君主起源于底比斯，最初居住在底比斯，并统治底比斯，但在两代之后，他们就常常居住在北方，他们在那里能够更好地控制上埃及和下埃及，同时能够管理亚洲的战斗。因此，孟菲斯作为埃及的行政管理中心继续它的古老职能，就像它自从法老时代开始以来就做的那样，并将继续下去，直到法老时代的结束。因为亚洲的关系，第三个首都于第十九王朝在东三角洲的培－拉美西斯建立起来，位于古老的希克索斯人根据地阿瓦里斯的附近。从一个首都到另一个首都的行进必定是很大的时机，这些时机使国王能够公开地扩散他的权威，并通过个人视察获取信息，突破高级官僚的障碍而进行直接统治。底比斯变成了埃及的宗教首都；没有其他任何城市像底比斯这样拥有如此多的神庙。

63

早期底比斯国王们把他们的成功归于阿蒙神。阿蒙神与孟菲斯的主神——拉神合并起来,变成了埃及万神殿的主神:"众神之王","存在于万物中的"神。依靠从成功的军事战斗中获得的贡赋和战利品等财富,他们在整个国家建立和重建了阿蒙－拉神的神庙,并向它们捐赠丰富的财物。这些神庙当中最大的是底比斯东岸的卡尔纳克神庙。卡尔纳克神庙是埃及最大的神庙,事实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庙,实际上是一个神庙复合建筑,占地一百多公顷,包括一些奉献给其他神——主要是穆特、孟图和孔苏——的礼拜堂和区域。几乎所有主要新王国君主都试图通过为它增加一些主要特征而提高自己的(例如哈特舍普苏特)荣誉。一条斯芬克斯大道导致东岸另一个主要神庙——卢克索神庙的构建。在每一年的大欧佩特节,阿尔纳克的阿蒙神和其他神的雕像都被抬着沿这条大道去拜访位于卢克索神庙的众神。这个节日旨在庆祝国王作为阿蒙神在地球上的化身的身份。

作为宗教首都,底比斯也是新王国国王们的埋葬之地。然而,与他们的古王国和中王国的前辈不同,新王国的国王们不是埋葬在金字塔里,而是埋葬在尼罗河西部巨大山谷中的岩窟墓里,这个山谷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帝王谷。国王墓都是沿山上的洞口经长廊进入山体中的大厅和埋葬间,这些大厅和埋葬间都装饰着绝妙的绘画,这些绘画描绘了神圣国王的来世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埋葬间充满了神话般的丧葬品。帝王谷的安全是依靠干河谷口和峭壁山头的正规巡逻队和护卫站保持的。尽管他们的坟墓大部分摆脱了公众的视线,但国王的丧葬庙却立在尼罗河西岸耕地边缘的凸出位置。随着他们的大量捐赠,这些凸出的神庙变成了世俗权力的重要地方聚焦点。

底比斯也是新王国最高官员们喜爱的埋葬地点。最好的地点是阿布德·埃尔－库尔纳首长山,这个引人入胜的地点俯瞰着广阔的底比斯平原。尽管帝王谷的国王绘画通常严格地遵从传统艺术法则,但库尔纳贵族墓中的那些绘画却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法则,导致了所有古代埃及艺术中最令人兴奋的发展。我们在这里发现了非常高水平的艺术

革新，导致了在透视法、美感和主要在自然主义方面更流畅的线条和更多的试验。日常生活的场景比以前更多地描绘出来，这提供了有关古代社会更丰富的信息，因为工人们被展示出来在土地或作坊里从事他们的杂事。狩猎场景是一个受人喜爱的主题，宴会也是这样的主题，宴会有音乐和舞蹈相伴，还有大量食物和饮品（或许有太多的饮品，一些图画展现了这点，结果妇女在呕吐，而男人被迷迷糊糊地带走）。墓主人和他的妻子被描绘出来，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绘画，他们是友爱的、满意的，而且永远年轻。

那些在帝王谷和阿布德·埃尔－库尔纳首长山建筑和装饰坟墓的人们，是特殊的书吏和工匠群体。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居住在戴尔·埃尔－美帝纳的工人村里。这个工人村保存完好，而且被如此完好地记录下来，以至于我们在很多事例中可以了解到哪个工匠居住在特定的房屋里。他们靠近山边的坟墓为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素材，大量陶片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陶片上铭刻着解释和粗略的平面图。这些人是非常灵巧而专业的工匠，他们因自己的职业而骄傲，并千方百计地把它们传授给自己的儿子。

因为古代埃及显赫的艺术和纪念物残存的丰富性（不考虑那些已经丢失的和仍未发现的残存物），而且因为这些残存物在时间上的相对接近，所以我们关于古埃及的大部分画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新王国为基础的。但古埃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记录的间隙比持续更重要，如果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这是历史学家们经常对彼此的解释如此普遍地争议的原因。这也是历史学家们经常陈述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而非描绘一般趋势的原因。结果，人们不可能写作一部关于新王国或古埃及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的完整叙事史。

65

雅赫摩斯把希克索斯人驱逐出埃及以后，一刻也未休息，便继续军事活动，在巴勒斯坦和努比亚进行广泛战斗。他可能在巴勒斯坦追逐希克索斯人，并毁坏了他们的亚洲根据地。他的努比亚军事行动是由阿蒙霍特普一世（大约公元前1525—前1504年）完成的。阿蒙霍特普

一世继续父亲雄心勃勃的建构项目，这确保了重建的王国的权力和财富及其君主制。地方朝臣都获得嘉奖，这由大量装饰漂亮的坟墓表现出来。

阿蒙霍特普一世没有孩子，但继承权毫无争议地传给了图特摩斯一世(大约公元前 1504—前 1492 年)。无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他仅仅通过联姻才与阿蒙霍特普一世联系起来，这促使人们想知道为什么马涅陀的王朝谱系在这一点上没有中断。图特摩斯一世通过广泛战斗完成了雅赫摩斯和阿蒙霍特普一世的事业。在亚洲，他把边界推进到幼发拉底河；在努比亚，他到达了第四瀑布及其之外的地方。这样的扩张需要空前规模的常备军。埃及变成了近东最强大的国家，仅仅在北部叙利亚遭遇了米坦尼王国。与阿蒙霍特普一世不同，图特摩斯一世有几个孩子，包括他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哈特舍普苏特，一个妃子生的儿子和他的继承者，也叫图特摩斯。

根据图特摩斯二世(大约公元前 1492—前 1479 年)的木乃伊来判断，他可能是一个有病的男人。在他统治的 13 年里，他几乎没有留下纪念性记录，而且他唯一著名的军事远征是在努比亚进行的，他在那里实施了惯常的暴行。他与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哈特舍普苏特结婚，这种方式可能是用来加强其王权的，因为她的世系被更大地晋升了。她在她父亲统治时期就已经获得了显著关注，而且在她丈夫统治时期，她享有“国王主妻”(Great Royal Wife)和“阿蒙神的妻子”(God’s Wife of Amun)等高级地位。图特摩斯二世和哈特舍普苏特有一个女儿，名叫涅菲尔鲁拉。图特摩斯二世与他内室中的妻妾之一生下了一个儿子，即另一个图特摩斯。图特摩斯二世把这个儿子立为继承者。

当图特摩斯三世(大约公元前 1479—前 1425 年)登上王位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他杰出的姑姑和继母哈特舍普苏特(大约公元前 1473—前 1458 年)将作为他的摄政王行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荫伊尼是图特摩斯二世统治时期的高级官员。按荫伊尼的话来讲，哈特舍普苏特“按照她的委员会的意见处理两土地的事务。埃及因她而运

66

转，人们遵从她的统治”。但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的第七年，她放弃摄政王的角色，变成一位执行统治的女王，或者换一种说法，她变成了埃及的女王。

这是一种革新和危险的实验。在哈特舍普苏特之前已经有执行统治的女王了，一个在第六王朝末期，另一个在第十二王朝末期，但这两位女王都是例外情况，而且都预示着灾难，不仅标志着王朝的终结，还标志着第一中间期和第二中间期的开始。但作为一位国王的女儿和另一位国王的妻子，哈特舍普苏特知道她在做什么，而且知道她正在冒着怎样的危险。她对王位的占有是一场仔细规划的政变，她拥有很多贵族支持者，这些贵族都被奖励给完好的坟墓。然而，最众所周知的支持者是一位平民，名叫塞内穆特，显然是她的行政部门的重要人物。尽管证据很少，但人们猜测他是哈特舍普苏特王位背后强有力的人物，甚至是她的情人。

哈特舍普苏特的动机也是猜测性的，而非事实。她确实考虑要自己掌握王权吗？新王国的王室妇女经常是政权当中强有力的人物，因此她可能认为自己变成法老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一些人想知道是否她旨在建立一种女家长式的继承制度。她授予其女儿涅菲尔鲁拉的头衔可以解释这一目的。或者她可能已经试图把涅菲尔鲁拉嫁给图特摩斯三世，但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奇怪的是，她在统治期间没有这样做。(一种推测认为涅菲尔鲁拉嫁给了图特摩斯三世，这接下来便引起了一些险恶的问题，即为什么她恰恰在图特摩斯三世开始其绝对统治之时便消失了。)一种合情合理的假设是，作为王朝自卫的措施，哈特舍普苏特掌握了王位。重要的是，她没有谋杀图特摩斯三世，他也没有把图特摩斯三世推出政治场景之外；相反，尽管她是地位较高的政治伙伴，但图特摩斯三世是她的共治王，而且随着他的成长，哈特舍普苏特把越来越多的军事和民事责任给予他。如果他遭受了虐待，那么他很可能运用自己的权力对抗哈特舍普苏特。

非常清楚的是，哈特舍普苏特的统治是新王国杰出统治之一。政

府是稳定的，而且运转良好；国家是繁荣的。她统治时期的埃及也是一
67 个军事强国，因为有证据表明在她统治时期，至少发生了四次征服战争。埃及人在叙利亚的地位可能已经衰弱，但这或许是因为米坦尼的力量越来越强，而不是因为埃及人的疏忽。然而，她最值得庆祝的对外冒险是一次和平冒险：向东非的蓬特之地派遣的使团。

在建筑方面，哈特舍普苏特超越了她所有的新王国前辈。她的纪念物可以在全国各地发现，包括中埃及，这里的著名小神庙阿特米多斯记录了她对这一地区破败神庙的修复。她最令人难忘的建筑物位于底比斯，包括卡尔纳克神庙的几个重要工事，例如第八塔门和四块方尖碑，其中一块是埃及现存最高的方尖碑。她统治时期的建筑杰作是视觉效果极好的戴尔·埃尔－巴哈里葬祭庙。她是第一位在帝王谷中为自己准备坟墓的国王。

关于哈特舍普苏特故事当中最令人灰心的事情之一是，她的结局不为人所知。她统治了21年以后，发生了什么？她是被图特摩斯三世推翻的吗？她是被图特摩斯三世谋杀的吗？或者她是强有力而且受人尊敬地死去？没有任何证据。甚至她的纪念物的抹杀也是神秘的。她的统治以后，她的王名圈被消除了，通常被其他君主的王名圈代替，或者被改变成其他君主的王名圈，尽管目前看不到临时性的铭文了。但这直到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接近结束时才发生，引起了更多的关于他的准确动机的问题。他是向他的强大继母/姑姑复仇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为什么要等待如此长的时间才试图破坏对她的纪念呢？或者他是在消除任何敌对家族对王位的宣称吗？这种宣称会威胁到他儿子阿蒙霍特普的王位继承，他在统治的最后几年开始准备传位给他的儿子。或许经过认真思考，我们可以确定，她的统治冒犯了玛阿特，必须从记录中消除，以作为权宜之计。这些和其他臆测都已经被提出来了，但没有一个得到证实。无论原因是什么，哈特舍普苏特的统治大部分被忘记了，直到19世纪才得到恢复。

图特摩斯三世在大约公元前1458年进入他的绝对统治时期，到当

时为止，他的统治还有23年的时间。他几乎立即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了系列战斗，这些战斗使他成为古代埃及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他十分可能已经感觉到他需要证明自己，但也有危险，即这个地区的城市国家将归入米坦尼王国的势力范围。米坦尼王国是埃及在近东的劲敌。这些战斗是极为值得的，这由他的纪念物和他的军队司令的坟墓验证了，军队司令的坟墓是常备军越来越多的另一个明证。但从长远来看，米坦尼王国能够控制自己以对抗图特摩斯三世，而且他不能维持自己在米坦尼王国最大程度地获得的势力范围。冲突在他死的时候还没有结束。他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建筑项目是卡尔纳克中庭后面的庆典神庙。 68

人们可能已经期望下一个国王跟随其父亲尚武的脚步了。阿蒙霍特普二世（大约公元前1425—前1400年）是一个运动型的年轻人，因他善于在战车上射箭而闻名。他的确以两次叙利亚战争开始自己的统治，并满载战利品而归，但他发现和平的利益可能重于战争的利益。一旦北方的形势稳定下来，那么他便与米坦尼王国缔结了长期和平，这允许他把统治的其余时间用于处理国内事务。他通过保留他父亲时代经过考验和验证的人们，并把自己选择的优秀新人收入其列的方式，加强行政管理。尽管战争艺术以前最受重视，但文化也逐渐受到重视。中王国被视为埃及文学的古典时期，中王国的文献被抄写和阅读，尽管标准在艺术领域增加，而且个人观点在艺术领域得到更多表述。阿蒙霍特普二世留给图特摩斯四世（大约公元前1400—前1352年）的是一个和平而富有的国家。图特摩斯四世通过与米坦尼的公主结婚而强化了与这个国家的联盟关系。

阿蒙霍特普三世（大约公元前1390—前1352年）的统治是更耀眼的。埃及统治了一个广阔的帝国；国家是和平的；繁荣达到了新高度。这些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埃及人意味着什么，还无人知晓，但对于阿蒙霍特普三世而言，这提供了一个无比富足的宫廷文化和在整个埃及执行建筑项目的机会，而且这种建筑项目几乎是古代埃及其他国王的建筑

项目无法比拟的。他在底比斯的主要工事包括卡尔纳克的第三塔门和卢克索神庙的大柱廊。在尼罗河西岸,他建筑了一座宫殿,挖掘了一个延至泛滥平原的巨大人工湖。

69 然而,阿蒙霍特普三世最大的建筑物大部分都消失了。到底比斯西岸参观门农巨像的参观者能够看到两个巨大的坐像,高出周围地平面二十多米。这两个巨大纪念物不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门农的雕像,而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坐姿雕像。它们矗立在他的礼拜神庙主入口的两侧。他的礼拜神庙是一座比附近的拉美修姆或美迪奈特·哈布或古埃及任何其他国王的礼拜神庙都更大的建筑物。阿蒙霍特普三世记录道:它是用"白色砂石建筑的,全身覆盖着金子,地面覆盖着银子,门用金银合金打造"。与底比斯其他国王礼拜神庙不同,这个礼拜神庙建在低洼地上,结果泛滥水冲刷了它的庭院和柱廊以及巨大雕像的底座,只留下了残垣断壁。

阿蒙霍特普三世特别注意外交,很多现存档案文献证明了这点。他与米坦尼国王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与米坦尼公主结婚,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但是,他也保持与巴比伦、迈锡尼和克里特等其他权力中心的关系。当阿蒙霍特普三世去世时,米坦尼国王给阿蒙霍特普三世的正妻王后提伊写信,要求她令她的儿子记住埃及与米坦尼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问题可能已经潜伏得够多了,但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统治完全可以被视作新王国的鼎盛时期,是几代人经过艰难构建之后出现的高峰时期。

然后,连续性被一种最意想不到的、在某些方面奇异的方式打断了。阿蒙霍特普四世(大约公元前1352—前1336年)最初并不打算做国王。他没有出现在他父亲统治时期的纪念物上,可能被保存在隐蔽的地方。他几乎没有受到掌握王权的训练,因为仅仅一位年龄较大的哥哥的死亡才使他变成了继承者。他的面貌非常奇怪:面容憔悴、狭长,厚厚的嘴唇、肿大的腹部、宽大的臀部、细弱的双腿。从心理学上讲,他可能充满了怨恨;他想当然有一些新思想。他的统治是一种失

常，埃及从未完全从这种失常中恢复过来。但是，因为它持续吸引大量注意力，而且因为它对新王国的其他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容否认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它的一些方面上花费笔墨还是值得的。 70

阿蒙霍特普四世直到自己统治的第五年都或多或少地按正统方式进行统治。在这一年，他开始了宗教政策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震荡了古代埃及政府和社会的基础。他拒绝接受传统的埃及神，首要的是大神阿蒙－拉的崇拜，用一个神——比神更强大的自然力——阿吞，即太阳圆盘本身，代替这些埃及传统神。与其他神不同，阿吞不表现为人形，也从不表现为动物形态。他仅仅展现为太阳，光线从它照射下来。唯一神人同形同性的感觉是光线末端的人手，人手握着生命(ankhs)——一个十字交叉的圈状物，象征着生命。生命被授予埃赫那吞和他的家庭。阿吞是“中心的、唯一的、不可见的和独特的……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过它的力量、要求或责任”。阿吞的至高无上性因他的名字写在王名圈里面得到强调，好像他是一位国王。

阿蒙霍特普四世通过把他的名字阿蒙霍特普(“阿蒙是满意的”)改成埃赫那吞(“他为阿吞有效地行动”)，从表面上表明与过去断绝联系。支持一个神或一群神战胜另一个神或另一群神，这并不一定是埃及的新鲜事物，也不是向一神教发展的趋势；在以前的很多统治时期，宗教领域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感作用。埃赫那吞的宗教政策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排他性。这种宗教政策没有为任何传统神留出位置。他宣布阿蒙神为被咒逐的神，并派遣成批的工匠去把阿蒙神的名字从纪念物上擦掉。阿蒙神庙的收入被转交给新的阿吞神庙。

埃赫那吞不打算留在底比斯，因为底比斯是他的敌人阿蒙的崇拜中心。他也不打算迁往孟菲斯，因为这个地方也明确表示认同古老宗教及其神祇。相反，他在底比斯与孟菲斯两城道路中间选择了一个地点，这里有一块广阔而贫瘠的平原通向山脉，这些山脉在尼罗河东岸紧靠河流簇拥在一起，沿着中埃及伸展。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城市，作为他的首都，他称其为埃赫塔吞(“阿吞的地平线”)。我们今天称

之为阿玛尔纳。埃赫那吞把这座城市献给阿吞神,并用一系列界碑标出它的边界,其中几块界碑保存下来了。

71

阿玛尔纳城被迅速建起来,很快就有了三万居民。这是中央规划和偶然发展的结果。该城市主要由北部的一座宫殿复合建筑和市中心的一座巨大阿吞神庙构成。与大多数古代埃及神庙——它们是黑暗、神秘的地方——不同,阿吞神庙没有屋顶,向天空开放。行政管理建筑物、办公处、作坊、动物棚和其他支持性建筑物被构建出来。几排私人房屋簇拥在王室大道这条中轴线两侧,埃赫那吞和他的王后涅菲尔泰提坐在巨大战车上从这条大道驶过。因为城市建立在泛滥的河水不能到达的不毛之地,而且埃赫那吞死后不久就放弃了,所以它是保存最好的古代埃及城市事例,并产生了大量重要发现。阿玛尔纳书信发现于记录大厅。阿玛尔纳书信是几百片烤砖式的泥板,铭刻着楔形文字,记录了埃及与古代近东其他强国的交往。雕刻家图特摩斯的房屋和院子分散着很多未完成的雕刻品和模型,包括著名的涅菲尔泰提彩绘石灰石半身像,现存放于柏林的埃及博物馆。(这是一些埃及人厌恶的事情,他们对于这件艺术品和其他很多古物从他们的国家输出到其他地方的方式感到愤恨。)

当然,古代埃及城市不得不给它的死者和活人提供供应品。对于高级官员,坟墓设置在凿进南部和北部的山洞里面,可以清晰地俯瞰城市。它们的墙壁装饰着王室家族和阿吞给出其带有生命光线的场景。唯一保存下来的文献《阿吞颂》(*Hymn to the Aten*)也发现于这些坟墓的墙壁上。埃赫那吞选择城市东边的一个干河谷作为王室墓地,这是帝王谷的另一形式。他规划了几座坟墓,但只有一座坟墓得以建成。埃赫那吞命令道:“如果我多年以后死在东南西北的任何一座城市,那么我都要被带回来,而且我要埋葬在埃赫塔吞。”然而,这里唯一安全的墓葬是他的第二个女儿麦克塔吞的坟墓,这个坟墓的绘画悲伤地展现了她那极度忧愁的家庭,这是所有古代埃及艺术中如此描绘王室的唯一一处。十分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的坟墓建在阿玛尔纳,这

引起了这样的想象，他们可能通过尼罗河运回了他们故乡的老墓地。

埃赫那吞的王后涅菲尔泰提在政权中占据一种强有力的地位。她 72 远不仅仅是王后，她在埃赫那吞统治的最后几年变成了正式共治者。她的非凡地位由她独特的王冠展现出来，她甚至被描绘成传统国王锤击其敌人的姿势。在阿玛尔纳艺术中，埃赫那吞、涅菲尔泰提和他们的六个女儿被经常显著地展现为亲密、不拘礼节的家庭群体。涅菲尔泰提可能一度被一个名叫凯亚的妃子超越，这个妃子获得了特殊的头衔，即“国王极为钟爱的妻子”。埃赫那吞或许正是与凯亚生了一个儿子，当时的史料把这个儿子描述为“国王的亲生儿子，他钟爱的儿子，图坦卡吞”。这个图坦卡吞就是未来的国王图坦卡蒙。但几年以后，凯亚突然从记录中消失了，她的名字被从纪念物中抹掉，而且涅菲尔泰提再次卓越地出现。很明显，涅菲尔泰提并不是可以小看的妇女。

阿玛尔纳艺术的革新与宗教改革一样令人震惊。自然主义早在新王国某个阶段的艺术中就已经开始发展了，但它从未被应用于王室家庭。现在，宫廷艺术家运用高度发展的技术，以最迷人的自然姿势描绘埃赫那吞、涅菲尔泰提和他们的女儿。在一个场景中，埃赫那吞把他的大女儿放在摇篮里，并亲吻她，而其他两个女儿则爬到涅菲尔泰提身上，这两个女儿中的一个用手指着她的父亲，说着一些关于他父亲的事情，而且是他妈妈听不懂的，这种家庭的瞬间变成了永恒。另一幅绘画也是这样的，描绘了涅菲尔泰提坐在埃赫那吞的膝盖上。埃赫那吞几乎总是不被描绘为理想的形态，但他实际上就是这种身体形状，尽管他奇怪的体形有时被夸大和类型化，甚至应用于其他个人。尽管艺术品失去了很多传统项目，例如国王与神在一起，但艺术家更加关注人的形态，并试验新技术，包括传递深刻印象的试验。埃赫那吞也是雄心勃勃的建筑者，尤其在阿吞神庙的建筑方面。阿吞神庙或许是匆忙建筑的产物，因为他的工程师运用了较小的石块，这些石块被称为标准石块（*talatat*），能够迅速地堆砌起来。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埃赫那吞死后，它们能够被更容易地拆除，并循环利用到其他建筑物中。

自然主义在文学和艺术中找到了新的表达途径。阿玛尔纳出土的最著名作品是《阿吞颂》,这是献给神的一系列诗歌,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诗歌是由埃赫那吞自己写作的。

73

你升起于地平线,光彩夺目,
哦!阿吞,生命创造者有勃勃生机。
当你在东方升起,
你用美丽填充大地。
你的光芒强大而美丽,
高悬空中,照耀大地。

与较早的新王国作品不同,阿玛尔纳文学是用后埃及语书写的,这种语言更接近于那个时代的日常用语。较早的新王国作品是用稍显古风式的古典语言创作的,古典语言在中王国时期形式化。

尽管埃赫那吞远在阿玛尔纳,但他绝不会与国家事务隔离开来。北宫(宫殿)靠近尼罗河上的一个港口,他可以通过这个港口与埃及国家其他行政中心和诺姆省会保持联系。外国使节来到这里,呈献上他们的问候和礼物。在阿玛尔纳书信中,有一份抱怨,是来自亚述国王的,因为他的代表团没有得到埃赫那吞的及时接见。埃赫那吞也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与人们有时设想的不同。他在统治的第十二年,严厉镇压了努比亚的一次反叛。但当正在扩张的赫梯王国打败埃及的同盟米坦尼王国,削弱了埃及对其北方附属国的控制时,埃赫那吞没有进行对抗北方新强国的远征。阿玛尔纳书信包含歇斯底里的恳请援助的内容,这恰恰是三百名埃及战士和拜布罗斯的王子发出的请求,而且埃及在耶路撒冷的代理人警告说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但埃赫那吞谨慎地作出反应,在北部叙利亚安置一支正规军,以便阻止任何其他国家立场的转变。证据表明埃赫那吞缺乏更强有力地对抗赫梯人的行动,这可能导致了军队内部的骚动,军队到当时为止都是埃及的强大支柱。然

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叙利亚后来的事件，那么埃赫那吞的克制可能是他做出了聪明的调整，以适应正在变化的现实。

埃赫那吞的改革试验整体上对埃及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还无从知晓。在社会较低层，在大量民众当中，改革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在阿玛尔纳工人村的遗物中，有大量痕迹表明传统宗教仍得到尊崇，至少是私人行为。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新宗教不可能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没有像欧佩特这样的重大节日庆典，没有神话，没有肖像，没有来世信仰。至于传统祭司集团，他们对新宗教的接受最多也仅仅是勉强的。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埃赫那吞能够实施宗教改革，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强有力的君主制的存在，这种君主制建立在强大的基础上，尽管没有建立重要的新基础。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一些混乱的痕迹和证据表明他主动与古老的宗教崇拜进行调和。

74

阿玛尔纳试验是古代埃及史上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件，其结局仍然不是十分清楚。埃赫那吞大约死于公元前 1336 年，可能按照他的愿望埋葬在阿玛尔纳的坟墓中了。不幸的是，坟墓被发现以后，被粗心大意地清理，结果现存证据都丢失了，人们热烈地争论这样的问题，即他究竟埋葬在了阿玛尔纳还是底比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告诉我们涅菲尔泰提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可能比她丈夫去世早几年，并埋葬在其丈夫的坟墓里。埃赫那吞的女儿美丽塔吞嫁给了一个神秘而短命的国王，后者名叫斯门卡拉（大约公元前 1338—前 1336 年）。人们对如下问题仍有争议，即斯门卡拉是否曾进行独立统治，甚至他是谁，或者她是谁？因为斯门卡拉完全有可能是涅菲尔泰提，在保存下来的肖像画中，后者把她的女儿美丽塔吞描绘为伟大的妻子（Great Wife）。另一个女儿安克森帕阿吞嫁给了图坦卡吞，后者或许是她的同父异母兄弟，是埃赫那吞与凯亚的儿子。家庭联系通过对最近在图坦卡吞坟墓中发现的衣服的分析强化了，后者展现了与埃赫那吞同样扭曲的身形。

因为当图坦卡吞（大约公元前 1336—前 1327 年）登上王位时，他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埃赫那吞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阿伊和军队首席司

令郝列姆赫布掌握了摄政权。阿玛尔纳的试验突然停止。图坦卡吞从阿玛尔纳迁走,阿玛尔纳不再是埃及的政治和宗教首都,很快就变成了幽灵城镇。行政部门返回孟菲斯,而底比斯再度成为宗教中心。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不仅被放弃,还被积极地擦去,因为这样的继承关系,埃赫那吞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直到 19 世纪,研究的学者们才使他从湮没无闻中出现。古老神的神庙被修缮,阿蒙的优势重新确立,并伴随着复仇;埃赫那吞的宫殿和神庙被破坏,他的王名圈被损坏。当不得不在官方档案中提及他时,他被视作"敌人"。图坦卡吞的名字变成了图坦卡蒙(而安克森·帕阿吞的名字变成了安克森·帕阿蒙)。埃赫那吞在北部叙利亚的克制政策也被改变,但这或许并不聪明,因为赫梯人在阿穆卡打败了埃及人,使得北部边境的形势与以前一样。

当他大约十七岁和他统治的第十年的时候,图坦卡蒙突然死了。很多关于他的死亡的假设已经被提出来,包括自然原因、谋杀、战车事件和战斗中的致命伤。他没有埋葬在最初为他准备的坟墓里,而是埋葬在了一座较差的碰巧准备使用的坟墓里。他的坟墓是由霍华德·卡特于 1922 年发现的,这是埃及学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对流行的想象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当卡特首先向坟墓里窥视时,他看到的是"金子——每个地方都闪烁着金光"。然而,坟墓使我们认为男孩国王是一个次要君主,他的埋葬是匆匆进行的,是临时准备的,那些勉强塞入他的小坟墓的珍稀物件的杂乱无章表明了这一点。一些伟大国王坟墓中的配备或许更华丽,恰恰因为他们的坟墓更大、更复杂。

图坦卡蒙的继任者是阿伊(大约公元前 1327—前 1323 年)。在阿伊的短暂统治时期,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记录在阿玛尔纳书信里。图坦卡蒙年轻的寡妇安克森·帕阿蒙给赫梯国王舒皮卢利乌玛写信,要求一个王子与她结婚,并变成埃及国王。"我的丈夫已经死了,而我没有儿子,但据说你有很多儿子。如果你把你的一个儿子送给我,他将变成我的丈夫。我绝不会令我的任何臣民成为我的丈夫。我非常担心。"舒皮卢利乌玛最初疑惑重重,但最终派他的一个儿子詹展

扎去埃及，但王子在路上就被谋杀了，可能是郝列姆赫布派人进行的谋杀。郝列姆赫布继年迈的阿伊之后当上了国王。

在郝列姆赫布（大约公元前 1323—前 1295 年）统治时期，对抗埃赫那吞异教的物质遗物和精神记忆的斗争达到了顶峰。郝列姆赫布对阿蒙神的尊崇表现于卡尔纳克神庙的巨大多柱厅的构建，后者在他统治时期开始建筑。但他恢复埃及在北部努比亚的优势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埃及与赫梯人在北部叙利亚的冲突发生于詹展扎被谋杀以后。根据马涅陀的王朝世系，郝列姆赫布的死亡结束了第十八王朝，尽管第十九王朝的国王把他视作他们的先驱。

76

拉美西斯一世（大约公元前 1295—前 1294 年）的短暂统治之后，拉美西斯一世的儿子塞提一世（大约公元前 1294—前 1279 年）变成了国王。拉美西斯一世曾经是郝列姆赫布的维西尔，而且老年时得到很高的晋升。塞提一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统治者，再次在西奈、东沙漠和努比亚开采矿石和采石，他往这些地区派遣攻击性远征队，并把新财富带回埃及。在北方，他征服了巴勒斯坦反叛的傀儡城市国家，并在北部叙利亚把赫梯的影响范围向后推，尽管赫梯能够恢复大多数失地，并始终是埃及在近东地区的主要敌手。在西方，他对抗利比亚人的入侵，利比亚人使新王国后期的埃及苦恼不堪。

塞提一世也是一位著名的建筑者。他继续从纪念物上进行对抗埃赫那吞之记忆的斗争，但采用更积极的方式，派遣大批凿工去修复异端国王已经改变的阿蒙神和前阿玛尔纳法老们的铭文。大多数传统神庙的修缮由他的前辈开始，由塞提一世完成。他自己的底比斯和阿拜多斯神庙都展现了非常优秀的品位和专业工艺，保持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高标准，并结合了阿玛尔纳试验中的一些艺术创新。他继续建筑卡尔纳克神庙的巨大多柱厅，他开采石头的场面铭刻在外墙上。塞提一世成功的统治以后，被埋在帝王谷中最华丽的坟墓里。

拉美西斯二世（大约公元前 1279—前 1213 年）是在他自己的时代就变成了传奇人物的古代埃及国王，而且这是他自己创造的。关于他

统治的每一件事情在规模上都是惊人的,或者被描绘得就像事实一样。他统治了 66 年。在他统治时期,他和他的七位妻子以及漂亮的妻妾群至少生下了 45 个女儿和 40 个儿子。他比其中的十二个儿子的寿命还长。除了他自己的坟墓,他还在帝王谷中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巨大坟墓。

77 拉美西斯二世的建筑项目在规模上是令人惊愕的。他最众所周知的神庙是底比斯的拉美修姆神庙和努比亚的阿布·辛拜勒神庙。拉美修姆神庙因谢莉的"王者之王"而永垂不朽。阿布·辛拜勒神庙有四座巨大的坐像;但有很多神庙分散在埃及和努比亚各地,尽管这些神庙中的几座是从以前的统治者篡夺来的,尤其是从阿蒙诺菲斯三世篡夺来的。与拉美修姆一样,这些神庙中的很多都是建筑杰作,但其他神庙并不是很好的建筑物,以质量为代价强调数量。或许是对阿玛尔纳创新的持续反应,有一种向建筑中的古典主义的回归,这种倾向在大量古典文学作品的复兴中反映出来;但同时代文学是用当时的语言创作的,与阿玛尔纳文学作品相像。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是如此普遍存在,以至于它们一定使大批雕刻家终日忙碌,尽管很多雕像是从较早期的国王雕像修改成的。国王纪念物的循环使用是古代埃及非常确定的实践。

作为军事领袖,拉美西斯二世早就很好地卸下了自己在努比亚的统治责任,努比亚的事件经常需要恢复秩序。他在贝特·埃尔-瓦利修建的神庙证明了这一点,这座神庙恰好在阿斯旺大坝上重新确定地址。但到当时为止,他最好的拓展是在叙利亚,赫梯帝国在这里对埃及的占领地和同盟施加持续威胁。在亲自率领军队开战的过程中,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迭什遇到了他的敌手赫梯国王穆瓦塔里。埃及人不充分的侦察允许赫梯人掌控行进中的埃及军队,并迅速地毁灭其一部分,使拉美西斯二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根据他的记载,他大胆地在拉美修姆、卢克索神庙以及其他地方的塔门上宣称,他只身六次冲散敌人,击溃 3500 辆战车,"使卡迭什平原尸横遍野",而穆瓦塔里"斜着身子、颤抖着站立在那里,非常害怕"。正如人们猜测的那样,事实稍有出入。拉美西斯二世或许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他并没有很多选择,护卫军和其

余军队的及时出现挽救了他。战斗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会战，在这场战斗中，双方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战绩。北方的形势最终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外交稳定下来。双方签订了条约，该条约用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赫梯的楔形文字书写和保存下来。和平还得通过联姻的方式弥补。

相较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非常明显的辉煌，第十九王朝的最后几年是模糊不清的，但常常混乱不堪。拉美西斯二世的儿子和继承者美楞普塔（大约公元前 1213—前 1203 年）或许已经 16 岁了，他在当年登上王位（拉美西斯二世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并统治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他统治时期的伟大事件发生在三角洲。利比亚人在三角洲的入侵早就是问题了，并逐步上升为全线入侵。美楞普塔有效地反应，在现代城市比尔贝斯附近与敌人会战，并歼灭了他们。他用令人厌恶的细节鼓吹，六千两百个被屠杀的敌人的阴囊被割掉，并作为战利品被带走。幸存者被安置在军事殖民地，首要的是安置在三角洲，他们将在三角洲变成埃及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 78

美楞普塔因此表现得足够好，但塞提二世（大约公元前 1200—前 1194 年）的大多数统治时期因对抗篡权者的斗争而复杂化，这个篡权者名叫阿蒙梅索，或许是美楞普塔较低级王后的儿子。塞提二世非常艰难地战胜了阿蒙梅索。塞提二世被他唯一的儿子希普塔（大约公元前 1194—前 1188 年）继承。希普塔是一个跛足的男孩。年轻国王的继母特沃斯拉充当了摄政王，得到了强有力的官员的支持。这个官员名叫贝亚，他被描述为“整个国土的长官”，而且他的地位是如此高，以至于他在帝王谷中拥有一座坟墓。希普塔去世以后，特沃斯拉（大约公元前 1188—前 1186 年）作为法老进行公开统治，就像很久以前第十八王朝的哈特舍普苏特做的那样。

特沃斯拉的死亡结束了第十九王朝。第二十王朝怎样掌权的，还是个谜，但王朝第一个国王塞特纳赫特（大约公元前 1186—前 1184 年）的炫耀中提到了一个无政府时期和叙利亚篡权者的非法统治时期，这个叙利亚篡权者或许是长官贝亚，而且塞特纳赫特的坚决行动结束

了这个统治时期。他对以前政权的敌意表现于他占用了帝王谷中特沃斯拉的坟墓。

简短的统治之后，塞特纳赫特被他儿子拉美西斯三世（大约公元前1184—前1153年）继承。这位国王遇到的问题是多重的，包括来自宫廷内部的一场阴谋，后者被称为“后宫阴谋”。行政管理的困难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戴尔·埃尔－美帝纳工人村的工匠们宣称，他们没有拿到报酬，并在神庙前面举行静坐抗议。拉美西斯三世不得不两次开战，以便解决三角洲地区反复发生的利比亚问题，尽管他在每个事例——又残忍地以身体部件来计算数目——中都获得胜利，而且较小群的利比亚人的袭击往南远及底比斯，迫使戴尔·埃尔－美帝纳的国王工人停下手中的工作，并在美蒂奈特·哈布神庙墙的后面寻找避难所，这表明王国不能维持国内安全。但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最大的危机是海上民族的入侵，被克服了。

79

海上民族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不顾一切地抢占土地的民族的大批移民群体。他们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倾向于破坏和毁坏以及殖民，他们对整个东地中海和近东造成了巨大破坏。他们在陆地上和海上都是令人畏惧的，粉碎了强大的赫梯帝国，蹂躏了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和北部叙利亚，他们在这里把古老的城市乌加里特夷为平地。埃及人的史料怀着敬畏叙说海上民族：“他们用自己的手覆盖了地球边界所及的国家，他们的心是自信的和信赖的：‘我们的计划将成功！’”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第八年，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都转向埃及，造成了埃及曾面临的最严重的一个危险，因为海上民族的入侵和占领无疑是比希克索斯人更大的灾难。

幸运的是，埃及有时间做准备。通往三角洲的东方道路被设防，而且一支军队向南部巴勒斯坦进军。当大群海上民族在陆地上出现在边境时，他们被打败。但敌人也通过水路进攻，因为他们可怕的战船装有明显弯曲的撞锤，已经深入到了三角洲。如果说古代埃及人不是伟大的水手，那便是保守的说法。拉美西斯三世也运用一种革新了的陆路

与海陆相结合的战略击退了这次入侵。他的胜利在美蒂奈特·哈布的神庙第一塔门上的绘画中大胆地表达出来。因为这些战斗，拉美西斯三世有时被称为埃及最后一个伟大的国王，因此他被埋葬在帝王谷中一个豪华坟墓里，这或许是恰当的设计。

第二十王朝的其他国王是一系列连续的国王，都称拉美西斯，因此该王朝也被称为拉美西斯时代。关于各个国王的历史细节很匮乏，但整体轮廓是一个稳步衰落的时代。埃及摆脱了海上民族的入侵，但冲 80 击如此严重地毁坏了埃及帝国和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外交安排，以至于那些地区丢失了。拉美西斯三世以后，新王国没有建筑重要神庙。行政管理继续摇摆，这再次由戴尔·埃尔－美帝纳工人的经历展示出来，他们的报酬问题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他们的首席工人和书吏最终发现亲自收集政府税务以供养社区是必要之事。秩序的崩溃也表现于底比斯西岸盗墓的猖獗。盗墓在古代埃及根本不是新鲜事，但这时的盗墓是以这样一种规模进行的（这表明从普通工人到高级官员的人们都进行盗墓了），以至于强大的政府如果不消除它，至少应该能够限制它。

国王的政治和宗教权威都遭到侵蚀。在理论上，国王是政府每个部分的最高首领；他的财富就是国家的财富；事实上，他拥有土地。然而，在实践中，所有权和地位的古老世袭倾向重新起作用，结果土地和政府职位从父亲传给儿子，这导致了严格的家族体系的形成。他们的财富和权力大部分独立于国王，但这几乎没给国王造成影响，也没有直接控制国王。

出于同样的原因，神庙越来越多地累积财富，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据估计，到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末期，神庙拥有了埃及大约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和五分之一的人口。这种分散的权力的最大危险集中在于卡尔纳克阿蒙高级祭司，他是上埃及的实际统治者。与其他重要职位一样，祭司集团变成了世袭团体，因此大多独立于国王之外，它最终发展成了一种制度上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国王的权力对抗。阿蒙－拉神的恢复

使祭司集团获得了太多的因素,把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了阿蒙的祭司手中。

阿蒙-拉神的恢复也以更阴险的方式削弱了国王的权威,例如那种被称为个人虔诚的发展。以前,唯独国王在神和人类之间起中介作用:他是神在地球上的代表,因此人们都顺从他,因为他正执行人类的愿望,而且仅仅通过他,人们才能够获得神的支持。然而,阿玛尔纳时81 期以后,阿蒙-拉神不仅逐渐被视作无上权威之神,也被视作无所不在的神。一首阿蒙赞美诗写道:"当人们看他时,他在远方;当人们听到他时,他在身旁。"个人能够直接向阿蒙-拉神祈祷,而且神将会听到他的祈祷。在对这个神的很多描绘中,有一个第十九王朝的男人马伊的石碑。石碑展示出他正跪着向阿蒙-拉神祈祷,而"他(神)正聆听祈祷者"。为了使观点明晰,石碑描绘了三双巨大的聆听耳朵。随着国王的宗教职能的减少,他的政治权威也相应地衰落。

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军队并没有在王朝的衰落中起主要作用;恰恰在拉美西斯时代末期,与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军队赤裸裸地攫取权力。卫戍部队被广泛地分散开来,结果不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殖民主义者和其他类民兵因素也没有被武装起来。在必要时,他们从国王的主要城市的兵工厂获得武器装备。在这些城市里,他们"在法老面前"武装起来,就像一篇文献明确地表述的那样。

拉美西斯十一世是第二十王朝和新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他统治了 28 年。按照拉美西斯时代的标准,这样的统治时间是相当长的。与之前模糊的国王统治时期相比,他的统治被很好地记录下来,但记录没有提供什么好的事情。关于埃及已经衰落的艰难时代的最雄辩的证据保存于温阿蒙运气不佳的遭遇里。拉美西斯十一世派遣温阿蒙去拜布罗斯获取用于建造阿蒙-拉神的神圣船只的雪松。这样的任务以前能够得到很好的财政支持,并被顺利执行。然而,温阿蒙单独前往,只带着少量金子和银子,不得不乘坐外国商船前往目的地。他在路上被抢劫,因此当他到达拜布罗斯时,他既没有钱,也没有使节所呈递的国书。

拜布罗斯的王子曾经被视作“埃及的仆人”,轻蔑地接见了可怜的使者,指出在过去几天多达六艘满载珍稀金属的船只曾被派去购买雪松。王子宣称他不向埃及国王称臣,并拒绝无偿给予温阿蒙任何东西。

埃及在拉美西斯时代较早期就已经丧失了亚洲占领地;在拉美西斯十一世统治时期,努比亚和上埃及也背离了他。拉美西斯十一世无效用地尽力干涉几年的混乱之后,一位名叫皮安柯的将军在底比斯举行了一次军事政变,并占据了南部维西尔“国王的库什之子”和“阿蒙的高级祭司”等职位,有效地把自己确立为独立统治者。皮安柯的继承者是他的女婿赫利霍尔,他在拉美西斯十一世去世以后采用了王室头衔,从而使他的地位很清楚。 82

拉美西斯十一世是最后一位在帝王谷中拥有坟墓的国王,但甚至这个纪念物也展现了悲惨的证据。它从未完成,而且拉美西斯十一世被埋葬在其他地方。在第二十一王朝,当皮努杰姆一世是“阿蒙的高级祭司”时,该坟墓曾是存放国王木乃伊和其他物件的地方,这些木乃伊和物件是从相邻坟墓中移来的,相邻坟墓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掠夺了,这就是显赫的新王国君主制的悲惨结局。

第六章　第三中间期和后期埃及

83 第三中间期(大约公元前 1069—前 715 年)这个概念不太适合古代埃及历史的既定分期框架。首先,从时间长度上来看,这个持续了三百六十多年的时期与“中间”时期不成比例,这个时间长度比以前的两个中间期合起来还要长,比中王国更长,几乎与晚期埃及一样持久。其次,持久稳固的主线贯穿第三中间期,这使它比随之而来的后期埃及更连贯。

强大的中央权威和行政的统一是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很多王朝——绝非所有王朝——的特征,想当然是第三中间期所缺乏的,因为埃及被分成两个政治重心,一个在三角洲,另一个在上埃及,而中埃及的领域随着南北两极政权运气的盛衰而振荡。但这个时期绝不会返回到毫无法度和分权主义的状态,后者是早期混乱时期的特征。事实上,在第三中间期的很多时间,一种起作用的暂时妥协得以达成,这使得埃及能够以相当稳定的基础运行,尽管它在近东权力平衡中的重要性从 84 新王国的帝国时代就大大降低了。

在北方,第二十一王朝的第一个国王斯门德斯把首都从培－拉美西斯迁到塔尼斯。培－拉美西斯的港口已经淤塞了。塔尼斯位于三角洲北部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塔尼斯的遗物表明它是一个明显杂乱无章地堆砌起来的城市。城市的遗物包括各式各样的雕像、圆柱和建筑

石块。一些物件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是从各个遗址中搬运来的。这些物件并不总是按照有序而符合逻辑的方式集合起来。但塔尼斯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用高10米、厚15米的城墙围绕。第二十一王朝和第二十二王朝的国王坟墓在城镇中间，靠近阿蒙－拉神的大神庙。一些棺材是银质的。在法老时代，银子是比金子更珍贵的金属。1939年，这些未遭破坏的坟墓的发现在重要性上可以与图坦哈蒙墓的发现相匹敌，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遮蔽。北方国王的控制范围扩展到整个三角洲，并进入中埃及，到达了埃尔－希巴城，埃尔－希巴城位于法尤姆以南50英里的地方。

再往南的地方是阿蒙的高级祭司们的领地，他们几乎以王名圈进行统治，而且偶尔也确实以王名圈进行统治。他们的政府作为神权政体运行。在这种政体中，高级祭司的敕令具有神之命令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这些敕令通过神谕来确定。在第三中间期早期，祭司政权的收入来源是开采帝王谷中的财富，帝王谷的盗墓潮在第二十一王朝末期就被大大阻止了。幸运的是，图坦哈蒙的坟墓在当时逃过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它位于帝王谷的基底，很久以前就被碎石覆盖了，并被遗忘了。当国王坟墓中有价值的东西遭到洗劫时，国王们的木乃伊被隐藏到其他地方。一个这样的隐藏处是戴尔·埃尔－巴哈里一个重新使用的第十一王朝的竖井墓。这个竖井墓由当地古物商于1871年发现，四年以后由埃及学家们发掘出来。它包含40具国王的木乃伊，包括雅赫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一世、图特摩斯二世、图特摩斯三世、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等国王的木乃伊。后来，人们还发现了第二个隐藏处，而且可能还有第三个隐藏处。戴尔·埃尔－美迪纳的工人社区被解散，因为不再需要其居民的服务了。

85

阿蒙高级祭司的底比斯王国的最南端没有超过第一瀑布。就像在中王国末期那样，努比亚人利用埃及的虚弱，重新控制了下努比亚。这个过程几乎无人知晓，或许是逐步的，但这非常有益于库什王国的复兴。库什王国的首都此时更往南了，在第四瀑布附近的凯拜尔·巴卡

尔周围。随着时间的推移,库什王国占据了埃及权威崩溃之后留下的空白地区。尽管"库什的国王之子"这样的头衔在政府的命名法中保留了一段时间,但埃及人仅仅从军事上离开了南方,除了在公元前 9 世纪中期短暂地入侵至第二瀑布,埃及人始终与库什保持贸易和外交关系。

底比斯象征性地承认北方的霸权,但埃及的政治分裂是彻底的。然而,与之前埃及国家分裂为竞争的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不同,两个王国的关系整体上是可以容忍的,通过外交关系来巩固。高级祭司皮努杰姆一世与拉美西斯十一世的女儿结婚,而他们的一个儿子变成了普苏森尼斯一世(大约公元前 1039—前 991 年),后者是第二十一王朝的第三位国王。接下来,普苏森尼斯一世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底比斯高级祭司孟凯皮拉;他们的儿子最终变成了皮努杰姆二世。但第三中间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广泛内战的时期,尤其在南方,反叛持续不断;后来,在三角洲发展起来的互相竞争的封地,为了争夺贫穷国家已然减少了的资源,而展开了斗争。

另一个因素是利比亚人,他们的数量因逐渐增加的移民而增大。他们曾经是受轻视的入侵者,但随着拉美西斯三世开始的军事殖民逐渐把利比亚人吸收进埃及军队,利比亚人变成了埃及军队的一部分。他们在军队中的数量增加到极点,结果到新王国末期,埃及军队几乎完全由利比亚人构成。很多利比亚人晋升为行政高官。例如,舍尚克一世登上王位时,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然而,很多人保持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感,而且利比亚人的殖民地为地方王朝家族提供了强大基础。

86

第二十二王朝的创建者舍尚克一世(大约公元前 945—前 924 年),来自三角洲布巴斯提斯城的利比亚家族。他利用自己作为军队司令的地位和因婚姻而与普苏森尼斯二世的密切关系,在受到最小程度的反对的情况下,掌握了王位,并证明自己是第三中间期的杰出国王。尽管第二十一王朝已经接受了国家的分裂状态,但舍尚克一世尽力恢复它的完整性。他把自己的儿子伊乌普特(他已经是军队司令)安置为阿蒙的高级祭司,并与各地有势力的家族建立忠诚联盟。

在利凡特，埃及大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是消极的。舍尚克一世在这里恢复了前进的政策。在所罗门于公元前 930 年死后，以色列短暂统一的王国分裂为犹大王国[①]和以色列王国。舍尚克一世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率领一支包括 1200 辆战车的强大军队，战败了这两个王国，并围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的防卫者为了使它免于占领而付出了沉重代价。《圣经》的《列王纪》(上)陈述道：舍尚克"取走了神的房屋的财宝和国王的房屋的财宝；他甚至取走了一切——他取走了所罗门制造的所有金盾"。然而，恢复了实力的埃及人在巴勒斯坦的出现如同昙花一现，在舍尚克一世统治以后就迅速减少了。当舍尚克一世返回埃及时，他实施了几个引人注目的建筑项目，包括卡尔纳克神庙第二塔门和新庭院的修建。

舍尚克一世的儿子和继承者奥索尔康二世[②](大约公元前 924—前 889 年)继续他父亲的建筑项目，最突出的是建筑其家族在布巴斯提斯的根据地。他还通过使自己的儿子成为阿蒙的高级祭司而控制南方，通过使这个儿子成为自己的共治者而控制北方。这个儿子适时地继位为舍尚克二世(大约公元前 889 年)，但随着他在几个月后的死亡，把国家两部分再次结合起来的所有推动力都消失了。在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塔凯罗特一世(大约公元前 889—前 874 年)统治时期，虽然他掌握着权威，并统治了 15 年，但政治分裂的趋势继续发展。塔凯罗特一世没有留下任何重要纪念物，这一事实表明了他的统治是虚弱的。在接下来几十年里，阿蒙高级祭司的职位再次变成世袭职位，其他高级职务也变成了世袭的，这以国王的控制为代价加强了省的独立。

北方重新施加权威的试图受到底比斯的强烈抵制，高级祭司哈瑞斯在底比斯自称国王。很多地方统治者，尤其三角洲的统治者，获得了

87

① 严格来讲，公元前 930 年所罗门去世以后直到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32 年至前 30 年)之前，这个分裂出来的犹太人的王国都被称为"犹大王国"。直到希腊化时代结束以后，这个王国才被称为"犹太王国"。——译者注

② 根据某些王朝序列编排法，他被列为奥索尔康一世。

如此多的自治,以至于他们中的几个也自立为王。这些人中的一些可能是马涅陀笔下的第二十三王朝的成员,但这还不确定。根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计算,到公元前730年,"在三角洲(在布巴斯提斯和莱昂托坡里斯)有两个国王,在赫尔摩坡里斯有一位国王,在上埃及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有一个国王;除了三角洲那些几乎独立的国王之外,在舍易斯还有一个'摄政王'、四个'伟大的玛的首领'、一个'西方的王子'。后面这个人是泰弗纳赫特,他占据了西三角洲和孟菲斯的所有地区,并往上埃及北边扩展。"[8]

这样的政治大杂烩为库什国王们提供了黄金时机,他们巩固了对下努比亚的控制,也使自己成为埃及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当埃及的努比亚国王组建的第二十五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卡什塔(大约公元前770—前747年)向北进军时,他可能几乎未遇到底比斯国家的抵抗。阿斯旺的一块纪念碑称他为"上下埃及之王",尽管他的权威不可能已经扩展到底比斯以北的地区。卡什塔很快回到首都纳帕塔,这个城市在第四瀑布以南,他在那里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辟伊(大约公元前747—前716年)。

底比斯的控制是通过"阿蒙的神圣女崇拜者"(Divine Adoratrices of Amun)这个值得注意的制度实施的。这个古老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哈特舍普苏特统治时期,被第二十三王朝的奥索尔康五世(大约公元前730—前715年)①赋予了新目的,他希望阻止阿蒙的世袭高级祭司集团及相关问题的再次出现。他任命他的女儿为"阿蒙的神圣女崇拜者",同样地也认命她为底比斯最高的宗教人物。自此以后,神圣女崇拜者不能结婚;她的职位通过收养程序传递,王室家族可以通过这个程序选择女崇拜者,从而控制底比斯。辟伊恰恰通过迫使舍本韦坡特收养他的妹妹阿蒙尼尔迪斯一世而做出了选择。

88 下埃及的政治形势始终不稳定,因为地方权力中心相互竞争。在

① 有时被算作奥索尔康四世。

西三角洲，尼罗河一条主要支流上有一个城市，它就是舍易斯。舍易斯作为最强有力的地方权力中心出现。当舍易斯的泰弗纳赫特开始扩张他的势力进入尼罗河谷、侵犯底比斯领域时，辟伊做出了强烈反应。双方在孟菲斯北方较远的地方进行战斗，战斗非常激烈。辟伊迫使泰弗纳赫特和那些已经与他联盟的地方王朝臣服于他，尽管他们仍保持自己的地位。辟伊的成就被记录在凯拜尔·巴卡尔的一块显著的纪念碑上，这恰恰表明了他是多么的埃及化了。辟伊被表现为纯粹埃及文明的样本，埃及文明已经被微不足道的统治者玷污了。至少根据现存记录，他在埃及的行为比法老在努比亚的行为更人道，法老以前曾多次蹂躏努比亚。

在展示了对神的真正敬意，举行了加冕仪式之后，辟伊返回纳帕塔，但他在北方看到的事物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在凯拜尔·巴卡尔附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金字塔，并成为 800 年内埃及第一个被埋葬在金字塔内的国王。他的事例在接下来一千年里被效仿，结果在努比亚构建的金字塔相当于埃及金字塔的两倍。努比亚金字塔没有埃及金字塔那么高，而且有特别陡峭的角度，但它们是用优质石头构建的，所以很多遭受毁坏或破坏的金字塔不是自然力量造成的，而是人为的。这样，古代埃及人的很多伟大思想之一便被移植到尼罗河上游，且扎根很深。

舍易斯虽被镇压，但它的势力并未粉碎。在泰弗纳赫特的继承者巴克霍利斯（大约公元前 720—前 715 年，马涅陀把他归入短命的第二十四王朝）统治时期，北方的舍易斯国家又进行了一次扩张，结果冲突再度发生，这恰恰发生在辟伊的弟弟夏巴卡（大约公元前 716—前 702 年）继承王位的时候。（这里，我们可能注意到，库什王国的继承方式与时至今日的东方其他国家相似，把优先权给予去世国王的兄弟，而非儿子，然后再传给下一代。因此，夏巴卡接下来把王位传给了他的两个侄子，即辟伊的儿子，夏巴塔卡和塔哈尔卡。）国王巴克霍利斯再次向北进军，与努比亚作战。巴克霍利斯为他的野心付出了代价，在战斗中被

89

杀，或者根据一种记载，他是在战斗中被活活烧死的，但即使如此，舍易斯公国仍未毁掉。

现代年代学组织恰恰把后期埃及的开始定在这个时间点前后（有的把这个时间点推前一些，有的把其延后一些）。后期埃及一直延续到埃及被合并进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所有强加在古代埃及史上的时期当中，这个时期似乎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概念，因为它以一段时间的努比亚人的统治开始，之后连续出现的是亚述人的统治、当地埃及人王朝的建立、波斯人的征服、当地人统治的再建立、最后波斯统治的重新确立。它也被蔑视为这样一个时代，即埃及是一个“难以依靠的国家”。正如一位著名的埃及学家在 20 世纪中期所言，“内在动力已经胎死腹中了”。然而，埃及仍将展示出高水平的创造力和适应性，同时保留了很多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另外，无论谁掌权，埃及国土或多或少是统一的。

夏巴卡战胜舍易斯以后，第二十五王朝的国王们对埃及更感兴趣了。夏巴卡和他的努比亚继承者们没有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迅速返回纳帕塔，而是从底比斯和孟菲斯进行统治，特别注意在孟菲斯的统治，尽一切努力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也利用古代首都的战略优势。他们在深思熟虑地诉诸历史的过程中，表达了他们被接受为正当埃及法老的渴望，这几乎影响到了后期埃及宫廷文化的每个方面。复古倾向在利比亚君主统治时期就已经表现出来，目前在宗教、文学、艺术和建筑中加速发展，因为古王国和中王国的模式被接近地模仿。在积极建筑项目方面，古老的神庙被修复，新神庙建立起来。埃及比之前的几个世纪更统一、更至关重要。第二十五王朝绝不是外来统治的停滞时期，而是埃及复兴的时代。

不幸的是，埃及不再享有相对的孤立状态，这种相对孤立状态长期使埃及免于受到近东事态兴衰的影响。亚述帝国处于优势。埃及与这个残忍的国家的第一次碰撞发生在公元前 701 年，当时埃及人在犹太王国边境对抗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结果是非决定性的，但亚述人被

90

激怒了，把它变成了他们转向埃及之前的时间和机会问题。第一次攻击发生于公元前 674 年国王埃塞尔哈东统治时期。他被击退到边境，但三年以后的第二次尝试夺取了孟菲斯，迫使塔哈尔卡（大约公元前 690—前 664 年）逃往努比亚。根据他们的实践，亚述人把政府交给地方权威人士。既然这样，那么亚述人便把政府交给了三角洲公国（包括舍易斯）的统治者，并开始去胁迫其难控制之帝国的其他部分，这使得塔哈尔卡能够返回并重新控制埃及。埃塞尔哈东在能够安排另一次远征埃及之前就死掉了，但他的继承者阿舒尔巴尼拔与舍易斯协作，在两次灾难性的战斗中，战败第二十五王朝的新国王坦塔玛尼（大约公元前 664—前 656 年）。亚述人往南推进到远至底比斯的地方，迫使坦塔玛尼彻底离开埃及，再未返回埃及。但舍易斯证明是不可靠的亚述傀儡，因为当阿舒尔巴尼拔不得不返回美索不达米亚去处理一次叛乱时，舍易斯统治者普萨美提克斯一世（公元前 664—前 610 年）宣布独立，创建了第二十六王朝。你可能会注意到，从这时开始，时代不再是约数，而是绝对年代了。

普萨美提克斯一世消除了下埃及所有现存地方统治者，并安置自己的女儿作为底比斯“阿蒙的神圣女崇拜者”的继承人，把埃及统一起来，比库什王国做得更彻底。繁荣迅速返回埃及，这表明亚述人几乎没做持久的毁坏，而且库什人留下了复苏的良好基础。埃及也受益于自己更充分地联合进东地中海的整体经济。普萨美提克斯进行了广泛建筑，尤其在舍易斯，这可能是复兴时代所希望的。现在没有任何建筑保持在地面以上，但舍易斯巨大的砖围墙直到 19 世纪还引起欧洲旅游者的惊奇。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复古倾向在舍易斯时期达到了极致，因为遥远过去的模式继续得到模仿。仿制品在时代上是如此的近，以至于一个特殊的物件是在古王国制造的，还是在后期埃及制作的，这经常需要专家来甄别；但这绝不仅仅是不用脑子的再生产，因为舍易斯艺术也展现了很大的创造力和创新。

在对外事务中，普萨美提克斯一世不得不玩谨慎而狡猾的游戏。

91 唯恐亚述人的再次入侵,他最初暗暗地支持亚述的敌人。但随着亚述势力的衰落,形势明朗起来,其他危险的玩游戏者已经加入游戏,例如米底人和卡尔迪亚人,后者的首都在巴比伦。在公元前 629—前 627 年,他不得不在埃及边境击退卡尔迪亚人的进攻。他意识到近东权力的平衡正在倾斜,他积极地代表饱受压迫的亚述人干预其中,甚至向美索不达米亚派遣军队,帮助亚述人对抗卡尔迪亚人,但埃及人的帮助不足以阻止亚述帝国在公元前 612 年的最后崩溃,留下埃及面对卡尔迪亚人和利凡特地区正在进行的外交混乱。

尼科二世(公元前 610—前 595 年)除了在北方继续普萨美提克斯一世的政策,别无选择。他用希腊人雇佣兵加强他的军队,就像他父亲做的那样,但他也雇佣希腊水手,在地中海上配置三列桨战船舰队,这是埃及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这样一支海军,埃及变成了一个长期在海上进行争斗的国家。尼科二世开始修建尼罗河东部支流与红海之间的运河,或许因此他能够按照需要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调度他的战船,尽管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尼科二世也很好地开始了对外冒险。他占据了巴勒斯坦,打败并杀死犹大国王约西亚。他继续前进,并使埃及人出现在幼发拉底河,仅仅于公元前 605 年在卡盖美什被卡尔迪亚人灾难性地战败。他至少能够在边境防御公元前 601 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的进攻。普萨美提克斯二世(公元前 595—前 589 年)收复了部分土地,他对巴勒斯坦执行了很小的远征,并在利凡特煽动了一次对抗卡尔迪亚人的麻烦的起义。然而,这只能导致尼布甲尼撒二世以更大的力量作出反应。他围攻耶路撒冷,并于公元前 587 年攻下此城,把耶路撒冷的几千人俘虏到巴比伦,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很多其他耶路撒冷城的人进入埃及,形成了大批犹太人口的基础,这些犹太人在希腊罗马时代变成了埃及的重要因素。对于埃及来说,幸运的是,尼布甲尼撒二世显然在埃及方向仅仅满足于有限的惩罚性远征。

舍易斯的下一个国王是阿普里斯(公元前 589—前 570 年)。他继

续在巴勒斯坦和利凡特作战，有胜利，也有失败，但他的垮台源自西方。他于公元前 570 年向西方派遣一支军队，辅助昔兰尼的利比亚统治者对抗希腊殖民者，希腊殖民者正获得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阿普里斯派去的军队被打败，然后它就叛变了。当阿普里斯派遣他的将军阿玛西 92 斯去恢复纪律时，阿玛西斯加入叛变，宣布称王，并推翻了阿普里斯。几年以后，阿普里斯试图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支持下，夺回王位，但在不成功的尝试中被杀。卡尔迪亚人不久之后就忙于处理内部问题，再也没有机会威胁埃及。

阿玛西斯（公元前 570—前 526 年）发展了与希腊世界更密切的外交关系，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希腊人出现在埃及。他把更多公民特权授予希腊人在诺克拉底斯的商站和港口。诺克拉底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在西三角洲它的母城舍易斯附近建立起来。他还给予希腊商人其他关照。希腊雇佣兵卫戍部队驻扎在孟菲斯和三角洲周围，尽管阿玛西斯仔细地限制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接触，以防止族群冲突。埃及的希腊化在亚历山大到达之前就已经经历了两个世纪。

阿玛西斯的继承者普萨美提克斯三世（公元前 526—前 525 年）的统治被东方另一个新势力的出现所打断，这个新势力最终颠覆了舍易斯所有保持势力平衡的外交。居鲁士大帝非常罕见地兼具军事技能、管理天赋和精明的外交于一身，创造了世界上到当时为止最强大的帝国，从东边的印度，穿过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直至西边的小亚和叙利亚。居鲁士在深入中亚的战斗中死去，这阻止了他把注意力转向埃及，埃及徒劳地支持居鲁士的敌人，唯恐居鲁士的势力越来越大。

正是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公元前 525—前 522 年）侵入埃及，于公元前 525 年在玻琉修姆打败普萨美提克斯三世。根据一份古代记录，冈比西斯通过把狗和猫放在他的军队的前面而取胜，当埃及人看到这种场面时，便撤退了，唯恐伤到他们视作神灵的动物，但波斯人不需要这样的计谋。当冈比西斯前进去占领孟菲斯，并向国家的其他地区扩张他的控制权时，遇到了不太有效的抵抗，这样开始了第一波斯时

期,或者第二十七王朝。但对于埃及的新统治者来说,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当他派遣一支缺乏装备和向导的军队远征锡瓦绿洲时,他整个丧失了这支军队,即所谓的“消失了的军队”。它消失在沙暴中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把强烈的标志留在了神话中,因为很多人梦想着在西部沙丘中找到这支军队的白骨、武器、盔甲和财宝。当波斯人制订了在埃及的后续计划时,他们似乎相当缺乏远见。在公元前 373 年 7 月,他们试图进行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当时恰好尼罗河年度泛滥把整个地区都变成了大沼泽。这也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冈比西斯获得了非常残忍和毁坏的声誉。据说,他毁坏了很多神庙,嘲笑众神,而且他最初对普萨美提克斯三世表现出了怜悯,但后来还是把他杀掉了。他的继承者大流士一世(公元前 521—前 486 年)采取了更抚慰性的方法,表现出对地方宗教的深刻尊重,鼓励神庙的修缮与构建,最突出的是哈噶绿洲的希比斯神庙的建筑。他努力刺激经济的繁荣,取得了成功。他还执行重大公共工程,例如完成了尼科二世开始的运河的修建。即使如此,在大流士统治的最后一年,还是发生了严重的埃及人起义。他的继承人薛西斯一世(公元前 486—前 466 年)如此严厉地镇压了起义,结果在薛西斯一世去世时,又爆发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是由舍易斯的阿米尔泰奥斯和赫利奥坡里斯的荫阿罗斯领导的,后者是普萨美提克斯三世的儿子。在希腊人的帮助下,冲突进行了很长时间,直到公元前 454 年才最终被镇压下去。

在接下来相对宁静的时期里,希腊历史学家和旅游者希罗多德访问了埃及。人们一度盛行把希罗多德贬低为“谎言之父”,而非“历史学之父”,但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因为人们未能理解这样的事实,即希罗多德不仅准确地记录了他看到的,还记录了他听到的,而且他还常常认真甄别二者的真伪。他的记录大部分已经被考古发现和遗物证实了,遗物是古代埃及的重要史料。他还能幽默地写作,这表现于他对埃及人民的描绘中:

> 埃及人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殊气候，具有一条在自然状态上与其他所有河流都不同的河流。埃及人确立了很多习惯和风俗，他们的习惯和风俗几乎与人类其他地区的完全相反。例如，妇女在市场上做交易、看守店铺，而男人待在家里纺织。与此同时，其他人在纺织时是往上推纬线，但埃及人却是往下拉纬线。正是 [94] 男人把重物放在头上运送，而女人则用肩扛运重物。女人站着小便，男人却蹲着小便。他们在自己家里大小便，但他们在街上吃东西。这之后的逻辑是人们必须秘密地做那些不体面而又必要的事情，而公开地做那些体面的事情。无论对于男神，还是对于女神，都没有女祭司；两种性别的所有神的祭司都是男性。如果儿子不想照顾他们的父母，他们是可以不照顾父母的，但女儿必须照顾父母，无论她们愿意与否。在其他地方，神的祭司们留着长长的头发，但在埃及，他们要剃光头。在其他民族中，为了表达对死者的悲痛，死者最亲近的人都要剃光毛发，而埃及人却通过令头发在脑袋和脸上生长的方式悼念死者。但在其他时候，埃及人则把毛发剃光。其他民族与动物分开居住，但埃及人却生活在动物中间。其他民族依靠小麦和大麦为生，但对于埃及人来说，从这些植物中获取食物是最不体面的事情，相反，他们用一种称为 *zeia* 的谷物（单子小麦，希腊语）做面包。他们用脚揉面，但他们用手捡起泥土和播撒粪便以施肥。其他民族（除了那些向埃及人学习的民族）使男性的阴茎保持自然状态，但埃及人采取环割包皮的做法。每个男人都有两件衣服，但每个女人则只有一件衣服。其他人把铰链和收帆绳系在船的外侧，而埃及人却把它们系在船的内侧。希腊人在写字和打算盘时，手是从左向右移动的，而埃及人却从右向左；但他们却称自己的写字方向是正向的，而希腊人的则是反向的。[9]

等。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History*）的第二卷是阐述埃及的，可以看

做到埃及旅行的西方人写作的第一部长篇见闻录。

全面考虑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我们可以发现它并不是特别苛刻的，尽管它经常是不称职的。波斯人希望埃及在很多方面对波斯帝国做贡献，例如人力、税收和原材料。例如，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战役中的波斯舰队就包含200艘埃及三列桨船。但这些勒索并不是沉重的，波斯人整体上也没使用铁腕进行统治。事实上，波斯人的省政府管理是尽可能地允许地方风俗、法律和制度的运转，当然受到波斯总督或政府长官的监督。清楚的是，很多埃及人完全与帝国政权达成一致，但其他埃及人却从未顺从于它。这表明埃及人与波斯人之间存在一种永恒的憎恶关系。这种憎恶发展成了深刻的仇恨，因为它被当地王朝的野心所激发，当地王朝从未被彻底镇压，他们期望成为他们自己领土上具有自己主权的国王。

正是因为这些不顺从的家族，起义在大流士二世（公元前424—前404年）统治早期重新点燃。与以前一样，舍易斯还是特殊的抵抗中心，因为它靠近不可进入的沼泽，并且能够容易地从诺克拉底斯获得希腊雇佣兵。帝国家族内部致命的纷争如此严重地削弱了波斯人的反应，以至于前面那个阿米尔泰奥斯的孙子舍易斯的阿米尔泰奥斯（公元前404—前399年）把波斯人驱逐出三角洲，并使整个国家摆脱了波斯人的统治。这个阿米尔泰奥斯是马涅陀笔下的第二十八王朝的单个成员，但他被篡位者尼弗里提斯一世（公元前399—前393年）推翻，第二十九王朝随之开始。不幸的是，王位的僭越与废立反复发生，这是这个短暂的王朝的特征。当尼弗里提斯二世在涅克塔尼布一世（公元前380—前362年）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被废黜时，第二十九王朝便结束了。涅克塔尼布一世是第三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在这个王朝的前三位国王的统治下，埃及出现了非常繁荣的局面，这表现于建筑和艺术表达，以及它在影响近东事件以便重新获得埃及以前的某些地位、确保免于波斯统治等方面的努力。

但埃及破坏了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联盟。波斯决定恢复对埃及这

个前行省的控制，埃及人好管闲事的外交是持续的刺激因素，而且波斯的国内问题、埃及人的好运气和波斯无能力——例如公元前373年仲夏异常终止的入侵——阻止了波斯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取得成功。埃及人进行了几次失败的努力以后，阿塔薛西斯三世奥库斯再次征服了埃及，开始了第二波斯时期，或者第三十一王朝。第三十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涅克塔尼布二世逃到南方，显然充分验证了以西结的预言，即"埃及国家将不再有王子"，因为直到两千多年以后，埃及才会再次产生它自己的民族统治。 96

波斯统治的这次短暂恢复并不是一个快乐时代。波斯人甚至比以前更可恨，诉诸特别高压的措施，抢劫了神庙，推翻了城墙。埃及人用叛乱作出反应。卡巴巴什领导的一次起义成功地控制了下埃及达两年之久，他变成了民族英雄。波斯人的束缚是如此可恨，以至于当亚历山大大帝到达埃及时，埃及人将其视作救世主而热烈欢迎他。

第七章　托勒密埃及

97　亚历山大大帝在小亚和叙利亚征服了波斯其他领地之后，于公元前 332 年末在未受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埃及。驻扎在孟菲斯以后，他和一小支护卫队进入西沙漠，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锡瓦绿洲。在锡瓦绿洲，神谕把亚历山大大帝认可为阿蒙神的儿子(并因此把其认可为埃及的合法法老)，并使他确信他注定要统治世界。他也向北旅行到地中海海岸。他在那里下令以渔村拉考提斯为基础建构新城亚历山大里亚，并个人规划了该城的一些基本特征。这可能是幻想，而且这种建筑的灵感事实上来自亚历山大的梦境，但它也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他在这之前刚刚攻占了东方的一些主要商业城市；他当时恰好访问了诺克拉底斯，这个城市与其说是商业中心，毋宁说是商站，而且远离海洋，所以他有了在地中海直接建立一个希腊人港口的希望，这是显而易见的。亚历山大在埃及逗留了几个月以后，便离开埃及，去完成对庞大波斯帝国和之外地区的征服，但埃及历史的进程却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深受影响。

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病殁巴比伦，争斗随即发生。他的将军们
98　试图获得对新帝国的控制权，或者使自己成为新帝国各个部分的主人。埃及落入托勒密手中。托勒密是亚历山大少年时代的朋友，并参加了亚历山大很多值得纪念的冒险活动。托勒密与自己的很多后代一样，

爱好文学。据说，他写作了亚历山大最好的传记，不过现在已经遗失了。这部传记以托勒密自己的经历和亚历山大的个人日志为基础。托勒密曾伴随亚历山大短暂地访问埃及，他亲眼目睹了这块土地的富有，知道它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权力基础。最初，托勒密作为总督统治埃及，但他从一开始便旨在建立富足独立的国家和王朝。当维持亚历山大的帝国完整无缺的托词变得软弱无力时，他于公元前 306 年成功地令他的战士们宣称他为埃及的国王。两年以后，他举行加冕礼，成为埃及的法老。他作为托勒密一世索塔尔进行统治。堂皇的称号索塔尔（"救世主"）将是托勒密王朝称呼的典型。[1]

埃及是庞大托勒密帝国的基础。甚至在托勒密一世变成国王之前，他就利用昔兰尼加内部权力斗争而在那里安置了一支托勒密王朝的卫戍部队。这个环今日班加西城的肥沃沿海区域尽管四周是沙漠，但很容易通过海岸交通线进入亚历山大城。海湾和船只深夜入港之通道的入口处大堆的陶瓷碎片验证了这一点。希腊长达几个世纪殖民运动的焦点便是昔兰尼加。昔兰尼加已经彻底希腊化了。到公元前 320 年为止，昔兰尼加已经变成了托勒密帝国的主要构成部分。托勒密一世也迅速地控制了腓尼基和南部叙利亚。南部叙利亚这个区域被称为科勒·叙利亚，拥有丰富的农产品，还是通往阿拉伯的有利可图之商路的终点。科勒·叙利亚变成了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朝之间争斗的焦点。塞琉古王朝是亚历山大的一位将军建立的。当征服者的帝国四分五裂时，他占据了北部叙利亚。公元前 295/294 年，托勒密一世把塞浦路斯岛并入他的帝国，并把他的控制权扩展到南部安纳托利亚。托勒密的影响和直接统治最终远至爱琴海地区，甚至到达了希腊大陆。阿斯旺以南的努比亚北部地区的控制在托勒密帝国和遥远的麦罗埃王国之间摇摆不定。麦罗埃王国的首都在第五瀑布以南。库什国王的继承

99

① 文学作品经常用称号或其他方式指代托勒密国王。因此，托勒密二世菲拉戴尔弗斯可能简称为菲拉戴尔弗斯。托勒密三世奥厄葛提斯二世可能仅仅以奥厄葛提斯二世的形式出现。本文这里采用王朝名字和数字的最简单形式。

者们仍然在那里建筑金字塔,并将持续几个世纪。通过东南方的红海港口麦奥斯·霍莫斯(恰恰在现代吉赛尔城以北)和贝雷尼克,经由从三角洲到红海的运河,托勒密埃及保持着与东非、阿拉伯和更远地区的贸易联系。以埃及丰富的资源为基础,加上埃及其他占领地的辅助,托勒密国王们能够维持强大的常备陆军和海军。当他们遭受失败时,他们也确实遭受过失败,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元气。托勒密帝国可以算作是东地中海陆地和海洋的一强。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和希腊化世界的第三个权力中心马其顿一再被迫联合起来对抗托勒密帝国,旨在维持常常不易达成的权力平衡。

托勒密一世掌权之后的一个世纪是托勒密帝国的鼎盛时期。托勒密王朝的前三位国王是有能力的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们每个人都统治了很长时间。当托勒密一世于公元前 283 年去世时,他的儿子托勒密二世菲拉戴尔弗斯继承了王位,他继续发展其前辈的事业。托勒密二世把埃及的版图扩大到爱琴海。他与塞琉古王国进行了两次战争(托勒密王朝时期共有六次叙利亚战争),他在第一次战争中获得了显著胜利,在第二次战争中保全了自身。托勒密二世与马其顿的安提葛努斯·格纳图斯为期六年之久的竞争是不成功的,但损失很小,而且托勒密二世甚至可以宣称获得了一些小利。东非和南阿拉伯海岸要塞的建立促进了埃及在这些地区的贸易,确保了非洲战象的获取。非洲战象是托勒密军队的重要因素,尽管不能与塞琉古王朝使用的印度象相媲美。大规模的建筑项目和制度建设使托勒密一世的很多设想变成了现实。托勒密三世奥厄葛提斯("赞助人")也向自己证明昔兰尼加的形势的恢复是值得的,因为那里的状况变得很糟糕了。他进行了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在叙利亚和小亚获得了很多城镇。但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他统治时期的长期和平。当托勒密三世统治了 25 年以后,并于公元前 221 年去世时,托勒密帝国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大版图。

在希腊化世界,军事胜利和版图扩张并不是托勒密国王们展示其实力的唯一方式:他们也试图在财富、华丽、文化和物质成就方面超越

自己在马其顿和叙利亚的敌手。亚历山大里亚变成了东地中海最大的城市。它的博物馆不仅仅旨在保持和提高学术，也为了使自己比其他任何城市的博物馆都更大、更好，并使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希腊文化不容置疑的中心。大笔资金花费在节日和“行进队伍”上；宏伟的泛希腊运动会的举行给外来参观者和当地人口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王室家族的剩余资金也用于展现托勒密国王们似神的生活方式。当罗德斯岛被地震破坏时，地震倾倒了令人惊奇的巨像，埃及送去大笔浮雕经费，托勒密埃及的这种举动与其说是慷慨，还不如说是为了超越马其顿和叙利亚之贡献的渴望所致。托勒密国王们容易地超越了他们的竞争者，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是这样，因为这些竞争者未能比托勒密国王们花费得更多。

托勒密国王们强调王朝的连续性，这在国王们为自己起的称号中表现的很明显。例如菲洛帕特尔的意思是“爱父亲者”，菲洛密特尔的意思是“爱同胞者”，而菲拉戴尔弗斯的意思是“爱姐姐者”。托勒密二世的另一个适当称呼应该是“爱姐姐者”，因为他娶了他的亲姐姐阿尔西诺二世，而他的几个继承者也效仿他。这其中的原因还不清楚。这想当然不是他们的马其顿祖先的风俗。事实上，这种血亲结合是马其顿的禁忌，而且托勒密二世的婚姻一时间引起了嘲笑，尽管表达这种嘲笑的诗人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猜测，托勒密国王们仿效他们的法老前辈，但即使这样，他们也误解了他们的法老前辈的做法，因为埃及人的法老没有与亲姐姐结婚的实践。一种更合情合理的猜测是，这些公主与她们的兄弟结婚可以避免在外交和政治领域成为不受约束的竞争者，但这些结合经常创造王室内部不和谐的权力关系，尤其当大量王妃和一夫多妻制——托勒密国王也有这样的倾向——的联络者获得重要地位时。无论原因是什么，亲兄妹婚姻在托勒密王朝变成了正常做法。

到公元前311年，托勒密一世把住处从孟菲斯迁到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并引起了埃及发展方向的彻底

101

改变。从大陆到法罗斯岛修建了一条堤道——海波塔斯塔；几个世纪之后，它向附近延伸进了今日埃尔－古木鲁克覆盖的大半个岛屿。防浪堤从岛屿的每一端进入大陆，形成两个优良海港。这块土地之前没有地中海港口，现在拥有了一个最好的港口，把埃及与希腊化世界密切地联系起来。法罗斯灯塔用白色石头建构，高 135 米，是古代世界奇迹之一。在塔顶，一套精致的镜子在夜间把燃烧的火光扩大并反射出去，结果水手能够从很远的海上看到灯光。法罗斯灯塔一直站立到 14 世纪，这个坚固的建筑物因两次地震而最终解体。它的位置现在被魁特尔堡占据，魁特尔堡的一些石头可能是从古代法罗斯灯塔的残骸上取下来的。

亚历山大城迅速发展，这受激励于商业和政府，以及托勒密国王们意在超越所有其他希腊城市的政策。他们很快便达到了后面这个目标，因为每位国王都试图为亚历山大城添加光彩。宫殿区位于今日东港的东南角。随着继任的国王为了从富裕程度上超越其前辈而为自己建造新住处，宫殿区变得越来越大。博物馆和大图书馆位于西面靠近水边的地方。两条大道有三十多米宽，形成了很多较小但绝非不重要的街道组成的正规小格子的轴线。亚历山大大帝的玻璃墓就位于它们的交叉处。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被运往马其顿他所希望的埋葬地时，托勒密一世劫持了他的尸体。亚历山大城布满了巨大的公共建筑物，例如体育馆、竞技场和剧院；还有装饰华丽的私人住所、广阔的柱廊、酒馆和大量神庙。最大的神庙是塞拉皮姆庙，实际上是一座巨大的复合建筑物，矗立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在托勒密王朝末期，罗马历史学家狄奥多拉斯准确地把亚历山大城描绘为“文明世界的第一座城市，在典雅、广阔、富有和奢侈方面，远超其他所有城市”。

102

由于亚历山大城的国际纽带地位，它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吸引着整个地中海和更远地区的参观者和永久居留者。亚历山大城在最庞大时或许有大约五十万居民。主要群体是希腊人，他们享有特殊的公民权，这些公民权是其他族群的人群不能享有的，但当地埃及人占大

多数，主要集中在古老的渔村拉考提斯周围，这个渔村被包含进城市。大量犹太人也居住在亚历山大城。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的两个区里面，他们不能获得亚历山大城公民权，但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特权，由自己的民族统治者管理。根据托勒密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记载，犹太人的民族统治者的权力“与独立国家的最高总督的权力相像”。尽管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希腊化了，但他们仍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而且他们与希腊人口的关系经常因相互的憎恶而遭到破坏。

因为在人口、壮观、财富和权力方面的卓越性，亚历山大城也变成了希腊化世界最主要的文化中心。博物馆的字面意思是“缪斯的神殿”，是托勒密一世构想出来的，托勒密二世将其变成了现实的机构。博物馆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大学校为模板，装饰华丽，并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文化领域当中一些最伟大的学者做职员，得到国家的慷慨资助。一份记录知识渊博之人的名单几乎类似于古代知识分子世界的《名人录》(*Who's who*)，因为托勒密国王们搜寻最著名的天才人物，无论他身在何处。著名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城博物馆教书。最著名的事情是，当托勒密一世问他是否有容易的教育课程时，他告诉国王没有通向几何学的国王之路。阿基米得也在亚历山大城度过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当他在埃及时，他可能已经发明了阿基米得式螺旋抽水机，这是用于提水的天才设计。博物馆博学的科学家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非常精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并传播他的太阳中心论，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亚历山大城的医学也始终是强大的，拥有诸如科斯的普拉克萨格拉斯以及查尔西顿的赫罗菲拉斯这样的医学家。伽林认为，普拉克萨格拉斯是古代最伟大的内科医师之一。赫罗菲拉斯是普拉克萨格拉斯的学生，他进行了正规的解剖实践。诗人提奥克里 103
图斯和罗德斯岛的阿波罗尼乌斯是亚历山大城纯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一些历史学家在博物馆工作，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写作了关于埃及的历史，包括阿卜杜拉的海卡泰俄斯，他把埃及视作文明的源泉。然而，最迷人的历史学家是马涅陀，他或许活动于托勒密二世统治的早

期,他是当地埃及高级祭司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他用希腊语写作了一部关于埃及历史从神话时代到公元前323年的三卷本著作。该著作仅仅留存于那些不充分但很有价值的摘要里。该著作以仔细的档案著作和个人的观察以及经历为基础。这里仅仅提到了亚历山大城知识分子领域当中的几个超级明星。还有其他大量值得一提的学者。所有这些学者都为古典世界最伟大的文化机构做出了他们的贡献。

亚历山大城的大图书馆靠近博物馆。在古代世界,没有其他任何图书馆在规模和组织上接近这个大图书馆。虽然关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藏书数量的具体估计各种各样,但人们基本上都承认,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藏书达五十万到七十万卷,而且每卷书都包含不止一部著作。托勒密一世把搜集书籍者派往希腊世界各地,令其购买文献以填充图书馆的书架。托勒密三世给"世界各地的君主"写信,借阅文献以便复制。他甚至令人搜查港口的船只,寻找文献,一旦搜到文献,就将其复制,但归还给物主的不是原书,而是复制本。这不仅仅是获取图书的问题,因为图书馆也对巨大数量的著作进行编目、校勘、排序、校订、阐释、批评,涉及了学术工作的所有方面。图书馆的任务因精力充沛的主任而更多,一些图书馆主任本人身边就有一些像萨莫色雷斯的阿里斯塔库斯这样的学者。诗人昔兰尼的卡里马库斯在古代非常受尊重,在图书馆工作,并为图书馆编辑了120卷的书目。犹太人对亚历山大学术的主要贡献与大图书馆有关的是《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本。这个版本的《旧约圣经》就是著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因为据说它是由七十位学者翻译完成的作品,后来被视作讲希腊语的基督徒的《旧约圣经》。大图书馆还有一个第二图书馆,后者是托勒密二世在塞拉皮姆建立的。

亚历山大最初把政府和财政体系——尽管税收被用于马其顿的战争基金——留给埃及当地人,这一定使统治从可恶的波斯人转向希腊人变得更容易。但只要他们能够统治,那么托勒密国王们便创造了复杂的希腊官僚政治的国家。这种官僚政治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完善

起来。这个国家的官僚阶层从国王往下直达村庄。这种制度的首要目标之一——实际上是本质点——在于国家收入的最大化。托勒密埃及勤勉地追逐这个目标，尽管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商业活动的很多领域，例如玻璃制品、纺织品、各种奢侈品以及纸草的出口等，都由政府垄断执行，而且私人商业被仔细地规范和收税。一家造币厂在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来，而且严苛的货币主义政策被强制执行。托勒密王朝的硬币只允许在帝国内部流通；外国货币在国家拥有或监督的市场上兑换，并按照国家确定的比率兑换。一个到当时为止几乎完全依赖于物物交换的国家，迅速地发展成了地中海世界最货币主义的国家。这转变了埃及的经济，促使埃及与更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当然，这种联系经常以有利于埃及为基础。

到当时为止，埃及最大的财富资源是土地上的生产。人们认为埃及的土地是国王所有制，以不同的条件授予个人。托勒密国王们仔细调查埃及，估计其生产力，设计了地方管理的方式，以便汲取最大数量的税收。据说，托勒密埃及的土地制度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罗马人在控制了埃及以后，几乎完整无缺地保留了这种制度。虽然这种说法不是十分经得起详细考察，但无论如何这是托勒密王朝剥削制度之有效性的明示。

托勒密国王们也试图增加埃及的农业生产力。这部分上是靠发明来完成的，尤其萨奇亚（*saqiya*）或水车在托勒密时代引入埃及。自从新王国早期开始，把水从河流或水渠提高到较高地面的主要装置是沙杜夫（*shaduf*）。沙杜夫是一种平衡起重杠杆，操作者能够借助它一次提起一桶水。萨奇亚依靠牛提供动力，能够灌溉大约五公顷的土地，是沙杜夫灌溉数量的三倍，是沙杜夫提水高度的四倍。新地区被开发成耕地，尤其在法尤姆地区。托勒密国王们通过在埃尔－拉宏建筑大坝而大大提高了法尤姆的生产力。大坝的修建使法尤姆的大湖泊加龙湖的水平面降到比中王国水利系统允许的水平面更低的程度，这大大扩展了可耕地的数量。在法尤姆南部，一个人工湖的构建为边缘土地的

105

透彻灌溉提供了条件。托勒密埃及引进了新农作物,这增加了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很多产品由政府以实物收集起来,并根据政策在国内再分配,但始终有大量收入是从出口贸易中返还回来的。当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死后选择埃及作为他瓜分帝国的一部分时,他做出了英明的抉择。埃及的岁入是任何古代国王都羡慕的。

以这样的生产力为基础,埃及能够供养大批人口。据估计,托勒密埃及人口高达七百五十万,不包括居住在亚历山大城的大约五十万左右的人口。一种较低的估计数字介于四百五十万或五百万之间,这是更合情合理的。狄奥多拉斯于公元前1世纪在埃及进行了长期艰难的考察之后进行写作,可能获得了真实的信息。他确信国家的人口至少有三百万,但"在古代"大约有七百万。无论人们提出什么样的数字,但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埃及人口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急剧增加,并且在罗马时代仍保持很高的水平。

托勒密埃及的人口由相对少量拥有相关特权的希腊人和大批当地埃及人构成。希腊人凌驾于埃及人之上。大多数埃及人生活在生存的边缘,但他们艰苦的劳动却支撑着托勒密王朝的社会和政府。希腊化时代的一般特征是一个文化混合、交换和融合的时代。但当我们涉及埃及时,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这种观念,因为尽管希腊人和埃及人之间有很多接触点,但这些接触点经常是障碍,而不是入口。事实上,托勒密王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两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分离。托勒密王朝纯粹是彻底的马其顿人,可能最后的统治者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是个例外,她有一个埃及母亲。她也是王朝里面唯一学着讲埃及语的成员,而且埃及语恰恰是她讲的几种语言之一。希腊语是唯一的政府语言,而且行政管理的高级职位直到托勒密王朝后期才对埃及人开放。分离也在亚历山大城城市选派官员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亚历山大城是"埃及之外的亚历山大城",不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希腊人从亚历山大城出发向三角洲或上埃及旅行,便说是"去埃及"。

除了在后期埃及大量希腊人定居在埃及,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

106

世界各地的移民也涌入埃及。希腊政府代理人和雇佣兵渗入到王国的每一个角落。希腊老兵被称为“份地兵”(*cleruchs*),被授予土地作为军事服役的报酬,形成了一个希腊人农民阶级。托勒密国王们在埃及创建了很多新希腊城镇。有证据表明在这些文化相互作用中,一些希腊人不可避免地在生活方式上变得更埃及化了,而很多埃及人采用了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但强烈的分离因素仍然保持下来。希腊公民权的权利和特权被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而且很少授予希腊人之外的人们。在一个城镇,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婚姻被明令禁止。这种法律——和文化——的划分一直坚持到罗马统治埃及时期。希腊人在埃及总是少数人,但具有高度影响力。

在希腊文化背后,埃及人的文化和社会保持着自己的活力。古老的埃及贵族统治阶级从未被毁坏,尽管最初被排除于中央管理之外,但它的很多成员继续掌握着地区水平的高级军事职务和市政职务。档案文献证据也表明了大量埃及书吏的存在,这些书吏履行神庙职责,作为秘书服务,后来是市政仆人。如果他们学习希腊语,他们能够变成希腊精英和埃及人之间的中间人,因为世俗埃及语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继续得到广泛使用。埃及人的法律坚持与希腊法律并行发展,但法庭体系几乎不可避免地支持希腊人。埃及人通常被排除在正规军之外,尽管当地民兵可以充当警察和辅助军,但与希腊人份地兵相比,拥有较少的特权。也有大量埃及人工匠和小商人,但大多数埃及人是农业工人,他们自从远古时代就是这样。

托勒密王朝的统治最初很容易地被接受了,或许因为它是从令人憎恶的波斯人统治的转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受到了强烈敌视。托勒密埃及发生了大量叛乱,尤其在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大多数叛乱可能是由经济绝望或因王朝内斗而导致的中央集权的松弛造成的,但一些叛乱伴被法老诱捕,这表达出了对埃及人统治埃及人之光辉历史的眷恋。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出现了,例如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伪历史著作《世俗语编年史》(*Demotic Chronicle*)和公元前2世纪

107

晚期启示录式的著作《陶工的预言》(*Oracle of the Potter*)。后者预言道："佩带腰带的人(即希腊人)将毁坏他们……当所有的不幸结束时，当所有居住在埃及的外国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失时，这些事情就会实现。佩带腰带的人的城市(亚历山大城)将会废弃……由于他们犯下了亵渎神灵罪。那些被运到对岸的埃及人的雕像将返回埃及，而且沿海的城市将转变成渔夫的晾晒场……结果过路人会说：'这就是养育一切的地方(城市)，这里曾被所有种族的人们居住。'"[10]

人们可能合情合理地认为，托勒密统治的强迫接受没有极大地增加埃及人们已经承担的沉重负担，至少在王朝的第一个世纪里是这样，但当亚历山大城之外的政治形势从托勒密四世的统治开始恶化时，人民大众遭受了无序和混战之苦。政府官员尽可能地从农民那里榨取每一样东西，经常使农民难以维持生计。饥馑、通货膨胀、盗窃和逃逸在托勒密王朝后期都频繁发生，尽管当政府中的权力职位最终向个别埃及人开放时，他们能够利用混乱的条件改善他们的命运。

重要的是，虽然托勒密国王一直关心增加国家收入，但他们不干涉埃及祭司集团的财产、捐赠和税收，事实上提高了祭司集团的这些特权。这在公元前238年的《卡诺普斯敕令》(*Canopus Decree*)中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它宣称："因为兄妹神即托勒密和阿尔西诺的儿子，国王托勒密即善神和他的妹妹兼妻子王后贝雷尼克①，不断地向全国的神庙授予很多巨大恩惠，并越来越多地增加神的荣誉……所以全国的祭司决定增加已然存在于国王托勒密和王后贝雷尼克神庙中的荣誉。"[11]在危急时刻，国王对祭司集团的支持倾向于增加，这由几份重要文献证明了，包括托勒密五世统治时期的著名罗塞塔石碑。这份文献是用象形文字、世俗语和希腊语写作的，指出"永生者、普塔神的钟爱者、国王托勒密，即明白无误之神和善神"，"赋予众多神庙和那些居住

108

① 这里的兄妹神是指托勒密二世菲拉戴尔弗斯和他的妹妹兼妻子阿尔西诺。国王托勒密是指托勒密三世。——译者注

在神庙里面的人们以及他的王国内的所有臣民以很多利益，是一位男神与一位女神所生之神……”对埃及祭司集团的强烈支持可以部分地用当地宗教在托勒密君主国所起的作用来解释：国王是法老；他们是神，是埃及合法的统治者，就像他们的前辈几千年来一直做的那样。但托勒密王朝必须有一种实际的政治考虑，即祭司集团和他们的机构能够帮助托勒密王朝控制埃及人们。

对传统埃及宗教秩序的支持仅仅是托勒密王朝宗教政策的一个方面。从一开始，托勒密一世就把亚历山大神化了。托勒密一世后来也被视作神。托勒密二世也把自己和他的妻子/姐姐阿尔西诺二世崇拜为活着的神。阿尔西诺二世死后被提高到个体神的地位，而且在所有埃及神庙里，她的崇拜雕像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与地方神在一起。其他王室妇女，尤其贝雷尼克二世受到崇拜。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集体崇拜获得发展，结果亚历山大的祭司已经成为埃及最高祭司，变成了“亚历山大和兄妹神的祭司”。托勒密亚是以托勒密王朝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奢侈节日，庆祝王朝神，并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此神。希腊人把狄俄尼索斯神与奥西里斯神联系起来。狄俄尼索斯神在托勒密王朝的万神殿中占据特殊地位，就像伊西斯那样。伊西斯以前与奥西里斯和荷鲁斯一起受到崇拜，现在获得了属于她自己的神庙和小礼拜堂，并被希腊人视作阿芙罗狄蒂神的埃及对应者。男性统治者与狄俄尼索斯等同起来，女性统治者与伊西斯等同起来。

最原初的托勒密宗教创新是新神塞拉皮斯的引进，他的名字体现了神圣的阿匹斯公牛与神奥西里斯的结合，但他也结合了希腊神宙斯、哈德斯、狄俄尼索斯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神的因素。他的配偶是伊西斯。亚历山大里亚的庞大塞拉皮姆庙有一尊壮丽的神雕像。尽管塞拉皮斯似乎是埃及因素和希腊因素特别恰当的综合体，但我们最好在希腊文化背景下解释他，而且他的崇拜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吸引更广阔的希腊世界的人们。塞拉皮斯的雕像和肖像展现了与古典希腊万神殿中众神之王奥林匹斯神宙斯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塞拉皮斯崇拜广泛扩张。

到罗马时代,他的神庙建筑在远至不列颠北部约克的地方。

托勒密埃及的宗教政策在艺术和建筑中模糊地表达出来。古老的宗教中心得到修缮。吉萨的斯芬克斯获得了重要的面部整容,被描绘成红色。重要的附加建筑被给予现存复合建筑物,例如卢克索神庙和卡尔纳克神庙,而且很多新神庙建立起来。我们关于古代埃及神庙之特征的很多内容都是从托勒密王朝的神庙获得的,因为现存古代埃及神庙保存最完整的是托勒密王朝建筑的:登德拉、埃德福、考姆·乌姆布等神庙,最漂亮的是菲莱岛神庙。埃斯纳神庙是保存较好的另一个纪念性建筑物,也是托勒密王朝奠基的,但它的大部分建筑物今日看来显然是罗马时代建筑的。

在最初三个统治者的统治下,托勒密帝国享有一个世纪的稳定、发展与巩固,而且不断增长的混合使帝国成为东地中海的卓越力量。但随着托勒密四世菲洛帕特尔("爱父亲者")于公元前 221 年继位,托勒密王朝进入了一个衰落时期。到他去世时,王朝已经暴露出了一系列危机,这些危机使埃及失去了世界主导势力的地位。恰恰在此时,新的挑战也出现了,其中一个挑战是由势力正在增加的罗马施加的。

然而,在托勒密四世登基时,罗马的威胁几乎没有笼罩埃及领土。他在大约二十岁时继位,仿效他的祖父,与他的亲妹妹阿尔西诺三世结婚,后者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女性。他也有一些天分,因为他是艺术的伟大赞助者,也是一位作家的赞助者。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的危急时刻,他非常合理地脱卸自己在战场上的责任。但他基本上是懒惰的、热爱节日的人。他纵情地享受托勒密国家给予他的奢侈生活,把政府的很多权力放到强有力的廷臣手中。这个廷臣名叫索塞布斯。索塞布斯熟练地操纵和使用权力,他在早期谋杀了王室家族的很多主要成员,从而国王的叔叔和他的小弟弟,甚至他的母亲都被害死。

110

当塞琉古王国的国王安提奥古斯三世开始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时,索塞布斯对最初的不利状态作出了很好的反应,通过微妙的外交巧妙地获得了时间,同时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果在公元前 217 年决定

性的拉菲亚战役中，国王领导的托勒密军队迫使安提奥古斯三世撤兵，实现了有利于埃及的和平。最终，托勒密国王从叙利亚战争中胜利班师。然而，在最后的危机中，托勒密四世反应冷淡，例如在向其小亚联盟国王派遣救援队方面太迟缓，当时后者正遭受安提奥古斯三世的攻击。

埃及国内也出现了新问题。在拉菲亚战役中获胜的军队当中，有一部分是大批当地埃及士兵构成的分遣队。这种经历增加了埃及士兵对自己在国家里的从属地位的不满。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记载，“他们因拉菲亚战役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拒绝听从国王的命令，而是寻找代表他们的领导者，他们希望以此能够保持独立。他们在很久以后才成功地做到这点。”[12]结果是一系列当地人的叛乱沿尼罗河爆发。在上埃及，一个事实上的国家也出现了，并维持了几十年，两个当地埃及人国王连续实施统治。这些问题或许从未引起托勒密四世的足够重视，因为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纵情享乐上。自从托勒密国王被等同于神——尤其等同于狄俄尼索斯神，这个神与酒和狂欢联系密切——以来，荒诞的醉酒社交就是托勒密神圣王权的一个职能，也是国王的宗教职责之一，托勒密四世的确非常严肃地履行这种职责。阿尔西诺三世是一位谨慎的女性，当她的哥哥/丈夫变得愈加放纵时，她沮丧地守护着他，但国王的情妇把她边缘化了。这个国王的情妇是阿贾托克勒斯的妹妹。阿贾托克勒斯是另一个强有力的大臣，是索塞布斯的同盟者。阿贾托克勒斯把他的妹妹作为控制国王的工具。

当托勒密四世于公元前 204 年去世时，他还不到四十岁，他的继承人是大儿子托勒密五世埃庇法尼斯（“明白无误之神”），后者当时年仅六岁。通常情况下，阿尔西诺三世将作为男孩国王的摄政王行事，但索塞布斯迅速而残忍地采取行动。他隐瞒国王的死讯，并谋杀了阿尔西诺三世。那些可能保护男孩国王之利益（尽管为他们自己服务）或者自己继承王位的大家庭成员在这之前就都死掉了。王朝陷于无助之中。索塞布斯迅速地把统治权聚敛在自己手中，获得阿贾托克勒斯和其他 111

一些属下大臣的支持。

就他所有的邪恶方式而言,索塞布斯是一个熟练的外交家、高效的军事领袖和宫廷阴谋的操纵者。他可能掌控托勒密国家度过了它已经进入的混乱状态,但他很快就死了。而阿贾托克勒斯总是受到几乎所有人的强烈厌恶,在阿尔西诺三世的谋杀之后,甚至变得更可恨了,因为阿尔西诺三世是非常受人们爱戴的。在公元前 203 年年末,阿贾托克勒斯和他的家庭被亚历山大城的暴徒粉碎。暴徒一再而经常地作为亚历山大城政治的致命因素出现。一系列不稳定的摄政政治和护卫政治接踵而至,而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灾难也形影相随,这加速了已然处于风雨飘摇状态的王朝的衰落。

塞琉古王国对托勒密埃及的压力在安提奥古斯三世的领导下上演,他已经从拉菲亚战役的失败中恢复元气;罗马越来越多地从外交上进行干涉;问题在上埃及继续。在公元前 200 年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中的潘尼昂战役中,托勒密王朝丧失了科勒·叙利亚。这是托勒密王朝在小亚的占领地,这块土地的丧失缩小了帝国的领土。托勒密埃及的外部占领地还有昔兰尼、几个爱琴海岛屿和塞浦路斯。塞琉古王国或许将要夺取塞浦路斯,因为他们的舰队完全不会受到恶劣天气的阻碍。当托勒密五世到了成年时,他展现出了主动的迹象。上埃及在公元前 187/6 年被再次征服,而三角洲一次危险的当地人的叛乱被镇压。他谈论着收复科勒·叙利亚。读者一定想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事领袖。据说,他是非常喜欢运动的,是一个优秀的骑师和弓箭手,尽管具有令人厌恶的性格,但他缺乏执行远距离军事战争的财政手段。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没收了朋友的财产,这促使他的将军们将其毒死。当托勒密五世于公元前 180 年去世时,他留下了另一个孩童国王,与他的境遇相同,这就是他六岁的儿子托勒密六世菲洛密特尔。

随着托勒密六世的继位,王朝进入了一个特别混乱而肮脏的阶段。帝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用于恢复元气,而且任何有利于埃及的趋势都被王朝内部的敌对斗争所颠覆。即使如此,新统治的开始比

之前的统治的开端要顺利得多，因为托勒密六世的母亲克里奥帕特拉一世变成了保卫者和摄政王。或许正因为克里奥帕特拉是一位塞琉古公主，所以她能够坚决地制止另一次叙利亚战争的计划。但她可能也已经意识到，帝国在从事任何这样的军事行动之前需要时间恢复元气。然而，当她于公元前 176 年去世时，两个无能力的廷臣掌握了控制权，一个是以前的叙利亚奴隶勒奈奥斯，另一个是宦官尤莱奥斯。公元前 175 年，他们安排男孩国王与他的妹妹克里奥帕特拉二世结婚。五年以后，他们宣布进行三人组联合统治，即托勒密六世与克里奥帕特拉二世和他们较年轻的弟弟托勒密八世[1]联合统治，这个步骤证明是灾难性的，就像他们的帝国政策那样。勒奈奥斯和尤莱奥斯决定收复科勒·叙利亚，但他们不充分的准备引起了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古斯四世埃庇法尼斯的警觉，后者意识到，控制埃及及其肮脏的政府和有名无实的君主（他们是安提奥古斯四世的外甥和外甥女）的机会已经成熟。

当敌对斗争于公元前 170/169 年开始时，安提奥古斯四世采取攻势，并在三角洲打败埃及军队。托勒密六世进入他舅舅的营帐，签订了和平条约，但亚历山大里亚人愤怒地否认和平条约，并宣布克里奥帕特拉二世和托勒密八世为共治王，尽管托勒密六世后来返回了城市，而且三人组君主制得以恢复。安提奥古斯四世进入亚历山大城，但受到尼罗河每年泛滥的阻碍，而且异常决定性的防卫战迫使他撤回到叙利亚。他在公元前 168 年再次进犯埃及，攻取了塞浦路斯，占据了埃及的北半部分。当他再次准备攻打亚历山大城时，他有很好的理由希望取胜。不是托勒密王朝的力量，而是罗马的干涉和威胁阻止了他。

公元前 273 年，托勒密帝国与罗马取得联系。这发生在罗马与比鲁斯的战争获胜以后。这场战争的胜利巩固了罗马对意大利半岛的控制，使罗马成为地中海的主要强国。埃及和罗马互派使节。令人好奇

---

① 托勒密八世在托勒密七世之前出生，是托勒密六世和克里奥帕特拉二世的儿子。托勒密七世被他的父亲于公元前 145 年宣布为共治王，但在下一年被托勒密八世杀害。

的是,当乡巴佬一样的罗马代表看到世界性的城市亚历山大城时,他们想些什么呢?在公元前3世纪,埃及与罗马的关系是平等而诚恳的,尽管相距遥远。埃及与罗马的敌人迦太基靠得更近,埃及与迦太基有很多商业往来,尽管埃及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13 264—前241年)时期保持严格的中立状态。罗马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开始就作为地中海的主导力量出现,并通过打败马其顿以作为对其援助迦太基人的惩罚而迅速地展示了它的力量。几年以后,罗马与叙利亚发生冲突,并决定性地打败了叙利亚,于公元前188年强行签订了一个限制性的和平条约。

罗马最初谨慎地干涉叙利亚与埃及的冲突,因为它忙于与马其顿进行另外的战争,但它不能容忍一个在塞琉古王国控制下的叙利亚-埃及国家的出现,尤其自从塞琉古王国因保持海军和雇佣战象而违犯了塞琉古王国与罗马的条约以来。公元前168年6月,在皮得纳战役中,马其顿人决定性地战败,一个罗马使团就立刻在前执政官加伊乌斯·珀庇琉斯·列努斯的率领下,来到埃及。珀庇琉斯在亚历山大里亚郊区埃留西斯与安提奥古斯四世会晤,要求后者立即停止战争,并立即全军撤出埃及。安提奥古斯四世要求给予考虑的时间。波里比阿的作品是关于这个时期非常好的史料来源,描述了接下来的场面:

> 珀庇琉斯做了一件看上去极为傲慢无礼的事情。他手中碰巧有一支藤杖,他用它绕着安提奥古斯四世画了一个圈儿,并命令他在迈出那个圈儿之前给出答复。国王被他傲慢的行为吓坏了。简短而尴尬的沉默之后,他回答说他将做罗马人需要的任何事情。[13]

罗马人还强迫安提奥古斯四世把塞浦路斯归还埃及。这样,埃及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中幸存下来,但谁将是地中海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强国,这一点毋庸置疑。

珀庇琉斯在离开埃及之前,劝诫三个君主和谐地统治,但不久之

后，两个兄弟便彼此斗争，而他们的不和也引起了王国内部的骚乱。托勒密八世把托勒密六世逐出亚历山大城，采用了“奥厄葛提斯”的称号，但他很快便疏远了民众，人们要求托勒密六世返回埃及。尽管托勒密六世占了上风，但他慷慨地分割帝国，使他的弟弟成为昔兰尼的国王。后者在昔兰尼作为托勒密八世奥厄葛提斯二世进行统治，尽管他也变成了众所周知的“菲斯孔”或“胖子王”。托勒密六世没有单独统治埃及，而是与他的妻子兼妹妹一起统治，因为当时的文献称他们为“法老托勒密和克里奥帕特拉(他的妹妹)”。

114

托勒密六世善良而尽责，是托勒密王朝最具吸引力的成员之一。据说，他从未对任何人宣判死刑，尽管他可能对自己和帝国宣判了死刑。如果他对其弟弟执行了死刑，那么他自己和帝国也就保全下来了。他严肃地执行国王的职责，使自己深入民众，接受人们的请愿。他阻止了他弟弟持久的捣乱行为，继续矫正很多困扰托勒密国家的问题。内部叛乱被镇压。托勒密王朝的控制权再次深入到努比亚。托勒密六世利用塞琉古王国领域内的混乱，收复叙利亚，并能够向更远处进军，但不希望引起罗马的敌视。罗马比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力。然而，在公元前 145 年，托勒密六世获胜的时候，他从马上摔下来死掉了。托勒密军队返回埃及；叙利亚仍处于塞琉古王国的控制下。

托勒密六世的突然死亡为托勒密八世返回埃及清理了道路，与他的妹妹克里奥帕特拉二世共同登上王位。他到达亚历山大里亚之后不久就与克里奥帕特拉二世结婚。他的谋杀生活方式是不可更改的。当婚姻还在庆祝时，政敌就被屠杀了。托勒密八世把托勒密六世和克里奥帕特拉二世的儿子杀死在其妈妈的怀抱里。然而，托勒密六世夫妇还有一个遗腹子，他就是众所周知的孟菲斯(托勒密八世后来也把他杀害了)。孟菲斯出生之后不久，托勒密八世就把托勒密王朝血亲婚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或深度，与克里奥帕特拉二世的女儿克里奥帕特拉三世发生性关系。他于公元前 141/140 年与克里奥帕特拉三世结婚，他仍然与克里奥帕特拉二世维持婚姻关系，从而变成了母亲和女儿

共同的丈夫,她们也是他的妹妹和侄女。克里奥帕特拉二世和三世分别被视作托勒密八世的"妹妹"和"妻子"以示区别,都变成了国王的劲敌,为埃及灾难性的结果埋下了祸根。

115 随着托勒密王朝的政治逐渐变得更低级和令人费解,几个主旋律出现了。一个是托勒密王朝妇女的权力越来越大,到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统治时达到顶峰。一些妇女比他们的男性亲属更有能力,但她们作为主要政治主角出现意味着更多的权力中心的出现,因此越来越不稳定的事态也出现了。另一个趋势是当地埃及人在政府和法庭中晋升到高级职位。与他们的希腊人同伴相像,这些新人对个人的发展而非国家的安宁更感兴趣。同时,大批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因为国内秩序因疏忽和王朝内讧而崩溃,民众变成了强盗和贪婪的税务收集者的牺牲者,税务收集者受到中央政府不顾一切的税收收入的逼迫。起义不绝于缕,而且国家的各个部分陷入了彼此争斗之中。到公元前 2 世纪末,当大量个人,甚至整个村庄逃离他们的土地时,弃耕(放弃土地)的现象广泛蔓延。

最重要的因素是罗马越来越多地在埃及要求权力,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托勒密王朝晚期既是罗马历史的一个插曲,也是埃及历史的一个阶段。在整个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已经通过外交手段广泛地干涉埃及事务。在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在埃及的利益以令人痛苦的直接方式表现出来,这很快就在昔兰尼的事件中展示出来。昔兰尼是托勒密王朝最古老的外部占领地。当昔兰尼最后的统治者托勒密阿比翁于公元前 96 年去世时,他通过遗嘱把昔兰尼赠给罗马,这恰恰把古代世界扩张主义的超级大国带到了埃及的门口。之后,在公元前 1 世纪 80 年代,托勒密九世亚历山大一世为了在争夺王位过程中,获得罗马更必要的财政支持,把埃及抵押给了罗马。罗马没有充分利用这件事,但这件事把埃及的命运直接交到了罗马元老院的手中。在那以后,埃及的命运就在罗马元老院例行公事地得到讨论。没有罗马的允许,任何人都没有希望统治埃及。

显而易见，强大的罗马政治家的支持是重要的，但在罗马共和国晚期混乱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经常很难准确地说出哪些政治家是值得依赖的，因为结交一个强大的朋友就意味着冒险造就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在苏拉的事例中尤其是事实。他摧毁了他在罗马的敌手，然后率领强大的军队来到东方，对付密特里达提，后者是罗马在小亚的敌人。但在苏拉离开罗马以后，他的敌人再次获得了对罗马的控制权，引起了致命的权力斗争。根本无法判断谁会获胜。一个托勒密王朝的王子，即未来的托勒密十一世亚历山大二世正确地选择与苏拉联系，变成了他的委托人，这是一次具有复杂的外交、政治和个人意图的举动。当苏拉再次以至高无上的身份出现在埃及时，他看到了使他的国王委托人与贝雷尼克三世在埃及一起统治的巨大政治利益。当时，贝雷尼克三世刚刚登上王位不久。然而，苏拉本身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暴力脾性之人，不理解托勒密王朝的残忍。在他于公元前 81 年到达亚历山大城几天以后，托勒密十一世谋杀了贝雷尼克三世，而亚历山大城崇拜贝雷尼克三世的暴徒因此事而把托勒密十一世拖出宫殿，并在体育场将其杀死。116

亚历山大城人不得不采取迅速步骤推立新统治者，否则罗马可能替他们选择新统治者，或者根据托勒密十世的抵押而把埃及据为己有。他们的选择落在了托勒密九世的两个儿子身上。一个儿子作为托勒密十二世变成了埃及的国王。另一个儿子成为塞浦路斯的国王，这是塞浦路斯第一次被确定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埃及新统治者的官方称号是尼奥斯・狄俄尼索斯，即“新狄俄尼索斯”，但他也很快便被称为奥勒提斯，即“吹笛者”，因为他经常在宫殿里参加音乐表演。称号没有很好地预言埃及为了获得独立生存的机会而绝对需要的动态特征。或许没有更多的事情是托勒密十二世能够做的，他只能把权力放到罗马人手中。他主要关心的是罗马对他作为国王之地位的认可，他通过向罗马政治家贿赂巨资而确保了这种认可。他对格涅乌斯・庞培是特别慷慨的。格涅乌斯・庞培在东方忙于组织新的罗马行省，包括叙利亚。庞培在叙利亚对托勒密王朝曾经的强大敌对王国之残余的清除是令人胆寒

的,这提醒人们注意埃及将容易地发生什么事情。除了现金费用,托勒密十二世送给庞培一顶金冠,并资助罗马军事行动的昂贵费用。为了支付这种费用,托勒密十二世不得不从基本的政府开支中提取基金和提高税收。税收被冷酷甚至残忍地收集,使已然贫困不堪的民众雪上加霜。当那些资源用尽以后,托勒密十二世求助罗马的高利贷者,这些117 高利贷者掌握着高利贷的利率,这使他陷入了无望的债务泥潭,尽管他统治着本应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王国。当庞培、尤里乌斯·恺撒和马克·李锡尼乌斯·克拉苏于公元前60年在罗马形成前三头政治时,托勒密十二世许诺给恺撒和庞培提供6000塔兰特(talent)银子,这笔银子相当于托勒密王国一年的总收入。但它变成了骗局。在下一年,恺撒使元老院批准托勒密十二世为国王。

如果托勒密十二世认为他能够对自己花巨资买来的王位高枕无忧了,那么他很快便清醒了,因为在公元前58年,恺撒的一个亲密合伙人罗马保民官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在罗马平民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法律,即把塞浦路斯王国变成罗马行省,软弱无力的托词是塞浦路斯已经变成了海盗的避难所。托勒密十二世想当然应该反对这个法律,或者一些事情应该通过外交来完成,但他什么也没做,唯恐面对罗马。他的弟弟饮毒自尽,没有顺从罗马。塞浦路斯被罗马吞并,归入安纳托利亚南海岸的西里西亚行省。亚历山大里亚人早就对托勒密十二世把巨款从埃及拿走并交给罗马人愤恨不已;现在宫廷也厌恶国王。亚历山大城人和王室一起把托勒密十二世驱逐出埃及,并试着构建一个新君主国,以托勒密十二世的长女贝雷尼克四世和她的母亲克里奥帕特拉六世为基础。

托勒密十二世到罗马寻求帮助。罗马寡头政治的一个强大派系支持彻底吞并埃及,但另一个派系担心埃及的彻底吞并将为一个野心勃勃的行省官员提供太强大的权力基础。元老院长期争论此事。与此同时,当亚历山大城的政府派遣一支由一百个卓越的公民组成的代表团到罗马为此事申辩时,罗马人直接看到了托勒密王朝的政治具有怎样

的谋杀性。托勒密十二世派遣了一支暗杀小分队。代表团一到罗马的奥斯提亚港口，暗杀小分队就杀死了这个代表团一半的成员。其他很多代表到达罗马以后也被谋杀。幸存者因威胁和贿赂而保持沉默。元老院决心调查这次暴行，但托勒密十二世强大的罗马债权人清除了一切痕迹，这些债权人不希望真相大白于天下。最终，托勒密十二世的贿赂和庞培的支持获得了辩论的胜利。托勒密十二世依靠一支罗马军队恢复了权力。马克·安敦尼掌握了埃及的骑兵。

托勒密十二世的第一个行动是杀死他的女儿贝雷尼克四世和她的支持者，但他最紧要关心的是如何令他的罗马债权人满意。一个主要债权人伴随军队来到埃及，被任命为王国的首席财政官。几乎毫无疑问，这个人收回了他的投入，而且收回得更多，方式是残忍的税收，完全不顾及王国的安宁。埃及人们为托勒密王朝后期的王朝动乱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托勒密十二世于公元前 51 年去世时，埃及可以描述为自治国家，而非独立国家。 118

根据托勒密十二世的遗嘱，他的两个孩子托勒密十三世和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充当联合统治者。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机智地排出了他哥哥的权力，单独统治了几个月，之后他又把她从王位上驱逐。她试图依靠暴力再次获得权力，当时埃及被卷入罗马权力政治的漩涡。当克拉苏于公元前 53 年在帕提亚战争中战败被杀时，前三头政治动摇了，而且内战随即在庞培和恺撒之间爆发。公元前 48 年，庞培在法萨鲁斯灾难性地失败以后，逃到埃及，希望得到托勒密十三世的欢迎，托勒密十三世的父亲曾从庞培那里获得了如此多的关照。相反，庞培被背信弃义地谋杀了。当恺撒马不停蹄地追赶庞培两天以后到达埃及时，托勒密十三世向他呈上了其敌人的首级。

恺撒进驻亚历山大城，享受美景，并参与博物馆的哲学讨论。他宣称他将仲裁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和她哥哥之间的争端。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在一天夜里来到恺撒这里，向他陈述自己的案子，而善于冒险的罗马政治家——据说，他是“每个男人的女人，每个女人的男人”——立刻就

被 21 岁的埃及女王征服了。他重新确定她与托勒密十三世做联合统治者。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与恺撒和马克·安敦尼的关系已经成为文学和传说的主题。恺撒的确占有了年轻的妇女,但他也认为她和埃及能够为他的目的服务。安敦尼尽管毫无疑问更爱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但至少最初是按照正确的政治和外交考虑行事。至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浪漫牌是她不得不玩的唯一一张牌,而且她玩得很好。她的目标是保持埃及的独立。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她完全了解这一点,而她最终失败了。但她的浪漫主义政策实现了更多的目标,而且比他父亲的贿赂政策更便宜。

119

除了浪漫主义动机,恺撒在埃及逗留的主要原因是为他自己在罗马世界的继续争权斗争建立安全的基地。当他不打算立即离开埃及这一点变得明晰起来时,亚历山大城人和大量埃及军队开始敌视他,因为托勒密十三世享有广泛的支持者,而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却几乎没有任何支持者。恺撒只能依赖于一支罗马军团,而且援军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他这里。一旦恺撒的船只被亚历山大城的暴徒沉没,他的人都逃跑,那么他就不得不跳进寒冷的海港水中,依靠游泳逃生。为了阻止埃及人的船只被用于对抗他,他纵火烧掉了这些船只。大火蔓延到码头,蔓延到附近的大图书馆,大图书馆被夷为平地。40 万卷书被毁掉,很少的收集品留在作为亚历山大城的主要研究性图书馆的塞拉皮姆庙里。马克·安敦尼后来通过把帕加马的图书馆转移到亚历山大城弥补了一些损失,但很多著作在公元前 48 年那天晚上永远遗失了。

援军最后到来了,恺撒采取攻势。托勒密十三世在公元前 47 年的决定性战斗中被杀死。恺撒使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成为女王,尽管他考虑到继承权的连续性,而把她年幼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立为共治王,与她一起进行有名无实的统治。他也把塞浦路斯归还埃及,这向着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恢复托勒密帝国的野心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她仍然是如此的不受欢迎,以至于恺撒在埃及永久地驻扎三个军团。当他在公

元前 47 年春季出发进行新的征服，并最终在内战中获胜时，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怀孕了。在下一年 6 月份诞生的男孩是托勒密十五世恺撒，即众所周知的恺撒琳或“恺撒的儿子”。

当恺撒于公元前 45 年击败了他的最后一个敌人返回罗马时，他成为不可争议的罗马世界的主宰，史无前例地获得了终身独裁官职位。在庆祝胜利时，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年轻的妹妹阿尔西诺四世（后来被安敦尼按照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命令谋杀）被视作恺撒的情妇。之后，恺撒开始根据自己的意愿在罗马进行统治。尽管当安敦尼给他提供一个王冠时，他拒绝了国王的头衔，但他在东方的经历，尤其在埃及的经历，120 可能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他接受了东方君主制的一些诱惑物，例如紫袍和体现其仁慈的神庙，该神庙由一个祭司（安敦尼）完成。他还把自己描绘在硬币上，他是第一个在世时受到如此崇拜的罗马人。这受到了广泛但无力的仇视，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出现在罗马也受到了仇视。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与托勒密十四世来到罗马，并居住在恺撒的一个别墅里。他们被授予“罗马人民的联盟者和朋友”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恺撒的一个立法活动今日仍然直接影响着我们，肯定是以埃及人的影响为基础的。这就是他对罗马历法的改革。罗马历法以月亮周期为基础，越来越不能与季节保持一致，但以前的罗马政治家都未能替换这一历法。恺撒以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索塞葛尼斯的著作为基础，制定了 365 又 1/4 天的太阳历。索塞葛尼斯的年周期在《卡诺普斯敕令》中被视作计算时间的正确方法。从此以后，恺撒制定的历法被称为朱利亚历法。

恺撒打算返回东方，向帕提亚人开展，为克拉苏的战败复仇，但他在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被刺客刺杀。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返回亚历山大城，她在亚历山大城杀死了她的弟弟托勒密十四世，立恺撒琳为自己的共治王。国内状况比以前更糟糕。公元前 1 世纪 40 年代，饥馑和瘟疫紧随系列地泛滥而广泛蔓延。克里奥帕特拉七世通过把王室储蓄的谷物分配给人们而保持亚历山大城人的安静，尽管未对亚历山大城人

之外的任何人进行关照，使三角洲和上埃及自谋生路。她的注意力放在了国际事务上。

当恺撒派与恺撒的刺杀者之间的内战爆发时，克里奥帕特拉七世自然与前者站在一起。恺撒派由后三头政治的马克·安敦尼、雷必达和屋大维领导，他们对权力的要求最初立足于被承认为恺撒的继承人，但谁拥有政治敏锐性和耐性，谁就能建立起自己的地位，激烈的安敦尼未能总是展示出这样的品质。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用于战争的军队迅速地转向了另一边，而且他个人参与海战的企图也受到风暴和疾病的阻碍，但安敦尼于公元前 42 年在腓力比粉碎了刺杀者的军队。当他召唤她到塔尔苏斯见他时，她欣然前往，而且就像对待恺撒那样，仅仅在一夜之间便征服了安敦尼。

121 当三巨头划分罗马世界时，安敦尼负责东方。他强有力地掌握了东方，并重新组织罗马行省，建立了附属国。恺撒已经把塞浦路斯返还给埃及。安敦尼把罗马在小亚海岸的西里西亚行省和叙利亚的广大地区并入埃及，从而恢复了托勒密王朝的科勒·叙利亚。他还把昔兰尼返还给埃及。一时间，托勒密帝国重新组成到它在鼎盛时期享有的范围，尽管它是建立在罗马共和国晚期政治流沙之上的大厦。安敦尼的敌人把这些赐予描绘为安敦尼迷恋情人的行为，宣称安敦尼将放弃本该属于罗马的一切。当然，安敦尼的敌人也受到这样的事情的刺激，即安敦尼意识到一个复兴的埃及能够给他以支持。

当安敦尼与屋大维的妹妹屋大维娅结婚时，安敦尼与屋大维之间的冲突关系平息下来。三头政治在公元前 37 年更新，尽管安敦尼把屋大维娅留在西方，继续他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关系。他与后者有两个孩子。他在接下来一年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帕提亚，但战斗以安敦尼的灾难结束，当时他被联盟者亚美尼亚的国王抛弃。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冬季，撤退的安敦尼丧失了相对于五个军团的步兵和另一个军团的骑兵。灾难因这样的事实变得复杂，即屋大维利用安敦尼与帕提亚交战的机会，于公元前 36 年清除了第三个政治巨头雷必达。这使安

敦尼与屋大维之间成了一对一的关系，没有第三方来保持权力的平衡。

当安敦尼已经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结婚，从而回绝屋大维娅，并与其离婚时，两个敌手之间最后的缓冲器也被移除。安敦尼越来越多地扮演东方君主的角色。报复了亚美尼亚国王之后，安敦尼在亚历山大城浪费地庆祝胜利，他在庆祝仪式上作为神狄俄尼索斯出现。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作为伊西斯神在金王座上接受屋大维的朝拜。他们充分地扮演神的角色。所有这一切都为屋大维越来越积极的宣传提供了口实。屋大维无情地把安敦尼描绘为浪荡的醉汉，用诗人贺瑞斯的话宣称安敦尼已经倒在“破坏性的妖怪”的石榴裙下。罗马人逐渐相信，克里奥帕特拉已经蛊惑了安敦尼。如果她成功地战胜安敦尼，那么他将把首都从罗马转移到亚历山大城。当舆论燃烧起来时，屋大维对克里 122 奥帕特拉七世宣战，这个狡猾的步骤迫使安敦尼对屋大维和罗马开战。

很多因素最初有利于安敦尼。作为经验丰富的将军，他掌握着大量陆军，后者是他的大量附属国王和联盟者提供的。埃及舰队受他指挥，而且他在西方仍然有支持者。他最好的行动应该是迅速冲击屋大维的西方权力基础；相反，或许是受到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影响，他继续防卫，允许屋大维军队进行几次毁坏性的突然袭击。安敦尼的大军被阻截在亚克兴的亚得里亚海湾，他被迫进行海上突围战。对于安敦尼来说，公元前 31 年的亚克兴战役是一场灾难。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大多数船只逃跑了，安敦尼的军队被迫投降。他的阵地迅速地在整个东方崩溃。安敦尼几乎被抛弃了，当他准备在亚历山大城外面与屋大维进行最后的决战时，他获得了关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死亡的虚假报告，这对他造成了致命伤害。当他得知她仍活着的时候，他被带到她那里，并死在她的怀里。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不能动摇屋大维，决定不在罗马装点他的胜利，于公元前 30 年 8 月 10 日自杀。她或许是被眼镜蛇咬死的。① 17

① 流行的说法是克里奥帕特拉七世是被角蝰咬死的，事实肯定不是这样，因为古典词汇“aspis”指的是一种能够把脖子插入盾牌中的蛇。

岁的恺撒琳已经被送往南方安全的地方,后来被找到,被屋大维谋杀。克里奥帕特拉七世与安敦尼的孩子被带到罗马,由屋大维娅抚养。这个统治埃及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托勒密王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八章　罗马帝国统治的埃及

公元前27年以后，罗马的屋大维被称为皇帝奥古斯都。他在政治 123 遗嘱中写道："我把埃及加入到罗马人民的帝国里。"然而，埃及在罗马帝国内部享有独特的地位。奥古斯都对安敦尼和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胜利使他成为罗马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者。他在获胜以后便殖民埃及。随着奥古斯都的殖民埃及，罗马行省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元老院行省，一类是帝国行省。前者由元老院直接统治，而皇帝通过使节统治后者。使节被授予地方总督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由元老院定期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帝国行省具有较大的战略意义，由常规军团驻守；而元老院行省是较安静的地方，相对而言很少有军队出没。这两种行省的地方长官通常都是元老。这种安排从根本上掩饰了罗马帝国的君主制特征，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提供了相当好的政府。然而，埃及并不适合这种体制，因为元老院被完全排除在埃及的管理系统之外，甚至在理论上也是如此。埃及的地方长官不是元老级的人物，而是比元老低一级别的骑士，由皇帝任命，并只为皇帝负责。事实上，在没有皇帝明确 124 许可的情况下，元老甚至不能访问埃及。埃及在罗马帝国内的地位是如此独特，以至于它已经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产。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却切中要害。

皇帝作为神圣国王统治埃及。他被表达和描绘为法老，他的名字

用象形文字写在王名圈里,就像托勒密国王的名字那样。埃及的长官依靠古老的托勒密宫廷的大批职员进行统治。他下面有四个大总督(*epistrategoi*)或地区长官,再下面是三十多个总督(*strategoi*)。这些总督分别统治一个诺姆,诺姆与托勒密时代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管理金字塔内部,甚至在这个管理金字塔的外侧,有一大批帝国官僚。根据亚历山大城的哲学家菲洛的说法,他们的职责是"复杂多变的,甚至那些从一开始就研究这些官僚的研究者也难以把握"。底层是城镇和村庄,它们具有地方职责:负责公共工程,把收获物转运到国库,收集货币税,征集强制劳役的人力。直到公元3世纪初,罗马统治的埃及还没有城镇元老院或城镇议事会,但总督和较低级官僚作为权威人物被任命、选举或指派去服务。这些人,无论是埃及人还是希腊人,都是拥有闲暇时间和财政手段,从而能够服役的人们,而且在国家需要时,他们能够为国家提供短缺物资。罗马统治的埃及没有重要的自治政府。

罗马在埃及的卫戍部队最初由三个军团构成。一个军团驻扎在亚历山大城。第二个军团的指挥总部设在巴比伦[①],即今日的开罗,那里仍然残存着一段城墙,被合并进了科普特博物馆的入口。第三个军团驻扎在底比斯。后来,埃及的卫戍部队减少到两个军团。这两个军团都迁到亚历山大城,驻扎在奈克坡里斯。他们从这里根据需要向整个埃及派遣分遣队。除了正规军团卫戍部队,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伯说当时还存在几支骑兵和步兵队伍,可能也有各种辅助军队。

125

行省的边境早就建立起来了,而且之后就没怎么变化。恺撒和安敦尼已经交还给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那些古老的托勒密帝国的地区,被再次分开。昔兰尼加与克里特合并起来,形成一个元老院行省。同样,塞浦路斯也变成了一个元老院行省,尽管不是非常重要。埃及在叙利亚的占领地落入了帝国行省叙利亚或各个委托国王手中。东沙漠和

① 关于这个名字,存在很多解释。斯特拉伯认为这是巴比伦人的殖民点。但埃及的巴比伦必定不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相混淆。

红海继续是重要地区，事实上获得了重要性，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皇帝到达了西沙漠，这由西沙漠的大量优质神庙证明了，尤其是由达赫莱绿洲的神庙证明了。埃及的南部边境由埃及的两位最高地方长官保卫，他们是科尼利厄斯·加鲁斯和皮特鲁尼乌斯。他们在南方的战斗远及麦罗埃王国，而一支卫戍部队临时驻扎在伊卜里姆堡，但边界很快便在希拉·锡卡米诺斯建立起来，这个地点位于第一瀑布以南 80 公里处。皇帝尼禄往尼罗河上游派遣了一支探险远征队，但这支远征队确证了较早的观点，即这一地区不值得罗马的进一步扩张。

埃及的管理中心仍然是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与以前一样辉煌繁盛，始终是东地中海第一位的城市，直到公元 4 世纪君士坦丁堡代替了它的地位。罗马人的到场表现于托勒密宫殿中的罗马长官总部、奈克坡里斯（几乎是城市的郊区）的军团站、驻扎在海港的帝国舰队以及成群的罗马官员、商人和旅行者。旅行者遍布城市各地。罗马人接触埃及的另一个证据是两块方尖碑（尽管其中一块源自法老埃及）。奥古斯都把它们从赫利奥坡里斯运到神化的尤里乌斯·恺撒的神庙，并立在该神庙前面，该神庙被称为恺撒乌姆，位于东港旁边。亚历山大城衰落之后很久，它们仍然矗立在那里，并被称为“克里奥帕特拉之针”。在 19 世纪后期，它们远离了家乡，一块到了伦敦的维多利亚堤区，另一块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

宏伟的托勒密和罗马城市亚历山大城几乎消失了。在中世纪，城市几乎被放弃，并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废墟。人们为了建筑材料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掠夺它。然后，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几乎每一样东西都被复活的现代城市淹没。一些有价值的文化废料被保存在亚历山大城的希腊－罗马博物馆里。现存最著名的直立纪念物是孤立的圆柱，这些圆柱通常被称为庞培柱。这种说法很流行，却是错误的。另外，我们必须往地下看地下墓穴或另一个地下奇迹即古代水塔。这些地下建筑物中的很多仍完整无缺，其中一些如此宏伟壮丽，以至于我们必须亲眼目睹才会相信。

126

为了确保罗马人对埃及的严格政治控制,他们在罗马统治的最初两个世纪里不允许亚历山大城有任何地方自治政府。由于军团的直接参与,城市暴民不再是重要因素,尽管危险的群体暴力事件持续不断。不管怎样,亚历山大城享有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行进队伍和节日继续使群众喜悦,尽管它们不能与其托勒密王朝极其繁荣的先例相比拟。公共事业得到重大资助。竞技场聚集着一种或另一种狂热的战车御者,佩戴着不同的队伍颜色,或者是蓝色,或者是绿色,尽管他们的竞赛经常不限于赛跑。剧场也是非常流行的,古代城市几个部分当中的一个剧场仍然可以见到,这个剧场在考姆・埃尔-迪克的土堆下面保留下来,考姆・埃尔-迪克后来在这块废墟上兴起。最近的挖掘已经发现了剧场,这个剧场保存的十分完好。剧场周围紧紧围绕着很多公共建筑物,例如澡堂和演讲大厅。早已逝去的亚历山大城人的涂鸦深深地勾勒进墙体内。

就像在托勒密时代那样,希腊人继续从社会和市政两个方面控制着亚历山大城。特权和公民权把罗马人与其他人分离开来。这些特权包括低税率和法庭上的高度保护。这种差别被警惕地保护着,并由早期皇帝正式确定。这些皇帝想要保持城市的稳定,并确保谷物顺利地运往罗马。然而,帝国的善意并不能想当然地获得。当皇帝卡拉卡拉于 215 年来到亚历山大城时,他被这样的断言所激怒,即他与他的兄弟盖塔的死亡有关系——这很可能是事实,以至于他颁发命令不加选择地屠杀城市的年轻人。

127 大批犹太人也继续在亚历山大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尼禄和韦斯帕芗统治时期埃及的地方长官是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他是一个富有的亚历山大城犹太人家庭的成员,是哲学家菲洛的外甥,尽管他与犹太宗教断绝了关系。尽管亚历山大城犹太人的特权没有希腊人的特权那样广泛,但奥古斯都确定了这些特权,克劳迪皇帝更新了它们。当然,克劳迪命令犹太人不要要求更多特权,也不要不适当地利用他们已经拥有的特权。

然而，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对抗比以前更加激烈。这部分上似乎是因为希腊人对犹太人人口数量的越来越多和他们试图更多地进入市政设施(例如剧场和竞技场)的仇视。但这也表达了朴素的族群偏见，这在一个希腊籍亚历山大城人的言语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向皇帝克劳迪抱怨道：城市的犹太人"并不是与亚历山大城人同性质的人，而是根据埃及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在帝国时代早期，大量暴力冲突发生了。在这些冲突中，一些房屋被烧毁，犹太人被谋杀。即便如此，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并没有全体支持公元 66 年发生在朱迪亚的叛乱，尽管零星的暴乱遭到了军团卫戍部队的镇压。犹太人的忠诚得到了登基不久的皇帝图拉真的赞扬，图拉真于公元 98 年登基。皇帝图拉真向他们保证了自己的意图："为你们提供不受干扰的宁静、食物、社区权利和个人权利"。但在 115—117 年的大规模"犹太叛乱"中，形势变化了。一个犹太弥赛亚在临近埃及的昔兰尼宣布就职之后，这场叛乱从埃及开始，并扩展到塞浦路斯。埃及的战斗是剧烈的，游击队作战扩展到乡村，导致大量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到叛乱被镇压的时候，亚历山大城的犹太社区已经被毁坏，再也无法恢复它曾经拥有的数量或重要性。

在罗马统治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商业重要性比以往更重要。它的港口向海洋开放，而海洋因"罗马和平"而变得安全。亚历山大城也通过一条运河与尼罗河联系起来，这条运河使人们可以从亚历山大城进入富饶的三角洲和上埃及，并通过尼罗河与红海港口建立陆路关系。红海港口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贸易在罗马时代达到鼎盛。当浦路撒的狄奥在公元 1 世纪访问亚历山大城时，"亚历山大城好像处在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上，甚至处在那些最遥远国家之间的十字路口上，它似乎是为单个城市服务的市场，把所有人都带到一个地方，使他们向彼此展示自己，并非常有可能把他们变为同一个种族"。[14]

在罗马帝国时期，亚历山大城也始终处于地中海世界文化生活的前沿。尽管图书馆未能从公元前 48 年的大火灾中完全恢复，但它仍然

是到当时为止罗马世界最好的图书馆,而且皇帝克劳迪扩建了博物馆,博物馆继续是很多著名学者和很多被忘却的人们的家园和训练基地。这些被忘却的人们过着精神生活,并且是亚历山大城文化事业的重要成员。2 世纪克劳迪·托勒麦斯的天文学著作是一部展示、参观和分析的杰作,其拉丁化的阿拉伯名字是《天文学大成》(*Almagest*)。尽管他的地球中心论可能是从埃拉托色尼的太阳中心论的倒退,但托勒麦斯的著作因为其丰富的数据和优秀的解释模式而很流行。该书控制着天文学理论达千年之久,直到 16 世纪被哥白尼的理论代替。托勒麦斯的天文学纲要《天文集》(*Tetrabiblos*)以其自己的方式与《天文学大成》一样有影响力。他在这本书里面试图为伪科学提供科学基础。托勒麦斯也是一位具有很大能力与影响力的地理学家,而且他的《地理学》(*Geographia*),与《天文学大成》相似,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是标准的参考书,尽管他的观察基础太有限了,以至于不能真正地运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而且他对地球周长的估计没有埃拉托色尼的估计准确。

哲学在亚历山大城繁荣发展,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柏拉图哲学。罗马时代早期卓越的亚历山大城哲学家菲洛也变成了亚历山大城犹太社区的领导者。他的著作对于后来的新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教义的发展都是重要的。新柏拉图哲学是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毕达哥拉斯哲学和斯多葛哲学中的一些因素的综合,把柏拉图对概念的热情带入了神秘主义的王国。亚历山大城在这种发展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新柏拉图哲学经常被视作"亚历山大城学派"。新柏拉图哲学因公元 3 世纪的教师阿摩尼阿斯·萨卡斯而获得了最有效的发展。萨卡斯有时被称为新柏拉图哲学的苏格拉底,这是因为他的影响,也是因为他与苏格拉底很相似,虽然是一位著名的教师,但从未留下文字作品。萨卡斯教育了很多思想各异的学生,例如伟大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异教徒奥利金、基督徒奥利金、朗基努斯。然而,亚里士多德学派从未消灭,而且无论是柏拉图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后古时代最著名的

哲学家都在亚历山大城做研究。

亚历山大城在医学方面的卓越成就继续独领风骚。古代最伟大的内科医师帕加马的伽林就在亚历山大城研究医学。他对后来医学思想的影响堪与亚里士多德的医学思想比较，并一直保持到现代。他的一些思想，尤其关于疾病传播的思想，在19世纪中期仍然很活跃。甚至在公元4世纪晚期，博物馆遭受了很多变迁兴衰，其他研究领域衰落之后，医学始终在亚历山大城保持强大优势。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塞里努斯发现："当医师想在专业领域建功立业时，他需要做的便是说他在亚历山大城受训。"

尽管更加不可思议，但在罗马时期的亚历山大城最有影响的文化和文学发展是赫耳墨斯主义。众所周知的《赫耳墨斯全集》(*Corpus Hermeticum*)是2世纪和3世纪希腊人在埃及编辑而成的，这些希腊人以赫耳墨斯·特里斯美基图斯的名字书写文献。他们把希腊神赫耳墨斯等同于埃及神托特，并授予他世界上最有智识者的地位。《赫耳墨斯全集》的文献尽管被宣布为最遥远时代的文献，但事实上是柏拉图哲学、斯多葛哲学、流行哲学，或许还有犹太和近东哲学等因素的混合体。它们的主题事件范围从宗教和哲学到魔法和炼金术。是否真正的古代埃及因素被容纳进《赫耳墨斯全集》当中，这是学者们热议的问题。然而，赫耳墨斯的文本却被教父们给予强有力的真实性标签。他们相信赫耳墨斯·特里斯美基斯图斯确有此人，他大约生活在摩西时代。拉克坦提乌斯把他视作最重要的犹太作家之一，他预见了基督教的出现。圣·奥古斯丁同样对其印象深刻，并在他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中写道："这个赫耳墨斯说了很多神说的话，坚持真理。"

当赫耳墨斯主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而且当马尔西诺·菲西诺于1460年将《赫耳墨斯全集》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赫耳墨斯主义引起了轰动。它被翻译成大量不同语言的版本，并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艾萨克·卡索本于1614年最终证明它不是在最遥远的古代写成的，而是在早期基督时代完成的。甚至在那之后，学 130

者们仍然认为它是可信的。耶稣会士学者阿塔纳西乌斯·基切尔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士之一,在1652年写道:

> 赫耳墨斯·特里斯美基斯图斯是埃及人,他首先创造了象形文字,从而变成了埃及神学和哲学的王子和父亲,是埃及人当中最早的和最古老的人,并首先严肃地思考神圣事物,还为了永恒地保留其观点而将其铭刻在耐久的石头和巨大岩石上。从这以后,俄耳普斯、缪斯、莱纳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巴门尼德、梅里苏斯、霍默、欧里庇得斯和其他人才正确地了解了神和神圣事物。[15]

《赫耳墨斯全集》的影响至少保持到19世纪,甚至偶尔还是推测和修正的出发点,就像在马丁·伯纳尔富有争议的《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里一样。

罗马埃及的宗教生活继续展现出托勒密时代的生命力、多样性和创造力。传统宗教——或许考虑到其复杂性,可以用复数的宗教(religions)一词——继续平稳地发展,至少直到混乱的3世纪仍然如此,尽管神庙没有以前富裕了,而且皇帝把它们置于更严格的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以往政权的复杂的国王崇拜仪式中断了,但罗马皇帝们仍然被描绘为法老形式的神,并获得他们值得的尊重,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尊重越来越少。皇帝科莫多斯(180—192年)是最后一个在埃及被广泛描绘为法老的人,戴修斯(249—251年)是最后一位用象形文字刻写名字的人。

早期罗马皇帝是著名的神庙建筑者。他们在边远地区、亚历山大城和尼罗河谷都进行了神庙建筑。卡拉巴沙的努比亚神庙是奉献给库什王国的太阳神曼杜里斯的,是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大规模建构的。131 它被移到了阿斯旺大坝上面的一个遗址处。在达赫莱绿洲,人们可以参观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阿蒙、孔苏和托特的神庙,这座神庙始建于尼

禄统治时期。这是那些富有的考古时代当中建筑的众多神庙之一。皇帝们也在现存神庙的基础上锦上添花，例如菲莱岛地区图拉真的精致亭子。塞拉皮斯和伊西斯神兴旺繁荣起来，还有大量的其他神，有些是地方神，有些是引进的神，还有一些是复合神，给埃及崇拜者提供了广泛的选择空间。文献丰富的奥克西林库斯城镇或许有四万居民，位于今日的贝尼萨城附近，有宙斯－阿蒙神庙、赫拉－伊西斯神庙和阿拉加里斯－贝斯尼斯神庙等三座神庙，还有一处巨大的塞拉皮姆神庙，两座伊西斯神庙，一所奥西里斯神庙，四个特厄里斯神庙，以及得墨忒耳、科勒、狄奥斯库罗伊、狄俄尼索斯、赫耳墨斯、阿波罗、阿迦图斯、戴蒙、奈奥特拉、提喀、丘比特和马尔斯等神的神庙和崇拜中心。亚历山大城的宗教维度——与它的五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和两千多处神庙——一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埃及为宗教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老的宗教陨落了，但新的宗教又扎根发芽。希罗多德在谈到公元前 5 世纪的埃及人时，说："他们有非常多的宗教，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他在埃及历史的其他很多时期访问埃及，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观点。

尽管埃及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带来了他们自己关于宗教、生命和死亡的观念，但这些观念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可避免地被埃及人所接受。这在木乃伊制作的坚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木乃伊制作被希腊人采用，并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保持下来。在某些方面，木乃伊制作的实践已经从法老时代的高标准恶化了。基础准备工作不再那么小心翼翼；身体内部的器官被留在体内，尽管有盖的坛子仍然用于盛放器官，但它们只是幌子。一些身体零部件可能丢失，或者多余的零部件被插入体内，或者整个尸体都遗失，但外部绷带的包扎是按几何学的方式操作的，如此明显以至于即使是非专业人士也常常可以识别出希腊－罗马时期的木乃伊。无论如何，一切东西都缠绕进木乃伊里面，结果木乃伊的外貌是令人满意的，死者的家属也是满意的。

早期罗马木乃伊制作的另一个特征和最突出的特征是木乃伊肖像画法。这时的木乃伊放弃了传统的具有高度类型化的表现形式的三维

132 丧葬面具。在公元1世纪的某些时候，普通的做法是在木乃伊体内插入一个平面的彩绘肖像，后者呈现出死者的体征和面貌。因为如此多的彩绘肖像发现于法尤姆入口处的哈瓦拉，所以它们被称为法尤姆肖像，尽管它们也来自埃及其他地区。最好的画家按照古代希腊肖像画法的逼真传统进行工作（法尤姆肖像提供了大多数这种画法的现存事例），获得了高水准的技术杰作，这些杰作在很多方面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通常借助一个所谓蜡画的介质工作，这个介质上是混合着蜂蜡的颜料。他们运用明亮而原初色彩的调色板，这些颜色被混合起来以提供各种微妙的色调；诸如视觉上的精彩触点和珠宝上的反光点反映了对现实的强大幻想。观看法尤姆肖像就等于经历一次与遥远过去直接接触的感觉，因为它的主题似乎把注意力转移到遥远的过去，使观察者分享当时的动机。法尤姆木乃伊不仅仅体现了埃及的希腊－罗马丧葬方式，就像2世纪亚历山大城地下墓穴展现的那样，希腊因素、罗马因素和埃及因素的混合也可以在这里发现。

尽管普通人在古代历史记录中占据的比例非常小，但我们对埃及日常生活的了解比对罗马帝国其他行省的日常生活的了解更多。信息来源于大量史料，但尤其来源于成片的纸草，这些纸草被埃及干燥的空气和沙子保存了数千年之久。19世纪后期在奥克西林库斯取得了重要发现。尽管几乎所有古代城镇都变成了废墟、无定型的土墩，但奥克西林库斯的垃圾堆却包含大量纸草堆积物，主要是罗马和拜占庭时代的纸草。这些纸草通过如下一些内容揭示了古代生活的新维度：私人书信、遗嘱、家庭记录和地产记录、契约、色情作品、司法审判记录、税务收据、伟大但不是如此伟大之古典作家的遗失作品的残片，等等。

就像在托勒密时代那样，希腊人经常在埃及占据特权地位。当地埃及人不被允许进入政府，而且埃及的罗马军队也是绝对地从早期罗马时代的希腊化人口中雇佣的。罗马埃及的政府语言，与帝国东部的其他大多数行省一样，是希腊语。希腊人口的主要中心是四个城镇，即
133 诺克拉底斯、托勒麦斯、安提诺坡里斯和亚历山大城，这些城市保持特

殊的权利和免税权直到3世纪。3世纪，这种独特性逐渐消失；希腊人也大量出现在诺姆中心城市。当希腊文化继续在埃及实施强大影响时，西方拉丁文化和社会的冲击是更肤浅的，或许因为来自意大利和帝国内部高度罗马化的西方行省的人们的殖民还很少。重要的是，在拜占庭时代，埃及人可能吹嘘自己是希腊人或马其顿人的后裔，但从不说自己是罗马人的后裔。

托勒密王朝土地的国有政策在罗马统治时期越来越多地松弛，土地的私有却越来越多，但大比例的土地仍是帝国的地产和公共财产。国家从这些土地中获取产品、租金，并从各种商业活动中获取利润。据说皇帝奥古斯都喜爱的酒源自他在法尤姆的葡萄园。神庙的财产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罗马政府来说，它们是太大的资源，不能不理会。祭司集团的财富——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权力——被大大削减。

与他们的祖先自有史时代以来就做的那样，大多数当地埃及人继续无意识地在土地上工作，很少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权的影响，无论是法老时代，还是托勒密时代，抑或罗马统治时期。这种说法几乎是事实，而这样的判断符合事实。农民始终与土地最密切地联系起来，而且他们的生活由四季规范：泛滥季迫使人们闲散起来，就像人们希望的那样，而且他们祈求好的泛滥水高度，既不高，也不低；耕种季节是人们勤劳的季节；收获季给人们留下少量利润，因为大多数收入都被税务收集者、神庙领主，或无论什么样的剥削机构收走。但与法老时代不同，在希腊-罗马时代，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与经济有关，种植或生产他们需要的每样东西。他们是复杂的市场交换体系的组成部分。市场交换为人们提供媒介，人们为了获取另一种足够的物品而用一种剩余物品进行交换。这部分上是一种物物交换的问题，但它也涉及大量的货币，因为就像在托勒密埃及那样，罗马埃及也有大量货币在流通；这种货币中的一些流入到人民大众手中，并被用在他们的市场交易中。较大的地产是复杂农业活动的中心。地产上的葡萄园、果园、葡萄酒酿造厂、橄

134

榄油提炼厂、酿酒厂和很多作坊是他们生产产品的地方。甚至一些较小的村庄都能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

就罗马统治时期普通埃及农民生活的整体质量而言,罗马帝国在埃及的事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秩序和安全,后者必至少已经改善了混乱形势,混乱形势经常在托勒密王朝后期的乡下地方出现。内部叛乱在早期罗马时代很少出现,115—117 年的犹太叛乱是一个特例,国内安全程度很高。没有任何重要的外部入侵发生于公元 3 世纪中期以前的罗马。然而,出于同样原因,3 世纪帝国范围内的危机给埃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且现在人们已经理解,甚至在公元 2 世纪帝国内部就存在制度问题,这些问题在埃及特别严肃地表现出来。公元 2 世纪中期之前,成群的小官僚就开始伴随着埃及人一再令人失望的隐退行为而逃离他们的岗位,放弃他们的土地,任其充公,因为他们不能承担对国家的义务。令人惊奇的是,大片土地变得荒芜,更为沉重的税务负担被放在那些继续经营土地的人们身上。到公元 154 年,隐退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一道禁止隐退的敕令被颁发。政府是怎样造成人们采取这样绝望的措施的呢?

答案在于罗马对埃及的态度。罗马把埃及作为他的菜篮子、作为盘剥的源泉,而非将其作为发展的目标。“面包和马戏”不仅仅是罗马的标语,它还是那种保持皇帝掌权的制度的基本特征。罗马人民不再参与正规的民主程序,但他们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罗马皇帝唯恐作为津贴的谷物分配得不到保证,所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埃及的长远利益,以保持他们在罗马的政治存续。对埃及的盘剥绝不是什么新鲜事:托勒密国王们已经把它提升到了精密科学的程度。虽然托勒密国王们是外来王朝的君主,但作为埃及人的君主和王国的重要中心,他们至少能够与埃及共进退。他们从埃及获得的大多数物品都花费或浪费在了埃及,提供了基本的平衡关系,至少在鼎盛时代是这样。在罗马统治时期,表面上不尽的尼罗河财富流往国外,几乎没有什么回报。最沉重的负担(但绝不是唯一的负担)是 *anona*,即实物税。这种税务主要构成

135

部分是运往罗马的大量谷物。据估计，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埃及每年向罗马运送一百多万吨的谷物，这个数量或许相当于埃及整个年度收获物的10%，或许更多。

谷物是大批运输的，尤其是用船运输的。当恶劣的天气迫使这些船只中的一艘船在雅典躲避时，人群聚集起来，张口结舌地观看船头带有伊西斯女神的巨大船只。一个证人报告说："这只船的规模是多么大啊！""船匠告诉我，该船长55米，船脊梁长是船长的四分之一强，从甲板到船底部最低点达13米……船员的数量一定与一支军队的数量相仿。他们告诉我，她运载着如此多的谷物，以至于这些谷物可以喂养雅典所有人达一年之久。"在古代可以看到的短暂航行季节里——从4月持续到10月，这样一支航船最多可以航行两个来回。亚历山大城到罗马的船只是最困难的：因为相反的盛行风，它能够容易地航行两个月，有时三个月，但返航受到西北风的推动，从而更快。当赫罗德·阿格里帕打算离开罗马到东方去时，皇帝卡里古拉告诉他："直接向亚历山大城航行。船只都破裂了，大多数船员和船长都经历了那一幕；他们驱逐着船只向赛马一样按直线快速行驶，这简直是找死。"[16]卡里古拉一定是精神病患者，但他非常充分地意识到了谷物运输的重要性，从而知道船只怎样工作。确保获得埃及的谷物是皇帝卡里古拉在奥斯提亚构建新港口的主要原因，皇帝图拉真后来也修缮了这个港口。谷物运输仅仅是罗马从埃及获得的税务的一部分。其他税务——货币税、产品税和服役——结合起来或许比实物税为罗马提供的收入更多。

尽管农业到目前为止始终是罗马埃及最重要的经济方面，并且是罗马统治时期大多数埃及人最关心的，但埃及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活跃时代。不仅大量农业产品输入埃及，各种手工制品也输入进来，很多物品是由组织严密的手工业行会制造的。埃及的玻璃就是这样一种产品。精致的波特兰花瓶可能就是在一间埃及作坊里面制作的，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埃及与阿拉伯、印度和锡兰的贸易最初通过东南海南的港口进行，在罗马帝国时期越来越多，这记录

在公元1世纪一个亚历山大城商人的《环红海航行》(*Voyage around the Red Sea*)中。埃及富饶的矿产被开采和输出，包括金子、银子和绿宝石。然而，尽管埃及贸易网络具有全球性，但埃及仍在很多方面处于孤立状态，包括它的高超的货币制度，后者是由托勒密王朝制定的，由罗马人将其保留到296年。

自从前王朝时代以来，采石就是埃及的主要活动，因此它在罗马人统治时期也保持下来了。人们继续在阿斯旺开采红色花岗岩，在凯拜尔·埃尔－希尔希勒开采砂岩。但罗马在埃及的大采石场位于东沙漠的波菲利高地(或凯拜尔·铎克罕)和克劳迪高地，都是在罗马时代早期确立的，当帝国体系动荡时被放弃。波菲利高地的产品是帝国的斑岩，这种岩石只能在这里找到。紫色长期与罗马贵族而且后来与罗马皇族关系密切，尤其被用作奖励。紫色石料用作立柱、镶嵌物、嵌板和优质雕像材料，最著名的例子是皇帝戴克里先和其共治者的雕像，现存于威尼斯的圣马丁大教堂。克劳迪高地位于波菲利高地的南部，是英云闪长片麻岩的产地，这些岩石用于罗马最大的纪念物，包括万神殿和图拉真广场。(意大利石刻工称图拉真广场为“花岗岩广场”。)这些采石场的规模和复杂性令所有参观者吃惊，尤其克劳迪高地的采石场。克劳迪高地有一个殖民点，被如此完好地保留下来，以至于给19世纪和20世纪的旅行者留下的印象是，仿佛罗马人在不久之前才离开这里，而且令人感到有些呆板的是四轮马车还在里边。波菲利高地和克劳迪高地的斑岩和花岗岩被开采和提取的方法未得到完全解释。克劳迪高地的最大立柱重达两百吨，几乎长二十米。这样巨大的物体不得不通过陆地转运一百多公里到达尼罗河，它们又在尼罗河被装进驳船运往亚历山大城；它们从亚历山大城被转移进特殊的船只，运往意大利或地中海的其他地方。

137

埃及常常是早期罗马皇帝们理论联系实际的地方。埃及为罗马提供谷物，后者对于罗马皇帝的政治延续是重要的。来自埃及这个罗马帝国大地产的收入大大增加了罗马的财政预算，财政预算经常达到顶

点。埃及的石头装饰罗马皇帝的很多巨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对于表达罗马帝国的实力是重要的。1 世纪至少 3 个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克劳迪和尼禄——是马克·安敦尼的直接后裔（尽管通过屋大维娅，而不是通过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并对此感到骄傲，因此埃及人与他们的伟大祖先联合起来的思想很容易地被这些罗马皇帝接受了。1 世纪[①]的另一个统治者韦斯帕芗于尼禄倒台以后第一个被埃及地方长官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宣布为皇帝。这种支持是以埃及的军团和对谷物供给的控制为基础的，这促使东方各行省追随他。当韦斯帕芗于公元 69 年来到亚历山大城，等待罗马西部的事件得以解决时，他在跑马场上接受欢呼，被尊称为阿蒙的儿子和塞拉皮斯的化身。奥古斯都旨在把埃及排除在帝国政治生活之外，但这样一个重要的行省不可能始终与罗马世界较广泛的利害关系不相关。

罗马最特殊的行省也在罗马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个表现是罗马人到埃及旅游，因为罗马人被尼罗河沿岸的景观所吸引：吉萨的金字塔群、哈瓦拉的迷宫和底比斯的神庙。两个所谓的门农巨像是最受人喜爱的。阿蒙霍特普三世这两个巨大的雕像在古代世界人们的想象中等同于荷马笔下的黎明女神伊奥斯的儿子半神门农。在一些早晨，最北边的雕像发出音乐般的响声，被形容像断裂的竖琴弦发出的声音，好像门农正在向他妈妈致敬。人们对这种现象给予了各种解释，包括祭司的诡辩，但最合情合理的解释是，它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因为能发出响亮声音的石头被太阳晒热。古典旅行者早晨起来去聆听它的响声，而且他们用铭文和涂鸦覆盖巨像的下半部分，以纪念他们的经历。一个典型的涂鸦是："我是卡图鲁斯，是底比斯的首长。我在晚间来聆听这个神圣的门农的声音，而我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当皇帝塞维鲁在公元 3 世纪初来聆听雕像的歌声时，它是寂寞的。塞维鲁颁布了

138

① 原文这里用的是"公元 3 世纪"。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判断，这必定是作者的笔误。——译者注

一道安抚的命令，修缮了巨像，这次修缮破坏了巨像的发音机制，结果门农再也没在日出时向他的母亲讲话。

埃及还在很多其他方面影响了罗马帝国，包括宗教。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塞拉皮斯的崇拜扩展到了整个帝国，而伊西斯变成了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女神之一，并被以一种理想的希腊化方式描绘出来，但总是具有埃及化的影子。罗马元老院把她视作是对罗马传统美德的袭击（公元前19世纪，铺天盖地的流言飞语针对伊西斯的崇拜），一再毁坏伊西斯神庙，但伊西斯神庙总是被重建起来。一个巨大的伊西斯神庙曾经坐落在罗马城的马丁学院，而且一个保存特别完好的伊西斯神庙仍矗立在庞培城。

罗马人长期迷恋于埃及人的方尖碑，这开始于奥古斯都。卡里古拉建造了一艘特殊的船只，运送了一个重达500吨的方尖碑，这个方尖碑现在矗立在圣彼得广场上。大约三百年以后，皇帝君士坦丁把另一块方尖碑运回罗马，并矗立在马克西姆斯马车竞赛场上。它后来被移动到目前的位置，即拉特拉诺的圣乔凡尼教堂。其他几块方尖碑从尼罗河两岸运往帝国城市罗马，或者在意大利定做，结果罗马城比埃及有更多的埃及方尖碑。关于古代埃及文明的知识大部分在欧洲遗失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些庄严肃穆而又离奇迷幻的纪念物却指向古代国土，并在普通民众的思想里保持神秘性。罗马装饰艺术中的埃及风格可以在如下一些现存事例中看到：蒂沃里的哈德良别墅，普莱奈斯特的福耳图那女神庙（与伊西斯神关系十分密切）中的帕莱斯特里那风格的镶嵌图案，庞培城房屋的壁画或者诸如盖乌斯·塞斯提乌斯的金字塔这样的私人纪念物。

埃及的影响可以容易地从罗马文学中发现。普鲁塔克（1世纪末至2世纪初）在他的《论伊西斯和奥西里斯》（*On Isis and Osiris*）中最全面详细地记录了埃及宗教。对于埃及学来说，奥西里斯－塞特－伊西斯－荷鲁斯的故事能够保留下来，是特别重要的事情。这是理解法老神圣王权的基本神话。在2世纪阿普琉斯令人愉快的小说《金驴记》

139

(*The Golden Ass*)中，英雄卢修斯在鲁莽地涉足巫术以后变成了一头驴，但通过入会仪式而恢复成了神秘的伊西斯。女神伊西斯的通俗化在两部作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最令人感动的帝国个人与埃及的相遇是哈德良的巡游。这个有文化的皇帝对帝国每个行省至少巡访了一次，因此毫不令人惊奇的是，他应该给予埃及特殊的关注。他在130—131年在埃及度过了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一如往常，哈德良尽心尽责，检阅士兵，视察政府，评价和确定标准。他也起到了最卓越的罗马旅行者的作用。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业余哲学家，哈德良与亚历山大城博物馆的博学之士进行辩论，就像尤里乌斯·恺撒做的那样。他在沙漠猎狮。当然，他也沿尼罗河向上游航行。与他之前的很多人相像，他在黎明之前起床，站在底比斯平原上，聆听门农动听的声音。当雕像沉默不语时，他耐心地在第二天早晨再次前来聆听，而雕像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讲话，好像是在弥补前一天对哈德良的忽视。哈德良和他的随从一行的场面极其奢华，展现了帝国的实力，但奥克西林库斯的一份莎草纸残片验证了城市支持这样一次巡游的艰难财政现实。这个城市不得不提供巨大数量的供给，包括200阿塔巴(*artabs*)[①]大麦，3000大捆干草，372只乳猪和200只绵羊。埃及的其他地区不得不给予类似的捐献。悲剧发生在埃尔-什克附近，皇帝喜爱的英俊青年男子安提诺斯淹死在尼罗河里。极度忧伤的皇帝把安提诺斯神化，并在他死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城市，名叫安提诺坡里斯，还建筑了一座神庙用于崇拜安提诺斯。该城市的残骸直到19世纪早期仍可以看到。哈德良也下令构建长长的罗马大道，即哈德良大道，绕过一个大长弯，通过东沙漠，从安提诺坡里斯到红海的贝雷尼克港口。安提诺斯的大量雕像被制作出来，经常内部空空，外部覆盖着法老的服装。尽管这次巡访令哈德良感到悲痛，但埃及给哈德良留下了强有力的印象，他在蒂沃里的别墅里描绘了很多埃及场景。

---

① 阿塔巴是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140 哈德良(117—138 年)的统治时期是罗马帝国史上相对秩序井然的时代。他的继承者安敦尼(138—161 年)的统治时期也是这样。埃及铭文很好地证明了这点,因为他的统治与天狼星周期的完成一致,这是古代埃及历法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每 1460 年出现一次。但帝国在公元 2 世纪结束之前受到瘟疫、野蛮人入侵和财政混乱的困扰,在公元 3 世纪,它进入了一个长长的危机时期。当塞维鲁在公元 193 年经过一场血腥的继承斗争之后变成皇帝时,他在公开的军事支持下,放弃了宪制政体,后者掩饰了帝国基本的君主性。他的方法是使士兵富有,而蔑视世界的其他人,他建议他的儿子们遵从这种方法。这种政策严重耗费了帝国财政,埃及或许为此付出了比应支付的份额更多的东西。塞维鲁在埃及巡游期间(他就是在这时不小心使底比斯唱歌的雕像沉默不语了),为埃及国家的城镇建立了地方议事会,这种措施是埃及的自治市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寻求的。这不是因仁爱心而是因确保当时的收入所采取的措施。当时地方长官和农民都逃离他们的岗位和土地以躲避税务负担:城镇议事会提供容易确认的人群,他们能够被控制以便支付税务,而且他们也不得不为他们在地方政府的很多职能而付款。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塞维鲁的儿子和继承者卡拉卡拉(211—217 年)把罗马公民权(这曾经是受到高度珍视的特权)授予帝国内的所有社区时,这只是为了从公民不得不支付的遗产税中增加收入。

塞维鲁王朝受到谋杀、狂怒、阴谋和起义的困扰——塞维鲁家族内部继承了他的四个成员都死于暴力事件,这随着 235 年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的被谋杀而结束。合法继承的任何希望都丧失了,而军队司令彼此斗争以变成皇帝。一个皇帝刚刚即位,另一个军队司令就起而反抗他;经常几个司令同时竞争以便穿上代表帝位的紫色服装。边疆被忽略,而内部安全也被忽视,因为想要成为皇帝的人们把所有可利用的资源都用于争夺权力。在整个 3 世纪,除了正规税务,埃及人还受到军队对金钱和货物越来越多的需求的折磨。

141 尼罗河谷(罗马和平迄今为止确保了其安全)受到西沙漠游牧部落

的反复攻击。埃及的南部边境受到一个所谓布来米民族的蹂躏。如果史料记载正确，那么皇帝戴修斯(249—251 年)是运用了一些非传统的手段对抗这些入侵者。根据一位作家的记载，戴修斯“从利比亚捉来一些毒蛇和可怕的两性人，并把它们放在埃及边境”。然而，布来米人能够抵挡戴修斯的蛇和两性人，并继续制造严重的麻烦。在皇帝普洛布斯(276—282 年)统治时期，他们的一次入侵最北远达托勒麦斯城，后者位于今日的梭哈格城附近。

甚至亚历山大城也不安全。随着东部边境陷入混乱，富有的缓冲区国家帕米拉(以叙利亚东面的绿洲贸易中心为根据地)开始入侵和蹂躏北部埃及，并于 270 年攻占亚历山大城。皇帝奥勒良(270—275 年)再次占领亚历山大城，重新获得对埃及的控制，打败并俘虏帕米拉女王季诺碧亚[①]，但亚历山大城因帕米拉的占领而惨遭破坏。一直作为埃及行政中心的宫殿群被毁，博物馆或许遭受了大面积的破坏。亚历山大城篡位者卢修斯·多米图斯·多米提安努斯于公元 297 年自称皇帝之前，亚历山大城还没有恢复起来。卢修斯的篡位促使皇帝戴克里先(284—305 年)对亚历山大城进行了八个月的围困。根据一个故事，当围城之战慢慢地持续下去时，戴克里先变得如此沮丧，以至于他断言要屠城，直到居民们的鲜血到达他的战马的膝盖为止。但是，当他最终胜利地进入城市时，他的战马踉跄跪倒，膝盖着地，结果戴克里先的誓言无从实现。为了感激这一点，城市制作了一个戴克里先骑在马背上的雕像，这个雕像可能曾经站在立柱之上，这个立柱被误称为庞培柱，实际上是为了纪念戴克里先而竖立的。重要的是，立柱的阿拉伯名字是 al-‘Amud al-Sawari，意思是“骑马人的立柱”。

与此同时，埃及的其他地区继续遭受蹂躏。当一次叛乱于 293—294 年在上埃及爆发时，戴克里先的同治皇帝盖勒留亲自指挥军队摧

① 季诺碧亚是古代叙利亚地区帕米拉国家的女王，在位时间大约为 267—272 年。——译者注

毁了科普图斯城。持续的混乱和对埃及毁坏的效果是灾难性的。尼罗河沿岸城市生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制度,当时遭到严重破坏。在乡村,形势可能更糟糕。甚至在和平的2世纪,正如我们看到的,普遍的困难导致大量人们(农民和相对有身份的人们)逃离他们的土地。在3世纪,面对外来入侵、袭击、盗窃、税收、经济失败和彻底失望,混乱加速发展;随着居民逃跑,并在沙漠、山脉、干河谷和大量古代坟墓里寻找庇护所,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陷入荒凉,所有村庄都被放弃。在城市和乡村,无论人们是逃走,还是留下来,他们的世界观都破碎了。帝国体制和它的地方代表曾经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当时也失败了,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消失了,仅仅间歇地返回来,但更经常地是增加问题,而非减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个人转而寻求其他解决方法(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3世纪末期,某种安定的假象返回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征服了所有竞争者,试图通过广泛的重新组织修补正在破碎的帝国结构。从上往下,他划分和再划分行政单位,结果监督可以在所有层次上更密切地进行。埃及最终被分成六个独立的行省。诺姆最终失去了他们的重要性,一些诺姆自从史前时代以来就存在。为了提供边境安全,戴克里先把罗马驻军的规模扩大到两倍,并建立了新的防御体系,例如其中一个防御体系就沿着红海岸边铺开。卢克索神庙被转变成一个设防的驻军要塞和管理中心。在镇压了亚历山大城的叛乱以后,戴克里先巡游埃及期间,把菲莱岛建设为最南边的军事据点,并撤销了努比亚的希拉·锡卡米诺斯军事据点。

这些改革给埃及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埃及人们也受到了其他经济变化的影响。大量埃及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很好地保持到3世纪,但这些土地现在大多数被卖给了个人,这些人中的一些获得了广阔的地产。尽管与大多数人相比,一些人可以算作小土地所有者,但他们也越来越受到压迫。很多小土地所有者变得还不如特权人物地产上的农奴和奴隶。特权人物掌握了之前属于国家的权力,这使他们更有力

量控制农民。

在君士坦丁(306—307 年)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政治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在东方,君士坦丁于 330 年在欧洲和亚洲相连的古老希腊城市拜占庭的遗址上建立了新首都。这个城市最初被称为新罗马,很快便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它迅速发展,超过了亚历山大城,变成了东地中海最大的城市。从埃及运输来的大部分谷物曾经进入罗马城,现在被运进君士坦丁堡,分配给新城市的人们。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建成,罗马历史上的拜占庭时期开始了。拜占庭帝国是希腊人在东方的帝国,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5 世纪末罗马帝国权力在西方的拉丁世界崩溃以后,拜占庭帝国持续了上千年。埃及最初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太稳定的部分,而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基督教。新宗教变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源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曾经提供了某种聚合力量。

第九章　科普特埃及

145 一般而言，埃及对于基督教发展的重要性几乎总是被基督徒低估或忽视。埃及是基督教转变和基督教制度建立的最早和最富成效的领域之一。基督教的很多正统思想是在埃及第一批问答学校里锤炼出来的，也是在诸如圣阿塔纳修和阿里乌之间关于基督本性、西里尔一世和奈斯托利乌斯之间关于玛利亚本性的激烈神学辩论中锤炼出来的。第一批问答学校是在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来的。尼西亚信经（“我信仰唯一上帝、全能的父、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之物的创造者，信仰唯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诺言……”）是由埃及传教士阐明的。典范形式的《新约》最初是在埃及编成的。埃及远不是一个奇异而孤立的支流，首先是孕育所，然后是早期基督教会的支柱。尽管埃及后来变成了主要穆斯林领地，但强大的基督徒少数派一直生存至今，并成为埃及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的经历是埃及民族意识的基础之一。“科普特”（Copt）和“埃及”都源自古埃及语 *Hikaptah*（普塔的精灵之
146 屋），中介是希腊语 *Aigyptos*。在伊斯兰教最初几个世纪里，阿拉伯人把埃及称作 Dar al-Qibt，即科普特人的住处。

根据埃及基督徒喜爱的传说（尽管历史学家们对这种传说心存质疑），基督教是在尼禄皇帝统治时期由圣马克引进埃及的。圣马克在亚历山大城殉教。事实上，人们对基督时代最初三个世纪埃及基督教的

发展几乎一无所知，但基督徒的启示显然在尼罗河谷的肥沃土壤上得以实现的，或许基督教首先通过基督徒的犹太社区在城市里建立起来，然后传播到乡下的。到它在3世纪末被写入历史时为止，基督教还是埃及一个动态的和逐渐发展的力量，再次而非最后一次证明了希罗多德的断言，即埃及人是最信奉宗教的民族。

在晚期罗马埃及，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传播条件已经成熟。3世纪的混乱对于埃及人这样一个享有秩序的民族而言是极为不幸的。正如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一样，很多现存宗教制度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一个已经变得难以言状或许无法忍受的世界里，人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安乐窝呢？

精英人士能够从诸如伊西斯宗教、密特拉宗教这样在后古时期传播开来的神秘主义宗教，以及在埃及和整个罗马帝国的其他宗教中寻找到安慰。神秘主义宗教的魅力在于它们宣称能够揭示变幻无常的生活背后的潜在意义。受教育者也有自己的信仰，即新柏拉图主义，后者在亚历山大城兴盛起来，是哲学、神秘主义甚至魔法的混合体。通过魔法，人们能够感知那种控制万物的精灵。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表达了这种观点，他宣称："不是我到神那里，而是神来到我这里。"

另一个新宗教现象是诺斯替教[①]，主张通过个人的直觉可以直接与上帝接触。根据诺斯替教徒的观点，人类本身是肉体掌握的精神世界的火花，是能够实现超越的。1945年，人们在纳格·哈马迪发现了4世纪的诺斯替教图书馆，这是在巴勒斯坦出土的著名《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的指引下发现的。这一发现为人们提供了关于诺斯替教和早期基督教的重要新洞察。摩尼教是一个肇始于波斯帝国的宗教，在公元3世纪末期以前到达埃及，并拥有了很多信徒，大多数信徒来自中埃及和上埃及。摩尼教徒认识到善与恶这两个敌对的力量之

147

① 诺斯替教是初期基督教的一派，尊重某种灵的直觉，含有西亚、东亚哲学因素，曾被视为邪教。——译者注

间进行持续斗争的基本二元性,这种宇宙观在罗马帝国晚期这种混乱的时代是很有意义的。赫耳墨斯教继续用那些据说来自远古时代的永恒真理安慰人心。在这之前,占星术在埃及很少出现,但在基督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变得流行起来,因为焦虑的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未来。

所有这些力量都在埃及留下了标记,但在埃及生根发芽并覆盖埃及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宗教是基督教。基督教也在危机时期提供了慰藉。对于受苦受难者来说,它给他们提供了神之爱的保证和在永恒的来世获得最终的正义与奖赏的许诺,永恒的来世对于埃及人来说始终是如此的重要。但基督教的好处不是精神的,而是现实的:具有强烈身份认同感的群体内部人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感、痛苦时代的支持网络、值得信赖的并在必要时举行恰当葬礼的朋友。随着税务、公民职责和义务征集变得越来越强制,越来越多的埃及人逃离家园和村庄,在无数坟墓和尼罗河谷两岸峭壁上蜂巢一样多的洞穴中寻求庇护。人们在逃避这个世界的兴衰时,恰恰迈出了对另一个世界的兴衰进行沉思的第一步。这是隐士运动的起源,这是埃及对基督教的发展做出的很多贡献之一。

然而,埃及接受基督教的另一个原因是基督教如此多的因素与埃及古代宗教产生了共鸣,古代宗教控制尼罗河谷居民的思想达几千年之久。古代埃及所有神话当中最基本的是奥西里斯、伊西斯与荷鲁斯的神话。这个神话可以视作关于神圣家族的寓言。伊西斯经常被等同于玛利亚,而伊西斯哺育婴儿荷鲁斯与基督教圣母怀抱圣子的主题相似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早期基督教艺术家描绘圣母玛利亚哺育婴儿耶稣的画面时,是直接从伊西斯哺育荷鲁斯的异教描绘中复制过来的。化身为神之子的法老预示了起同样作用的基督。同样,基督徒关于末日审判和进入天堂或地狱的想象是古代埃及人习以为常的观念。甚至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论这种对于很多非基督教文化来说是陌生观念的教义,也是埃及人能够理解的,因为古埃及人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把一组神

148

放在一起组成三联神。很多其他形似物也有助于埃及人接受基督教，例如基督徒的十字架与古代埃及人的安柯(ankh)符号之间就十分相似。然而，尽管古代宗教为基督教提供了认同背景，但它还是通过宗教信仰的汇合过程巧妙地把明显的埃及特性加入到基督教之中。宗教信仰的汇合是指一种宗教合并了其他宗教的一些因素，甚至合并了那些被它代替的宗教的很多因素。

尽管基督教在历史记录中几乎没留下线索，但它到3世纪末期已经在埃及获得了重大发展。到3世纪末，证据更加丰富了。教堂矗立在埃及国家的每个地方，包括西部绿洲，而且主教等级已经在大多数诺姆里建立起来，并臣服于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用于估计这个阶段埃及基督徒的数量，但他们必定仍是少数人口。然而他们是特别动态的少数人口，而且皈依者逐渐增加，即使变成基督徒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皈依者在洗礼和允许充分交流之前必须接受初期教育。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在仪式期间不得不站在后面，并与集会的其他成员分开。埃及的基督教坚持严格的信奉制度。

埃及的基督教也获得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礼拜仪式，这种发展最终在使埃及教会成为国家教会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三种语言在罗马埃及得到广泛运用：埃及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这三种语言当中，拉丁语的影响最小，主要用于专门的行政事务。埃及从来没有出现大规模讲拉丁语的人群。希腊语进一步渗入到埃及社会，部分因为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部分因为希腊语是罗马帝国东部地区行政、文化和商业用语。当然，大多数当地埃及人继续讲埃及语。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书写埃及语言的文字已经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于象形文字(即图画文字)，然后是僧侣体文字，最后是世俗体文字。尽管在早期罗马时代仍有为数不多的石匠能够在纪念物上铭刻象形文字铭文，而且到当时为止几乎所有埃及文献都是用世俗体文字书写的，但因为能够阅读和书写世俗体文字的人们的数量很少，因为世俗体文字是如此难以阅读，也因为如此多的官方和商业档案不得不用希腊文书

149

写,所以世俗体文字也开始急剧衰落。除了埃及南部疆界的菲莱岛的一些粗糙雕刻,3世纪中期以后没有任何年代确凿的世俗语文献。因此,在早期罗马时期,埃及语继续作为口语存在,但不再是书面语了,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世纪。解决办法是科普特语的发展,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科普特文字的发明。

大多数埃及人从未学习过希腊语,但这种语言几乎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他们在缺乏用于书写自己语言的文字的情况下,试图用希腊字母书写埃及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正是那些能够读写希腊语的埃及教士,首先开始详细阐释运用希腊字母表达埃及语声音的系统方法,并加入七个新字母以表达那些希腊字母不能表达的声音。用这种文字和大量希腊语词汇书写的埃及语就是众所周知的科普特语。尽管埃及语已经持续不断地变化了数千年,但科普特语是直接从法老埃及的语言中遗传下来的。当人们聆听科普特礼拜仪式时,他们会聆听到古代埃及语的回声。在埃及的科普特家庭里面仍然流行的很多个人名字也是古代埃及的名字。《圣经》很快就被翻译成科普特语著作,而且新宗教著作也用科普特语编辑出来。教堂仪式是用科普特语进行的。《福音书》可能用埃及人自己的语言宣讲给埃及人的。

教堂在埃及和整个罗马帝国的迅速传播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尽管罗马人是著名的宗教宽容者,并常常准备欢迎新宗教加入公民的生活之中,但基督教有一些烦扰特征。首先,基督教主要是一个秘密组织,始终使罗马人在政治上感到不安。其次,更令人不安的是基督徒拒绝认可国家宗教,因为国家宗教的遵从就意味着对皇帝和国家本身保持忠诚。耸人听闻的谣言围绕着基督徒展开,即他们沉溺于性放荡,他们嗜食同类,等等。罗马人的反应是零散而地方性的迫害,间或长期的忽视,但当迫害被实施时,它便是破坏性的。受迫害的基督徒被给予挽救自己的机会,即只要他们否认他们的宗教,或者至少在形式上向众神奉献祭品;那些拒绝这种机会的基督徒被拷打并判处死刑,变成了殉教者,或者以死见证其宗教虔诚。

埃及受到了皇帝戴修斯短暂统治时期席卷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徒迫害浪潮的影响。很多基督徒殉难，而其他基督徒则遭受拷打，但最后被释放了，例如亚历山大城问答学校的领袖奥利金。251 年，戴修斯在多瑙河边境与哥特人的战斗中被杀害之后，他的继承者瓦勒良继续对基督徒实施迫害，但接下来的皇帝伽里恩努斯颁发了一道结束基督徒迫害的容忍敕令。更糟糕的是皇帝戴克里先实施的大迫害，这件事在埃及基督教发展史上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科普特历法——“殉道纪元”——始于戴克里先统治的第一年(284 年)，而非始于基督耶稣的诞生日。

戴克里先曾在埃及作战，于 303 年在帝国范围内实施迫害。埃及总督索希阿努斯·希罗克勒斯是一个特别积极的迫害者。死亡代价迅速攀升。影响深远的《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的作者尤西比乌斯是一位目击证人。

> 我们在那里(埃及——译者按)目睹了很多迫害行为，一些人被斩首，其他人被烧死。那么多的人被砍死，以至于行刑的斧头都顿挫、破裂，甚至成为碎片了；行刑者如此精疲力竭，以至于他们不得不轮换上场。然而，我们始终能够从那些信仰上帝基督的人们身上看到最令人惊奇的热忱和一种真正的神圣力量及热情。第一批人刚被判决，其他人就冲进审判法庭，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根本不在乎恐怖和各种折磨，大胆而沉着地谈论他们的宗教和宇宙之上帝。他们高兴地、大笑着和欢喜地接受死亡审判，吟唱着对宇宙之上帝的感恩颂诗，直到最后的死亡。[17]

埃及殉教者的名单是很长的，这些殉教者中的很多都变成了圣徒，他们的故事被详细地记录在科普特圣徒传里面。科普特基督徒最敬畏的一个圣徒是圣地米亚娜。她和她的伙伴们被命令抛弃自己的信仰，她们坚定地予以拒绝，并都被杀死。人们仍然每年在萨福伦村庄纪念

151 圣地米亚娜和四十位圣女的殉道者,地米亚娜的遗物被保存在开罗的各个教堂里。她是妇女健康和生育能力的保护神。圣凯瑟琳是一位博学的年轻妇女,她的博学给她的迫害者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派遣50位智者去规劝她放弃她的信仰。而她反而使他们皈依了基督教,他便将她斩首示众。她未腐烂的尸体被秘密地运到西奈山,9世纪的修道士在这里发现了她的尸体,而且她的著名修道院在那里建立起来。在亚历山大城,一座现代教堂就建在圣凯瑟琳殉教的地方。在大迫害时期,无人知晓到底多少基督徒在埃及遭受拷打、致残和处死。科普特人的估计数字达到几十万,这无疑是夸大了,但毫无疑问的是埃及的基督徒遭受的痛苦和丧失生命是空前的。然而,戴克里先远没有根除埃及的基督教,而是把它深深烙入了埃及人的生命中。

戴克里先的迫害到当时为止是最大的,但它也是最后一次大迫害,因为罗马帝国内部基督教的命运突然得到改善。公元311年,戴克里先的一位继承者盖勒留在临死之前结束了大迫害。几年以后,皇帝君士坦丁进行争夺帝国统治权的斗争,在决定性战斗的前夕梦见得到了基督徒的支持,从而于313年签发了"米兰敕令",授予基督徒以信仰自由,归还教会财产,允许基督徒担任公共职务。这之后是很多更明显的帝国支持。除了皇帝朱利安(361—363年,他试图在短暂的统治时期恢复异端宗教)之外,之后的所有皇帝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发展的道路畅通了,而它尤其在埃及繁荣发展起来。到4世纪末,在埃及的人口统计之中,基督徒的人数高达90%,尽管更合情合理的估计是埃及的基督徒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无论哪个数字是可信的,基督徒的数量都迅速而稳固地增加,这使基督教成为埃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

埃及对基督教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修道制度的建立。尽管历史并没有准确地把圣安东尼(251—356年)定为埃及修道制度的创立者,因为在他之前还有先驱者,但他无论如何都被当成了榜样,主要因为他

152 的传记在文学上的影响。圣安东尼的传记是他的朋友圣阿塔纳修写作

的，这是一部地道的圣徒传。对安东尼更加人性的描绘可以在《教父箴言录》(*Sayings of the Fathers*)中找到。作为一位富裕的年轻人，安东尼对《马太福音》(*Gospel of Matthew*)的号召作出反应："如果你意在完美，那么去卖掉你所拥有的一切，并把其给予穷人，你将在天堂获得财富：跟我来吧。"安东尼放弃自己的遗产，在更遥远的地方追逐苦行修道的生活方式。当经历他的划时代诱惑时，他正生活在沙漠中的一座古墓里。魔鬼用厌倦和懒惰、用楚楚动人的美女幻影、用安东尼希望得到的东西等来折磨安东尼，但他通过祈祷的力量坚持斋戒。恶魔的这些方法都失败以后，恶魔便派数批修士去虐待他，使他离开自己选择的道路，但徒劳无功。

安东尼从精神和肉体的考验中获得新生，变成了修道名人。人们聚集在他周围，聆听他的教导。根据《教父箴言录》，他告诫他们：

> 始终敬畏你们眼前的上帝。牢记给予生和死的上帝。憎恨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憎恨来自肉体的所有宁静。与这样的生活断绝关系，你就能够感受到上帝。牢记你向上帝许下的诺言，因为它是你在审判之日必需的。忍受饥渴和衣不蔽体的痛苦，保持谨慎，经历悲痛；在心中流泪和叹息；考验自己，看看你是否值得上帝的垂爱；轻视肉体，你便可以保有自己的灵魂。[18]

随着安东尼的声誉传播开来，随着他的信徒越来越多，坟墓变得太热闹而不适合他了，他便开始往更远的地方撤退，最终撤退到了东沙漠的一个洞穴里，后来著名的圣安东尼修道院就在这个洞穴下方建立起来。他的影响从这种往遥远地方的撤退中逐渐增加，而且很多人开始模仿他的事例，这适合人们在社会动乱时期向沙漠撤退的悠久传统。这并不意味着中断了与家人、朋友或支持网络的联系，因为荒野与尼罗河谷的距离从来就不会超过几公里，经常是几步之遥。大量古墓展示出了宗教隐士居住的迹象。但隐士不必撤退。很多隐士住在城镇和村 153

庄里,一边采取严格的苦行修道的生活方式,一边继续在社区里发挥作用。

安东尼的理想是修士撤退到中心崇拜地附近的单个洞穴中,这种模式逐渐被称为"隐居修道制度",但另一种模式的埃及修道制度被称为"寺院修道制度",并变成了修道制度的规范,对西方基督教产生了最大影响。寺院修道制度的所谓创立者是圣帕库米乌斯(290—346 年),这里他的历史作用也有点夸大了,因为其他很多人也曾采取这样的修道方式,但与圣安东尼一样,圣帕库米乌斯后来的声誉为他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帕库米乌斯修士们没有寻求孤独,而是撤回到有组织的修道院里,分享修道院的设施。修士们接受共同教规的管理,亲自耕种土地、制作手工制品、尽可能地使自己自给自足,同时通过服务的方式向周围社区扩展影响范围,例如向穷人发放救济品,照顾寡妇和孤儿,救助病人,参与丧葬仪式。随着修道院人数的增加和资源的增多,它们变成了埃及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

帕库米乌斯大约于 320 年在塔贝尼西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后来又相继建立了九处修道院。纳特仑干河谷中的几个修道院中的第一个是由玛迦里乌斯于 330 年建立的。圣舍努特在 4 世纪晚期对梭哈格附近的白修道院进行管理,这是对埃及修道制度另一次重要推动的开始。修道制度更多不同的分支发展起来。妇女修道区建立起来了。尽管修道院和其修士的数量是猜测性的,但一份史料宣称到 4 世纪末有一万个修士居住在奥克西林库斯;另一份史料提到在白修道院有 2200 名修士和 1800 名修女。即使有夸张的成分,但这样的数字也是埃及其他地方的共同现象,表明了埃及拥有巨大数量的修道人口。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修道院就几乎遍布埃及居住区附件和内部的每个角落,当然一些修道院也出现在遥远的地方,尤其是圣安东尼修道院和圣保罗修道院。这些修道院中的很多都变成了坚固的复合体,幸存下来的事例验证了这一点。当大量古代神庙被废弃时,修士们将其变成了理想的修道院,这样的修道院拥有围墙、生活区、储物室和大面积的崇拜区。这仍明显

地表现于卢克索的两个主要纪念物的名字中，拉美西斯三世的葬祭庙 154
被称为戴尔·埃尔－美蒂纳，或者城镇修道院，哈特舍普苏特的雅致神庙被称为戴尔·埃尔－巴哈里，或者北修道院。古代神庙与修道院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戴尔（*deir*）一词被应用于一些从未服务于修道目的的地方。

埃及也是《新约》得以形成的神学发源地，这个形成过程是在基督去世之后的大约两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基督徒在仪式中依赖于圣歌和《旧约》的其他因素，但除了这些内容，到1世纪末各种基督教文献也在起作用，例如福音书、耶稣和师徒的言行集、书信等。一些文献后来被合并到规范的《新约》里，但还有很多其他文献没有被收入《新约》。在这些没有被收入《新约》的文献中，一些文献含有令人震惊的内容，并标明了早期基督教的多样性，纳格·哈马迪的发现便表明了这一点。关于教会一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需要大量广泛接受的文献。埃及的基督教事业在决定文献应该包括什么内容（圣约翰的启示就被包含在内）和什么文献应该被排除，或者事实上什么文献应该被抑制（例如托马斯福音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新约》的第一批书卷便来源于埃及。

基督教的很多教义都是在埃及铸就的。亚历山大城博物馆的哲学传统，尤其菲洛的学说的影响在早期基督教思想中表现的很明显。在1世纪后半期，基督徒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一所问答学校。亚历山大城的克莱门特（大约150—216年）便是它的早期导师之一，也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克莱门特是基督教的皈依者，精通希腊文学。尽管他的作品强调基督教哲学优越于希腊哲学，但他强烈的古典背景使他理解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必要性。克莱门特最终被认为具有太浓厚的古典主义的味道。他的继承者是奥利金，他是一个教会的教父和多产的神学家。奥利金是第一个阐明诸如上帝和基督、圣灵和救赎这样的教条原理的人。在问答学校形成的思想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和之外的地区。

随着教会在数量和组织方面的发展,它发展出了对正统(直译为“正确信仰”)的坚持,确信只有一个真正的信仰,这个真正信仰的原理能够建立起来,并且在以真正信仰为基础的教会之外没有救赎。这些原理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任何挑战既定正统的人都是异端者,将被驱逐出教会。对教条的辩论占据教会生活相当大的比重,尤其在帝国干预因素加入已然不稳定的混合体中以后。当族群划分和民族主义意识被加入教条辩论之中时,结果可能是爆炸性的。

155

震动教会的第一个主要异教完全起源于埃及。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两个亚历山大城教士之间的个人争执的结果。一个是圣马克教堂的长老,名叫阿里乌;另一个是阿里乌的野心勃勃的敌手阿塔纳修,他最终变成了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和圣徒。阿里乌认为,既然耶稣是由上帝生的,那么他的本性就与上帝的本性相似,但不相同,也就是说,耶稣的本性不等同于上帝的本性。阿塔纳修坚持认为,上帝和耶稣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阿里乌异教似乎在埃及也是分裂的,因为希腊人基督徒社区倾向于簇拥在阿里乌周围,而当地埃及人基督徒却喜欢与阿塔纳修为伍。但冲突扩展到整个罗马帝国,而且阿里乌的观点一度获胜。激烈的辩论、战斗、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接踵而至,因为双方都不愿意让步或容忍对方。皇帝君士坦丁试图解决争端,于 325 年在尼西亚召集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基督教大公会议。阿里乌遭受谴责,并被放逐,但阿里乌的异教继续繁荣发展,并且直到 380 年皇帝提奥多西乌斯坚决地站在尼西亚正统派这一边,它才停止了制造问题。

在早期,埃及与神圣家庭(Holy Family)密切联系起来。这是以《马太福音》中的段落为基础的。这个段落描写道:上帝的天使出现在约瑟的梦中,命令他“带着小孩和孩子的妈妈,逃往埃及,你到了那里,我才会给你命令:因为希律王将寻找小孩子,并将其杀掉”。尽管《圣经》几乎没有谈论更多的关于神圣家庭在埃及逗留的事情,但关于这件事情的大量传说在埃及出现了,而且大量遗址也与他们出现的地方等同起来,并变成了朝圣的目标。在这些遗址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的

是赫利奥坡里斯的圣母树和开罗穆斯图德街区的圣母教堂，还有上埃及凯拜尔·埃尔－戴尔的圣母教堂和埃尔－库西亚的圣母修道院。

朝圣者也被吸引到埃及的其他地方，尤其像圣安东尼修道院这样的大修道院，也被吸引到一些地方圣殿，例如亚历山大城西南阿布·美纳城纪念圣美纳斯的圣殿。根据某个版本的故事，圣美纳斯是戴克里先大迫害时期的殉教者，这个殉教者的尸体是由一匹骆驼运送的，直到骆驼拒绝向前走为止。尽管这样的行为对于骆驼来说是平常之事，但不能再往前移动尸体这种现象传统上在埃及被看做是一种迹象，即神圣的个人希望被埋在这个地方。因此他的尸体被埋在这里；一处泉水出现了；奇迹开始发生。阿布·美纳变成了埃及的首要朝圣之地。这些圣殿吸引埃及境内的朝圣者，也吸引较广阔世界的朝圣者。一位来自高卢的名叫埃特丽娜的修女在 379 至 388 年之间的某个时间访问了埃及。与在她之后如此多意欲仿效她而到埃及来的朝圣者一样，她寻找与圣经有关的遗址。她被告知，底比斯的巨像是摩西和亚伦。她的手稿在 19 世纪晚期被发现，在很多旅行见闻录中那可能是第一部欧洲妇女关于埃及的写作。

科普特人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埃及的艺术和建筑。教堂和修道院尽管利用很多既定设计，但不得不满足新功能需要。与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埃及教堂和修道院的围墙装饰着壁画；一些围墙（包括圣安东尼和圣保罗修道院的围墙）的壁画最近得到修复，允许参观者在观看它们时能够了解它们最初的状态。参观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明显的埃及主题和技术。人们在追溯法尤姆肖像画的晚期历史时，能够看到异端肖像画法正转变成基督教肖像画法。科普特人的手稿、手工艺品和珍稀物件的事例可以在旧开罗科普特博物馆中看到。

埃及的基督教教堂变得富裕、强大和有影响了。教堂构建的浪潮席卷整个埃及，持续了两个世纪。或许从 5 世纪初占人口一半开始，基督徒的人数已经如此地增加了，以至于到 5 世纪末使非基督徒变成了少数人口。教堂和修道院严格地在埃及每个地方建立起来，一种清晰

确然的等级制度发展起来,从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往下延伸到村庄祭司,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是埃及的大主教。大主教的权威扩展到昔兰尼加,157 而且他和其他高级埃及修士在整个罗马的教会委员会上实施重大影响。传教活动继续进行。埃塞俄比亚皈依基督教是基督教的早期成就,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教堂直到 1948 年都是按照科普特正统教堂的方式建造的。教堂的财富和财产因为帝国的赠礼而获得巨大发展,例如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赠礼,他于 350 年将亚历山大城的恺撒乌姆赠给教堂,很多个人也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和捐赠给教堂和修道院。

在基督教事业蒸蒸日上时,埃及的异教却正遭受着稳步衰落的命运。神庙早在 2 世纪就处于麻烦之中,当时帝国的铭文越来越少,表明帝国的支持者正在减少。它们获得的捐赠因为罗马对埃及的组织而被剥夺,所以在 3 世纪的动乱时代和接踵而至的令人痛苦的再调整时期,它们表现得脆弱不堪。随着基督徒人口的增加,异教徒的数量锐减。证据表明异教神庙的祭品也逐渐减少,一些异端节日逐渐停止。在 341 年,君士坦提乌斯命令结束迷信,并且献祭行为必须完全停止。皇帝朱利安恢复古老神崇拜的狂想式的企图几乎未在埃及产生持久影响。

4 世纪末,基督教对异教的迫害时期在帝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了。在亚历山大城,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经常发生。但异教徒在数量上是很少的,而基督徒能够从附近的大量修道院中获得现成的有组织的支持,这些修道院能够迅速提供大群好战的修士。皇帝提奥多西乌斯开始了一项强烈的反异教政策,这项政策对埃及给予特殊关注:传统形式的崇拜被宣布违法,神庙被命令关闭,异教作品被搜查和毁掉,仍由一些祭司保持使用的世俗语被禁止,那些不适合教会的异端节日被转变成工作日。391 年,提奥多西乌斯命令"任何人都不允许到圣所去,不允许步行穿过神庙或仰视那些由人们的劳动创造的雕像"。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提奥菲洛斯以此为借口,获得了控制被放弃的神庙 158 的司法权,并把它们变成了教堂。在这些新教堂之中,他以嘲弄的方式展示众神的雕像,激怒了异教徒,他们以暴乱作出反应。

这恰恰是提奥菲洛斯希望的结果，因为这为他提供了号令修士和暴民的借口。异教徒意识到自己形势的动荡以后，撤退到巨大的亚历山大城神庙复合建筑——塞拉皮姆之中并设防，将其作为持久据点。攻击很快就到来了。在皇帝的鼓励下，基督徒暴民粉碎了异教徒的路障。他们毁坏了巨大的塞拉皮斯雕像，焚烧了整个神庙复合建筑。亚历山大城大图书馆的遗骸的大部分在这场灾难中丧失。对埃及其他异教中心的类似攻击接踵而至。一则寓言是由赫耳墨斯·特里斯美基图斯给出的，仍然被一些基督徒和异教徒阅读。这则寓言预测到：

> 众神正离开大地，将返回天堂；他们将放弃埃及。那块神圣的土地、圣所和神庙的领土，将被棺材和尸体彻底覆盖。啾！埃及，埃及！你的宗教将荡然无存，除了神话，你后来的子女将不再相信这些神话！人们被放弃，都将死去，然后既没有人，也没有神，埃及除了沙漠将一无所有。[19]

在埃及，基督教对异教的攻击持续了几十年。西里尔一世于412年变成了大主教，在修道院度过几年，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415年，他指导修士、煽动暴民反对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毁掉了他们的财产，并把他们驱逐出城市。当罗马总督试图阻止这种暴行时，西里尔指使暴民杀掉了他。然后，西里尔转向哲学学校，这里是埃及当时保留下来的文化精英的家园，其成员是声名狼藉的异教徒，包括著名的学者提昂和其天才的女儿西帕提亚。西帕提亚是一个独立的女性，是成就卓越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她的演讲甚至在基督徒中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她的行为激怒了厌恶女人的西里尔，他煽动群众反对她。总督被暗杀之后不久，西帕提亚正驾着四轮马车穿过亚历山大城时，一群基督徒暴民向她攻击，并把她拖进附近的教堂，将其砍为碎片。他们拿着她的遗物在街道上炫耀，并在庆祝篝火中将其烧掉。

尽管有提奥多西乌斯的敕令和基督徒的暴行，但一些异教徒坚持

159

他们的信仰达几代之久,而且一些边缘地区的神庙继续运行。到6世纪晚期,乡村的大多数人或许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而且城市的现存异教徒也不再公开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菲莱岛的伊西斯女神神庙坚持运转到最后,由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到大约535年便不再运行了。正是在菲莱岛,我们发现了最晚的可以确定年代的象形文字铭文。阅读象形文字的能力或许在此时消失了,在接下来大约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恢复。埃及基督教的胜利是彻底的。

然而,甚至当基督徒在埃及获得胜利时,他们发现埃及教会的地位和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职位受到帝国政治和新兴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威胁。君士坦丁堡是君士坦丁于324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的新首都,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了,从根本上转变了帝国内部的政治平衡,在权力、规模、财富甚至声望上代替了亚历山大城。这是令那些有公德心的亚历山大城人难堪的,因为在君士坦丁堡存在之前,他们的城市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东方最大的城市。这也有宗教内涵,后者与政治考虑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因为君士坦丁堡的教会阶级很快便开始要求在教会内享有与他们的城市政府的地位相当的至高权力(名义上遵从罗马),这种要求得到了帝国的支持。381年,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明确宣称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仅次于罗马主教。对于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职位而言,因为它对教会的悠久传统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所以这是极为无理的行为。

君士坦丁堡与亚历山大城的敌对在基督一性论辩论中表达出来。这场神学辩论是针对基督的本性展开的,基督的本性自从阿里乌异教以来就一直是辩论的源泉。基督一性论相信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的统一,而另一派逐渐被称为麦勒卡派或查尔西顿派,坚持认为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两个独立的性质。随着教义差异的发展,这个问题变得足够严肃了,因为查尔西顿派与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的等同而导致了政治极性,所以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尽管基督一性论的说服力在埃及盛行。因此,教派斗争变成了政治斗争,事实上是民族斗争,因为埃及抵

制自己认为是外来压迫的东西。正是这种长期冲突动摇了教会，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统一，定义了科普特正统教会。

基督一性论辩论在499年以弗所第二次大公会议日程上占主要地位。大量埃及人出席这次会议，他们的粗暴行为导致此次会议一般被称为强盗会议。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和此次会议的主持官迪奥斯克鲁斯拒绝允许另一方举出事例，并且在喧闹的追随者的支持下，他开始猛烈攻击决议，以便支持基督一性论的理由。然而，埃及人不能打败那种给予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职位的动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战胜了安提奥古和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迪奥斯克鲁斯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把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推翻在地，并中断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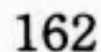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堡的传教士没有在以弗所接受那种支持基督一性论的决议，并规劝一个新的、有同情心的皇帝玛西安(450—457年)去召集另一次大公会议以便再次公开问题。埃及代表团没有在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取得胜利。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于451年在穿越海峡的帝国首都的视域内举行。迪奥斯克鲁斯在上次大公会议上的行为方式遭到很多抱怨之后，迪奥斯克鲁斯被剥夺了主教席位，然后被罢免了主教职位。委员会返回到紧迫的教义问题上来，宣布这样的教义为正统，即基督具有两种性质，而这两种性质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埃及人拒绝接受这一决定，早期科普特教会的一名学者将这描述为“对文化独立于外来占领的民族主义陈述”。这可以看作是科普特正统教会的有效开端。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科普特基督徒非常不喜欢自己被称为基督一性论者。

在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后的几十年里，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尽力把它对正统的定义强加给埃及，这种努力遭到了帕克米安修道院的坚决抵制。当君士坦丁堡受挫的官员加大力量迫使埃及实现宗教统一时，修士抵抗便相应地增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埃及基督教因这种抵抗而铸就。570年，埃及的基督徒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任命了自己的大主教。

161

埃及在拜占庭帝国的地位始终在恶化，尽管埃及的谷物和税收对

君士坦丁堡是极为重要的。大约 537 年，皇帝查士丁尼在埃及重新组织了一套更彻底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似乎旨在确保君士坦丁堡的谷物供给。埃及的人口或许减少了，或许到 600 年只有三百万人口了，这部分上因为持续艰难状况造成的持续损耗，更重要的原因是 542 年瘟疫的灾难性爆发。在毛瑞斯(582—602 年)统治时期，抢劫事件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埃及到君士坦丁堡的谷物运输被迫中断。608—610 年，一场反对野蛮的帝国篡位者福卡斯的叛乱爆发出来，导致了遍及拜占庭帝国所有行省的流血事件，并使行省处于混乱状态。埃及从战斗中遭受了最大痛苦。对于埃及人来说，拜占庭的束缚变得如此可憎，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宗教(与观念密切相关)上来说，都是如此，以至于他们并不反对 7 世纪到来的统治的变化。



第十章　穆斯林的到来

163

603年，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对抗了数个世纪以后，开始了一场特别恶意的争斗。这首先把拜占庭帝国，然后又把波斯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在争斗结束时，两者都精疲力竭。最初，战争的运气有利于波斯人。几年的稳步前进之后，他们在613年攻占了大马士革，在下一年又攻占了耶路撒冷。当拜占庭人撤回来保卫他们的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区时，波斯人向南转向埃及。拜占庭的要塞在617年陷落，而亚历山大城则在619年陷落。波斯人占领了整个埃及，通过剥夺君士坦丁堡的谷物供给而给予拜占庭人以重击。

在埃及内部，波斯人最初几乎没有造成物质毁坏，尽管对基督徒进行了大屠杀。然而，这次最新的波斯占领必定在政治上是分裂性的，而罗马－拜占庭统治的制度迅速恶化。与之前几个波斯人对埃及的占领时期一样，埃及人并不喜欢这些特殊的外国主人，但也没有埃及人试图驱逐他们的证据。当波斯人离开时，它是因为其他地方的事件，而不是因为埃及的事件。

波斯万王之王乔斯洛斯二世拒绝慷慨的和平建议，并准备彻底征服拜占庭帝国。到622年为止，君士坦丁堡本身也处于危险之中。城市依靠固若金汤的城墙坚决抵抗，但拜占庭帝国似乎已经进入最后的苦恼期了。皇帝赫拉克利乌斯最后不惜一切地孤注一掷，率领他的野

164

战军从君士坦丁堡起航,在黑海东端登岸,向南行军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攻打波斯帝国的心脏地区。赌注获得胜利。赫拉克利乌斯在古代尼尼微城附近决定性地打败波斯人,使波斯帝国的中央行省暴露在战线上。乔斯洛斯二世的政权崩溃了;他被废黜并被杀害;波斯帝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下一个波斯国王创造了和平,把所有征服地都归还给了拜占庭人,包括埃及行省,波斯人在629年撤出埃及。

因此,当拜占庭人重新控制埃及时,这已经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了,而且他们在使自己的返回受到埃及人的欢迎方面没有做什么。拜占庭统治的再度确立意味着高税务,这种措施必然是不受欢迎的,其他措施也是这样;但最糟糕的事情是631年赫拉克利乌斯任命赛勒斯为埃及总督和亚历山大城的大主教。在不适当地试图调和科普特观点和查尔西顿观点之后,赛勒斯执行了一次热心的反科普特人的迫害,驱逐了非正统的主教和修士;他甚至试图杀死科普特人大主教。很多埃及人获得的教训是,对拜占庭帝国和科普特基督教会保持忠诚都是不可能的。埃及的犹太人也受到了惩罚,因为他们曾经支持波斯人。

赫拉克利乌斯返回君士坦丁堡,并得到光荣的欢迎,但他的胜利是以沉重代价换来的。拜占庭帝国在获得胜利以后需要的是恢复实力的时间;相反,它不得不面对来自阿拉伯沙漠深处未知的挑战。大约610年,中阿拉伯西部的商业城市麦加的一位商人穆罕默德获得了最早的一批神启,并开始与他的追随者分享这些神启。信使用强有力而值得纪念的语言传递启示,是一个全能而富于同情心的神。他将使人们为自己在最后审判日的行为负责。而且,这个神也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神,是唯一的神,他的启示曾被歪曲了。过去所有其他启示都是虚假的。这是《可兰经》的启示,是伊斯兰教的基础。

165 最初,皈依者很少,而且穆罕默德在信奉多神教的麦加城进行的一神教讲道也招致很多敌人。他被迫在622年逃走,在北方的麦地那城找到了庇护,并使该城成为他的总部。随着皈依者的数量急剧增加,穆斯林变得强大起来。他们打败麦加人,而新宗教在阿拉伯半岛迅速传

播开来。阿拉伯的部落以前是虚弱的，而且倾向于相互争斗，当时被锤炼成了一支统一的力量，这是由深奥的宗教承诺激发的。穆罕默德告诉那些到麦加朝圣的人们：“聆听我的启示，并将其记在心中！要明白每个穆斯林都是其他每个穆斯林的兄弟，而且你们现在是一家人。因此，对于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拿走属于你兄弟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合法的，除非它是自愿给予你的。”除此之外，拿走他人的东西意味着抢劫，抢劫形成了阿拉伯经济的基础部分，这种行为不得不通过对外征服来完成。当穆斯林战士蜂拥离开阿拉伯，开始系列大规模征服时，一种新力量被释放出来。征服最终在西方远达摩洛哥和西班牙，在东方远及印度。

在先知于 632 年去世之后的那年，穆斯林征服军队侵入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636 年，雅尔穆克战役使穆斯林变成为叙利亚的主人，因为拜占庭军队的残余力量失败以后向北方退缩，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军队利用赫拉克利乌斯军事战斗导致的灾难和无政府状态彻底打败了波斯人。埃及与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中心的陆路联系被切断。639 年后半年，一小支由四千人构成的穆斯林军队在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率领下，从叙利亚出发，向埃及进军。

考虑到整个战略形势和阿拉伯军队在其征服的早期阶段的威力，埃及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成功地组织抵抗穆斯林的防御战争，然而防御战争进行得可能比看上去的要好。但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用最好的正规军保卫安纳托利亚，防御通往帝国首都的所有道路，因为根本没法判断穆斯林将从哪条路进攻，而且拜占庭政权不愿冒险另一次战场失败的灾难。在埃及战斗的行省军队和地方军队想当然仍比穆斯林入侵军队更庞大，穆斯林入侵军甚至在得到增援以后，军队数量也只有一万五千人。不幸的是，埃及军队的战斗力较差，也缺乏有能力的领导者，分歧开始出现，尤其是总督和大主教赛勒斯起到了分裂的作用。 166

阿拉伯人在 639 年 12 月到达埃及时，遇到了一些抵抗，但玻琉修姆在 640 年 7 月就陷落了。这使阿拉伯人能够迅速进军三角洲地区，

并于当年7月末在赫利奥坡里斯获得了重大胜利。640年年底之前,穆斯林占领了埃及的巴比伦城,并围攻毗邻的要塞。在无望得到行省或帝国支持的情况下,地方军队厌倦了与穆斯林的战斗;除此之外,埃及科普特人因发生在阿拉伯人入侵之前的宗教迫害而对拜占庭人的憎恨加强了,很高兴地看待拜占庭的失败。尼基乌的主教写道:"每个人都知道希腊人的失败和穆斯林对埃及的征服是对皇帝赫拉克利乌斯暴政和他通过大主教赛勒斯而对[埃及人]实施的错误行为的惩罚。"然而,没有重要的第五支心存不满的科普特基督徒在埃及继续战斗。

当皇帝赫拉克利乌斯于641年2月11日去世,帝国内部冲突使帝国中央政府瘫痪时,帝国对埃及支持的可能性变得更渺茫了。巴比伦要塞于641年4月陷落。当年9月,穆斯林进入亚历山大城。拜占庭帝国于641年11月28日正式放弃埃及;拜占庭最后的军队在一年内全部撤出埃及。当帝国政府最后下决心在埃及战斗,并于644/645年派遣了一支由曼纽尔率领的大军时,已经太晚了,难以扭转乾坤。拜占庭的另一次努力发生在654年,同样以失败告终。拜占庭帝国永久地失去了埃及。

据说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参观了亚历山大城,但其他阿拉伯战士都是第一次从中阿拉伯来到这里,因城市辉煌的宫殿、华丽的私人房屋、壮丽的公共建筑以及复杂的港口和商业设施而惊骇不已。一个故事出现了。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不知道怎样处理塞拉皮姆前面的大图书馆,因此他写信给哈里发乌玛尔寻求指示。哈里发回信说:"至于你提到的图书,如果它们包含与上帝之书一致的内容,[那么]上帝之书的内容已经足够了,没有这些书也无所谓;如果他们包含与上帝之书相矛盾的内容,那么我们便不需要它们。所以,下令毁掉它们。"然后,图书馆的藏书便被拿去用于加热洗澡水。167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的书都被燃烧掉了。与其他那些与第二位哈里发有关的精炼的轶闻一样,这个故事是可疑的,因为这是最不可能的,尽管大图书馆藏书经过了尤里乌斯·恺撒、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屡次

破坏，仍有很多书保留下来了。

但阿拉伯人没有选择从亚历山大城统治埃及。相反地，在埃及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上，他们在巴比伦要塞附近创造了一个新首都福斯塔特。阿穆尔清真寺是非洲大陆的第一个清真寺，是在641—642年在这里建立起来的，今日仍矗立在这里，尽管它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被彻底重建了。福斯塔特最初或许是大军营，这个城市的名字在阿拉伯语中的字面意思就是大军营，但它很快便发展成了一个繁荣的城市。尽管在历史记忆中它被开罗遮蔽了，开罗在三个世纪以后才建筑起来，但福斯塔特在全盛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城市之一，仅次于巴格达，甚至在开罗从规模上超过它以后仍长期处于重要地位。根据10世纪旅行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的记载，福斯塔特城包含优良的市场和大范围的花园以及六层高的泥砖房屋。一座拱桥把福斯塔特与罗达岛连接起来，而另一座拱桥从罗达岛跨到对岸的吉萨。亚历山大城作为埃及首都经历了900年以后，开始了长期的衰落过程，尽管它在一段时间里继续是重要城市。

埃及变成了蒸蒸日上的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最初由来自麦地那的哈里发们统治。然后，倭马亚哈里发政权于661年在大马士革建立起来以后，埃及又受到来自大马士革的哈里发们的统治。埃及的首席行政官员是总督。在他之下是其他重要官员，例如卡迪（*qadi*），即首席司法官，因为阿拉伯人也把新的司法制度带到了埃及。总督的权威最终依赖于阿拉伯卫戍部队，如果卫戍部队得不到有规律的薪金，那么他们便是最不容易驾驭的力量。一个小的但蒸蒸日上的——而且极为好斗的——阿拉伯定居者社区也在早期穆斯林埃及的政府和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位总督是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但他很快便被哈里发乌特曼召回。哈里发乌特曼愤恨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享有的半独立权力，并希望加强哈里发中央集权的管理。然而，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的继承者阿布达拉·伊本·萨阿德·伊本·阿比·萨拉是

 一位能干的人,他击退了646年拜占庭人对亚历山大城迟来的进攻,并开始发展穆斯林海军,最终于645年依靠这支海军决定性地战败拜占庭人,将其赶出小亚细亚的海岸。651—652年,阿布达拉·伊本·萨阿德·伊本·阿比·萨拉也入侵当时坚决抵抗的基督教国家努比亚,但不能征服它,尽管结束战争的条约(被称为 *baqt* 巴卡特,这个词源自拉丁语 *pactus*)要求努比亚每年向埃及交付奴隶作为贡赋,这个条约持续了几个世纪。埃及的南方疆界限定在阿斯旺。

埃及人最初很安静。没有发生地方叛乱。在穆斯林制度内,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受保护者"(dhimmis)。从实践的角度讲,这意味着他们只要交付税务,就可以保持很大程度的独立自主。这对于埃及的基督徒来说是最受欢迎的变化,因为他们经历了拜占庭人几个世纪以来对宗教正统的顽固坚持。阿拉伯人根本不关心基督教神学,因此他们几乎不关心一个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胜利与否。阿拉伯人也没有占据基督徒的家园和土地。当然,基督徒要交税,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新事物,而且虽然税务是沉重的,但它们最初并不太苛刻。先知的传说经常被引用:"关于埃及,你必须全面考量,当那里还是一片绿地时,切忌过分开发她"。只是到后来,当税务变得更沉重时,叛乱才开始爆发,但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埃及人在任何时候渴望拜占庭的统治返回来。甚至在阿拉伯征服埃及五个世纪以后,一个基督徒作家仍能够以强烈的感情断言:"从罗马人[拜占庭人]的残忍、恶意、愤怒和对我们的残酷热情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处于和平之中,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

容忍并不意味着平等。基督徒被禁止服军役和出任国家的最高官职;另一方面,阿拉伯化的基督徒在阿拉伯统治埃及的最初几十年里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财政管理领域。在征服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埃及乡村的所有官员都是基督徒。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禁止奢侈的法律被颁布,禁止基督徒穿着特殊的衣服,或者禁止某些像骑马这样的活动,但这些法律没有严格而持续地执行。埃及犹太人的数量在当时大大降

低。犹太人也有理由对统治者的变化持乐观态度，至少他们最初证明自己的希望是正确的，即他们希望得到宽容，而这种希望在罗马时代晚期和拜占庭时代经常被否定。 169

埃及从讲科普特语为主的基督徒国土转变成讲阿拉伯语为主的穆斯林国土的速度和过程是难以证明的。穆斯林征服者没有试图使大批基督徒皈依伊斯兰教，并不仅仅因为这样做会大大减少非穆斯林被迫缴纳的税务，还有大量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如果阿拉伯男人与基督徒妇女结婚，那么他们的孩子将变成穆斯林。在 8 世纪，大规模阿拉伯人开始迁入埃及。个人野心可能是皈依的一个原因，因为尽管基督徒长期占据政府中的重要岗位，但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折磨和暴力的靶子，而皈依伊斯兰教可以为晋升打开机会。埃及的教堂和修道院最初是免税的，但 705 年教堂和修道院税务的提高促使修道院衰落，这使埃及教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消失了。当基督徒开始在阿拉伯人的税务和歧视下叛乱时，接踵而至的残酷镇压迫使成批的基督徒为了逃避暴力而皈依伊斯兰教，这在 832 年贝什穆瑞叛乱之后尤其引人注目。伊斯兰教本身拥有强有力的教义，埃及人更容易接受这些教义，因为更多的埃及人懂得阿拉伯语。

相对于宗教皈依而言，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追溯阿拉伯语在埃及的传播。埃及的行政语言始终是希腊语，直到 706 年。在这一年，一位哈里发下令用阿拉伯语代替希腊语，结果希腊语几乎彻底地从官方档案中消失了。埃及书吏和其他那些依靠读写能力为生的人们不得不学习阿拉伯语以保持工作。当然，大多数埃及人在穆斯林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不讲希腊语，而是讲科普特语。阿拉伯语代替科普特语作为流行语言在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生，但这种过程是无情而彻底的。到公元 14 世纪，科普特语几乎在乡村消失了，并几乎变成了彻底的礼拜仪式语言，就像罗马天主教教堂中使用的拉丁语那样。

656 年，第三位哈里发乌特曼在麦地那被谋杀以后，先知的女婿阿里在恶劣竞争的环境下掌握了哈里发政权。最可怕的挑战是倭马亚家

族，这是麦加一个富有而有影响力的家族，在叙利亚拥有强大的势力根基。在接下来的阿里和以穆阿维亚为首的倭马亚家族之间的战争中，170 埃及变成了主战场。战斗在657年爆发，倭马亚家族迅速占据上风。阿里做出回应，在658年任命第二任哈里发的儿子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巴克尔为埃及总督，以便恢复对埃及的控制。但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巴克尔的苛刻政策只是把更多的人们驱逐到了穆阿维亚阵营里，为穆阿维亚提供了一个反击的机会。穆阿维亚派遣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到埃及率领倭马亚军队。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渴望返回他曾征服和统治的国土。658年晚夏，敌对军队在福斯塔特和艾因·沙姆什之间的血腥战场上遭遇，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获得胜利。埃及完全附属于穆阿维亚的事业，他于661年变成了倭马亚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为了感谢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的支持，穆阿维亚允许他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统治埃及，直到他于664年去世为止。

当哈里发马尔万一世于684年去埃及建立自己的权威时，他任命自己的儿子阿布德·埃尔－阿兹兹为埃及总督，后者在这个国家实施了长达20年之久的和平统治。在这段时间，埃及是穆斯林完成征服北非和获得战利品之事业的基地。阿巴德·埃尔－阿兹兹所提名之人中的一位后来率领穆斯林入侵西班牙。阿巴德·埃尔－阿兹兹之后，埃及政府越来越紧张；税务被更彻底地收取，这种倾向在724年乌巴德·阿拉·伊本·埃尔－哈巴巴被任命为埃及税务长官时达到顶点。乌巴德·阿拉是被选出来去增加行省的收入的，所以他对埃及国家进行了复杂而详细的调查，要求每个人都佩戴号码牌。他把税务提高了10%强，并粗鲁地甚至残忍地收取税务。正是在这时，埃及的科普特人口爆发了一系列反叛行为，他们自从阿拉伯征服以来就耐心地接受穆斯林税务。这些不协调的、没有纲领的和缺乏领导的起义几乎没有获得胜利的机会，但它们令穆斯林军事组织非常紧张，穆斯林军队以丧失大量生命为代价镇压了起义。

倭马亚家族后期那些年是衰落时期。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都腐化堕落。关于倭马亚家族不道德行为的诽谤性故事流传开来。与此同时，敌对中心发展起来。一个敌对中心是由阿巴斯家族领导的。这个家族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追溯自己的族谱到穆罕默德的一个叔叔阿巴斯，借以证明他们与先知的关系比倭马亚家族更密切。在747年，阿巴斯家族叛乱，从很多有叛意的因素中获得力量。750年，哈里发马尔万二世在扎巴战役中被他们打败，之后阿巴斯家族屠杀了他们能够抓住的倭马亚家族的每个成员。马尔万二世逃往埃及，但他还没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于750年8月1日在中埃及的布希尔被紧紧追击他的阿巴斯军队杀死。

阿巴斯哈里发政权把帝国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巴格达，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处于强有力的哈里发的统治下，例如哈伦·埃尔-拉希德(786—809年)。阿巴斯王朝决定不从倭马亚的基地福斯塔特统治埃及，为政府和战士在北方不远处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即埃尔-阿斯卡尔。这对福斯塔特没有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福斯塔特从自己靠近新行政中心的有利地位中获利。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玛穆恩是哈伦·埃尔-拉希德的儿子，因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的系列叛乱而在832年访问埃及。根据《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中的一则传说，正是这个玛穆恩为了寻找珠宝而在大金字塔的北面开凿了一个入口(现在旅游者的入口)。

除了偶尔的叛乱，埃及在9世纪后半期是相当安全的，但阿巴斯帝国与其前辈倭马亚王朝一样，也进入了衰落时期。哈里发的地位与其说在于权力，还不如说是在于声望。与此同时，帝国的各个行省很少臣服于中央权威。行省总督开始凭借本身的头衔把自己看做合法统治者，并试图建立家族统治。这恰恰是发生在埃及的情况，即埃及出现了两个总督王朝，一个是868—905年的图伦王朝，一个是935—969年的伊赫什德王朝。

阿赫迈德·伊本·图伦是一个作为贡赋而从中亚送到哈里发那里

的土耳其奴隶战士的儿子,在 868 年到埃及任总督。他还在北边不远处建立了另一座新城镇,称为埃尔－卡台(意思是“让步”或“图谋”)。伊本·图伦在他的新城建立起来的清真寺现在是开罗最大的清真寺,也是保持着原初结构的最古老清真寺。伊本·图伦通过恢复水利工程和重设税务而恢复了埃及的经济稳定;在国外,他获得了对远及拜占庭边境的叙利亚的控制。他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巴格达之外,哈里发最终对此难以容忍。在某些情况下,伊本·图伦甚至能够对竞争哈里发职权的双方之间的斗争进行干涉。

172 当伊本·图伦于 884 年去世时,他是受欢迎的,并留下了一个充裕的国库。他的儿子库马拉瓦希继承了他的总督权力,这是阿拉伯帝国这样大的行省第一次依靠继承权利而非哈里发的任命继承总督权力。库马拉瓦希作为一位强大的统治者进行统治。他向哈里发发号施令,并在叙利亚扩张图伦王朝的范围,但他不关心开支,而且当经济急速下降时,他不能成功地管理。库马拉瓦希被他的宫廷宦官谋杀,后者在 896 年与库马拉瓦希的妻妾私通,而且他的王朝在放荡、阴谋和谋杀中浪费时间。巴格达当局看到了恢复控制的机会,于 905 年向埃及派遣了一支远征军,把埃尔－卡台夷为平地,只保留了伊本·图伦的清真寺和沟渠。

在接下来的 30 年里,埃及受到巴格达当局派遣的一系列军事司令的直接控制。然而,这种制度并没有很好地运行:行政管理的质量是低劣的,税务保持在太苛刻的水平,社会秩序继续混乱。当帝国的外部威胁获得中央政府的充分注意时,哈里发埃尔－拉迪于 935 年任命穆罕默德·伊本·图吉为埃及总督,希望他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处理埃及的事务。

伊本·图吉被授予伊赫什德的头衔。伊赫什德是一个波斯语单词,意思是“领袖”。这个称呼被用于他建立的短命王朝。与图伦王朝的哈里发们一样,伊赫什德王朝的哈里发们使自己有效地独立于阿巴斯王朝之外,但敏捷地与阿巴斯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伊本·图吉掌

握着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击退了来自突尼斯的法蒂玛人的入侵，并保持着对叙利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他的总督职位，但他们是未成年人，因此权力由他们的老师实施，后者是前努比亚奴隶，名叫卡福尔。卡福尔是一个极为能干的人。他不得不处理很多棘手的问题：叛乱，外敌入侵，海军灾难，地震，饥馑，963—968 年的系列尼罗河低水位，其中一次是埃及记录当中最低的水位。当卡福尔在 968 年去世时，新总督不能应付这些问题，指导不是来自东方的巴格达，而是来自西方的马格里布。在马格里布，突尼斯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埃尔－穆伊兹正计划进行一次对埃及的新入侵，并坚定不移地宣传此计划。因为埃及这样一些糟糕的事情和根本得不到遥远的、越来越虚弱的阿巴斯王朝的援助，所以很多埃及人合情合理地得出结论：法蒂玛王朝的统治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第十一章　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

173　法蒂玛王朝起源于根本分歧和彻底分裂，分歧和分裂源于这样的决定性问题——谁应该是先知的哈里发（“代表”或“继承者”）。伊斯兰教的主要推动力是逊尼派，他们接受了四大哈里发的继承顺序：阿布·巴克尔、乌玛尔、乌特曼和阿里，但其他人持不同观点。什叶派属于持反对意见者阵营，是先知的堂兄弟和女婿阿里的“党徒”，认为继承顺序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阿里才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者，倭马亚和阿巴斯哈里发政权都是非法的。

什叶派教义本身就是宗教分裂的产物，还是宗教分裂的多产的生产者。法蒂玛王朝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这个派别被非常完善地组织起来，并善于与其使徒交流。因为不能在东方实施权力，所以一群伊斯玛仪派教徒于 909 年从叙利亚迁出，定居在今日的突尼斯，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朝国家，由法蒂玛哈里发统治。然而，他们把这个王朝国家仅仅视作一个基地，他们可以以这里为基础，从阿巴斯王朝夺取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埃及是通往巴格达的第一步。

174　法蒂玛王朝最初征服埃及的企图未成功，但他们继续通过传教士和复杂的宣传运动准备征服埃及之路，这种宣传运动破坏了伊赫什德王朝的统治权力。968 年卡福尔死后，新总督是一位有修养但无能力的人，名叫伊本·埃尔－弗拉特。当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卡福尔

的追随者和伊赫什德王朝的后继人之间爆发时，伊本·埃尔－弗拉特不能应对这种形势，听从法蒂玛使者的意见，后者劝他打开埃及国门，把法蒂玛王朝的军队放进来，使埃及处于法蒂玛王朝的保护下。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埃尔－穆伊兹派遣他的将军雅瓦尔进入埃及，后者在969年几乎未遇抵抗就进入了福斯塔特。

雅瓦尔立即着手在之前的城市北面建筑另一座城市，这是遵从埃尔－穆伊兹的指示进行的。埃尔－穆伊兹指示雅瓦尔建立一座首都，这个首都要适应法蒂玛王朝迟早会实施的对全世界进行控制的需要。关于新城市的起源，有几个故事传播开来。根据一个故事，雅瓦尔用树桩和细绳子标出城市所有事物的地点，绳子上系着铃铛。在占星家计算出的最有利的时间，他将通过振动细绳子弄响铃铛，这就是建筑开始的信号。但是，在天体移动到正确位置之前，一只乌鸦落在了一根绳子上，使铃铛乱响起来。工人们顺从地开始工作。占星家吓呆了。在那一刻，火星开始升起。他们直接预测出这座城市迟早会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不管城市建筑的开始有多么不幸，当埃尔－穆伊兹于972年从突尼斯出发到达埃及时，城市建筑工程进展顺利。新城市被称为埃尔－卡西拉（“胜利”），最终西化为现在的名字开罗。

它附近几个先前建立的城市——福斯塔特、埃尔－阿斯卡尔和埃尔－卡台——都是开放城市。与它们不同，开罗城四周围绕着多门的沉重泥砖墙，后来维西尔巴德尔·埃尔－扎马里用石头代替了泥砖。中世纪埃及伟大的历史学家塔奇·埃尔－丁·埃尔－马克里兹（1364—1442年）看到了最初的城墙在几个世纪以后的一些遗骸，并写道：“我亲眼目睹了墙砖的巨大，这些砖在我们的时代也是奇迹，因为每块砖都是长一腕尺（半米多），宽2/3腕尺。城墙的宽幅达几腕尺，足够两个马兵在上面并肩骑乘。”城墙内部是大量繁华的宫殿、亭台、住处、办公处、澡堂子、花园、喷泉、水池和凉亭，还有诸如铸币厂、军械厂和马厩这样的工作设施。在新城市的东边是大宫殿，占地大约13475平方米。东边的宫殿不仅是哈里发的主要居所，还是部署所在地。哈里发

埃尔－阿兹兹在西边为王室妻妾们预留的巨大花园中间建筑了另一个较小的宫殿。一条地道把两个宫殿连接起来。这条地道是足够大的，以至于哈里发可以骑在马背上通过。地面之上是宽敞的阅兵场，面积足够大，可以容纳一万名战士，被称为贝恩·埃尔－卡斯瑞恩("两宫殿之间的地方")，这个名字幸存下来了，尽管法蒂玛王朝的开罗的大多数东西和宫殿都已经消失了。在辉煌壮观的环境中，哈里发们保持着炫耀奢华生活方式，这是他们宣传其政治权力和宗教神秘性的深思熟虑的政策。

法蒂玛王朝的开罗是一座禁城，是为哈里发、他的随从、政府和军队保留的，城市的各个部分被分配给这些群体居住。一支军队是由柏柏尔人构成的，被称为祖维拉，这个名字用来称呼城市的南大门。福斯塔特和周围地区的埃及人在开罗工作，为开罗提供货物和服务，但当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时，他们被希望从巴布·祖维拉门离开，这个门是仆人出入的门口。这意味着福斯塔特远没有因开罗城的出现而衰落，而是进一步受到了这样一个临近的巨大宫廷和行政城市的刺激。事实上，福斯塔特最伟大的时代恰恰是开罗城建成之后的那段时间，它为开罗提供了大量精英，还是开罗与外界之间的商业枢纽，同时享受着因法蒂玛王朝的国际势力而提高的经济利益。

法蒂玛对学术的赞助在开罗得到丰富表述。雅瓦尔在 970 年奠定了大清真寺埃尔－阿兹哈尔的基础。它在 989 年哈里发埃尔－阿兹兹统治时期变成了一个教育机构，而在一千多年以后继续作为一所大学繁荣发展。开罗也以拥有大哈里发图书馆而自豪。在很多其他法蒂玛王朝的学术机构中，最著名的是达尔·埃尔－希克玛("智慧之屋")，是由哈里发埃尔－哈稀姆于 1005 年建立的，由博学之士出任职员，他们提出了很多学科。智慧之屋包含一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对学者开放，也允许普通读者进入，并为他们提供笔、墨和纸。一个天文观测台曾一度存在，但在赞助这个观测台的维西尔失去兴趣之后，它就被拆除了。法蒂玛王朝也激励音乐和文学，很多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作品验证了

176

这一点。

法蒂玛帝国以埃及为根据地，囊括了大片领地，东到叙利亚和汉志，北至非洲北海岸，西达西西里岛。哈里发处于法蒂玛王朝政治、社会和宗教体系的最高点，通过高度组织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官僚机构由哈里发的首席长官维西尔统领。在法蒂玛王朝的晚期，哈里发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领袖，但在埃及实施统治的前三位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埃尔－穆伊兹、埃尔－阿兹兹和埃尔－哈稀姆——是充分掌握政府的绝对君主。他们的维西尔是确然的行政长官，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出和解除命令。哈里发控制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战士大多数是奴隶：来自法蒂玛王朝的马格里布领地的柏柏尔人，苏丹人和土耳其人。最终土耳其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令柏柏尔人非常厌恶，因为正是柏柏尔人使法蒂玛王朝掌握了埃及权力。在海上，强大的海军保护法蒂玛王朝在地中海的利益，并使红海变成了法蒂玛王朝的湖泊。

法蒂玛王朝的另一个力量基础是强大的经济。法蒂玛王朝充分利用其跨越地中海和红海的地势，控制了地中海——包括诸如拜占庭、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基督教国家——与印度以及远东之间的贸易。法蒂玛王朝也出口高质量手工艺品，例如优质纺织品、精致的玻璃器皿和陶器，陶器的制作标准是以前从未达到的。尼罗河谷被很好地开发，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加强了法蒂玛王朝的贸易平衡。水利工程被仔细地维持，繁重的税务降低了，这使王朝受到乡下人口的支持，也因此增加了土地的生产力。大量金子供给使法蒂玛王朝能够铸造大量货币。法蒂玛王朝的金币直到王朝结束还保持着其纯度水准。

除了行为古怪的哈里发埃尔－哈稀姆，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们对dhimmis，即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政策是高度容忍，有时甚至是支持。很多基督徒在法蒂玛王朝的政府和社会中占据优势，尽管正是在法蒂玛王朝早期基督徒不再是埃及的多数人口。法蒂玛王朝时期或许是埃及的犹太人享有的最好时代。一个犹太社区在福斯塔特发展起来。这是自从亚历山大城的犹太社区消失以来埃及最大的犹太社区。图伦王朝

时期，本·以斯拉犹太教会堂在这里建立起来。1170 年，图德拉的参观者本杰明写道："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是非常富有的。"福斯塔特变成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的犹太人的权力中心。

因为福斯塔特的犹太社区，我们对中世纪埃及的日常生活有了异常的史料。这些史料对于我们了解法蒂玛王朝时代是特别充足的，对于我们了解其他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本·以斯拉犹太教会堂有一个 *genizah*，这个词可以宽松地翻译为"储藏室"，破损的希伯来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储存在这里，因为毁掉带有上帝的名字的文本是非法的。因此，几个世纪以后，书卷和法典被抛弃在储藏室中。什么书应该储藏？标准变得更宽松了，结果各种文本在福斯塔特的储藏室中堆积起来。这些文本不仅涉及宗教，也涉及诸如结婚、离婚、商业、魔法、医药和教育等日常事务，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关系，而非仅仅涉及犹太人这一小部分人口。文本经常以强烈的个人口吻叙述。一位商人焦急地说："上帝知道，这些天的物价是如此难以预测。"一位灰心沮丧的妻子抱怨说她的丈夫已经九个月没有跟她发生性关系了："我是一位饥渴的妇女；男人是性无能。让他一个人生活；让我们取消婚姻。"

在埃尔－穆伊兹的继承者哈里发埃尔－阿兹兹（975—996 年）统治时期，法蒂玛帝国达到了最强盛的程度。埃尔－阿兹兹坚持法蒂玛王朝卖弄的哈里发生活方式，花费巨资在奢侈品上——他曾经令人们把樱桃绑在信鸽的腿上从黎巴嫩运到他这里，但他也是一位尽责的管理者。埃及在他统治下繁荣发展起来。在埃及之外，埃尔－阿兹兹在去世之时还准备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北叙利亚的拜占庭。这是返回巴格达、实现法蒂玛王朝毁灭逊尼派哈里发政权的长远梦想的准备运动。

埃尔－阿兹兹的继承者是他 11 岁的儿子埃尔－哈稀姆（996—1020 年）。在埃尔－哈稀姆继承哈里发职位的最初几年，他受制于他的顾问，后者是一位名叫巴尔伽万的宦官。但当他成长到 15 岁时，突然命人杀掉了巴尔伽万，并实施强有力的个人统治，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统治。事实很难与关于埃尔－哈稀姆的传说分离开来。关于他的无节

178

制行为的一些故事可能被夸大了，而其他一些故事可能有合情合理的基础，但他至少是很古怪的人。据说，他能够在这一刻慷慨地赐予他喜爱之人以礼物，但在下一刻就将其杀死。他甚至在某天将他的妾全部杀死在她们的澡堂里。埃尔－哈稀姆是强烈的什叶派教徒，从事反逊尼派政策——尽管他任命了一个逊尼派的人担任卡迪（*qadi*，首席司法官）之职，因为他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但与其他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不同，他对基督徒是特别苛刻的，强迫他们佩戴宗教身份认同标志，禁止他们骑马或购买奴隶。很多基督徒被迫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几位教会职员被处死，包括埃尔－哈稀姆的两个舅舅（埃尔－哈稀姆的母亲是基督徒）。他下令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物储藏所教堂和埃及的大量教堂。埃尔－哈稀姆也残忍地对待犹太人，毁掉了他们的很多犹太教会堂。他针对妇女的禁令是特别严苛的，妇女不允许佩戴珠宝，最终甚至不允许走出家门，如果妇女的诉讼被驳回，那么他就会这样惩罚他们。他憎恨狗，并两度下令杀死开罗所有的狗。

法蒂玛王朝其他所有哈里发都是遥不可及的统治者，只有在重大时刻才在壮丽辉煌的场面中出现在公共场合，但埃尔－哈稀姆的个人行为是令人震惊地自然。他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穿着朴素的毛纺衣服，很少佩戴哈里发的布满钻石的穆斯林头巾，禁止他的臣民在其面前跪拜或称呼他为“真主”。他骑在驴上自由地绕城游玩，不需要护卫，很容易与人们混杂在一起，好像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去世几年以后，一位作家这样记述埃尔－哈稀姆：“他是一位具有幽默感的农民。他经常在街道上与人们谈话，并相互开玩笑。”埃尔－哈稀姆喜欢独自在开罗后面的穆卡塔姆山上散步或骑行。但在他的统治即将结束时，有谣言称他逐渐相信自己是阿拉的化身，并很快就会显露其神性。当这导致了福斯塔特的一次骚动时，他使自己的士兵散布在城市里，而他则撤到山上去观看，他们正以令人震惊的肆虐在整个城市里大屠杀。

一天夜里，埃尔－哈稀姆独自到穆卡塔姆山上骑行，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任何痕迹地消失了，除了几天以后发现的血迹斑斑的斗篷。几

179 乎可以肯定,他被谋杀了,但他的一些追随者相信他没有死,而只是从这个世界上隐退了,一定会在某一天作为马赫迪或救世主再次出现。这些人变成了德鲁士派,他们在黎巴嫩建立基业,并始终尊崇埃尔－哈稀姆。埃尔－哈稀姆壮丽的清真寺在1003年建成,恰恰矗立于开罗北墙后面的巴布·埃尔－浮图内部。

埃尔－哈稀姆的继承者是另一个未成年人,即他的侄子埃尔－扎希尔,但王位背后的权力掌握者是新哈里发的姑姑,即埃尔－哈稀姆的妹妹希特·埃尔－穆尔克,她可能是谋杀她兄弟的同谋。就在埃尔－哈稀姆消失之前,埃尔－哈稀姆和希特·埃尔－穆尔克之间发生过激烈争吵,因为埃尔－哈稀姆谴责她的通奸行为。希特·埃尔－穆尔克也对埃尔－哈稀姆的继承计划焦虑不已。埃尔－扎希尔的统治(1020—1035年)受到国内与国外系列问题的损害,与拜占庭有关的问题特别令人伤神。当1035年埃尔－穆斯坦希尔变成哈里发时,希特·埃尔－穆尔克仍然是一支可怕的力量。她去世以后,埃尔－穆斯坦希尔最终获得了独立,仅仅在他长达58年的特别长的统治的最后几年才失去这种独立。

早在埃尔－扎希尔统治时期,局势就已经失去了控制。部分问题是奴隶战士的广泛征募。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族群征募的,所以他们易于进行派系战斗,并变得越来越不顺从。1060年,接连的低泛滥导致了大范围的供给不足,破坏了商业,导致政府腐败。这些问题与上述问题结合起来使埃及进入了为期三十多年的混乱时期。得不到军饷的战士进入长时间的暴乱状态,拿走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派系斗争变成了彻底的战争。苏丹人战士控制了上埃及大部分地区,而柏柏尔人战士控制了三角洲。土耳其人曾占据开罗,洗劫了埃尔－穆斯坦希尔的图书馆,并强迫他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卖掉他的珍宝。拉瓦塔的柏柏尔人战士攻占并洗劫了纳特仑干河谷的修道院,把教长克里斯托多罗斯作为人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在这个"大危机"时期,形势是如此的可怕,以至于人们互相残杀,有时人们会吃掉那些仍然活着的牺牲者,

如果记录可以相信的话。

在绝望中，埃尔－穆斯坦希尔于1074年任命阿克里的总督为维西尔。这个总督曾经是亚美尼亚籍奴隶，名叫巴德尔·埃尔－扎马里。巴德尔·埃尔－扎马里随身带来了一支由亚美尼亚士兵组成的可靠个 180 人军队，很快便制伏了敌对力量，并恢复了秩序。延缓三年的税收给了这个国家以恢复元气的时间。在开罗，巴德尔·埃尔－扎马里用石头墙代替了城市的泥砖墙，点缀着宽敞的大门，其中三个大门保留下来了：南墙的巴布·祖维拉和北墙的巴布·埃尔－纳斯尔和巴布·埃尔－浮图。但这些服务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在这之前，维西尔通常是服从于哈里发的市民；但从此以后，他们是对国家实施有效控制权的军人。巴德尔·埃尔－扎马里统治埃及达20年之久，而且他的儿子埃尔－阿芙达尔·沙汗沙继承了他的维西尔职位。但巴德尔·埃尔－扎马里不能恢复法蒂玛帝国的整个形势。西西里于1071年丢掉；到当时为止，随着部落统治的重新确立和小王朝的建立，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都丧失了，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的领地缩小到从提尔往南的海岸带，尽管埃尔－阿芙达尔于1098年再次占领了耶路撒冷（恰恰在下一年及时将其丢给了十字军）。

当埃尔－穆斯坦希尔在1094年去世时，埃尔－阿芙达尔把已故哈里发的小儿子埃尔－穆斯塔利放在王位上。长子尼扎尔发动叛乱，并被杀死，但他的一些支持者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并在伊斯玛仪派的进一步分裂中加入了叙利亚的刺客派。随着埃尔－穆斯塔利的登基，法蒂玛王朝的宫廷党派之争和阴谋变得持续不断。尽管维西尔们从哈里发获得了权力，对维西尔职位的争夺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这种制度从来不能造就足够稳定的有效统治局面。这是危险时刻，因为政治虚弱，尤其是另一支可怕的军队出现了，这支军队威胁着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现存的领地，甚至威胁到了埃及本身。

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是中亚土耳其大游牧移民的一部分。塞尔柱王朝的真正建立者图格里尔从他在库拉桑的根据地，扩张到伊朗，然

后转向西方。当图格里尔于 1055 年进入巴格达时,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把他视作苏丹("掌握权力者")。从此以后,苏丹就成为土耳其统治者的首选头衔。在 1071 年,图格里尔的继承者阿尔帕斯兰在曼兹凯尔特战役中灾难性地打败拜占庭人,粉碎了拜占庭野战军,捕获了皇帝,向土耳其人打开了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阿尔帕斯兰的儿子马利克沙往南进军,直入叙利亚,占领了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甚至阿拉伯半岛的部分地区。

181 埃及显然是塞尔柱王朝的下一个征服目标。然而,对于法蒂玛王朝来说,幸运的是,塞尔柱王朝有才气的维西尔尼扎姆·埃尔-穆尔克在1092 年被刺客杀死,他曾指引阿尔帕斯兰和马利克沙获得了很多成就,马利克沙也在同一年去世了。一场恶劣的权力斗争接踵而至,在这场斗争中,中央政府对塞尔柱王朝广泛领地(包括叙利亚)的控制丧失了。法蒂玛王朝也因此免去了一次军事战争,而这场战争有可能是法蒂玛王朝的毁灭。但无论如何,埃及最终也没有听到土耳其人的到来。

在 11 世纪末期,东方的形势是虚弱和分裂。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出现了权力真空。拜占庭帝国正经历着从灾难性的战败中恢复元气的长期过程。法蒂玛帝国在彻底衰落,只能在巴勒斯坦维持象征性的统治。尽管法蒂玛王朝和塞尔柱王朝都宣称叙利亚领地属于自己,但两者都不能或不愿保护这一地区,这里已经分裂成了诸多竞争的小公国。然而,另一个力量突然闯入了这种碎乱的政治场景中:西方的十字军东侵,从一开始到几个世界之后它们的结束为止,埃及被深深地牵涉进十字军东侵之中。

十字军东侵于 1095 年开始于克莱蒙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解放圣地上受压迫的基督徒,消除圣地被穆斯林占领的耻辱。(事实上,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受到很好的对待,而且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都向基督徒的朝圣开放。)乌尔班二世继续演讲:法兰西挤满了人,而巴勒斯坦却是一个充满奶和蜜的地方。他力劝贵族们停止

彼此的战斗，把他们的宝剑指向异教徒。乌尔班二世叫喊着："让掠夺者变成骑士！"贵族们狂热地回应着："上帝希望如此！"加入十字军的热情席卷欧洲。时机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大朝圣和宗教战争的时代。在西西里，诺曼人对抗撒拉逊人的斗争被看做宗教战争，再征服也是如此，即把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出来。甚至诺曼底的威廉公爵于1066年投机入侵英格兰时，也获得了教皇的宗教战争的旗帜。基督教徒正经历伟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变化，正在创造能够被用于转向外界的能量。

182 第一次努力是1096年的人民十字军东侵，但这场非法的、组织涣散的成群农民远征军是由隐士彼得和赤贫农民沃尔特率领的，当年10月在未到达圣地之前就被歼灭了。然而，1096年11月，一支更可怕的军队开始在君士坦丁堡集结，包含一些分遣队和小军队，大多数是从法国、佛莱芒和诺曼底等地区招募来的。在安纳托利亚攻打土耳其的斗争中验证了军队的能力之后，十字军于1097年秋季到达叙利亚，经过八个月的围攻之后占领了安提俄克城。在1099年1月，他们开始进攻耶路撒冷，未因严重抵抗而受阻，于当年6月到达耶路撒冷城墙。虚弱的法蒂玛王朝的卫戍部队镇守城市达一个多月，但十字军于1099年7月15日便攻下了耶路撒冷城。总督和其随从被允许离开，但耶路撒冷城的其他人口，包括十字军表面上来援助的基督徒，都遭到大屠杀。埃尔-阿芙达尔的埃及援军出发得太晚了，并在阿斯卡隆被打败。当十字军领袖们转而开始互相争斗时，这个城市仍保留在埃及人手中，并在接下来半个世纪里充当了对抗十字军的前哨。一次重要的文化保护行动发生在阿斯卡隆，法蒂玛王朝的卫戍部队赎回大批有价值的手稿（十字军从耶路撒冷抢走的）。

各种十字军部队的领袖发誓收复以前由拜占庭人占据的土地，但他们反而为自己分割出四个十字军国家：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和耶路撒冷拉丁王国。这些王国当中最后面这个是最大的，享有控制基督教圣地的权威。拉丁王国也是直接对抗法蒂玛埃及

的王国。最初的征服之后必定是巩固,因为十字军在数量上是少的,把他们的统治强加给巨大而多样的人口之上是困难的,这些人口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都是十字军不熟悉的。人力和金钱都越来越短缺,十字军国家也受到叙利亚穆斯林军队恢复实力的威胁。对于埃及来说,幸运的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 年)旨在占领大马士革,这种无效能的努力导致攻打埃及的计划被放弃。

与此同时,埃及内部的形势继续恶化。控制政府的斗争变得更残[183]忍,维西尔职位被反复篡夺,哈里发被谋杀,几乎所有王子都被屠杀,只有一位漏网,这个王子被用作傀儡哈里发。拉丁王国从外界对埃及实施越来越大的压力。埃及被迫向十字军缴纳贡赋。1143 年,阿斯卡隆向十字军投降,消除了通往巴勒斯坦的法蒂玛王朝这个现存桥头堡,敞开了通往埃及之路。20 年以后,拉丁王国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惨败中恢复元气之后,它的新的、能干的国王阿马利克认为占领埃及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于 1163 年入侵埃及,并于当年 9 月到达了比尔贝斯,但防御者切断了堤防,把在最近的泛滥中储存起来的水放了出来,洪水淹没了田地,迫使法兰克人(所有欧洲人都被称为法兰克人)撤退,尽管很快他们就又返回来了。

十字军不是唯一对埃及感兴趣的势力。在混乱之中,随着塞尔柱王朝的苏丹和维西尔都于 1092 年去世,他们的阿勒颇总督的儿子赞吉在北叙利亚建立了一个自治政权。他于 1144 年占领埃德萨,这是第一个由穆斯林收复的十字军首都,这使得他成为了信仰的卫士。当赞吉在 1141 年被法兰克奴隶谋杀之前把他的领地分给他的儿子们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努尔・埃尔-丁获得了北部叙利亚。努尔・埃尔-丁继续他父亲攻打十字军的圣战,从十字军手中收复了更多的领土,并于 1154 年实现了赞吉占领大马士革的野心,把穆斯林叙利亚统一在了单一统治者的领导下。努尔・埃尔-丁强有力的封臣之一是他的军队司令希尔库,后者的弟弟阿尤布(接下来的王朝的名字便是阿尤布王朝)在战斗中经常由他的儿子萨拉・埃尔-丁陪伴,萨拉・埃尔-丁在西

方通常被称为萨拉丁。我们应该注意，阿尤布王朝的国王们既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阿拉伯人：他们是库尔德人。

当阿马利克在1164年再次侵入埃及时，努尔·埃尔－丁对法蒂玛王朝的维西尔的求助作出反应，允许希尔库率领军队进入埃及。在接下来三年里，战斗从三角洲一直往南延伸到中埃及的埃尔－巴贝恩。在亚历山大城，萨拉·埃尔－丁抵挡住了一次十字军围攻。双方都不能获得决定性结果，于1167年8月都撤出了埃及，但阿马利克占有一些优势：埃及人对拉丁王国缴纳的贡赋被增加，法兰克人定居点在开罗建立起来，而且一支法兰克人卫戍部队驻扎在开罗城的各个城门。

阿马利克应该满意了，但他试图在下一年彻底征服埃及。这次他占领了比尔贝斯，这个城市在较早的时候曾反对过他，所以他屠杀了全城人口。提尔城的十字军东征年代记编者威廉记录道："我们的人手持出鞘的宝剑进入城市，开始屠杀能发现的所有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没有一人漏网……当他们发现藏在屋内的少女或老人时，他们就挥舞着宝剑驱逐他们逃跑，只有那些能够提供大笔赎金的人躲过了劫难。毁坏是令人震惊的，而掠夺也绝不次于毁坏。"[20]

184

通往开罗的道路打开了。维西尔下令把福斯塔特付之一炬，使它不能为入侵者充当基地。城市燃烧了近两个月，它从未能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哈里发个人请求努尔·埃尔－丁和希尔库的援助。希尔库的迅速到达迫使阿马利克撤退，丢失了他已获得的一切。希尔库来埃及的动机或许完全出于个人野心，因为在1169年1月，他杀害了法蒂玛王朝的维西尔，并自己占据了这个职位。当他在几周后去世时，一个30岁的年轻人萨拉·埃尔－丁继承了他。

萨拉·埃尔－丁的地位最初是不稳固的。作为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的逊尼派维西尔，他仅仅控制一小部分军队，而敌手们在无序的国家里争夺权力。然而，通过系统而残忍的消除敌手，他巩固了他的权力。当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埃尔－阿迪德于1171年9月去世时，萨拉·埃尔－丁自称苏丹。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埃尔－穆斯塔迪的名字在

清真寺里被星期五祈祷者呼喊。埃及回到了逊尼派信徒的手中。夏菲司法学校的逊尼派卡迪（*qadis*，司法官）被任命担任官职。巴格达的哈里发正式认可了萨拉·埃尔－丁的职位。因此，在形式上，作为最高统治者努尔·埃尔－丁的代理人，萨拉·埃尔－丁在阿巴斯哈里发无上权威下统治埃及；事实上，他已经获得了如此强大的权力基础，以至于他与努尔·埃尔－丁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因为努尔·埃尔－丁在 1174 年 5 月去世，那么一场冲突一定已经发生了。这使得萨拉·埃尔－丁在埃及更安全了，并允许他更自由地插手叙利亚的事务。

在开罗，萨拉·埃尔－丁建立了控制基地，建筑了巨大的新城墙。他把法蒂玛家族的成员驱逐出开罗城，并把开罗城向普通民众开放。由于开罗与权力的靠近和福斯塔特的衰落，随着所有阶级的人口向开185 罗迁移，开罗迅速发展起来。繁荣返回到乡村。但是，尽管埃及无疑是萨拉·埃尔－丁帝国最重要的部分，但他主要把埃及视作确保安全和在叙利亚扩展领地的手段，他在埃及度过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从未把他的各种领地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而是把它们的统治权给予个人，这些个人常常是阿尤布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有效地变成了自治王子，他们与开罗的苏丹的确切关系从未清晰地确定下来。

萨拉·埃尔－丁在统治前期的扩张主义活动主要旨在战胜古老的赞吉王国。大马士革几乎未作任何抵抗便于 1174 年向他投降。阿勒颇和摩苏尔更顽固，但他最终也使他们认可自己为最高统治者。他也在汉志和也门被认可为苏丹。在这个时期，他与拉丁王国的关系是最和平的，因为阿马利克于 1174 年去世，之后是患麻风病的国王鲍尔温四世的虚弱统治。虚弱的拉丁王国需要共存，不需要冲突。萨拉·埃尔－丁在 1177 年对王国的沿海地区进行了一次突袭，但忽略了保护他后方的阿斯卡隆和加沙城，当他在当年 10 月在埃尔－拉姆拉附近遭受惨重失败时得以侥幸逃脱。他于 1179 年返回去获得了一些胜利，并在 1185 年与拉丁王国达成了为期四年的休战协定。

但当鲍尔温四世于次年去世时，他的继承者是鲁斯格纳的盖伊，后

者采取了更好战的政策，希望突破王国的螺旋式衰落。他得到了贵族的强烈支持，一个贵族通过攻击一个从埃及去往叙利亚的旅行队、抢占其货物、屠杀其人们的方式激怒了萨拉·埃尔－丁。当萨拉·埃尔－丁进行报复时，鲁斯格纳的盖伊便以全国军力构成的强大军队出兵迎战。1187 年 7 月 4 日，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提比略城附近的哈丁。十字军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允许自己被围困。他们的敌手截断了水源，并开始用火烧焦他们，这使他们口渴难耐，很多人被杀死在原地，其他人——包括国王盖伊——都投降了。

哈丁战役使十字军国家几乎失去了防御能力。阿克里没有任何战斗就陷落了。然后，萨拉·埃尔－丁进军耶路撒冷，后者于 1187 年 10 月 2 日友好地投降。与 80 年前十字军野蛮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萨拉·埃尔－丁允许人们逃走。夺回耶路撒冷的强烈欲望必定是不能抵抗 186 的，但萨拉·埃尔－丁应该尽力首先攻占提尔，这是保留在十字军手中的最后一个港口。哈丁战役之后，提尔是虚弱的，容易占领。提尔的占领将切断十字军与欧洲的联系，消除十字军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保持抵抗基地的希望。然后，耶路撒冷便可轻而易举地拿下。到萨拉·埃尔－丁到达提尔的时候，提尔已经加强防御；当他的东方联盟者在年度战争季节结束时撤出战争以后，他的围攻不得不放弃。十字军增援的大门敞开着，这不久之后就会到来。

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在西方基督徒中间引起了惊愕。当教皇乌尔班三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崩溃了，并最终死掉。一波新的十字军东侵热潮爆发出来。基督徒当中三个最强大的君主——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法兰西的菲利普·奥古斯塔斯和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德——响应了号召，每个人都是一支强大军队的首领。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在途中被淹死以后，大多数德意志人返回去了。但菲利普·奥古斯塔斯和理查德在 1191 年春季结束时到达了巴勒斯坦。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阿克里。它于当年 7 月 12 日投降，之后它的 3000 名防御者被处死。尽管理查德与萨拉·埃尔－丁

之间的竞争在西方神话中等同于武士行为，但真正的武士风范通常——尽管不是必然地——可以在萨拉·埃尔－丁身上找到。

理查德与菲利普·奥古斯塔斯对于他们在阿克里胜利后造成的毁坏后果的划分产生了如此激烈的争吵，以至于菲利普·奥古斯塔斯和他的军队返回了法兰西，留下理查德在下一年的系列沿海战斗中面对萨拉·埃尔－丁。在这些战斗中，战争的幸运来来往往——迦法不止一次易手——但理查德从未能够对他的首要目标耶路撒冷进行一次攻击。当他们到达和局时，理查德和萨拉·埃尔－丁在1192年9月达成了为期三年的休战协定。这个协定认可了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但允许未武装的基督徒朝圣者访问该城市。理查德在下个月出发去了欧洲。

1193年，萨拉·埃尔－丁去世以后，他的阿尤布家族继续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因为他的占领地的松散性，即他的占领地从未锻造成一个紧密统一的君主国，所以这常常使强有力的阿尤布王子很难超越其他王子。这些王子中的第一个便是萨拉·埃尔－丁的兄弟埃尔－阿迪尔·塞弗·埃尔－丁。他敏捷地消除了萨拉·埃尔－丁的儿子们的权力，并于1198年自己掌握了苏丹权力，把重要的公国分给他自己的儿子们。埃尔－阿迪尔满意于他兄弟艰难获得的征服地，与拉丁王国保持和平。新十字军在1197年备战完成，但它有限的军队指向北方。在北方，西顿和贝鲁特的占领为十字军提供了更多的喘息空间。1204年，残损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初以埃及作为其首要进攻目标，但从未接近埃及，因为那些把十字军运送到东方的威尼斯人使他们转向威尼斯的商业敌手君士坦丁堡，这种贪婪愚蠢的行为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灾难，削弱了欧洲东南部对抗穆斯林征服的壁垒。然而，阿尤布王朝对于攻击的解除非常高兴，用亚历山大城的商业特权奖赏威尼斯人。

1218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完全不同的事情。埃及再次成为首要进攻目标，而这次十字军彻底执行计划，旨在直接攻击阿尤布王朝的势力基地，放松了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控制，当然在埃及大地上获得了巨大财富。他们通过东三角洲入侵埃及，并围攻达米埃塔。在

这个关键时刻，埃尔－阿迪尔去世了，留下他的儿子埃尔－卡梅尔面对十字军。埃尔－阿迪尔早就任命埃尔－卡梅尔作为他在埃及的代理人了。埃尔－卡梅尔提供过分的和平条款，包括返还拉丁王国在约旦西部占领的所有领土，但十字军自信能够获得全部胜利，从而傲慢地拒绝了这些条款。

当达米埃塔于 1219 年 11 月落入十字军之手时，他们的傲慢似乎是正确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埃尔－阿提尔写道："埃及和叙利亚其他所有地区都在崩溃的边缘，每个人都害怕入侵者，日夜预测灾难。埃及人甚至因为害怕敌人而撤出埃及。"但十字军表演过火了。他们在内部争执中浪费了时间，发现自己被接踵而至的夏季尼罗河洪水切断进路，被迫撤离埃及。当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在 1229 年率领勉强的十字军到达埃及时，埃尔－卡梅尔以如此有效的外交作出反应，以至于这个最后的敌手也在没有武装战斗的情况下离去了。

1238 年，埃尔－卡梅尔的去世引起了第三轮和最后一轮阿尤布家族斗争，这场战斗以他的儿子埃尔－萨利·阿尤布变成埃及的苏丹并在叙利亚建立霸权而结束。埃尔－萨利·阿尤布早就在雇佣奴隶战士，这些战士被称为马穆鲁克（"被拥有的人"），他们主要是钦察土耳其人。他们被称为湖水马穆鲁克或河流马穆鲁克，因为他们的兵营驻扎在尼罗河的罗达岛上。他们迅速地证明自己是他迄今为止最可靠的战士。当埃尔－萨利·阿尤布身患重病时，他正逐步地把他分散的占领地合并起来。在这个脆弱时刻，十字军再次侵入埃及。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由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给予良好的财政支持和熟练操纵的战争。与他的前辈一样，路易九世把埃及视作进军圣地的关键，是可以用来进行军事活动的富饶根据地，也是十字军东征的大奖。达米埃塔可能得到防御，但它的卫戍部队和居民惊慌失措，并逃离城市。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瓦希尔称其为"史无先例的灾难"。前所未有的灾难因为苏丹埃尔－萨利·阿尤布于 1249 年死于曼苏拉的军营而复杂化。十字军征服埃及的时刻即将到来。

188

第十二章　马穆鲁克[①]

189　当埃尔－萨利·阿尤布去世时，他的遗孀控制了局势。她是一个专制的土耳其女性，名叫沙加尔·埃尔－杜尔。她与一位强有力的马穆鲁克合作，封锁她丈夫去世的消息，并冒用他的署名来签发敕令。这位强有力的马穆鲁克名叫法克尔·埃尔－丁。军队、政府和人们都被迫向埃尔－萨利·阿尤布和他的继承人埃尔－穆阿扎·图兰－沙宣誓效忠。这为图兰－沙从其所在的上美索不达米亚的遥远公国返回来赢得了时间。与此同时，她任命法克尔·埃尔－丁为首席司令，并把国家的行政管理委任给他。根据历史学家伊本·瓦希尔的记载，“苏丹的敕令按照她的命令、并用她的名字颁发，加盖她的国王印章”。伊本·瓦希尔明确地说明了沙加尔·埃尔－杜尔的地位：“从这以后，她就变成了整个国家有头衔的首领；国王印章以她的名字颁发……而 *khutba*[②] 以她的名字被宣布为开罗和整个埃及的苏丹王后。这是整个穆斯林世界史无前例的事件。”[21]

190　法兰西人在1250年2月进攻曼苏拉。战斗是激烈的；法克尔·埃尔－丁被杀死，但他的马穆鲁克战士英勇地完成任务，十字军的攻击失

① 9至19世纪穆斯林世界一支强大的军事种姓。——出版者注

② 在穆斯林清真寺的星期五祈祷期间，正在实施统治的苏丹的名字以这样的方式被提及。

败了。新苏丹图兰－沙到来，而十字军无法在曼苏拉阵前立足。他们撤退到达米埃特，结果遭遇了灾难；路易九世成为战俘。路易九世的王后不得不通过交出达米埃塔的方式与马穆鲁克谈判，并用巨资获得其丈夫的释放，更直接的说法是，用巨资赎回国王。十字军于 1250 年 5 月撤出埃及，但图兰－沙没有机会享受胜利，因为他被湖水马穆鲁克阴谋杀害，这是因为图兰－沙的马穆鲁克地位提高以后超过了湖水马穆鲁克，这令湖水马穆鲁克不满。湖水马穆鲁克也痛恨他对待沙加尔·埃尔－杜尔的残忍方式，而沙加尔·埃尔－杜尔是土耳其人的伙伴，或许也是杀害图兰－沙的阴谋策划者之一。他的谋杀标志着阿尤布王朝的结束和马穆鲁克在埃及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的开始。

因为沙加尔·埃尔－杜尔是女人，她不能独自掌控军队，一些边远领地的人们也拒绝认可她的统治，所以她嫁给了一个名叫阿伊贝格·埃尔－土尔库曼尼的马穆鲁克。但权力继续由沙加尔·埃尔－杜尔掌握，她控制着阿伊贝格。当阿伊贝格试图通过提高他的马穆鲁克的地位，并与另一个妻子结成婚姻同盟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时，沙加尔·埃尔－杜尔便于 1257 年 4 月把他杀死在浴室里。然而，一个小集团以他年轻的儿子为中心形成，几天以后，沙加尔·埃尔－杜尔自己也被杀死了。

处于领导地位的马穆鲁克运用阿伊贝格的儿子作为傀儡苏丹，操纵政权，这种方式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时期反复出现。库图兹一度占据了优势，他是阿伊贝格喜欢的马穆鲁克之一，他已经控制了国家的很多关键岗位。另一个外部威胁立即出现了。自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蒙古人就受到征服世界之梦想的驱动，骄傲地离开他们的家乡，蹂躏了中国、中亚、古罗斯和中欧很多地区。征服世界的梦想是非常有可能的。1255 年，在大可汗的兄弟旭烈兀的领导下，蒙古人入侵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并于 1258 年占领了巴格达，毁坏了城市，杀死了哈里发。因为的黎波里和安提俄克的十字军对蒙古人的支援，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也在下一年沦陷。埃及的征服是蒙古人的下一个目标。旭烈兀

派特使到开罗，向其发出可怕的最后通牒：

191　　以其他国家的命运引以为鉴，在面纱被撕碎、你们遭受痛苦、你们的错误令你们自食其果之前，把你们的权力交给我们。因为我们不会同情那些哭哭啼啼的人们，我们也不会同情那些抱怨的人们。你们已经听说了，我们已经征服了很多领土，净化了腐败的国土，杀死了大多数人……你们绝不会躲过我们的宝剑，绝不会从我们军队的恐怖中逃脱。我们的马匹在追赶敌人时快如闪电，我们的箭镞能穿透盔甲，我们的宝剑锋利如霹雳，我们的心似磐石，我们的人数如黄沙。要塞抵挡不住我们；军队与我们的战斗等于徒劳……如果你们抵抗，那么你们就会被毁灭。[22]

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些空洞的言辞，这是很多人明白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经受得住蒙古人的冲击。

但库图兹得到了叙利亚湖水马穆鲁克支派和其占主导地位的成员贝巴尔斯的强烈支持，选择抵抗。他通过把特使斩为两段并将其头颅悬挂于巴布·祖维拉城门之上示众的方式，回复了旭烈兀的来信。库图兹不等被攻击，便率领他的军队向北进军巴勒斯坦，摈弃拉丁王国的支持，并在基利波山附近的艾因加鲁特发现了蒙古人。不顾一切的战斗发生在1260年9月3日，结果是马穆鲁克完胜。尽管库图兹接下来不止一次被打败，但他重整旗鼓，把马穆鲁克集结起来，粉碎了蒙古军队，杀死了很多蒙古人。贝巴尔斯率领的马穆鲁克追击军队把幸存者驱赶出了叙利亚。我们能够注意到，蒙古人因为他们的领袖旭烈兀在他的兄弟大可汗去世以后离开战场而虚弱下来，而且他们是在距离他们的根据地非常遥远的地方战斗。即使如此，马穆鲁克的胜利是一次伟大的军事壮举；它也是决定性的，为马穆鲁克王朝赢得了北部叙利亚，使埃及从蒙古入侵的威胁中解放出来。

当库图兹把叙利亚诸多公国分给马穆鲁克埃米尔(amir)时，他忽

略了贝巴尔斯，尽管他曾许诺把阿勒颇给予贝巴尔斯。贝巴尔斯已经在艾因加鲁特的战斗中使自己声名鹊起，他也因为参加了在达米埃塔对抗十字军的战斗而声名远播。这再次激起了湖水马穆鲁克内部的派系敏感性，他们痛恨库图兹和他的派系。当库图兹正在狩猎之后返回埃及时，贝巴尔斯和一些随从将其杀死。于是，贝巴尔斯获得了苏丹职位。他的统治是马穆鲁克历史上和传说中杰出的篇章之一，因为《贝巴尔斯的生活》(*Life of Baybars*)变得极为流行，并被职业朗诵者演说了几个世纪。 192

在返回去叙述马穆鲁克统治时期的政治史之前，我们应该谈论这个军事精英的巨大组织，这个军事精英在接下来几百年的时间里控制埃及。应召入伍的士兵是奴隶，这些奴隶从奴隶市场上被购买而来时还都是孩子。这些奴隶市场经常在黑海地区，超过了伊斯兰世界的范围。代理商把他们转运到埃及，他们在这里被各个马穆鲁克家族的族长或者苏丹再次购买。苏丹常常本身就是一个马穆鲁克，并领导着最大的马穆鲁克家族。年轻人变成了马穆鲁克家族的成员，接受伊斯兰教教育，获得战争艺术的训练，尤其是马术训练。在他的教育结束时，当他成年时，他获得自由，通常继续在他的前主人对骑士的训练中服务；后来，他能够开始构建自己的家族，并变成埃米尔或军队司令，他获得权力的基础在于他能够购买多少马穆鲁克。

马穆鲁克家族的成员骄傲地展示和佩戴他们的身份徽章，这导致他们对自己家族的强烈忠诚和对其他家族的敌意。埃米尔塔兹的房屋位于伊本·图伦清真寺附近，后来得到修复，提供了一个大马穆鲁克家族的极好事例。塔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苏丹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所购买。苏丹使他变成了 *saki* 或称持杯者。塔兹获得苏丹的喜爱之后，也获得了自由，并迅速地晋升，最初是十个马穆鲁克的埃米尔，最后是一千个马穆鲁克的埃米尔，成为埃及六个最重要的埃米尔之一。像塔兹这样强大的马穆鲁克可以通过这种引人注目的制度控制国家的最高职位。这种制度能够使一个男孩从奴隶上升到如此高的地

位,以至于他可以拥立或废除苏丹,甚或自己就变成苏丹。昂贵的马穆鲁克生活方式受到广泛赐赠的支持,这种赐赠被称为 *iltizams*。这些赐赠本质上是一种包税制。这些获得土地作为奖赏的人们被称为 *multazims*,几乎控制了土地和土地上的产品。这当然给农民造成了沉重负担,当越来越多的勒索被强加在农民身上时,他们就变得更不幸了。埃及土地上的大多数税收都归于马穆鲁克。

这种独一无二的制度的关键方面在于它并不是世袭的。几乎所有成员最初都是同代人。马穆鲁克的儿子们或许某一天也被给予好的政府职位,但他们不能进入马穆鲁克阶层,也根本不能被接受进马穆鲁克寡头政治群体。唯一变成马穆鲁克的方式是作为奴隶被购买,然后通过一个马穆鲁克军事家庭晋升。当一个马穆鲁克死亡,或从政治场景中消失时,他的遗产被再分配给其他马穆鲁克。

193

在马穆鲁克帝国的最强盛期,它是一个可怕的势力。比阿尤布帝国更连贯,马穆鲁克帝国的偏远行省由那些向苏丹负责的总督统治,而不是由那些具有模棱两可的忠诚和权力关系的自治王子统治。内部事务因为革新的司法制度而缓和。一种复杂的外交仪式使埃及保持着与东方远至金帐汗国、西方远至阿拉贡、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城市国家以及海上王国的关系。拜占庭获得了认真的外交关注,而与十字军王国的关系需要持续变动,因为休战和约不得不持续重复谈判确定。马穆鲁克通过对重要贸易路线的控制,从商业中富有起来。派往努比亚的远征军重新确立了埃及对那里的控制,维持了 *baqt*(巴卡特),即年度奴隶贡赋,也就是说,努比亚必须每年向北方的埃及缴纳奴隶作为贡赋。

马穆鲁克也通过精明的宗教政策提高了他们的威望。除了恢复哈里发政权,他们还与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保持特殊关系。开罗朝圣队已经是年度麦加朝圣的主要成员之一;当时马穆鲁克又获得了给麦加制作和赠送黑色罩幕(*kiswa*)的特权,黑色罩幕是覆盖卡博(Kaaba,建于麦加的伊斯兰教寺院内的圣堂)的门帘,卡博是朝圣的焦点。马穆鲁克苏丹们获得了这样的头衔,即"两个威严的避难所的仆人"。马穆鲁克

苏丹们也鼓励伊斯兰教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即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思想，并在王国范围内赠予苏非派很多女修道院。然而，马穆鲁克王朝对基督教和犹太人的政策比以前政权的政策更苛刻。

苏丹贝巴尔斯(1260—1277 年)的兴起是一个经典的马穆鲁克成功的故事，从他作为男孩奴隶被购买，到他在一个军事家族里接受训练，再到最后登上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顶点。他在艾因加鲁特打败蒙古人和谋杀了库图兹之后，于 1260 年 11 月 25 日在开罗登上王位。依靠他在湖水马穆鲁克中的坚实基础，他保持了与重要马穆鲁克家族要人的良好关系，这些马穆鲁克要人担任着重要的高级行政管理职务。1261 年，他在开罗恢复了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政权，安置一位在巴格达大屠杀时逃出来的阿巴斯王子就任哈里发职位。这个职位不再有重要政治权威，而是保持重要的特权，它对于认可和推行司法事务是有用的。哈里发的出现赋予政权以更多的合法性。贝巴尔斯的大清真寺建于 1266—1267 年，是北部开罗卓越的纪念物。

194

贝巴尔斯特别关心叙利亚。在叙利亚，蒙古人迫害的阿巴斯公国当中最后一个已经落入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控制之中。这些区域不得不被组织起来。蒙古人的威胁已经到达了这里，因此他不得不准备对抗蒙古人，但贝巴尔斯的主要力量在于对抗十字军国家。这些十字军国家几乎没有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强大，他们缺乏有能力的领袖，因大量权限而分裂开来；除了十字军的政府，诸如圣殿骑士团这样的重要十字军组织嫉妒地保卫他们的特权。首要的是，十字军国家缺乏来自欧洲的稳定的战斗人力的供给，欧洲对十字军的人员补充是断断续续的。贝巴尔斯表现出了堪与萨拉·埃尔－丁的将军才能媲美的能力，几乎每个季度都与十字军作战，获得了系列极好的战绩。他的袭击到达了阿克里城墙。1268 年，他攻占了安提俄克；1271 年，他攻占了所有十字军城堡之中最强大的一个，即克拉克骑士城堡。

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里，贝巴尔斯把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创造苏丹职位的世袭制，但他认真地继承计划仅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之后他的

儿子们就被一个老马穆鲁克同僚边缘化了，这个人是另一个钦察土耳其人，名叫卡拉乌恩。他自己也拥有相当于苏丹权威的头衔。卡拉乌恩一旦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不是容易的任务——他就会追求一种与贝巴尔斯的政策类似的政策。他被严重地卷入叙利亚的事务之中，他在这里也不得不警惕蒙古人的威胁死灰复燃。通过 1281 年 10 月在西姆斯打败了蒙古人对叙利亚的第二次入侵，他同样转向十字军掌握的领地。十字军王国当时比以前更弱了，因拉丁王国的王位之争和其他遍及整个正在衰落的十字军体系的分歧而分裂。当卡拉乌恩于 1289 年 4 月占领的黎波里城时，十字军掌握的唯一一个重要城市是阿克里。当他在 1290 年 11 月去世时，他已经在聚集军队准备攻打这个城市。

195 与贝巴尔斯相像，卡拉乌恩想在他的家族内建立继承关系，而他在这方面做的更有效一些。他的儿子埃尔－阿什拉夫·卡利尔和平地继承了王位，完成了他父亲的军事目标，征服了阿克里，清除了十字军在沿海保有的据点，彻底把十字军驱逐出大陆，但他变成了宫廷仇恨和马穆鲁克竞争的牺牲品。他的父亲已经开始了一种输入切尔克斯人马穆鲁克的实践，埃尔－阿什拉夫·卡利尔推广了这种实践。这些人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布尔吉（“城堡”）马穆鲁克，因为卡拉乌恩把他们安置在大本营的城堡里。湖水马穆鲁克主要是土耳其籍的，仇视布尔吉马穆鲁克的出现和苏丹对他们的宠爱。当 1293 年 12 月埃尔－阿什拉夫·卡利尔被一个不满的湖水马穆鲁克大贵族杀害时，湖水马穆鲁克和布尔吉马穆鲁克之间的一场暴力冲突便随之发生，解决方式是把去世苏丹年幼的同父异母弟弟推上王位。

接下来的埃尔－马利克·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的统治持续了几乎半个世纪之久，受到两次篡权和复位的干扰。在其统治的第一个阶段，他是一位傀儡苏丹；在第二个统治阶段，他是一位真正的独裁者。他在统治初期的地位不稳固由 1294 年 12 月他的废黜展示出来，这发生在他刚刚统治了一年的时候，代替他的人是一位湖水马穆鲁克的埃米尔，后者的统治在两年以后马穆鲁克派系之间的斗争中被推翻。这

个最新的统治者于 1299 年 1 月在祈祷中被谋杀之后，40 岁的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被从城堡中带出来，他已经在这里被仔细地储备了很长时间，被作为权宜之计的苏丹而重新任职。王位之后的力量是两个难以联合的马穆鲁克埃米尔，即萨拉和贝巴尔斯・埃尔－伽什尼基尔，一者代表湖水马穆鲁克，另一者代表布尔吉马穆鲁克。

然而，国家仍能有效地运转，1303 年蒙古人最后一次重大威胁的失败说明了这点。当萨拉、贝巴尔斯・埃尔－伽什尼基尔和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率领的马穆鲁克军队遇见并毁灭了蒙古人的军队时，蒙古人正向大马士革进军。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获取实际权力的企图被萨拉和贝巴尔斯・埃尔－伽什尼基尔一再破坏，他心灰意冷，于 1309 年放弃王位，撤退到一个要塞里准备有效地复位。贝巴尔斯・埃尔－伽什尼基尔代替他坐上了苏丹之位。但对埃米尔的支持正在崩溃，派系斗争继续，尼罗河的系列低水位和瘟疫导致了普遍困苦，这使得时年 25 岁的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能够在 1310 年 3 月第二次夺回苏丹之位。贝巴尔斯・埃尔－伽什尼基尔在下一个月出现时被扼死。萨拉试图与复位的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达成协议，但他被捕了，并于 8 月被处死。在清除马穆鲁克的军事组织时，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逮捕了 22 位埃米尔，并提拔他自己的 32 位马穆鲁克担任埃米尔职位。两年以后，他提升了 46 位马穆鲁克。

196

从 1310 年第二次复位直到 1341 年结束，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的统治异常地摆脱了外部问题。这使他能够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内部事务的处理，尤其财政改革。然而，他恢复的统治受到了一波严重的反基督徒暴力事件的损害，这些事件于 1321 年席卷了开罗。很多基督徒被屠杀，他们的教堂被劫掠和毁坏。科普特人被从政府岗位上驱逐，诸如禁止基督徒骑马和需要基督徒穿戴特殊衣服的禁止法令得到加强。很多科普特人因不愿受迫害而皈依伊斯兰教。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是他的后代，保持卡拉乌恩家族世袭统治达几十年之久，但这些苏丹中没有一

个掌握真正的权力。第一个继承者仅仅统治了几周时间,就被一个较年轻的弟弟代替,后者又被另一个弟弟代替,这第三个继承者也被废黜。这样,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的三个儿子被拥立和罢黜苏丹职位,而且最终都被杀害。后来还有更多的继承者出现,但都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在卡拉乌恩去世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有二十多位苏丹进行统治,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也几乎有同样多的苏丹在统治。权力几乎总是在马穆鲁克大贵族的手中,他们有时加冕为苏丹,但经常通过傀儡苏丹进行统治。

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的一个继承者,即他的儿子埃尔-纳西尔·哈桑展现了一些能力和抱负。当 1347 年他的前辈同父异母的兄弟埃尔-穆扎法尔·哈吉在不成功的对抗马穆鲁克埃米尔的斗争中失败而被杀时,他变成了苏丹,年仅 11 岁。当苏丹哈桑试图在 1351 年 8 月宣称自己的权力时,他被废黜,三年以后通过与埃米尔达成协议而恢复王位。然而,苏丹哈桑这次决定实施真正的权力。他有效地运用他的家族马穆鲁克,与持不同政见的势力进行战斗;他镇压了那个躲在王位背后的强大的马穆鲁克;他任命马穆鲁克的后代出任最高军事和行政职务,这是前所未有的运动。他辩护道:"这些人是可靠的,受我的指挥。我想让他们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当我想取消他们的职务时,我能够如此容易地办到。他们也友善地对待我的臣民,并理解规章制度。"苏丹哈桑预料到马穆鲁克大贵族必然会进行反对;即使如此,他的支持者在一次战斗中被打败,他也在 1361 年 3 月被一个名叫雅尔博哈的马穆鲁克杀害。雅尔博哈在苏丹哈桑的家里长大成人,他结束了这次调整性的改革实验和马穆鲁克帝国的发展。

苏丹哈桑的第一个统治时期与洪水般的黑死病处于同一时期,这场瘟疫于 1347 年侵袭埃及。埃尔-马克里兹记述了黑死病的出现:"一艘船到达亚历山大城。在船上有 32 个商人,总共 300 个人,这些人里面有贸易者和奴隶。几乎所有人都死了。除了四个贸易者、一个奴隶和大约四十个水手,船上没有其他任何活人了。这些幸存者死在亚

历山大城。”

这是腹股沟腺炎瘟疫，是一种高度传染、杀人迅速的疾病，来自中亚，依靠跳蚤和啮齿动物的共生来传播。在一年之内，它就以令人惊骇的死亡率席卷整个埃及。在开罗，一天之内就有 1000 人死掉。城市被描述为“空旷的沙漠”，一个人从城市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不会看到另一个人。到 1349 年黑死病在埃及减轻时，埃及国家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于黑死病。腹股沟腺炎瘟疫的造访变成了埃及反复发生的特征。埃及人口突然减少。在 15 世纪，埃及就至少爆发了九次严重的瘟疫。埃及最后一次重大瘟疫与以前一样致命，发生在 1834—1835 年。

灾难性的疾病反而产生了相反的作用。苏丹哈桑得以构建伊斯兰世界最突出的建筑物之一，即城堡脚下的巨大伊斯兰大学。建筑物部分是用吉萨金字塔的石头建筑的，用其他优质石灰石做衬里。建筑物完全体现了高超的工艺，尽管装饰从未完成。考虑到 1356 年和 1361 年之间这段时间的条件，它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建造，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入口的第四塔门在 1361 年倒塌，死了几百人。其他三个塔门中的一个在 1659 年倒塌，而圆屋顶在一年以后倒塌。根据埃尔－马克里兹的 198 记载，伊斯兰大学的费用是巨大的，但随着死亡税的征收和对无继承者的地产的没收，金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入国库。

除掉苏丹哈桑之后，雅尔博哈在傀儡苏丹背后进行统治。这些傀儡苏丹当中的第二个是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的孙子埃尔－阿什拉夫·沙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父亲从来就不是苏丹），正是在他有名无实的统治期间，埃及遭受了十字军最后的打击。1365 年 10 月，塞浦路斯的十字军国王和耶路撒冷的名誉国王（即鲁斯格纳的彼得一世）率军攻打了亚历山大城。埃尔－马克里兹鲜活地描述了十字军攻占亚历山大城时造成的死亡和毁坏：

> 法兰克人用宝剑刺杀人们。他们抢劫能找到的一切，抓走很多囚徒和俘虏，焚烧很多地方。在罗塞塔大门碾压致死的人数无

法计算。……因此他们从星期五上午到星期日清晨不停地杀人、抓获囚徒和俘虏，抢劫财物和焚烧建筑物。[23]

但亚历山大城的这支十字军的目标还不清楚，因为仅仅八天以后，在雅尔博哈领导的援军从开罗到达之前，法兰克人就把他们的战利品和1000个俘虏装上他们的船只，离开了埃及。雅尔博哈于来年10月份的另一轮党派战斗中被杀死。

1382年11月，当切尔克斯人马穆鲁克的埃米尔巴尔库克废黜了卡拉乌恩王朝的最后一位代表埃尔－萨利·哈吉，并攫取苏丹权位，开始了布尔吉马穆鲁克统治时代之时，卡拉乌恩王朝结束了。他的地位最初是不稳固的，他遭到强有力的埃米尔们的围攻，并于1389年6月被一些支持埃尔－萨利·哈吉的埃米尔废黜。但他们的联合很快就解散了，而且巴尔库克在下一年年初便重新当上了苏丹，允许埃尔－萨利·哈吉在城堡中享有舒服的退休待遇。巴尔库克这次细心安置支持他的埃米尔，并能够在1399年和平地死去。

与其他马穆鲁克苏丹一样，巴尔库克也希望建立一个王朝，但他和199 其他具有相似意向的布尔吉苏丹都没有实现哪怕名义上的继承，他们的湖水马穆鲁克前辈们曾经实现了这种继承。尽管巴尔库克从主要埃米尔和国家重要官员那里获得了支持其儿子的庄严誓言，但未成年的苏丹埃尔－纳西尔·法拉很快就在持续进行的马穆鲁克派系竞争中变成了人质。当埃尔－纳西尔·法拉成长到足够成熟并表现出独立的迹象时，他就被废黜了，并被其婴儿年龄的弟弟取代，后者以埃尔－马利克·埃尔－曼苏尔的头衔进行统治。埃尔－纳西尔·法拉后来要求归还王位，但从来不能控制叙利亚那些难以驾驭的马穆鲁克大贵族，并最终失去了他的妻子，后者尽力把这些大贵族拉拢到一起。他的继承者是另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后者接下来被王位背后的权力人物代替，这个人决定自己登上王位。这个篡权者是一位名叫谢卡的马穆鲁克，试图建立一种王朝继承关系，但他于1421年1月去世，14个月以后，巴尔

库克的一个马穆鲁克巴尔斯贝·埃尔－扎赫利攫取了苏丹之位。

巴尔斯贝的统治被称为“马穆鲁克苏丹政权的兴旺的晚期”。幸运的是，埃及免于骇人听闻的破坏，这种掠夺是由帖木儿领导的蒙古利亚高原的土耳其人造成的。他们蹂躏了西亚的很多地区，在 1380 年和 1405 年之间的 25 年时间里，他们留下的是毁灭和堆积成山的人头。中亚、北印度、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城市都落入了帖木儿的军队之手，并被毁坏。在埃尔－纳西尔·法拉的统治时期，他攻占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但他没有向南攻打埃及，而是往西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并在穿越亚洲攻打中国之前蹂躏了土耳其人的心脏地区。北叙利亚遭受了帖木儿入侵的致命打击，但马穆鲁克政府很快便在那里恢复秩序。

因此，在巴尔斯贝统治时期，马穆鲁克王朝很少受到外来威胁，国家也相对摆脱了内部叛乱。马穆鲁克埃及在海上仍然是强大的，有利可图的红海—印度洋贸易正在扩展，巴尔斯贝在红海的积极政策促进了它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加强了马穆鲁克王朝作为圣城保护者的传统角色的声望。巴尔斯贝几次派遣远征军，成功地攻打塞浦路斯的其他十字军前哨阵地，海盗继续从这些前哨阵地威胁马穆鲁克商业。塞浦路斯的十字军国王詹努斯被俘虏到开罗，新塞浦路斯国王向巴尔斯贝宣誓效忠。与其他布尔吉苏丹一样，巴尔斯贝试图建立一个王朝。但也与他们一样，他也失败了。巴尔斯贝于 1438 年 6 月 7 日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优素福仅仅统治了三个月。之后，另一个巴尔库克老兵柴科马克·埃尔－扎赫利篡夺政权，并作为埃尔－马利克·埃尔－扎希尔进行统治。

马穆鲁克时期是埃及艺术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之一。马穆鲁克在艺术领域的推动作用最明显的表现是建筑，因为马穆鲁克苏丹几乎在他们的时代自始至终地构建引人注目的建筑物。苏丹贝巴尔斯是中东地区中世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者；埃尔－纳赛尔·穆罕默德几乎是一样多产的建筑者；很多大马穆鲁克埃米尔也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建筑，以验证其权力和财富，总是竞争以超越彼此。这种竞争的一个

辉煌结果是建起了一个马穆鲁克埃米尔库尔库马斯的坟墓和陵墓，位于开罗的东部公墓。库尔库马斯在苏丹埃尔－古里统治时期晋升到高位。沿着东部公墓的中轴线行走，或者沿着巴布·埃尔－浮图和巴布·祖维拉之间南北走向的古老主街道走下去，你会看到最主要的马穆鲁克的纪念物，这些纪念物一个接着一个。马穆鲁克尖塔变成了标准的埃及建筑物，马穆鲁克建筑方面的其他发明也是这样。马穆鲁克时期在诸如微型绘画这样的其他媒体、金属制品、玻璃器皿、陶瓷制品和纺织品等不太令人难忘但同样灿烂的成就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

马穆鲁克王朝是学术的强大赞助者。中世纪伊斯兰教的最伟大历史学家伊本·哈尔敦(1332—1406 年)是一位突尼斯当地人，但他在开罗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在开罗，苏丹巴尔库克使他成为首席卡迪(*qadi*)。伊本·哈尔敦曾写道：“人们能够想象的东西总是超过其看到的东西，因为想象的空间更大；但开罗除外，因为它超过人们能够想象的一切事物。”伊本·哈尔敦已经看过了世界上太多的地方，以至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开罗明显令其惊讶不已：

> 开罗，世界大都会，宇宙的花园，各民族的聚集地，伊斯兰教的心脏，权力的所在地。这里有大量宫殿，每个地方都有密密麻麻的伊斯兰学校和苏丹陵墓，而其学者就像耀眼的恒星那样大放异彩。城市沿着尼罗河两岸延伸，尼罗河是天堂之河，是天堂雨水的容器，它的水平息人们的口渴，给人们带来充裕的财富。我漫步在城市的街道上：街道挤满了人，市场上充满了各种商品。[24]

201

伊本·哈尔敦生活在混乱的 14 世纪，在西方最远旅游到了收复失地运动时期的西班牙，在东方最远旅游到了帖木儿(他在大马士革陷落之前遇到了帖木儿)的宫廷。伊本·哈尔敦着迷于他所看到的正在战斗的军队，并试图解释他们：“当宇宙被颠倒过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询问自己，这是否正在改变宇宙的本性，是否在世界上会出现新的创世和新

秩序。因此，今日，我需要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够阐明世界、国家和人们的状态，能够展示信仰和风俗方面已然发生的变化。"[25]

伊本·哈尔敦的循环历史观与其广阔的视角，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尤其在西方史学界更是如此。在他最伟大的著作《穆加迪玛》（*Muqaddima*）中，他解释了沙漠中的人们怎样浸透着 *assabiya*，即一种群体力量感，这种感知使他们能够征服和统治更文明的民族，而这些文明民族已经在他们的都市生活方式中衰老了。但过程正在进行中：一旦征服者建立了文明生活方式，那么他们接下来便屈从于文明，并丧失他们的群体力量感，使他们易于受到一个新的更勇猛民族的征服。这种过程是无法停止的，也是永无止境的。

尽管在中世纪时代到埃及旅游的人减少了，但一些勇敢的流浪者来到埃及，并记录下了他们看到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朝圣者也偶尔在去往圣城的路上留在埃及观察一番，就像智者伯纳德和他的两个同伴在 870 年做的那样。他们被投入开罗的监狱里，并且不得不用金钱赎身。即便如此，伯纳德还是成功地游览了埃及，他得出了这样的推断，即吉萨的金字塔是约瑟生活在埃及期间建筑的谷仓。图德拉的本杰明从 1165 年至 1177 年在埃及逗留，生活得更好一些，甚至一度变成了维西尔。因为他从南方穿越阿比西尼亚而到达埃及，所以他是第一个描述每年由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季节性降雨怎样导致的泛滥。在他看来，吉萨的金字塔是依靠魔法建筑起来的。

阿布德·埃尔-拉提夫是一位阿拉伯医师，来自巴格达，后来变成了开罗的哲学和医学教师，大约 1200 年写作了一部书，这部书因缺乏圣经偏见而引起注意。到那时为止，对吉萨的掠夺非常发达；很多小金字塔的石头被掠夺，用于建筑开罗的城墙；但阿布德·埃尔-拉提夫注意到，大金字塔还没有失去它的覆层石头，还覆盖着"用古代字母书写"的文字，这是他不能阅读的文字。当阿布德·埃尔-拉提夫看到斯芬克斯像时，它几乎仍完整无缺，并仍能展示出在古代就覆盖在它上面的红色涂料。拿破仑的士兵常常被错误地指责毁坏了斯芬克斯的鼻子，202

或许是阿巴德·埃尔－拉提夫参观之后不久被毁掉的。

埃及也是所有中东旅游者的最长路线的一部分，摩洛哥的伊本·巴图塔就于1326年来到埃及。伊本·巴图塔写道："我最后到达了开罗。开罗是城市之母和暴君法老的所在地，广阔区域和富饶土地的女主人，无数美艳绝伦、光彩壮丽的巨大建筑物的所在地，来往行人的聚集地，弱者和强者的停留地，但人群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湃，她限于自己的规模和容量而不能接收如此多的人群。"[26]

中世纪旅游者的著作在西方获得了最大声誉，但这可能完全是14世纪一位法国作家的虚构小说，他从未离开图书馆去其他地方旅游。这本书的英文译本是《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The Voiage and Travaile of Sir John Maundevile, Kt.*），因为它被广泛阅读，并被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就金字塔的功能而言，使用笔名的约翰爵士坚持圣经观点。"它们是用石头建造的，体现了石匠的精湛手艺。其中两个是非常巨大的，而另一个则没那么大。每个金字塔都有一个门，从这里可以进入里面…… 里面充满了大毒蛇。在上面…… 和外面，有很多神圣语言的铭文。巨大的人站在那里，它们是大神的雕像，它们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对所有来到面前的人们诉说着什么。它们是约瑟的谷仓。"[27]

巴尔斯贝的统治之后，马穆鲁克帝国衰落的迹象变得明显了。最具预兆性的一件事是马穆鲁克制度本身的崩溃。年轻的马穆鲁克曾经严格地接受所有战争艺术的训练，特别是骑兵战术的训练，而且直到他们完全掌握了这些艺术，他们才能够得到提拔。这些训练被废弃了，而作为马穆鲁克士兵的素质也相应地下降了。然而，甚至当他们忽略了他们的传统力量时，他们还拒绝认可技术正在多么严重地改变着战争的本质。他们逐渐地采用加农炮，藐视作为普通步兵之武器的手枪，认为步兵比不上精英骑士。而且，他们的原则正在崩溃，这使他们成为不可靠的士兵，这对于社会和经济秩序来说都是危险的。马穆鲁克骑兵的暴乱经常发生；店铺和杂货店被抢劫；公共安全在降低。

自从黑死病以来，那种支持马穆鲁克制度的经济已经处于越来越危急的状态。腹股沟腺炎瘟疫的反复发生阻碍了人口的恢复。灌溉体系衰落了。国家收入急剧下降。在1215年，埃及的土地税收入是九百多万第纳尔(dinar)；到1517年马穆鲁克时代结束的时候，它们已经锐减到了不足两百万。除了毁坏了马穆鲁克政权的经济基础，瘟疫也夺去了大量马穆鲁克的生命。无论因为什么，16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的前夕与马穆鲁克帝国的伟大时代相比，马穆鲁克人口减少了近一半。

另一个对马穆鲁克帝国经济的严重打击发生在15世纪末，葡萄牙人在这时发现了环非洲的海上航线，使欧洲与印度、远东甚至非洲东海岸直接联系起来，破坏了马穆鲁克帝国在红海有利可图的贸易，降低了埃及作为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商业枢纽的重要性。在几年之内，葡萄牙就威胁到了马穆鲁克在红海内部的海上地位，仅仅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及时援助下，马穆鲁克帝国才能够阻止欧洲闯入者。

晚期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之中最有趣的是凯特贝(1468—1496年)，这部分上因为他优美的建筑学叙述，但主要因为与他之前的大多数前辈不一样，他不是短命的，统治了近三十年。然而，没有和平年份，因为马穆鲁克的行为越来越恶劣，而凯特贝从未能充分控制他们。乡村变得越来越无序，贝多因部落攻击定居地区，毁坏这些地区的生产力，甚至偶尔还袭击了开罗市区。当大规模的部落叛乱在上埃及爆发时，政府的军事反应更像是惩戒性的远征，而非维护法律和秩序，而这只能导致形势更加恶化。凯特贝的亮点是他的建筑项目。他的建筑项目的杰作和伊斯兰建筑的珍品之一便是他于1472—1474年在开罗的东部公墓为自己建筑的陵墓。但这样昂贵的建筑物可能进一步加重了已然过度紧张的经济负担，而且凯特贝长期统治的表面稳定是虚假的，因为在接下来的同样长的时间里就更替了五位苏丹。

204

1496年凯特贝去世时，中东有三个大国：马穆鲁克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在这三个帝国之中，马穆鲁克帝国是最虚

弱的,最多也只能与其他两者保持均衡。另一方面,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处于一个特别动态的阶段,恰恰在马穆鲁克帝国正在衰落的地区越来越强大。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帖木儿对其造成的毁坏中恢复过来,在四位能干的苏丹统治时期繁荣发展起来,并向外扩张。这四位苏丹分别是穆拉德二世、穆罕默德二世、巴耶塞特二世和赛利姆一世。1453年,他们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作为伊斯坦布尔变成了欧洲和中东最大的城市,并从扩张的贸易中积聚财富。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四方扩张他们的控制领地。对帝国财政制度的彻底审查使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直接控制了帝国的大多数税收。一支强大的海军建立起来,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也建立起来。军队以新操练技术进行训练,能够熟练地使用大炮和步枪。

考虑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主义,它与马穆鲁克帝国之间的冲突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之前,两者几乎没有什么敌对行为。事实上,从 1484 年开始,发生了一场断断续续的战争,但这次战争涉及的是边缘问题。凯特贝获得了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大量胜利,但缺乏决定性地打败他们的资源。1491 年,两者达成和平协定。最晚到 1511 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巴耶塞特二世派兵援助马穆鲁克王朝在红海对抗葡萄牙人。

事后看来,1516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转攻马穆鲁克帝国时,它几乎是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萨非帝国之间的争端引起的。萨非帝国鼓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部领地的叛乱,制造麻烦,所以赛利姆一世开始坚决攻打波斯人,战斗深入到了波斯人的领地。这严重破坏了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平衡,从而马穆鲁克苏丹埃尔-古里应萨非帝国的请求,派兵进入叙利亚帮助萨非帝国。赛利姆一世当时正准备与萨非帝国进行另一次战斗,决定不能留下他的右翼暴露于这种威胁,并攻打马穆鲁克帝国。马穆鲁克军队根本无法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相抗衡。奥斯曼土耳其人在组织、纪律、数量和装备方面都占优势。由于马穆鲁克等级内部的背叛,他们在 1516 年 8 月 24 日阿勒颇以北的马里·达比克

战役中溃败。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不战自降。

埃尔-古里在马里·达比克战役中遭受了致命的中风打击。仅仅在面对困难的情况下，开罗的马穆鲁克大贵族们劝服埃尔-古里的外甥图曼贝继任苏丹之位。脆弱的新苏丹除了希望赛利姆一世满意于他在叙利亚的征服并继续进攻萨非帝国，别无他求了；但在很多有叛意的马穆鲁克的鼓励下，赛利姆一世继续南进，攻入埃及，未遇任何抵抗。图曼贝在开罗城外进行了一场抵抗，但被打败。他逃跑了，在吉萨被再次打败，并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1517 年 4 月 14 日，他被吊死在巴布·祖维拉城门上。行刑的绳子断了两次。直到第三次努力，行刑才得以完成。马穆鲁克苏丹在埃及的统治时代结束了。

第十三章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

207　在大约四百年的时间里，埃及，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行省。在描述埃及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埃及的历史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也与不幸的结果密不可分，即埃及的历史似乎常常不是关注的中心了，关注的中心已经从开罗转移到了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埃及的历史编纂突然中止，这种状况至少维持了一个半世纪。虽然在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的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传记作家大量涌现，但在伟大的阿布德·埃尔-拉曼·埃尔-贾巴尔提于18世纪末出现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学家。一些档案明显源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这些档案不能代替地方史的细致与直接。直到相当近的时候，早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埃及史才获得现代历史学家们的注意。

然而，有一点是清晰的，即埃及保持了自身的独特性，甚至在1517年以后也这样。它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内被以独特的方式统治，这种制度有特殊的能力来调节它对不同民族的束缚，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早就意识到埃及需要特殊对待。208　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赛利姆一世掌控埃及以后，在这里逗留了几个月，但他几乎未对他的新行省进

行行政管理的改革。他根本未打算征服埃及,他也没准备管理埃及。赛利姆一世把叙利亚与埃及分离开来,并把一个组织严密的行省政府强加给了叙利亚。与叙利亚相比,埃及没有获得这样的重组。十分令人惊奇的是,赛利姆一世保留事物的原样,把埃及政府委托给了强有力的马穆鲁克埃米尔凯尔·贝,后者是在马里·达比克战役中背叛了其同伴的那些埃米尔之一。凯尔·贝把大国家保持在城堡里,不是作为正常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总督,而是作为赛利姆一世的傀儡和总督统治埃及。一旦埃及安全了,那么就有很多其他马穆鲁克堂而皇之地现身,被凯尔·贝很好地收编,并开始出任官职。在 1522 年,新苏丹苏雷曼一世雇佣马穆鲁克军队远征罗德斯岛,并称对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事实上,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埃及的非凡事情之一是,尽管它意味着马穆鲁克苏丹政权的结束,但它绝不意味着马穆鲁克的终结。相反地,马穆鲁克再次繁荣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一种新马穆鲁克制度盛行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的埃及。那些参加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马穆鲁克大贵族受到管制,但很多其他马穆鲁克大贵族泰然处之,不参加争斗,还有一些马穆鲁克大贵族积极地与入侵者合作,并得到了慷慨的奖赏。年轻的马穆鲁克继续被输入,主要从切尔卡西亚输入,尽管第二代马穆鲁克也变成了普通人,而且很多马穆鲁克继续保持庞大的军事家族。新马穆鲁克通过 iltizams 保持和增加他们对大部分国家收入的控制(借以确保很多土地财富继续浪费在派系斗争上),而且他们逐渐控制了埃及的很多最高政府职位。一方面,新马穆鲁克非常适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制度,既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服务,又为他们自己服务。但另一方面,他们有助于保持埃及在帝国内的独特性。他们很快就重新插入埃及的整个军事组织,并再次成为埃及最强大的势力。

赛利姆一世对凯尔·贝的信任似乎得到了如下事实的验证,即埃及保持着安静,而且凯尔·贝也在控制之中。然而,赛利姆一世去世之后的两年内,爆发了两次叛乱,这表明制度控制中的一些调节措施可能

209

是必要的。第一次叛乱是两个马穆鲁克埃米尔对抗埃及新总督的起义。这个新总督是帕夏穆斯塔法[①],是苏丹的妹夫。但其他马穆鲁克并没有联合叛乱,结果帕夏穆斯塔法能够运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卫戍部队打败他们,这些卫戍部队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埃及以后留在这里的。第二次叛乱不是由不满的马穆鲁克,而是由新奥斯曼土耳其总督帕夏阿赫迈德发动的。他希望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的大维西尔。帕夏阿赫迈德不满足于自己被任命到埃及,他在1524年叛乱,自称苏丹,并采用王室服装。他的叛乱是更难以镇压的。

非常明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需要做一些事情来处理这个麻烦的新行省,因此大维西尔帕夏伊博拉希姆于1525年来到埃及,强制颁行了行政管理法令。帕夏伊博拉希姆是一位特别能干的人,获得了苏丹苏雷曼一世的彻底信任。新组织的顶点是总督。他的住所建在城堡里,而且新的准则被制定出来,以保护政府部门的尊严。总督下面是国家委员会或国务会议(*divan*),总督必须有规律地与国务会议会晤。再往下,有大量长期存在的区域和地方机构,而且马穆鲁克苏丹政权的很多特征被混合起来。

在相应的经济重组中,奥斯曼土耳其人基本上把发号施令的高级职位保持在他们的监督之下,但把很多管理任务留给了诸如行会和宗教基金会或称 *waqfs*(宗教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宗教基金会的经济权力稳步增加,直到18世纪末大约20%的土地由宗教组织控制。马穆鲁克作为 *multazims* 继续控制其余很多土地。

少量秩序由总督的土耳其卫戍部队保持,这支卫戍部队主要是由那些来自较古老行省的士兵构成的。埃及继续作为外国的重要谷物生产区而发挥作用,部分土地税被运送到伊斯坦布尔,这有助于加强帝国的金库。埃及也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红海的军事行动、阿拉伯半岛

---

① 帕夏(Pasha)是古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的称号,置于姓名后面。——译者注

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保护提供了有价值的基地。葡萄牙人在红海持续不断地威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职责和威望当时落在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身上。

在帕夏伊博拉希姆访问之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埃及平静了几十年。帝国从美索不达米亚，穿越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深入到南欧，几乎到了维也纳大门口；穿越北非远达阿尔及利亚以西；还在阿拉伯半岛两侧的海岸扩张领地。苏雷曼一世统治了 46 年。在苏雷曼一世非常天才的领导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获得了新征服地，增强了军事力量，发展了政府组织。苏雷曼一世的收入比欧洲或中东其他任何君主的收入都更多。光辉的军事和政治成就与显赫的文化成就相媲美。 210

因为埃及只是这样巨大的帝国内的一个行省，所以它的很多资源都流入帝国国库，它再也不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理外部事务。它不再是剥削者，而是经常被剥削。然而，埃及不但没有停滞不前，反而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获得了全面发展，人口的增长反映了这一点。埃及人口从大约 300 万发展到 1798 年的 450 万。1798 年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的一个分水岭年份。埃及人口在 18 世纪有些降低，但这甚至还有积极的一面，因为较少的人口意味着较高的工资。埃及结合进庞大的地中海帝国，这给埃及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而非限制了埃及。纺织品是埃及的主要出口物资。甚至在政治动乱的 18 世纪，1700 年至 1760 年的几十年也是埃及经济繁荣的时代。

然而，进步是缓慢的，还伴随着大量倒退，并非整个埃及都步调一致地发展。亚历山大城继续其长期的衰落过程，直到它最终变成了一个小渔村。当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参观这里时，它就是一个小渔村。亚历山大城不再是大贸易中心，它从未从 1356 年十字军对它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亚历山大城的人口也遭受了腹股沟腺炎瘟疫的毁坏，但与开罗不同，它没有回弹到瘟疫爆发之前的水平。另一方面，开罗仍是东方的大城市之一，尽管它只是行省的省会。开罗被称为乌姆·埃尔－

敦雅，即世界之母。开罗人口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开始时或许不到十万，到 18 世纪末法国人入侵时翻了一番。

211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埃及的影响是微妙的，但他们有很长时间去处理，并留下了持久的印记。他们的人数从来就不大——最晚到 18 世纪末在埃及只有大约一万名奥斯曼土耳其人，只占总人口数量的一小部分——但土耳其人在习惯、衣着和整个生活方式方面都造成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很多土耳其单词进入埃及的口语系统，而到 19 世纪早期，土耳其语也成为埃及统治精英使用的很多语言之一。尽管土耳其人可能是傲慢的，并坚持地位和尊重，但他们不被视作外来占领势力，而是被视作埃及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首要的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以前，埃及早就有土耳其人出现了，因为很多马穆鲁克在血缘、语言和文化上就是土耳其人。甚至在今日，听到一个埃及人骄傲地称自己是土耳其人的后裔，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开罗都市结构影响的效果最初几乎察觉不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成了城市外在表现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伟大的马穆鲁克建筑者时代随着凯特贝和埃尔-古里而结束。大多数土耳其总督没有有效的长期统治和资源去继续马穆鲁克时期的建筑，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们是奥斯曼土耳其绅士，他们想在伊斯坦布尔留下他们的印记，而非在开罗，开罗仅仅是他们发展和奖赏道路上的一站。在开罗，完全以伊斯坦布尔传统建筑起来的首要纪念物是帕夏塞楠的清真寺，但它直到 1571 年才建成。尽管它在布拉克占据突出位置，它是任何来到开罗的人能够看到的第一批事物之一，但它几乎未对开罗的建筑产生任何影响。[①] 然而，逐渐地，更多的带有独特笔直尖塔的土耳其式清真寺被建筑起来，而且土耳其公共酒馆和学校的结合体(*sabil - kuttabs*)开始出现，结果在 1798 年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统

---

① 一座不太显眼但值得注意的较早期奥斯曼土耳其纪念物是帕夏苏雷曼的清真寺，1528 年在城堡里建筑。

治的近三个世纪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开罗建筑了77座清真寺和41个公共建筑(*sabils*)。但新马穆鲁克因素继续发展。随着马穆鲁克传统的继续，新马穆鲁克因素经常在这些纪念物、建筑和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开罗最著名的奥斯曼土耳其清真寺建筑于19世纪：城堡中的穆罕默德·阿里的清真寺。它已经变成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以至于它被描绘在埃及的货币上。土耳其人的家庭建筑巧妙地、逐渐地、更密切地进入城市，转变了关于内部空间设计和使用的观念。 212

也是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埃及时期伊始，咖啡被引入埃及。尽管咖啡遭到了宗教和政治权威人士的深刻猜疑，但这种新饮料在埃及迅速站稳脚跟，咖啡馆在开罗遍地涌现。这些咖啡馆变成了重要社会中心，人们在这里通过聊天和赌博消磨时间。咖啡馆还有音乐表演的平台，埃及人非常喜欢音乐表演，职业朗诵者通过叙述诸如《贝巴尔斯的生活》(*Life of Baybars*)和《阿布·赛义德的浪漫史》(*Romance of Abu Zeid*)这些人们非常喜欢的作品来吸引受奴役的听众。开罗变成了也门和欧洲之间咖啡贸易的中心，城市大旅馆中的大量人口都投身于咖啡豆的存储和转运。

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16世纪达到了顶峰，但在16世纪结束之前它就进入了长期痛苦的再调整阶段，而埃及也分享了这些困难。一旦处于技术和行政革新的最前线，帝国就开始遭受过分保守主义甚至反理智主义的折磨，而后者在实践中造成了大量负面影响。当军队和政府变得越来越庞大时，它就变得更难以控制，而中央政府也发现它越来越难以有效地动员帝国的资源。当世界贸易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时，帝国的商业开始急剧衰落。同时，通货膨胀席卷欧洲和中东，这是由银子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大量流入导致的。然而，当物价急剧上升时，薪水却在原地踏步。腐败和忤逆在政府内广泛蔓延。这或许不是同时发生的。大约在这时，埃及的奥斯曼土耳其总督在享受了几十年的风平浪静和有效管理之后，也遭遇了他们自己组织内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动摇了他们的权威，并最终颠覆了权力的平衡，向着新

马穆鲁克大贵族的方向倾斜。

213 总督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巩固他们在埃及的权威。在 1517 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确立与 1798 年法国人的到来之间的 281 年里,埃及有 110 位总督。只有两位总督统治了较长的时间,他们俩还都是 16 世纪的。他们要想有效地统治,尤其随着马穆鲁克势力的复苏,奥斯曼土耳其卫戍部队的忠诚便是重要的,但这种忠诚也在 1586 年表明被严重腐蚀了。士兵在这一年叛乱,把总督赶出政府,并将其逮捕。下一个总督的境遇甚至更糟糕,他在 1589 年面对一次类似的叛乱。他的几个扈从丧失了生命,而他的私人住处也遭到掠夺。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狂暴的士兵,他们在 1598 年和 1601 年又进行了两次叛乱。1604 年到达埃及的总督帕夏伊博拉希姆决定恢复秩序,从一开始就采取严格的准则,拒绝为士兵捐款,而后者是新总督的惯例。他们迅速暴动,并抢劫金钱。不管怎样,帕夏伊博拉希姆坚持他的严格政策,直到士兵们决定彻底铲除他。1605 年 9 月,他们冲入帕夏伊博拉希姆在舒博拉的避难所,杀死了他。

这种局面太糟糕了,结果在帝国的强烈支持下,下一个总督通过逮捕谋杀者的魁首并将其处死的方式强制执行某种司法措施。总督的进一步措施是禁止收取 *tulba*,即一些士兵从农民那里勒索的一种非法税收。当这些士兵在 1609 年起而反叛时,总督帕夏穆罕默德使自己与强大的新马穆鲁克大贵族结盟,用强大兵力镇压反叛,之后便强硬地惩罚他们。当帕夏穆罕默德于 1611 年离开埃及时,他相信总督的权威已经恢复了。事实上,形势恰恰相反,因为他仅仅在马穆鲁克的支持下取得胜利。总督们不能依赖他们自己基地的军事支持,从而被迫求助于新马穆鲁克大贵族,这些新马穆鲁克大贵族被称为拜伊(bey),他们作为整体称为“拜伊集团”(beylicate)。

尽管拜伊集团的成员没有特别的行政职能,但他们逐渐控制了埃及的很多最高官职,并通过这些官职实施对国家的财政和行政控制。这些拜伊中的每一位都有一支庞大的家族士兵。这些拜伊结合在一

起，就是到当时为止埃及最强大的军队。然而，在实践中，他们经常分裂，属于不同的派系。这些派系的敌对经常爆发成公开的战斗。随着 214 时间的推移，拜伊集团在哈里发的授权下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王权等级，由 24 位成员构成。到 17 世纪中期，总督们仅仅是有名无实的领袖。拜伊控制了国家。然而，拜伊通常与总督合作，而税务被提交给帝国金库。事实上，一位高级拜伊被委托以特别的职责，即把埃及的收入转运到伊斯坦布尔。

然而，任何总督脱离轨迹太远，他都会从拜伊集团获得严重教训。1631 年，帕夏穆萨在总督任期内获得了一次教训。当他在一次仪式中来到城堡时，他对一位名叫凯塔斯的强大拜伊感到恐惧，并将其杀害。拜伊们对自己成员的这次遇害非常愤怒，要求对这件事情进行清算。当帕夏穆萨拒绝时，他们便废黜了他，并任命一位较低级的官员（*qaimaqam*）代替他管理政府，直到新总督到来。通过对这种既成事实的默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允许这种事情变成标准程序，而拜伊们不止一次地运用这种程序废黜麻烦的总督。

17 世纪最强大的拜伊是瑞德万·拜伊·埃尔－法凯瑞，是最强大派系之一的领袖。他在开罗的关系网非常强大，也非常受欢迎，可能产生过称王的意念，但从未公开挑战苏丹。即使如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总督在一切场合里采取各种方式消除他的权力，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总督的最后一次尝试的结果是，正是总督自己而非瑞德万被废黜。当瑞德万在 1656 年去世时，他仍然掌握着权力，但他去世以后，派系战斗随之发生，并且比以前变得更极端了。

派系之间的仇恨如此不可调和，以至于总督帕夏穆斯塔法能够从 1660—1662 年开始利用这种仇恨，使一个派别对抗另一个派别，并有机会处死一些可恨的拜伊，当整体上削弱了他们的派系势力之后，再放逐其他那些拜伊。这些操纵性的策略使总督们能够在接下来 30 年里以某种程度的真正权威进行统治。拜伊控制了高级官职，像以前一样指挥军事远征，但直到 18 世纪初，他们才能够再次挑战总督的权威，因

为在这时他们经历了一次政治权力的重要复兴。

与以前一样,问题始于总督自己的军事组织内部。七个军团构成215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埃及的卫戍部队,他们之间的敌对已经积蓄了数年,最终于 1711 年 3 月爆发成了暴力冲突,这使总督处于无助的境地。当马穆鲁克派系之间潜在的敌对再次爆发时,拜伊们与他们的马穆鲁克家族一起陷入战斗。当 1711 年的大起义结束时,拜伊们再次统治埃及,而且他们拥有了庞大的宫殿、大片土地、大量马穆鲁克士兵和无数其他扈从。一个拜伊家族可能有几百个马穆鲁克、几十个女奴隶和妾、数十位其他职员。尽管他们的权力最终依赖于他们的军事能力,但大拜伊和埃米尔也通过广泛的赞助网络实施影响,这些网络渗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拜伊们之间,他们也为了 *riasa*(“领导权”)而竞争,这种领导权是与总督和其他奥斯曼土耳其官员形式上的权力相对的真正权力。

拜伊集团的复兴发生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几乎不能控制它的时候。在 17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帝国依靠军事力量保持自己的声誉。晚至 1683 年,帝国仍然能够围攻维也纳,并几乎占领这座城市,这一事实清晰地表明它仍然能够威胁欧洲。但到 17 世纪末,欧洲人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理解开始改变了。外部观察者评论帝国的内部堕落,注意到了它的虚弱,发现它正在走下坡路,夺取帝国很多占领地的时机成熟了。

在这个阶段,折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困难与稍后阻碍马穆鲁克埃及发展的那些困难极为相似。收入来源已经急剧下降;曾经恐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士兵已经变得懒惰和毫无纪律,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落后了,然而固执地抵制变化。除此之外,苏丹们也不理国家事务了,而大维西尔从未获得足够的自治权以制作政策摆脱闺房政治和宫廷亲信的阴谋。在帝国北部边境,野心勃勃的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决定扩大版图,消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影响,这使伊斯坦布尔无暇顾及埃及。

恢复了权力的拜伊集团的统治时期是一个政治动乱的时代。这个时代有时因一些个人获得优势地位的阶段而缓和，例如卡亚伊博拉希姆和卡亚瑞德万在1748年和1754年之间建立的二头政治。卡亚伊博拉希姆关注实际问题，而卡亚瑞德万支持政权，但把他的能量用于赞助 [216] 诗人、建筑宫殿和奢侈地生活。瑞德万的思想从来就没放在政治上，而伊博拉希姆去世之后不久，瑞德万就被暗杀了。

六年以后，一个更令人畏惧的优势是由18世纪最强大的拜伊阿里·拜伊·埃尔－凯拜尔建立起来的，他从1760年至1772年掌握了领导权。为了绝对地保证其权威，阿里·拜伊积聚士兵，压制敌对拜伊，并提升其随从。他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以便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他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反对，而且他的敌人实际上在1766年3月把他驱逐出开罗，但敌对者的联盟缺乏稳固势力，阿里在下一年的秋季返回开罗。

阿里·拜伊对他的反对者进行了彻底报复之后，废黜了总督。当另一个总督到达开罗时，他也将其废黜。他试着穿戴王室的服装，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铸造在硬币上以代替苏丹的名字，因为他梦想恢复马穆鲁克苏丹政权。他已经被称为“埃尔－凯拜尔”或“伟大者”了，他当时又展现了这样令人震惊的专制主义和野心，以至于他也逐渐被称为“布鲁特·卡潘”或“捉云者”。当麦加城哈桑王族的统治者被驱逐出城市，并向苏丹请求援助时，阿里·拜伊被授权指挥远征以恢复该统治者的权力。阿里·拜伊的确这样做了，但他也通过任命自己的马穆鲁克代替了吉达的奥斯曼土耳其总督，借以获得了圣城保护者的威望。他派遣两支远征军进入叙利亚，蹂躏了巴勒斯坦，并在1771年夏季占领了大马士革。

在这段时间里，阿里·拜伊在埃及、汉志和叙利亚建立三重基地的项目与挑战苏丹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似乎既是马穆鲁克帝国的回忆，也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未来帝国的预见，但他缺乏维持这种状态的权力基础。1771年结束之前，他的司令们突然撤出叙利亚，返回开罗。他

们这种行为的原因还不清楚,但这些原因或许包括他的将军们不愿意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另一次派系斗争的爆发,其中一个派系包括其自己家族的成员,他们的野心与他自己的野心发生了分歧。阿里·拜伊脚下的根据地崩溃了。尽管进行了顽强抵抗,但他于1772年4月被打败,并逃往巴勒斯坦。当他试图于1773年5月率领一支非常小的军队恢复权力时,他被打败,并被俘往开罗。经过一周的囚禁生活以后,他死在了开罗。

217

阿里·拜伊去世以后,拜伊们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随之发生,结果对于埃及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尽管政治骚动持续不断,但18世纪前半期的埃及是繁荣的。从1760年开始,派系冲突严重地迫害了埃及的经济。结果,艰难困苦伴随着系列极大的泛滥洪水同时发生,复发的瘟疫也破坏着人口,局面在18世纪最后20年严重恶化。

拜伊集团的政治史因为派系的转化太快而极为复杂,难以追述。幸运的是,在那个时代出现了一位具有伟大叙述技巧的埃及历史学家,他就是阿布德·埃尔-拉曼·埃尔-贾巴尔提(1753—1825年或1826年),他是关于1688年至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建立政权这段时期众多事件的杰出记录者。为了写作包罗万象的著作《杰出人物事迹溯源》(*'Aja'ib al-athar fi-l-tarajim wa-l-akhbar*),埃尔-贾巴尔提利用了各种原始史料,包括马穆鲁克的档案文献。关于最后几年,尤其与法国入侵和占领有关的事件,他也能够依靠自己作为参与者或观察者的经历。不幸的是,埃尔-贾巴尔提遭到了政府的厌恶,结果他的著作被查禁,直到20世纪才获得广泛注意。

起初的一小群但数量越来越多的西方旅行者继续进入埃及,并记录下埃及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三本特别值得注意的记录出现了,分别是詹姆士·布鲁斯、理查德·鲍考克和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诺登三人用英语写作的。与之后出现的那么多的著作一样,它们大篇幅地叙述古代遗物。就拿布鲁斯来说吧,他就是受到进一步发现古物的激发才去埃及的,他是动身到埃及寻找尼罗河资源的第一批人之一。但是,

这些著作几乎未对那个时代的普通大众的想象产生影响，因为没有轰动性的事件吸引人们对埃及的注意力，而且英国的普通读者数量还没有大到足够支持对埃及这个国家的兴趣，这种形势将在19世纪初发生极大变化。18世纪，对埃及进行最后记录的两位法国人是克劳德·埃特纳·萨瓦里和君士坦丁·弗尔奈。与英国的出版物相比，法国的著作得到了仔细研究，至少是被一小群但有影响的读者研究了。然而，法国人对埃及的兴趣不完全是纯学术性的，因为遍及萨瓦里和弗尔奈著 218 作的是对埃及作为法国殖民地的潜在价值的率直评估。

阿里·拜伊·埃尔-凯拜尔去世之后的政治混乱于1784年降低。在这一年，两个马穆鲁克竞争者拜伊伊博拉希姆和拜伊穆拉德捐弃前嫌，联合起来，共同获得领导权。一旦掌握了权力，并消除了内部斗争，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恢复权威的坚决努力。伊博拉希姆和穆拉德已经停止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转送埃及的收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埃及这种无法接受的状态感到震惊，于1786年7月向亚历山大城派遣了一支舰队。舰队司令帕夏哈桑对拜伊们宣战，并声称：减少税务；从此以后，埃及的行政管理遵从帕夏伊博拉希姆在1525年作出的安排。马穆鲁克贵族不再拥有任何行政管理权力。拜伊穆拉德比他的同僚更好战，率领一支军队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但在三角洲的埃尔-拉曼尼亚被打败。1786年8月8日，帕夏哈桑在没有遇到更多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开罗，并任命一位顺从的马穆鲁克伊斯梅尔·拜伊管理埃及。

然而，帕夏哈桑和其支持者仅仅是下埃及的主人；穆拉德和伊博拉希姆仍然掌握着南方的领土。每一方都不能决定性地打败对方。穆拉德和伊博拉希姆曾一度进入吉萨的金字塔地区，却又被赶回到上埃及。当奥斯曼土耳其人追赶他们到达阿斯旺时，他们逃进了努比亚。媾和的努力失败了。与此同时，对帕夏哈桑有利的时间也用没了，因为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危机正在迫近。他和他的舰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急切需要的。在开罗进行了一些支持行政改革的安排

以后，帕夏哈桑于 1787 年 9 月驶离埃及。他的事业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到 1791 年伊斯梅尔・拜伊去世时为止，穆拉德和伊博拉希姆已经恢复了他们的权威，他们权力一直保持到 1798 年法国人的到来。



第十四章　现代埃及的诞生

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率军对埃及的远征是法国大革命以及随 219 之发生的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的产物。当时的法国政府被称为执政内阁。法国执政内阁因不能侵入英国或不能在公海打败英国而受挫，决定通过攫取埃及的方式间接打击英国。这将截断英国与它最大的殖民占领地印度的陆路交通，英国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把法国驱逐出了印度。除此而外，把埃及作为殖民地的思想已经在法国流传了很多年。这是一次机会。而且，对埃及的远征也为法国执政内阁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使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波拿巴离开法国甚或完全消除他。据此，执政内阁委任年轻的将军统率一支五千多士兵的军队，并转让给他一支拥有近四百艘船只的舰队。

1798年7月1日，当法国人在亚历山大城登陆时，拿破仑宣称他和他的军队作为真正的穆斯林来拯救埃及，使其摆脱马穆鲁克的贪婪统治，恢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公正权威。这是一种炫耀的宣传策略，试图削弱马穆鲁克，并确立法国控制埃及的借口。当然，他们坚决地旨 220 在保持埃及国家在自己的控制下，但法国人在消除马穆鲁克方面是严肃的，而且他们理性地认为他们的开明统治带来的利益必然极大地改善埃及人民的生活。

法国人迅速地向开罗进攻。拜伊穆拉德于当年7月21日决战于

伊穆巴巴村，这次战争被称为金字塔战役(尽管吉萨的金字塔距离这里达 10 英里)。马穆鲁克不缺乏勇气，他们对法国军队进行的反复骑兵攻击证明了这点，但他们在数目上被超过，而且他们的虚张声势不能战胜军纪严明的法国士兵。对于法军来说，击退这种猛烈进攻仅仅是技术问题。同时代历史学家埃尔－贾巴尔提注意到了法国军事训练的优越性：

> 他们遵从其司令的命令，并忠诚地服从其领袖。他们唯一的遮光物是头上的帽子，而他们唯一的行路工具就是他们的双脚。他们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和饮料挎在他们的胳膊下面。他们的行李和备用衣物像枕头一样悬挂在背上，当他们睡觉时，他们就像往常那样躺在上面。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标记和信号，他们都服从这些信号。[28]

当马穆鲁克马兵对抗法国军队时，他们遭到屠杀；当法军前进并重创马穆鲁克军队的后撤阵地时，更多的马穆鲁克淹死在尼罗河里。根据官方报告，1200 到 2000 名马穆鲁克死于金字塔战役，而法军仅仅丧失了 29 人，对照鲜明。拜伊穆拉德和其幸存下来的马穆鲁克逃到上埃及；他的同僚拜伊伊博拉希姆正在防卫尼罗河右岸，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总督一起逃往叙利亚。法军于当年 7 月 25 日进入开罗。

然而，金字塔战役之后的一周时间里，英国舰队就在纳尔逊勋爵的率领下，赶上了法国舰队，并在法国舰队停泊的亚历山大城东边的阿布·基尔港口毁灭了法国舰队。纳尔逊勋爵恰恰已经错过了在海上截杀拿破仑的机会。在开罗，拿破仑发现人们并不相信法国人的目标的221 价值。与埃尔－贾巴尔提一样，一些人嘲笑他的宣言和他的宣言所使用的阿拉伯语。之后，于当年 9 月 11 日，苏丹赛利姆三世对法国宣战，完全不信任拿破仑保护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埃及的利益之宣言。

即便如此，拿破仑仍在决斗中处于支配地位。他开始重新组织开

罗,毁掉了开罗的大门和房屋,使它更服从军队的控制;坚持笼络着城里有影响之人物的支持,并创造新的公民制度。为了追逐拜伊穆拉德和马穆鲁克,他派遣精力充沛的将军德赛克斯往南乘胜追击他们,远及阿斯旺地区,不过马穆鲁克按照这条路线撤退,并最终成功地逃过了他们的追击。与此同时,开罗在法国人的束缚下变得更难控制了。诸如公共死刑这样严格的安全措施疏远了民众,人们发现法国人的统治与马穆鲁克的统治一样沉重,事实上更糟糕,因为为了支付占领期间的开支,法国人不仅收集老的马穆鲁克税务,还在收取这些税务时更粗野,甚至向人民强收新税务。当年 10 月 21 日,民众的仇恨爆发成了叛乱。法国人从城堡对城市进行了两天的炮弹轰击,结果镇压了叛乱。

海洋割断了拿破仑与法国的联系,而且拿破仑还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攻,所以拿破仑不稳固地掌握着遥远的土地。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试图通过入侵叙利亚以拓宽战场。埃尔－阿里什陷落了,迦法也陷落了,法国人在这里屠杀了卫戍部队。但形势的关键在于阿克里,拿破仑于 1799 年 3 月 19 日围攻该城。阿克里城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和一小支英国海军的支持,得以维持下来,而拿破仑军队则被腹股沟腺炎瘟疫大批杀害。5 月,他不得不放弃,并返回埃及。他迅速地粉碎了在阿布·基尔登陆的一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但很清楚的是,埃及不能为他逐渐膨胀的野心提供任何更进一步的前景,并且无论如何拿破仑很快就会丧失埃及,因此在 8 月 22 日,他逃跑了,到巴黎试他的运气,留下将军让－巴普提斯特·克莱伯掌管埃及。

克莱伯的形势是如此的暗淡,以至于他最初唯一关心的事情是他自己和他的军队从埃及撤出。为了这个目的,他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签订了和平协议,但英国人否决了他的和平建议,坚决令其投降,因为英国人的海军已经把法国军队赶回了欧洲。这僵化了克莱伯的希望。当一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于 1800 年 3 月 20 日出现在开罗外面的艾因·沙姆什时,他艰难地战胜了这支军队,尽管他的精疲力竭的军队在人数上仅仅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六分之一。另一次民众起义爆发于开

222

罗,周期被延长,混乱了一个多月以后才被镇压下去。1800 年 6 月,一个叙利亚人的刺客之刀结束了克莱伯的生命。

指挥权落到了将军阿卜杜拉·雅克·梅农的身上,他是一位伊斯兰教皈依者,但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联军包围了法军。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当中,有一支强大的阿尔巴尼亚士兵分遣队,包括年轻的军官穆罕默德·阿里。1801 年 3 月 21 日,法国人在亚历山大城外面被打败,尽管英军司令拉尔夫·阿伯克鲁比爵士在战斗中被杀死。另一支军队逼近开罗。两支军队的竞赛上演了。梅农于 6 月 18 日在开罗投降;亚历山大城在 9 月 3 日投降。结果,根据法军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达成的协议,他们撤出埃及。

英国人此时不打算留在埃及。当他们准备离开时,他们宁愿看到马穆鲁克统治的恢复,因为这将削弱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为英国人在埃及提供机会。但马穆鲁克正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合作,正在上埃及一个安全的地方消磨时间。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决心通过新总督帕夏库斯罗恢复控制和统治埃及。1803 年 3 月,根据亚眠条约的条款,英国人从埃及撤出,这个条约使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暂时停止。

法国在埃及的占领持续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法国的占领对埃及的直接影响并不深。法国人的目标没有一项得到实现。法国人的这段插曲经常被宣称为这样一个事件,即它预示着现代埃及的诞生,但与其说它是一种创造力,还不如说是一种干扰力。然而,它是一种为新发展开辟道路的干扰力,尤其引起了埃及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混合。尽管这次占领之后法国和英国都没有在埃及逗留,但这次占领把埃及直接带入了巴黎和伦敦的外交视野,而且这种状况维持了一个半世纪。

尽管法国远征军的成就是短暂的,但它对学术做出了贡献,这种贡献既是持久的,也是规模巨大的。大群博学之士,即科学和艺术代表团 223 伴随拿破仑的军队来到埃及。他们的目的是详细记录整个国家:它的地理、城市、水文、制造业、农业、自然史、辉煌但仍然很神秘的历史。所有这一切对于繁荣的殖民地都是有益的,但这也是欧洲启蒙思想范围

内的一次努力。根据1798年8月22日的命令，拿破仑创建埃及研究所作为其学者的总部，并规定了该研究所的目标："(1)在埃及推进和传播科学；(2)调查、研究和出版关于埃及自然、工业和历史的数据；(3)为政府将向其咨询的各种问题提出建议。"

对于法国学者来说，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他们最充分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受到军队的保护，他们能够在军队到达的每个地方行动，并在军队的保护下工作。这把他们带到了那时人们知道的埃及尼罗河谷大多数主要考古遗址(军队停在了努比亚边界的阿斯旺)。专家们研究拿破仑分派给他们的各种问题，但古代遗物实施了最强大的吸引力，吸引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水利工程师经常忽略他们的重要工作，反而去描绘古老的纪念物。学者们也搜集了大量古代埃及的古物。当法国人撤出埃及时，英国人接收了他们的古物，并将其送到伦敦，它们在这里变成了大英博物馆华丽的埃及学收藏室的基础。著名的罗塞塔石碑也在这些物件之列。罗塞塔石碑记载了托勒密五世的敕令，是由一位法国士兵在拉希德建筑要塞时发现的，法语称拉希德为罗塞塔。因为它拥有三种语言的铭文，即象形文字、世俗语文字和希腊文，所以它注定成为解读象形文字和阅读古代埃及语言的关键，象形文字和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在古代就遗失了。法国人保留着他们的文件，用烧掉它们而不是交出它们来威胁英国，并用25年的艰辛劳动，生产出了《埃及纪行》(*Description de l'Égypte*)，这是埃及学所有著作当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西方人系统研究(古代和现代)埃及的基础。该书根据古物、现代国家、自然史等分成若干卷，它的巨大对折书卷包含埃及曾生产的一些最突出的画像。

埃及的政治场景从根本上因法国人的介入而改变。拜伊穆拉德已经去世，但马穆鲁克在新领导者的领导下从上埃及的基地重新获得权威。既然法国人已经离开了，那么他们仍然可以算作一支力量，但他们 224 的数量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而且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也受到毁坏。对马穆鲁克势力的进一步削弱是他们相互之间永无休止的派系之争，

这使其他外部势力能够利用一个群体去对抗另一个群体。更重要的是，在埃及当时还有其他力量；马穆鲁克不再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地。一位坚决的奥斯曼土耳其总督帕夏库斯罗令士兵支持他，而且在阿尔巴尼亚分遣队里面还有第三种因素，这个分遣队最初来到埃及与法军作战，但从未离开埃及。阿尔巴尼亚人经常难以管制，并于 1803 年 5 月因拖欠军饷问题而起义，迫使库斯罗逃往达米埃塔。这种复杂、失衡的政治综合体导致了两年的骚乱和复杂运动，穆罕默德·阿里从这种状态中作为埃及统治者出现，并保持了四十多年，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个王朝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穆罕默德·阿里于 1769 年出生于马其顿城市卡瓦拉。他获得了与强盗和海盗作战的早期经验以后，变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的一位官员，是那支被派去对抗法国人的阿尔巴尼亚人分遣队的副司令。当他的司令官在不久之后被杀害时，穆罕默德·阿里接任阿尔巴尼亚人分遣队的司令。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他熟练地进行政治斗争，运用一个马穆鲁克派系对抗另一个，然后转而对抗这两个派系。他还讨好土耳其总督，然后又与其断绝关系，获得开罗的乌力马(*ulama*)的支持，乌力马是博学的、非常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他们的观点在政府和社会中占有很重的分量。直到最后，他处在这样一种职位，可以要求奥斯曼土耳其人任命他为埃及的总督或帕夏。奥斯曼土耳其人不愿这样做，因为以前的帕夏是正规的职业人员，通过正规制度获得晋升，不是像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暴发户，但奥斯曼土耳其人也用实际方式以适应现实。在 1805 年 7 月，穆罕默德·阿里从伊斯坦布尔获得了敕令(firman)，敕令任命他为埃及的帕夏。

穆罕默德·阿里担任帕夏的早些年是极为困难的。他在狂暴的阿尔巴尼亚人中的权力基础是不稳固的。当穆罕默德·阿里拖欠阿尔巴尼亚人的薪金时，当他骑马穿过街道时，他们曾几次向他射击。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也不欢迎他出现在埃及，并在任何可能的时候为他制造麻烦。马穆鲁克从上埃及的基地威胁他，他们在那里否认他对下埃及的

225

控制。1807 年,他又不得不应对英国人的入侵。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敌对已经重新开始。英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关系已经恶化,而英国更加依赖于埃及的谷物供给。对于英国来说,他们从未满足于在埃及殖民,似乎已经到了在埃及建立一块根据地的时机了,以便保卫谷物供给和到达印度的陆路交通,同时阻止法国获得这条线路。据此,一支远征军在亚历山大城登陆,并于 1807 年 3 月毫不费力地占领了这座城市,但当英国人试图扩张其控制范围到尼罗河三角洲西岸的拉希德时,遭到了惨败。先锋军被截断。很多英国士兵被杀死,其他人被俘虏为囚徒,后来被迫在向开罗开进的队伍中手持他们砍掉的同伴的头颅。剩余的英国军队被围困在亚历山大城,仅仅在 1807 年 9 月英国与穆罕默德·阿里达成协议释放他们以后,才从埃及撤出。从那时开始,局势逐渐有利于帕夏。1807 年苏丹的变化使伊斯坦布尔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无暇关注埃及,这使穆罕默德·阿里更易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幸运的是,主要马穆鲁克领袖们都去世了。穆罕默德·阿里于 1810 年再次占领马穆鲁克的上埃及城市,并迫使马穆鲁克埃米尔们来到开罗并居住在这里,他可以在这里监视他们。

然而,穆罕默德·阿里远未消除马穆鲁克。这些军队精英的残余分子在法国入侵之前就控制了埃及,当时仍然武装着,仍是贪婪的和危险的。他们更容易在开罗被管理,但他们保持自己的军事家族和武装随从,依靠他们的土地和收入维持生计。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将在任何适宜的时候毁灭穆罕默德·阿里;与此同时,他们照旧反对他引入埃及的新军事制度,这恰恰像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苏丹的禁卫兵通过暴力反对苏丹赛利姆三世的类似改革,并在 1807 年将其废黜。当 1811 年 3 月 1 日穆罕默德·阿里在城堡中庆祝他儿子图苏获得远征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教徒的任命时,他邀请了开罗所有主要人物,包括近五百位马穆鲁克埃米尔。宴会之后,当马穆鲁克通过城堡下降的内部通道(今日仍可见到)离开时,他们发现出口被锁死了。阿尔巴尼亚射击手出现在围墙上方,将他们射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开罗的另

226

外一千个马穆鲁克被捕杀。剩余的马穆鲁克再次沿尼罗河向上游逃跑,首先逃到上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另一个儿子在这里又杀死了一千个马穆鲁克,并迫使幸存者逃到努比亚和更远的地方。穆罕默德·阿里现在是真正的埃及主人了。他能够在国内和国外推行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

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是以埃及之外的大量军事征服为标志的,这些军事征服使辽阔的地区归于他的控制下。第一次军事行动是对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的征服,苏丹对虔诚的瓦哈比派教徒的兴起感到烦恼。他们在中阿拉伯半岛建立了一个国家,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禁止奥斯曼土耳其朝圣队伍进入这两座城市。这对于苏丹来说是尴尬的,他负责保护圣城。瓦哈比国家逐渐侵占他的领地,他却什么也不能做。他对叙利亚和伊拉克总督们的求助充耳不闻。正是穆罕默德·阿里在集体屠杀了马穆鲁克之后,派遣一支远征军进入阿拉伯半岛,这支远征军由帕夏图荪率领。供给问题是惊人的,敌人数量几乎占绝对优势,苏丹援助的许诺也迟迟不能兑现。穆罕默德·阿里曾一度不得不亲自指挥战斗。但在1814年,他决定性地打败瓦哈比派教徒,并杀死了他们的埃米尔法萨尔·伊本·梭德。在下一年,图荪与新埃米尔阿布达拉·伊本·梭德签订了停战协议,返回开罗,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但很短的时间之后就感染腹股沟腺炎瘟疫而意外死掉。穆罕默德·阿里为了纪念他的儿子,在主街上以最好的土耳其样式建筑了一座华丽的公共建筑(*sabilkuttab*)。它最近被修复。

图荪离开阿拉伯半岛之后不久,瓦哈比派教徒阿布达拉·伊本·梭德毁坏和平协议,从他在内陆的安全势力根据地重新开始军事行动。穆罕默德·阿里迅速做出反应,委任他的儿子伊博拉希姆率军进行新的远征。伊博拉希姆证明自己是一位天才的司令。一位同时代观察员这样描述他:他总是“有威严的和公正的;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是严格而专制的人,是勇敢的人,尽管纪律严明,但仁慈、放纵;他从不希望军队中最低下的人做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比他获得的服从更

227

严格，因为他能够惩罚别人；不管怎样，他完全控制了士兵的心”。[29]

伊博拉希姆稳步推进，于1818年9月占领了瓦哈比派教徒的首都。埃米尔阿布达拉被俘，被送往伊斯坦布尔斩首。穆罕默德·阿里以汉志为立足点，掌握机会往南扩张到也门，早在1813年就往这里派遣军队。到1819年，他几乎控制了红海地区。他变成了从北方亚喀巴到南方穆哈的整个阿拉伯半岛西海岸的领主，也因此导致了英国人的猜疑，英国人也正在这个地区扩大影响。

穆罕默德·阿里的第一个扩张行动直指南方的努比亚和北苏丹。在1820年，他的第三个儿子伊斯梅尔率领的军队从阿斯旺出发。到下一年的6月，伊斯梅尔已经到达了塞纳尔，他在这里接受了当地领袖们的归降。与此同时，另一支军队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养子穆罕默德·拜伊·库斯罗的领导下，征服了科尔多瓦。但伊斯梅尔任性固执而又愚蠢地行事，不顾及他父亲的教导，没有认真听取高级军官的建议。伊斯梅尔的自大和残忍——针对这一点，穆罕默德·阿里曾告诫过他——使他遭到了他新征服的人们的痛恨。在1822年秋季，他曾经凌辱过的一个首领将他活活烧死在他的小木屋里；人民起而反叛。穆罕默德·拜伊·库斯罗从科尔多瓦来到埃及，极为残忍地镇压了起义。埃及人的统治在整个努比亚和苏丹北部建立起来，或者说，这里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埃及人的苏丹。

但穆罕默德·阿里的注意力主要在埃及。他想通过有选择地采用欧洲的模式、科技和专门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埃及的方式，把埃及转变成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和主要军事强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雇用了很多欧洲人，向他们征求诸如工厂管理、市政工程、军事训练和医学等建议。他天才的侦查员迅速地侦察地中海地区，募集很多合适的个人，将其带到埃及，给予他们受人敬重的职位。无论什么时候欧洲旅行者来到埃及，他们都可能被带到穆罕默德·阿里那里接受个人接见，因为他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但他的目的在于埃及人最终应该在政府、工业、军事和教育中占据重要职位。一些埃及人将在埃及 228

新建立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其他人将被送到国外去学习并带回更多必要的技术。一位游学者瑞法·埃尔-塔塔韦留下了一本论文集,记述了法国社会给他留下的印象,此人后来变成了很有影响的作家和教育家。

穆罕默德·阿里需要金钱为他野心勃勃的计划提供资金,然而他已经控制了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财富已经不恰当地被管理了几个世纪。但埃及的农业潜力依然存在,而且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就几乎完全控制了它。马穆鲁克们的巨大地产被没收,宗教基金会的财物也被没收,他们足足拥有埃及农田的五分之一。严格的名目调查给穆罕默德·阿里带来了更多的利益。税收结构被调整,结果埃及几乎所有土地都归国家所有。穆罕默德·阿里能够颁布敕令规定土地上种植什么作物,然后根据国家确定的低价购买产品,并用于出口以换取现金。在拿破仑战争——1815 年结束——时期,谷物是赚钱的出口品。在 1821 年,穆罕默德·阿里引进了长绒棉,长绒棉变成了埃及的主要出口作物。埃及的棉花是高质量的,直到今日仍受到有眼力的购买者的褒奖,他们为了制作优质棉花制品而购买这种棉花。生存作物开始向商品作物转变,商品作物可以赚取外汇。穆罕默德·阿里获得了大笔可靠收入,为他的项目提供经费。这些项目可能是自从罗马统治埃及时代以来对埃及资源最有效的开发。

为了扩展农业生产和把货物推向市场,穆罕默德·阿里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一位地位很高的同时代观察者认为,他建筑了 32 条运河、10 条堤坝和 41 个水坝和拦河坝。这些项目中的一些是巨大的。马赫穆迪亚运河是这些运河之一,位于亚历山大城和尼罗河西岸之间,长 72 公里。这条运河是在 1817 年和 1820 年之间构建的,动用了 30 万雇佣工人(根据各种记录,据说有 12000 人至 10 万人死去)的强制劳动。几千费丹[①]的农田从运河沿岸的沙漠中开垦出来。

① 费丹(feddan)是埃及面积单位,1 费丹等于 1.038 英亩。——译者注

一个新拦河坝恰恰位于开罗北面，仅仅部分成功建成，但无论如何还是提高了三角洲的生产力。这恰恰是新建筑项目。很多现有运河不得不被挖深；所有运河不得不被保持。穆罕默德·阿里总共开发了 100 万费丹的新农田。生产力因长期灌溉的采用而进一步增加，结果两种甚或三种作物每年能够生长，而非只有一种作物。他聚集大量强迫劳动工人的能力表明他多么彻底地掌握了埃及的资源。 229

穆罕默德·阿里不仅仅关心增加埃及的农业产量。他旨在利用从农业出口中赚取的金钱使埃及现代化和工业化。他仔细研究了英国的事务、工业革命的教训和它对英国实力的贡献。所有类型的工厂都出现了，例如纺织品、糖和军需品等的工厂，而且大量越来越专业化的工厂开始满足国家越来越高的需求。穆罕默德·阿里想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他通过一套排除不必要进口物的专营制度严格地保护他的新工业，使其免于外来竞争的威胁。例如，廉价的英国棉布不允许与埃及的布料竞争，埃及的布料在整个埃及和埃及之外的地方被广泛地出售。军队和政府越来越多的订单为工厂提供了大量制作机会。埃及变成了东地中海最主要的工业国家。

亚历山大城的复兴发生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到 1805 年，曾经显赫的东地中海皇后的人口或许已经缩减到了 15000 人，而且当时的城市仅仅占据了古代城市的一小部分，周围是不成形的碎石堆。新马赫穆迪亚运河带来了可靠的饮水供给，并使亚历山大城与尼罗河更直接地交通。穆罕默德·阿里对外贸的大力强调使城市的两个海港再次忙碌起来。随着兵工厂于 1829 年建立起来，亚历山大城变成了一个重要造船中心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庞大现代海军的基地。当穆罕默德·阿里在 1849 年去世时，亚历山大城的人口已经上升到了 100000，使它健康地走上了恢复其久已丧失之地位的道路，即恢复为重要城市。开罗和亚历山大城依靠壁板信号电报联系起来。信息在这两点之间传递仅仅需要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为了满足迅速增长的政府需求，穆罕默德·阿里彻底重组了埃及

的行政部门。为了获得建议，他创立了一些议事委员会。尽管这些委员会是咨询性质的，而非立法机关，但它们的很多建议变成了政策。一 230 套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建立起来，承担着在很多主要部门之间划分的职责。到 1837 年为止，有了七个主要部门：内务部、财务部、战争部、海军部、教育与公共工程部、外事与商务部、工业部。每个部门都被分成很多办公署和办公处。与此同时，埃及的区和地方组织被调整和理顺，清晰的权威顺序建立起来，从帕夏，经过社会等级的各个阶层，直到每个村的首领。尽管穆罕默德·阿里认真听取其顾问的意见，并把很多权威授予其官员，但最终的决定权始终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的很多事业后来被撤销，但穆罕默德·阿里的行政改革比他的寿命长，变成了现代埃及国家的一部分。

随着马穆鲁克的失利，穆罕默德·阿里进一步前进，建立了一个完全新的军事组织，而不是依赖于埃及现有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一次不成功地从苏丹雇佣奴隶军队的努力之后，他采取新步骤，征募埃及农民进入军队。他的新军队被称为尼扎姆·杰迪德。这支军队的军官最初是欧洲人，但当埃及人从新军事训练学校毕业时，他们就会被委任以军事职务。埃及人憎恨征召，逃跑以避免征召，甚至诉诸自残以使自己不适于服军役。但这毫无用处。当绝望的年轻人开始把他们的一只眼睛挖出来时，帕夏便组建了一支由单眼的人构成的军团。然而，一旦埃及人应征入伍，不管怎样不情愿，他们便成为很优秀的战士。穆罕默德·阿里的尼扎姆·杰迪德在很多地方和形势中一再证明自己的实力，尤其在对抗瓦哈比派教徒的战争、希腊独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中表现出色。这支军队在国内也是可靠的力量。当 1824 年上埃及发生一次重要起义时，尼扎姆·杰迪德军队决定性地镇压了它。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在最强大时，军人数量几乎达到了二十五万。埃及变成了东地中海的主要军事力量，使穆罕默德·阿里比他名义上的主人即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更强大。尽管 1840 年穆罕默德·阿里被迫依照条约缩小军队的规模，但这支军队是埃及的持久机构。他也建立了一支庞

大的海军，他因这支海军而非常骄傲。他鼓吹说，在伊斯兰世界，没有第二支这样的海军。

为了满足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和政府越来越高的需求，他开始广泛地发展高等教育。1816 年，他开始学校调研，大量技术学校建立起来。专门为尼扎姆·杰迪德训练官员的职业学校创建于 1825 年。第一所医学学校开创于 1827 年。第一个外语研究所创建于 1836 年，由瑞法·埃尔－塔塔韦领导，这为欧洲语言的出版物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出版机会。穆罕默德·阿里大约于 1822 年在布拉克创建了一家政府出版社，这与他的教育改革密切相关。这家出版社最初主要为军队和政府官员印刷技术手册，但后来出版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著作，包括有影响的阿拉伯语版本的《天方夜谭》(*Arabian Nights*)。报纸以阿拉伯语和法语出版。印刷媒体变成了埃及人生活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 231

19 世纪上半期，疾病肆虐埃及，危及到了尼扎姆·杰迪德军队的存亡，并限制了总体人力储备。天花每年杀死五万多儿童；大规模瘟疫，例如 1834—1835 年爆发的腹股沟腺炎瘟疫，带走了开罗 1/3 人口的生命；诸如霍乱这样的其他疾病大大增加了死亡总数。早在 1819 年，穆罕默德·阿里就下令接种疫苗以对抗天花。严格的检疫措施限制了时疫的传播。穆罕默德·阿里的法国医学专家克劳特·拜伊于 1827 年创建了阿布·扎巴尔医院(后来改名为卡斯尔·埃尔－埃尼医院)，用于护理尼扎姆·杰迪德。医学官员被分配给军团；战地医院建立起来。但帕夏的关心并不仅限于军队，因为在 1832 年，一所接生员学校在开罗开办，培训妇女以便提供各种重要的医学服务。然后，在 1837 年，一处专门为平民服务的新医院在开罗投入使用。它有专门的妇科病房和小儿科病房，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孩童在这里接受天花疫苗接种。从长远来看，在穆罕默德·阿里的所有项目之中，他的医学改革获得了最大成功。

穆罕默德·阿里的成就是以埃及人民的沉重代价为基础获得的。

帕夏在埃及实施的控制程度或许是自古以来最空前的，而且他用它去榨取他能够从埃及获得的一切，以支持他的项目。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被忽略。每一块有生产能力的土地、每棵棕榈树、每头驴子、能够提供价值的每样东西都被估价，并收取它能够承担的最大限度的税务。他232一再地把强制劳动用于公共工程，例如穆哈玛迪亚运河和整个埃及无数较小的灌溉项目。很多外来参观者为他的人力代价所震惊，然而一些人推测如果他的项目取得成功，那么这种人力代价便是值得的。

人们不间断地抱怨，但他们遵从命令，因为帕夏的权威是绝对的。他的手掌的简单水平地一挥就意味着处死。然而，他并不是任性地或随意地残忍。严格服务于特殊目的。他也没有利用他的地位进行过分的个人扩张。他的住处是舒服的，但不是特别富裕的。他骑在简单覆以马衣的马上绕城环行，仅仅带着一两位随从。不知道内情的参观者根本不知道一位重要人物已经从身边走过去了。他的臣民平实地称呼其为“帕夏穆罕默德”。根据一份见闻广博的同时代记述，“这个非同凡响之人的个人外貌只与他的个性有一点点关系。他是相当矮小的，稍显肥胖，面容生机勃勃，给人的印象是仁慈而非苛刻。他的胡须当时是灰色的。他自然而流利地讲土耳其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但他对埃及的语言即阿拉伯语了解的很少。在他的晚年，他已经学着阅读和书写阿拉伯语。”[30]

在 1821 年，希腊的很多部分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组成部分，爆发了反抗其土耳其主人的暴力叛乱。三年的战斗中遭受了一再失败之后，苏丹再次求助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迅速而有效地作出反应。在五个月里，他派遣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和几支尼扎姆·杰迪德军团去希腊，由他的儿子伊博拉希姆率领。希腊人的叛军并不能与领导有力、纪律严明的埃及战士抗衡。伊博拉希姆获得了系列印象深刻的胜利，并于 1827 年 6 月占领了雅典。尽管穆罕默德·阿里是军队的主人，但苏丹控制着对外政策。他漠视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和奥斯曼土耳其与西方强国的冲突的关心，导致了 1827 年 10 月 22 日无规划的纳瓦仁

大战。在这场战斗中，土耳其和埃及联合舰队被英国海军毁灭，这保证了希腊的独立。

穆罕默德·阿里对于希腊冒险的结果非常愤怒，无论如何他从不喜欢希腊冒险，而且这次冒险的结果是在一场与西方强国最不必要的冲突中以他自豪的海军为代价的。他希望以叙利亚作为自己劳动的奖赏，他已经获得了比苏丹成功做到的更多的东西。当他被苏丹用克里特代替叙利亚搪塞时，他决定靠暴力夺取叙利亚。他从希腊撤出军队，通过更多地招募军人来增加自己的军团。亚历山大城的新兵工厂迅速建造新船只，代替那些在纳瓦仁大战中用旧的船只。1831 年 11 月，他命令伊博拉希姆率领一支由 16 艘战船、17 艘运输船以及 3 万士兵和水手构成的军队入侵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很快投降。六个月的围攻以后，伊博拉希姆占领了阿克里，而拿破仑之前并没有成功地占领这座城市。在 1832 年的下半年，他与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进行了三次重要战斗，每次都获得决定性胜利。最后一次胜利以后，1832 年 12 月在科尼埃附近，伊博拉希姆开辟了一条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公路。苏丹不得不讲和。穆罕默德·阿里变成了叙利亚的主人。

233

苏丹麦哈姆德二世和帕夏穆罕默德·阿里都不满意。苏丹痛恨自己不得不承认帕夏对叙利亚的控制，而帕夏对于自己认可苏丹为他的主人感到不耐烦。在 1838 年，穆罕默德·阿里决定向着独立前进。苏丹首先打破僵局，在 1839 年 4 月入侵叙利亚，并宣布穆罕默德·阿里为叛逆者。埃及人的反应是迅速的和坚决的。在 1839 年 6 月 24 日，伊博拉希姆在奈兹布战役中战胜了奥斯曼土耳其人，这是他的最后一次伟大胜利。奥斯曼土耳其的形势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苏丹麦哈姆德二世在当年 7 月 1 日去世，继承者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人。奥斯曼土耳其舰队驶往亚历山大城，并投降。看上去似乎穆罕默德·阿里已经实现了他的所有目标。

他已经获得了太好的成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崩溃的边缘上摇

摇欲坠，这是西方强国决定阻止的事情。所有西方强国都通过外交进行干涉。一支英国军队对抗伊博拉希姆，并迫使他撤回埃及；一支英国海军停泊在亚历山大城。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承认失败。接下来的解决方式结束了他的很多梦想，减少了陆军和海军的规模，迫使他从克里特、叙利亚、阿拉伯半岛和也门撤出。他的专营制度被废除，允许欧洲商人进入埃及市场。

穆罕默德·阿里的最后几年经常被描述为衰落和老迈。他的很多项目都落幕了，比他希望维持的时间短很多。但他给埃及留下了一个几个世纪以来较好的行政体系；军队虽然缩减了，但仍是地中海地区最好的军队；在公共卫生方面，当时几乎没有几个国家能够与他的成就相比。他甚至能够开始新的动议，包括 1848 年高质量的人口普查。埃及的资源仍足以满足基本的政府需求和其他方面的需求。政府仍牢固地控制着埃及的资源。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没有招致外国债务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实现了最高目标之一，因为在 1841 年的敕令中，苏丹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家族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力。穆罕默德·阿里于 1849 年 8 月 2 日去世，被葬在城堡内的巨大清真寺里，城堡俯瞰着开罗。

234



第十五章　19 世纪中期的埃及

1841 年的敕令确定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长子为继承人。根据 [235] 这个敕令，下一个帕夏是阿巴斯·希尔米一世，他是穆罕默德·阿里钟爱的儿子图荪之子，图荪死于 1815 年的瘟疫。阿巴斯面对的各种可能性是巨大的。尽管穆罕默德·阿里已经丧失了其帝国的很多部分，但帝国的埃及部分完整无缺，并被授予他的后代，而且他仍然掌握着他的苏丹人军队。陆军和海军的确被精简了，但剩余的军队足以满足埃及的需要；他的制度改革的很多内容保持下来了。他给埃及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条件。很多项目即将实现埃及的巨大潜能，但穆罕默德·阿里的继承者们没有获得他们继承的大多数东西。

阿巴斯在性格和政策方面与他的祖父非常不同，他非常不喜欢他的祖父，去世帕夏葬礼的吝啬程度表现出了他对穆罕默德·阿里的轻蔑。与穆罕默德·阿里不同，阿巴斯是反对西方的，限制欧洲的影响。穆罕默德·阿里发动的很多改革都被取消或忽略。工厂被废弃，并被卖掉。学校被关闭，教育者因令人气馁的转变而沮丧，例如语言学校的 [236] 校长瑞法·埃尔－塔塔韦的遭遇，他被送往喀土穆。这些行为使阿巴斯具有了极端保守的名声，或许他部分上是值得这种声誉的，但一些衰落的迹象事实上在穆罕默德·阿里的晚年就开始了。

阿巴斯完全是粗心大意的保守主义者。他最初拒绝把铁路引入埃

及,但他很快便意识到他需要做出让步。1851年,他签署了一项关于铁路的协议,这条铁路在1856年建成,把亚历山大城和开罗连接起来。不久之后,另一条铁路在开罗和苏伊士之间开通。这些铁路都为埃及带来了巨大利益。埃及的铁路构建速度完全可以与欧洲最先进国家的铁路构建速度相媲美。阿巴斯强烈反对坦兹麦特时代肇始于伊斯坦布尔的意义深远的改革,不是因为他是极端保守的人,而是因为这些改革威胁到了他的自治。无论如何,历史对阿巴斯并不友好,通常用阴沉的腔调描绘他,即他是焦躁不安的、迷信的和难相处的,他可能确实如此。他必然在自己的时代造就了很多敌人。当阿巴斯在1854年7月被他的两个奴隶谋杀时,他没有获得人们沉痛的思念。

阿巴斯的继承者是穆罕默德·阿里的第四个儿子穆罕默德·赛义德。文化取向再次发生转变,因为赛义德比他的前任帕夏更趋向于西方文化。铁路建构继续进行。公共工程与新灌溉项目、桥梁和公路的建筑在速度上保持一致。电报被引入埃及。赛义德继续总督控制宗教权威的政策,在军队中压制宗教信仰。为了节约资金,他逐步缩减军队的规模,从阿巴斯统治时期的大约八万人,缩减到1860年的两万五千人。尽管任何节约都不能被1853—1856年埃及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消费所抵消,但埃及在这次战争中派遣一支两万人的军队支持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而从欧洲银行家那里借贷了大笔债务用于支付战争费用。

债务变成了一个陷阱,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前三位继承者越来越多地纠缠其中。尽管减掉了很多项目,但阿巴斯从来未能完全实现收支相抵。赛义德发誓绝不效仿阿巴斯进行赤字开支,然而他在去世时仍然欠下了700万英镑的外债。然后,他的继承者伊斯梅尔加速借贷,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毁掉了他的政权,并把埃及递交到了欧洲人的手中。

然而,赛义德最重要的活动是决定支持苏伊士运河的修建。穿过237 苏伊士地峡挖一条运河,把红海和地中海连接起来,从而大大缩短欧洲与东方的海上距离,这种思想自从古代就很流行。在当时之前的几个

时代,法国探险队就已经喜欢上了这一想法。后来,一群法国空想家拾起来并宣传这种思想,他们是圣西蒙学派。他们把运河看成是统一那个在社会和科技上已经转变了的世界的手段。尽管圣西蒙学派的思想是更理想主义的,而非现实主义的,但他们有效地传播了在苏伊士修建运河的思想。

技术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在两个水平面几乎相同高度的水体之间挖掘一条大约一百七十公里长的巨大水渠;这条水渠穿过的土地大部分是平坦的沙漠;沿路还有四个巨大的湖泊,这可以节约很多挖掘工作,尽管第五个湖泊曼扎拉湖既是沼泽地也是浅滩,需要构建一条穿越它的堆积渠。三个巨大多石的山脊站立在这条线上。如果有足够的金钱、人力和基础机械,那么这些障碍都能克服。更可怕的困难是由不利的风向导致的,这些风总是在每一年的很多时间里阻止红海和印度洋上的海上航行。这个困难通过海上蒸汽技术的采用而迅速克服,这项技术使船只能够逆风向、逆水流航行。

苏伊士运河因为赛义德与法国驻埃及领事斐迪南·雷塞之间童年时期的友谊而变成了现实。因为童年时期的赛义德是如此的肥胖,以至于穆罕默德·阿里强迫他节食,但小赛义德经常溜到雷塞那里,雷塞允许他吞食通心面,这种食物是他最喜欢的。离开埃及几年以后,雷塞形成了在苏伊士建造运河的幻想。当雷塞听说赛义德已经掌权时,他迅速来到埃及。他的老朋友热情地接见了他,并欣然同意他修建运河的建议。根据最初的理解,赛义德将获得苏伊士运河公司 15%的个人股份所有权,而另外 15%的股份所有权归埃及所有。作为报答,赛义德将对运河的修建作出让步,并持续提供大批劳动力。通过购买其他股份,赛义德在公司中的股份总数最终达到了 44%。运河的总价值估价是六百万英镑,这个价值通过新公司股份的国际销售而提高了。

看似无休止的问题和耽搁之后,挖掘终于在 1859 年开始了。尽管 238 雷塞进行了乐观的估计,但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的签订却令其大失所望,而费用也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算。赛义德调解了很多异议。正如

他许诺的那样，他通过古老的强制劳役制度提供劳动力去挖掘运河，每年有两万农民被征募，被赶到运河区，并投入劳动。这意味着每月有两万征募的劳动力正赶往运河区的路上，两万劳动力正在那里劳动，同时还有两万劳动力正返回他们的家园，结果一年当中，有 50 多万劳动力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参与运河的修建，而这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十年。工作条件常常是恶劣的；有时，人们不得不用他们赤裸的双手挖掘，仅仅获得可怜得令人同情的津贴，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维持他们的生活。挖泥机器（由埃及支付费用）直到运河修建的最后阶段才被广泛使用。据估计，因疏忽、过度劳累、营养不良或者事故而丧失生命的人的数量与基本配额的工人数量相同：两万。在埃及总人口只有 500 万的年代，这种巨大而持续的埃及人力的消耗造成了普遍的经济困难。正是在这种以埃及金钱、劳力和生命为基础的巨大措施中，运河工程到赛义德去世时进展顺利，赛义德在长期的疾病之后于 1863 年去世。

赛义德的继承者是伊斯梅尔，是伊博拉希姆的儿子。伊博拉希姆是穆罕默德·阿里的杰出将军和儿子。在他的早期 30 年里，新帕夏给人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位艰苦工作的人，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工作到深夜。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逃过他的注意。他也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改革和发展项目，这个项目的规模是自从穆罕默德·阿里的伟大时代以来就未曾见到的。他曾一度看上去有大量手段实现他的目标，因为他统治的开始与美国内战导致的棉花价格高峰几乎同时，他剥夺了美国南部对欧洲的棉花供给。到 1865 年，埃及棉花进口的价值已经上升到了比时代开始之时高出十多倍的水平。

伊斯梅尔也有一种珍贵的国家观念，这种观念是埃及的统治者应该保有的，他在非常慷慨的生活方式中表达了这种观念。他的很多宫殿之一阿布丁始建于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为了给该宫殿建筑五百多个房间和休息厅，几百处房屋被毁掉。他也渴望从卑微的帕夏提升自己的地位，情愿为了这种地位而向伊斯坦布尔增加贡赋。1866 年，苏丹授予他埃及总督（khedive）的头衔，这个头衔源自波斯语对国王的称

239

呼，这使他的地位高于其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官员。1873年，他从苏丹那里获得了一道敕令，后者规定他的长子继承他的埃及总督职位。苏丹也授予伊斯梅尔制定国内法律和规则以及与外国签订条约和建立商业关系的权威。他被允许增加陆军和海军的规模。这些是主权国家的因素。伊斯梅尔一定已经认为他取得了与他祖父穆罕默德·阿里相同的甚至更高的成就。

建筑项目继续进行，而且当更多公路、桥梁、铁路和供水系统被建筑起来时，新建筑项目也开始了。高质量的邮政局建立起来，蒸汽船运载着邮件往返于尼罗河。伊斯梅尔在教育方面尤其活跃。他创建了一个教育部，他的教育长之一是著名的埃及知识分子阿里·穆巴拉克。他开设了大量学校，包括1873年建立的一个女子学校。阿巴斯关闭的语言学校再次开学，由从喀土穆流放中召回的瑞法·埃尔－塔塔韦领导。到伊斯梅尔统治结束，埃及有读写能力的人已经上升到了大约5%。伊斯梅尔颠倒其前任的政策，把军队的规模增加到了十二万人。

对外征服召唤伊斯梅尔。伊斯梅尔往南方派遣了远征军，扩大了埃及在苏丹地区的占领地，并建立了超过苏丹地区的前哨阵地。两次对阿比西尼亚的战斗在1875年和1876年灾难性地失败，但另一支军队进入索马里，并占领了哈拉尔城。红海西海岸的大部分都处于埃及人的控制之下。一时间，苏丹地区的奴隶贸易也被抑制住了，但这严重破坏了地区经济，而伊斯梅尔任命的管理者常常是不会讲阿拉伯语的欧洲人，他们不能处理新领土的事务。一位英国旅行者在埃及人征服苏丹以后，返回苏丹，对他看到的变化感到沮丧：

尼罗河两岸富饶的土壤自从被高度开发以来已经有几年了，现在已经被放弃。偶尔可以看到一丛不起眼的椰枣－棕榈树，但尼罗河两岸以前长满了郁郁葱葱的作物，现在变成了荒野。曾经挤满人群的村庄现在完全消失了；人都不见了。灌溉停止了。以前的夜晚被无数水轮的吱吱响声扰乱，现在死一样的寂静。没有 240

> 一只狗因为丧失主人而嚎叫。工业已经消失;压迫把居民赶离土地。[31]

到伊斯梅尔的统治结束时,苏丹地区的形势达到了无政府状态,马赫迪叛乱的时机成熟了,这次叛乱不久之后就发生了。

在埃及内部,主要社会变化正在发生,尽管很缓慢,而且有时注意不到。人口从1800年的大约450万逐渐增长到19世纪中期的550万。到1882年,埃及人口已经增长到了780万。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种人口的增长。土地的生产力已经被改进;1834—1835年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腹股沟腺炎瘟疫,尽管其他传染性疾病持续地减少人口的总数;或许穆罕默德·阿里的公共卫生项目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当然,这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并不意味着更好的生活,他们不得不为了有限的资源而竞争,他们受到政府税收、军事征募和强制劳役如此深的压榨,以至于他们经常诉诸古老的措施,即撇下他们的土地,逃之夭夭。

土地所有权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没收了马穆鲁克和宗教基金会的土地;随着时间的发展,他和他的继承人把这些土地中的很多授予各个奥斯曼土耳其的朝臣,创造了一个新的讲土耳其语的贵族集团,他们拥有巨大的地产。村首领也被很好地安置以开发自己的私有财产,结果一个当地埃及土地精英阶层出现了。这个新的、有特权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将在20世纪早期的埃及政治中变成一支强大的保守力量。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增加了,结果很多人到1871年变成了他们那些小财产的真正所有者,但他们的土地被重重地收税,而那些贵族却缴纳较低的税务。农民的命运仍然很艰难。

另一个重要社会发展是一个都市中产阶级的形成,由政府职员、教士和从事商业以及职业活动的人们构成。他们的数量最初很少,但他们获得教育,并占据职位,他们能够从这些职位中理解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也是口齿清晰的人,能够表达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结果他们也能够最终使他们的政治声音被人听见。他们越来越大的影响减少了诸

241

如乌力马(ulama,博学的宗教领袖)这样的传统权威人士的影响,这些传统权威人士以前就控制了国家教育和司法的很多职能。

但令人非常惊奇的是,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注意力并没有固定在他自己的社会。他比他的任何前任都更亲西方,他喜欢这样说:"我的国家不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1867年,他在参观了法国以后,返回埃及,对法国的转变感到炫目,这种转变是由拿破仑三世的工程师豪斯曼用巨大的公共建筑物、宽大的公园和广阔的林荫大道强加给巴黎造成的。他下决心把开罗变成尼罗河岸边的巴黎。他不满意于错综曲折的中世纪开罗街道,派遣他的工作队摧毁古老的街区,毁掉了沿途的很多建筑珍品,旨在使开罗能够拥有它自己的林荫大道。新花园也铺设开来。一个巨大的歌剧院在艾兹别奇亚建筑起来。它于1869年11月以威尔第的《弄臣》(*Rigoletto*)的演出作为开放序幕,并在1871年的圣诞夜前夕首次公演了作者的《阿伊达》(*Aida*)。那个歌剧院在1971年被烧掉之前,一直是显著的开罗地标。然后,一个新的剧院复合建筑在扎马雷克建立起来。

埃及也在19世纪比以前更欢迎西方参观者,而且空前多的旅游者利用了这个开放机会。很多人被神庙、坟墓和金字塔以及古代埃及的神秘性所吸引,这些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后就深深地吸引着广大民众。其他人出于气候原因来到埃及:医师有时认为旅居埃及可以治愈各种疾病。一些人被当时埃及的异国风情吸引而来。还有很多人是因为《圣经》来到埃及的,因为很多旅游者发现埃及的场景比他们在巴勒斯坦甚至耶路撒冷看到的场景更贴近《圣经》的描述。一旦法国人离开,而穆罕默德·阿里下令保卫国土的安全,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旅游者大潮涌向尼罗河。

大多数人来到埃及,观看埃及,之后就离开了,但一些人试图进一步熟悉埃及。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1797—1875年)是英国埃及学的创建者,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埃及生活了12年,旅游、研究和记录了纪念物,然后把他不同寻常的古代埃及社会观传达给广 242

大读者。威尔金森的朋友爱德华·威廉·雷恩(1801—1876年)沉浸在土耳其人和埃及人的社会里,并写出了其经典著作《现代埃及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1836年),这本书仍然被埃及的学者(事实上是整个中东的学者)用作基本文献。很多其他19世纪的西方旅行者和旅居者对古代和现代埃及都进行了重要研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严格意义上的业余爱好者,但他们对埃及的研究都为自己的研究项目服务。

但是,甚至没有学术倾向的旅游者也被鼓舞去写作他们在埃及的经历和对埃及的印象。或许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曾成为如此多的旅行见闻录的主题。两个埃及旅行论文集出类拔萃。阿米莉娅·爱德华兹的《沿尼罗河上行1000英里》(*A Thousand Miles up the Nile*,1877年)是一位专业作家一次从亚历山大城到第二瀑布冬季航行的记录,他用高水平的文学技巧描述了沿途的景色。爱德华兹对埃及产生了终生的兴趣,并变成了英国"埃及探察协会"的联合创建者之一。露西·达夫·戈登的《来自埃及的书信》(*Letters from Egypt*,1865年)是另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的产品。她来到埃及,希望减轻自己的肺结核病,却找到了她在英国缺少的爱和家的感觉。达夫·戈登是一位埃及的旅居者,而不仅仅是旅游者,她的书信展示了不寻常的深邃见识。19世纪有其他很多价值很高的埃及旅行见闻录,包括佛罗伦萨·南丁格尔的书,该书的标题也是《来自埃及的书信》,但还有一个有帮助的副标题"1849—1850年,在尼罗河的旅行"。南丁格尔严厉地批评埃及的很多事物,但她注意到了个人与土地所遭遇的转变的性质:"人们好奇的是,当人们从埃及返回来时,他们仍然过着自己以前过的生活。"[32]

对于19世纪的艺术家而言,埃及也是一块磁铁。在这个艺术遭遇的最初几十年——这个阶段可以称为绘图者阶段,艺术家们竭尽全力记录埃及提供的表面丰富的主题,无论是错综复杂的伊斯兰建筑物,还是古代纪念物。完美的著作经常被视作指南手册,尼罗河沿岸的纪念物按地形学的顺序出现。这表现在19世纪的第一个伟大绘图者的著

作里，即法文版的《埃及纪行》(*Description de l' Égypte*，1809—1824 年)，并在大卫·罗伯特的《埃及与努比亚》(*Egypt & Nubia*，1846—1848 年)石版套色印刷版画中达到顶点，石版套色版画几乎普遍存在了。罗伯特·海的《开罗插图说明》(*Illustrations of Cairo*，1840 年)在刚刚出现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的很多图版在 20 世纪被那么广泛地重印，结果变成了开罗城一些伊斯兰建筑最著名的作品。

19 世纪后半期艺术家的遭遇可以称为东方主义者的阶段。著作不再传达东方纪念物的神韵和耸人听闻的事情。精确并不是变得不重要了，恰恰相反，东方主义艺术家经过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常常能够用小心翼翼的细节表现他们的主题。但是，即使在那时，他们的目标也是用这种细节慑服观者，并邀请他或她经历它的知觉。英国作家威廉·梅克匹斯·撒克里(另一本旅游见闻录的作者)注意到了很多可能性。撒克里写道："开罗的画家们有运气和材料用于他们的整个创作。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样的建筑物、生命、独特性、灿烂的色彩、光和影。每条街和每个街边货摊上都有一幅图片。"[33] 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在埃及度过了十几年，为他的作品积累了大量材料，这使他成为英国最大的东方主义作家。在法国，把埃及的肖像传递给观众的重要艺术力量是多产的画家让-莱昂·杰罗米，他的肖像画在各种媒体中广泛再生产出来。东方主义艺术家的技术和力量是非常突出的，给人们提供了难以抵制的印象，即埃及和东方是危险和颓废之地，也是美丽诱人的国度。

埃及对西方视觉艺术作出的另一个贡献是它在摄影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及明亮清晰的光线与无穷无尽的生动主题材料一起保证自己将变成摄影师们喜爱的圣地。开创者是弗朗西斯·弗里斯，他于 1860 年出版了著作《开罗、西奈、耶路撒冷和埃及的金字塔》(*Cairo, Sinai, Jerusalem, and the Pyramids of Egypt*)。另一位对埃及进行研究的重要早期摄影师是马克西姆·坎普，他与法国作家福楼拜(另一部沿尼罗河旅游的旅行记的作者)一起在埃及旅行。弗里斯和坎普的

摄影学后代扩大成大群的旅游者,他们今日带着照相机出现在埃及的所有地方。

244 到19世纪中期,旅游者的溪流膨胀成了一场洪流。大规模的旅游时代已经到来。托马斯·库克变成了安排包办旅游领域的一个重要名字。最早的两个欧洲型的旅馆出现在开罗,它们是东方旅馆和谢普安德英国旅馆。据撒克里记载:它们"与法国南部大多数最好的旅社一样大,一样舒适"。旅行者们不再独自前行,不再主要尽自己所能地临时准备。约翰·默里的《埃及旅行者手册》(*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Egypt*,威尔金森写作的)出现在1847年,之后出现了几个版本。很多关于埃及的旅行指南书中的第一本出版于1878年。

但是,埃及的大多数欧洲人主要不是为了旅游、写作、绘画或摄影而出现在这里。他们到这里越来越多地为了谋生,在一些情况下是为了试运气,而且他们从一种实践的视角看待埃及。他们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据估计,到伊斯梅尔的统治结束为止,多达十万欧洲人生活在埃及。这个巨大的移居国外者社区变成了埃及生活的一个永久特征。尽管伊斯梅尔是亲西方的,但这还是为他和他的政府制造了很多困难。

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间的协议。这些协议自从16世纪以来就存在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了,当时苏丹授予欧洲人某些特权,例如税务赦免和遵守自己法律的权利。这些权宜之计允许欧洲商人在东方进行贸易,确保他们的人身、金钱和财产安全。政府间的协议并不是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的重要因素,因为埃及的欧洲人很少。而且对于他们来说,穆罕默德·阿里太强大了,而不能滥用他们的特权。但当欧洲人的数量和力量保持增长时,形势失去了控制。欧洲领事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继承者们扩充协议,并进一步为他们的国民要求权利。事情达到了这样一个点,即领事们在那些涉及自己国家公民的民事和司法事务中享有充分司法审判权,他们甚至能够在领事法庭中对抗埃及政府。得到保护的人们不是真诚的商人和可靠的旅游者,他们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风流习气,他们总是制造麻烦。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从一

个或另一个欧洲国家成功获得公民权的各个地方的流浪者，他们还借助公民权来获得领事保护。在埃及有 17 个不同的领事裁判权，每个领事裁判权都遵循不同的法典。如果埃及人控告外国人，那么他不得不在相应的领事法庭提起诉讼。这种制度是对欧洲人比埃及人拥有特权的严正声明，也使社会和经济的大部分内容超越埃及政府的管辖范围。

245

与此同时，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工程仍在继续。工作量极大。不仅要清理掉大量泥土和石块，还要从三角洲东部修建淡水水渠，把淡水引向运河主道，以便为人们提供饮水。另外，还必须在北方的曼扎拉湖的沼泽地修建一条水渠，也必须修建海港。两个完全新型的城市建筑起来，它们是伊斯梅利亚和塞德港。外交关系特别敏感，涉及到了开罗、伊斯坦布尔、伦敦和巴黎之间复杂的相互交往。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后悔自己同意埃及执行这样一项重大工程。英国最初坚决反对修建运河，认为运河把印度连接起来会造成伤害，这种立场在运河开通以后就改变了。法国也经常制造困难，尽管最终它变成了欧洲最坚定的运河支持者。

埃及在修建运河过程中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压力比预想的更沉重。根据最初的协议，伊斯梅尔继续为运河的挖掘提供大批工人。就埃及而言，这恰恰是强制劳役的另一次应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这种劳役制度规定公共工程项目必须征募劳力来完成。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把它广泛地运用到像穆哈马迪亚运河这样的建筑项目上；赛义德把强制劳役用于铁路修建上；一些外国旅行者已经悲痛地注意到了沉重的人类代价，但欧洲没有任何人给予更多关注。苏伊士运河当时正在欧洲人的详细审查下修建。当可怕的强制劳役状况被公布于众时，人们的观念受到了震动。那些反对奴隶制度的社会和英国政治家们强烈地谴责那种被称为奴隶劳动的东西，尽管很多英国人的态度很少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更多地是渴望阻止运河的修建。在强大的外交压力下，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命令伊斯梅尔撤回工人。1864 年春季，运河的修建工程搁浅了。

这种僵局部分上是由伊斯梅尔造成的，他挑起了关于强制劳役的 246 争辩。伊斯梅尔之所以挑起这场争辩，不是因为他对制度本身（他打算为了其他目的保持这种制度）产生了疑虑，而是为了利用这个问题从雷塞那里收回对运河的控制权，因为他认为赛义德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他做出了十分错误的决定，即允许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仲裁这场争辩。拿破仑三世通过婚姻与雷塞联合起来，完全有理由偏向于法国的利益，法国曾向苏伊士运河公司投入大笔资金。拿破仑三世做出了有利于雷塞的决定，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惩罚的力度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埃及政府不能提供劳力，并考虑到伊斯梅尔想在协议中进行其他方面的修订，所以拿破仑三世的判决是伊斯梅尔必须支付 400 万英镑作为补偿。这对于雷塞来讲是一笔横财，因为不仅埃及的劳动者（他们的报酬仍然非常少）返回来了，他还能够用这笔补偿金购买蒸汽挖掘机，以加速工程进度。雷塞拥有了足够的金钱来完成运河的构建。没有埃及人的贡献，运河就不可能完成。伊斯梅尔的游戏不应该如此惨重地失败。英国人迫使他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决议，但他却接受了决议。埃及的棉花价钱仍然很高。他还向欧洲银行家借贷，以弥补意想不到的开支。

苏伊士运河于 1869 年 11 月 17 日在宏大的号角声中开放。对于伊斯梅尔而言，这是一个向欧洲展示他在埃及完成了多么伟大的事业的机会。一千多位欧洲客人被邀请去参加运河的开放仪式，所有费用都由伊斯梅尔支付。这些客人都被邀请参加庆典、宴会和游历，这又花费了伊斯梅尔 100 万英镑。尽管大量穿越运河的运输线在它开通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是令人失望的，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但交通量增加了，结果公司在 1875 年以后就持续赢利。然而，埃及几乎没有从运河获得利润。赛义德和伊斯梅尔共在苏伊士运河上花费了大约 1150 万金钱，埃及的间接耗费更是无法计算。当埃及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时，运河也极大地提高了埃及对于欧洲的战略意义。

问题在于金钱。到 19 世纪 60 年代晚期，与 1865 年时期的情况相

比，棉花出口带来的利润少了一半还多，但伊斯梅尔的花费事项却比以前更多了。当棉花收入降低时，国内税收也在降低。整个经济都经历着灾难性的波动，乡下居民迅速破产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然而土地税却一再地提高，到了关键性的程度。1867年，对埃及观察入微的英国移居者露西·达夫·戈登在上埃及写道： 247

> 我不能向你描述当时这里的痛苦。事实上每天都有某种新税赋，想起这种事就令人厌倦。当时的每种牲畜——骆驼、母牛、绵羊、驴子、马——都要付税。农夫不再能够吃面包，他们只能靠大麦粉生活，大麦粉混合着水和新鲜的绿色原料、野豌豆等等，这对于习惯于美食的人们来说是可怕的。我发现所有我熟悉的人们正变得越来越破衣烂衫、穷困潦倒和焦愁不堪。……税赋使人们几乎不能维持生活——每费丹(feddan)土地上的作物要交纳100比索货币，这是对每种谷物、每种一年生水果征收的税赋。当这些谷物和水果在市场上出售时还得交纳同样数量的税赋。这也是对每个人、木炭、黄油、盐和舞女征收的税赋。[34]

当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从农民那里压榨时，伊斯梅尔于1871年廉价地把未来税收出售出去。任何地主若能够提前支付相当于土地年税六倍数量的税款，他就将被免除未来税务的一半，并获得土地的所有权。这仅仅暂时地稍微减轻了压力，但丧失了未来税收。这导致埃及向外国借贷。伊斯梅尔依赖于外国贷款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使他的两位前任的借贷相形见绌。这些借贷的条款极为苛刻。不仅利率很好，高达12%，大笔代办费、发起费和深度风险折扣也要从原始贷款数额中扣除，结果伊斯梅尔获得的金钱比贷款面值少很多。在1873年一笔3200万英镑的贷款中，他实际上只获得了1800万英镑。然而，他仍然要以较大数量的贷款额为基数支付高利息。这仅仅是几笔主要贷款中的一笔。

尽管伊斯梅尔陷入了更深的债务泥潭,但他并没有留心它的致命危险,并继续积极地在政府的所有领域推行改革,包括制度改革。他和其有影响的大臣帕夏努巴尔特别感兴趣的是限制那种政府间协议规定范围内的外国司法权限的毁坏性影响。他们的解决方式是于 1875 年设立了混合法庭。这个司法改革针对的是外国人与埃及人之间的民事和商业案件的司法权限,也针对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的司法权限,甚至针对欧洲人与埃及政府之间的案件的司法权限,这有时迫使政府履行不利于自己的决定。混合法庭的法官是欧洲人和埃及人,埃及法官由埃及总督任命,混合法庭的名字也因此而来。表面上看,混合法庭内部的法官数量是平衡的,但它实际上处于欧洲法官的控制下。欧洲法官由埃及政府支付薪金,却由欧洲列强任命。混合法庭也没有影响政府间的整个协议制度,仅仅影响了其一部分内容。政府间的协议始终起作用,直到 1937 年才被最终废除。

248

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伊斯梅尔已经绝望了。埃及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还债。1875 年,他把自己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以 400 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英国,这个价格是这些股份实际价格的四分之一(而且比它们将来很快就值得价格低很多),但这耗尽了他的资产,而且他的债务达到了极限。在接下来的一年,埃及停止了还贷。埃及国家破产了。伊斯梅尔的总债务达到了一亿英镑。在今天,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但这个数字在当时却是天文数字,远远超过了他或他的国家能够承担的范围。埃及每年的整个财政预算还不到 1000 万英镑。

外国债券持有者已经盘旋上升了一段时间。考虑到他们收取的利率和费用,他们的贷款可能被视作充满危险的投机,贷方将承担各种损失,但英国和法国是埃及大多数债务的发放者,所以坚决支持它们的银行家和海外商人。伊斯梅尔面对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同意组建一个欧洲委员会来管理埃及的债务。委员会的代表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1876 年 5 月 2 日,债务清偿委员会建立起来。债务清偿委员会最初旨在获得埃及的收入和处理埃及债务的偿

还，但迅速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机构。当债务偿还额低于预定额度时，债务清偿委员会迅速在混合法庭上提起诉讼。混合法庭便强迫埃及政府把钱交给债务清偿委员会。债务清偿委员会远不仅仅是一个处理事务的团体，逐渐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埃及的经济实施广泛影响。

249

“二元控制委员会”建立于 1878 年，法国和英国拥有监督权，不仅监督埃及的国家收入，还监督政府管理和操作。两个控制者分别是英国和法国，他们监督埃及税务的收集以便用于还债，还监督政府部门的收入。他们制定了苛刻的缩减薪金和消费支出的项目，这导致了尼罗河低泛滥那一年的广泛困苦，导致了人们对外来干涉的极端仇视。伊斯梅尔的财政部不再受他控制，他很快就丧失了对政府其他部门的控制。正如一位历史学家间接地提及的，西方国家和债主利用埃及人的债务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并最终占领了整个国家。

伊斯梅尔尽力改变这种历史进程，但为时已晚。军队官员的军饷被严重缩减，他们起而反叛，或许是受到了伊斯梅尔的鼓动。伊斯梅尔戏剧性地出现，并镇压他们。他解散了二元控制委员会，并设置了一个新部门。这个部门与他一样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倾向。薪金缩减政策被废除。新宪法被起草，把财政的控制权交给代表委员会。这个代表委员会是一个未经审查就批准的团体，是伊斯梅尔在 1866 年建立的。伊斯梅尔建立这个代表委员会的目的是为自己提供政治保护。这种措施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并将是重要的宪法出发点。代表委员会接受了宪法。但是，这些措施仅仅使法国和英国确信他们必须把伊斯梅尔赶走，他们非常平静而隐蔽地流放了他。

1879 年 6 月 25 日，当两个电报从伊斯坦布尔发到埃及时，伊斯梅尔正在亚历山大城自己的宫殿里。一个电报是写给“前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另一个电报是写给“他的高级总督泰乌菲克”的。这样，伊斯梅尔明白了，他已经被废黜，并被他 27 岁的儿子取代。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施加压力，令其根据英国和法国的债券持有人的利益行事，是相当简单的事情。苏丹和他的大臣们早就想着找

个机会除掉伊斯梅尔的羽翼了。这是一个他们一直等待的机会。伊斯梅尔无计可施。他的国家已经落到了欧洲银行家和支持他们的政府的手中。他乘坐埃及总督的游艇驶离埃及,走上了长期的流放道路。他首先来到意大利,最后经过反复请求之后进入伊斯坦布尔,苏丹允许他在那里生活。伊斯梅尔的废黜标志着穆罕默德·阿里开始的自治政府实验的终结。从这以后,埃及尽管仍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却处于欧洲列强的控制下了。

新总督泰乌菲克非常了解这一点。他应该喜欢在自己的方向上前进,但他夹在埃及民族主义的卡律布迪斯和西方控制的锡拉岩礁之间,他只能朝着西方行驶,尽管他早期参加过民族主义协会。代表委员会被解散,而二元控制委员会再次建立起来。控制者之一是年轻的伊夫林·巴林,这个人后来被称为克罗默勋爵。一个来自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成员构成的国际债务清偿委员会获得任命。这个委员会建议埃及收入的近一半用于政府开支,另一半交给债务清偿委员会,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和归还本金,这进一步加强了债务清偿委员会在埃及的作用。埃及再次实行严格的节俭措施,包括把军队的规模缩减到12000 人。这再次造成了埃及极大的困顿。

或许正是财政困难促使一群未受影响的军队官员组成了一个秘密团体。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根据埃及的利益、而非西方的利益行动。团体的成员包括陆军上校阿赫迈德·乌拉比。到伊斯梅尔统治结束时,官员们依靠宗教因素结合起来,他们从学生和农民当中吸收支持者。农民在 1877—1879 年的严肃经济紧缩中遭受了重创,这应该广泛地谴责欧洲的干涉。这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这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标语中表现出来:“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

当泰乌菲克不能有效地对抗欧洲人这种状况变得显而易见时,愤怒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升起,但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各个群体都忙于争夺控制权,结果直到军队官员占据主导地位,运动才有所作为。在 1881 年 9 月 9 日阿布丁宫殿的一场闹剧中,乌拉比向埃及总督提出了三个

要求：改编政府部门，召集代表委员会会议，扩大军队规模。由于军队强烈支持乌拉比，甚至宫殿护卫也支持他，从而泰乌菲克不得不同意。代表委员会在当年12月召开，并立即试图控制财政。这是债务清偿委员会完全不能接受的。乌拉比作为战争大臣加入政府，获得了人民的强烈支持。

这些发展威胁到了苏伊士运河和债务收集的安全，警醒了英国和法国。首先，他们试图威胁，签发了严苛的联合通牒，断言他们支持埃及总督。当然，这在埃及仅仅起到了反面作用，巩固了代表委员会中民族主义因素和军队之间的相互支持。英国和法国都不想采取军事行动，结果他们决定通过炫耀武力来制造障碍，向亚历山大城派遣了一支联合海军，这支海军于当年5月19日在亚历山大城海滨抛锚。这一行动旨在加强埃及总督与其敌手斗争的力量，结果再次起到了反作用，强化了乌拉比的政治地位。它还激起了人民的仇恨，这种仇恨在当年6月11日反欧洲人的起义中爆发出来，这场起义杀死了两千多埃及人和50个欧洲人。埃及内阁对英国宣战。 251

接下来，英国和法国在埃及的联合干涉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此时一个讽刺性的事件发生了。在这场冲突中，法国人自始至终占据领导地位，并敦促英国人采取行动，但法国政府突然因为巴黎的议会危机而瘫痪。法国舰队未能采取行动，便驶离埃及，留下英国人单独对抗埃及。对于英国人来说，事情进展的太远而不能停下来了，即使他们想停下来也不可能了，但他们仍然不愿意亲自入侵埃及。他们认为，或许一次对亚历山大城的海军轰击就能够倾覆乌拉比。海上轰击亚历山大城这件事发生在1882年7月11日，结果是预先注定的：它使乌拉比更成为民族英雄了，并使他严格地控制了事态。泰乌菲克逃往英国。

英国人已经用完了较次要的底牌。除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别无选择。因为危机期间英国干涉主义情绪兴起，所以这样的决定变得更容易了。英国人在当年8月份侵入苏伊士运河地区。1882年9月13日，乌拉比的军队在三角洲东面通往伊斯梅利亚途中的戴尔·埃尔－

凯拜尔进行抵抗,但被英军决定性地打败。英军由将军加内特·约瑟夫·沃尔斯利领导。因为他的这个功绩,他被提拔为贵族,变成了开罗和沃尔斯利地方的沃尔斯利子爵。乌拉比被判处叛国罪,并处以死刑,但在锡兰的审判将其减刑为流放。英国人不希望他成为烈士。泰乌菲克恢复统治,但英国人已经占领了埃及。



第十六章　英国占领时期的埃及

当英国人于 1882 年占领埃及时，他们的目标很简单，而且很有限：253 恢复埃及总督的权威，然后撤出。这是首相 W.E. 格莱斯顿[①]的坚定意图，他于 1883 年在市政厅的演讲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意图。但这个目标包含一种两难选择：如果英国人离开了，那么埃及的政治形势将再次变得令人难以接受，至少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是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的政府可能会再次成立，拒绝债务，然后事态将与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糟。另外，如果英国人急于离开，那么他们很可能失去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他们刚刚获得它。一个敌对的欧洲国家可能会夺取埃及，这是 19 世纪英帝国外交在对世界进行掠夺中真正考虑的事情。英国对埃及的短期占领是必要的，这一点很快就明了了。英国对埃及的这次占领持续了 70 年。

既然在埃及逗留一段时间是必要的，那么就需要有人掌握政府，并承担政府的很多职责。埃及政府已经暂时失效，或者大部分由埃及人掌握。在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达夫林对埃及形势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实施了一些极为必要的权宜之计以后，格莱斯顿的选择落在了伊夫

① W.E. 格莱斯顿（1809—1898 年）是英国政治家，于 1868—1894 年间四度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254 林·巴林(后来的克罗默勋爵)身上。1883 年 9 月 11 日,格莱斯顿任命伊夫林·巴林为埃及总领事。克罗默的信任状使自己成为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他最初是一位军官,作为印度总督的私人秘书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在 1877 年,他被任命为债务清偿委员会的委员,这使他有了管理经验,并深入了解了埃及政府和经济。然而,就格莱斯顿而言,克罗默之所以非常适合这份工作,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就从埃及尽早撤军这一点而言,克罗默与首相的观点一致。

但在一年之内,克罗默相信尽早从埃及撤军是不可能的,他最终放弃了完全从埃及撤军的思想。埃及处于混乱之中。埃及的基层组织混乱不堪;灌溉系统已被忽略,更糟糕的是,这延误了农时。行政管理的重组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军队的规模被缩减,学校关闭,官僚机构大量削减,为的是尽力平衡几乎不可能平衡的财政预算,因为埃及国家一半的收入不得不用于支付外债。当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任何人都会考虑如何脱身。

克罗默也逐渐相信埃及人不能统治自己,需要在英国的监护下进行长期准备。他对泰乌菲克的态度最好也就是谦逊的,而且他对埃及总督的大臣们从未感到满意,抱怨他们"软弱无力",而且"他们获得的任何刺激很快就消失,除非持续的努力用于保持他们的上进心。"甚至在埃及居住了很多年以后,他断言"埃及还没有生产出一个完全适合做管理者的人"。这种观点更具影响力,因为它被广泛传播到英国,并在爱德华·塞西尔勋爵厌烦享乐的论文集《一位英国官员的休闲》(*The Leisure of an English Official*)中雄辩地表达出来。塞西尔的著作最初是有趣的,但很快就变得令人乏味了,因为它无情地把埃及人描绘为无能的、装模作样的孩子,他们从来不能正确的理解事情,不能把重要事情与琐事区分开来。然而,尽管克罗默关于埃及行政管理的知识是全面的,但他几乎不了解埃及社会,他生活在埃及的 30 年里几乎没有学过阿拉伯语。但是,享有他最信任的顾问的服务。这个人是克罗默的东方秘书哈里·波义耳爵士,拥有强大的语言能力。波义耳经常在

开罗四处走动，伪装成土耳其人，与人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真实情感，充 255 当克罗默的耳目。

克罗默在埃及的官方地位是英国总领事当中最低的一个，然而他掌握的权力是很多国王和苏丹都羡慕的。他的权威没有正规基础。从司法上来讲，埃及仍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因此在埃及的高级英国外交官是总领事，英国的最高大使在伊斯坦布尔。埃及总督仍然在名义上通过他的大臣们进行统治，大臣们控制着他们所在的政府部门。事实上，埃及总督可能被控制了，他知道他的王位归功于英国人。每位政府大臣都有一位英国顾问，英国顾问的建议具有命令的力量。克罗默称这种安排为“傀儡大臣加英国顾问”政府制度。他的一位高级官员将其描述为“罩着面纱的保护国”，这种说法切中要害。大臣们很快就理解到，如果他们不注意他们的顾问，他们就会丧失自己的职位。克罗默统治时期，长期任职的最高大臣穆斯塔法·法米由于对英国人有用而获得重视。克罗默的地位因一支近一万人的英国陆军卫戍部队的出现而加强，而英国皇家海军能够在任何时候出现在亚历山大城或苏伊士，同时城市的警察也处于欧洲人的掌握中。我们或许最好把克罗默描述为近代殖民地总督。

尽管克罗默的权力是广泛的，但它们绝不是无限制的。法国对于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埃及被英国人剥夺感到愤怒，但他们仍非常强烈地出现在埃及人生活的很多领域。法国人经常运用自己在债务清偿委员会中的关键地位给英国人制造预算问题，并经常尽其所能地阻碍英国人占领埃及。埃及的国际主义是英国统治的一个问题，正如它对伊斯梅尔的统治造成的问题那样，因为政府之间的协议和领事裁判权使埃及的大多数欧洲人口超越政府的监视，有时允许他们随心所欲地做很多事情，而克罗默则不希望干涉其中。

另一个阻碍英国人尽早撤退的因素是苏丹地区的大混乱，伊斯梅尔在这里的冒险造就了混乱。1881 年 6 月，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阿赫迈德的苏丹人宣称自己为“马赫迪”（救世主）。根据穆斯林的信仰，救

256 世主将在世界的最后几天出现。马赫迪鼓吹要建立一种革命的伊斯兰教,这种伊斯兰教鼓舞了早期麦加和麦地那穆斯林的情绪,马赫迪迅速地获得了支持。马赫迪的苦修僧人军队穿着遮体法衣。在他们到达之前,苏丹地区虚弱的埃及政权就已经崩溃了。克罗默掌握了总领事职位两个月之后,帕夏威廉·西卡斯率领的一支埃及远征军在苏丹地区被消灭,这导致马赫迪掌握了苏丹大部分地区。

克罗默和英国政府根本不打算陷入苏丹地区的事务中,无论如何埃及也不愿意在这一地区冒险,但埃及人和欧洲人都需要从喀土穆撤离,而且埃及的南部边境也需要加强。将军查尔斯·乔治·戈登是一位在埃及和苏丹地区拥有长期经验的官员,1894 年被派往苏丹地区,执行英军撤退命令。然而,当戈登到达喀土穆时,他就将克罗默给他的指令"抛到九霄云外"了,并决定控制城市,即使城市非常匆忙地准备抵抗马赫迪军队的围攻。戈登的顽强抵抗引起了英国公众的想象和同情。英国政府对戈登的不服从命令而感到愤怒,但害怕抛弃他会引起民众的抗议。从而,英国政府派遣了一支由沃尔斯利伯爵率领的救援军队,但这支救援军队经过了长时间准备,而且直到城市陷落、戈登和他的军队被屠杀两天之后的 1885 年 1 月 28 日才到达喀土穆。英国人的大声疾呼是压倒一切的。格莱斯顿以前被称为"元老"(G.O.M.),此时被称为"戈登的谋杀者"(M.O.G.)。人们要求复仇。精明的格莱斯顿没有采取收复苏丹地区的行动,但英军从埃及撤出的希望当时比以前更遥遥无期了。英国对埃及的密切关注一时间成为必要之事,这是由埃及造成的。

当英国人习惯于长期占领埃及时,他们便很快宣称自己获得了很多成就,尽管面临着紧迫的财政紧张局势。克罗默和他的官员们在尽力应对这种局势。税务有效地收集,甚至降低了,以决定性地减轻农民的负担。1885 年,债务清偿委员会得到扩充,德国和俄罗斯加入进来,这至少弱化了法国借助这个强有力的机构阻碍英国利益的能力。经济展现出了复苏的迹象。到 1889 年,出现了正规而逐渐增长的财政预算

剩余。然而，这些财政成就并没有促使克罗默和英国人离开，仅仅使他们确信他们的存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

英国人在埃及公共工程方面的活动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中心工程是供水系统的修复，这些供水系统在当时之前那段混乱时期被废弃失修。首先要使原有供水系统恢复工作——清理水渠、维修水闸，完成所有对于灌溉系统非常必要的运转任务，这些任务是费力的，但需要高度组织。这些都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下一步是系统地改善基础水利设施，因为即使粗略的土地调查都表明埃及农业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这是由水的缺乏造成的，然而尼罗河水的大多数却未得到利用，就流入了大海。通过改善水的管理，生产力得到根本提高。第一个这样的项目开始于 1884 年。这个项目是整修开罗下游的穆罕默德·阿里尼罗河堤坝。穆罕默德·阿里建筑尼罗河堤坝的目的是整年传递更多可靠的水流到尼罗河三角洲，但它们建筑在不安全的地基之上。25000 英镑的低投资导致埃及棉花收入 1050000 英镑的净增长。

最野心勃勃的水利工程是阿斯旺水坝（不要与几十年以后建筑的阿斯旺大坝混为一谈）。这是一个优质花岗岩结构的水坝，依傍菲莱神庙下游不远处的第一瀑布的岩石群建造而成。它在接下来几个月保持部分泛滥水，为埃及更多地区提供四季不断的灌溉，尽管它也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即淹没了菲莱神庙，并永远地使神庙墙壁上明亮多彩的绘画失去光泽，这些绘画本来是历经两千多年仍然光彩如昔的。除了这些大工程，还有大量虽规模小但意义重大的项目，例如上埃及的阿西尤特拦河坝和尼罗河达米埃塔支流上的兹夫塔拦河坝。尽管克罗默在大多数财政预算中都是声名狼藉地吝啬，但他强烈地支持这些水利工程的改善。他甚至为了给它们提供资金而情愿借款。他希望这些水利工程能够回报他，而它们也的确回报了他。如此促成的农业生产力的飞跃是埃及迅速恢复偿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业的成功强化了英国人的一种态度，即埃及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没有必要使它工业化。所以英国没有在埃及的工业化领域做

258 出任何努力。相反,埃及的制造业受到阻碍。商业有所发展,尤其在保险和服务领域,但这些商业大多处于外国人的控制下。然而,技术发展仍在这个国家继续,扩大了铁路里程。19 世纪 80 年代,埃及引进了电话。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很多成就;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埃及被蓄意任凭滞后了。

在行政管理领域,英国人能够提出标志性的改善。几乎消除了行政腐败。行政部门实现了更高的效率。但英国人没有迅速地或足够强有力地进行彻底的司法制度改革,法国人和其他利益团体坚决保持他们的治外法权,这创造了克罗默所说的“司法迷宫,后者是时间和国际敌对势力在埃及建构起来的”。即使如此,司法制度在英国人统治下比以前更好地运转,至少 1906 年以前是这样。司法可能是严格的,但它通常被认为是不偏不倚的和公正的。在司法领域,腐败大大降低,效率大大地提高。案件能够比以前更迅速地解决,因此也比以前更节约了。法官被更仔细地选择,而且他们的工作要接受更详细的审查。英国军官重构了埃及陆军,训练并用包括机关枪在内的最新武器装备它。但克罗默几乎没有为埃及自治政府创造机构,因为他认为埃及人不准备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思想变得更坚决了。退休以后,他在 1908 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声称:“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埃及人能够生成在没有外国军队保护和外国人对其民事和军事事务进行指导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能力,但这个时期还很遥远。在我看来,经过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35]

英国人在埃及教育领域的行为是残暴的。读写能力早在伊斯梅尔统治时期就已经逐渐提高了,但在英国人统治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改进,英国人允许教育停滞不前,甚至阻碍它的发展。1882 年当财政预算出现紧张局面以后,政府减少对教育的支持,这或许是一个勉强的借口;但到 1889 年,每年财政预算都有剩余,克罗默还是不愿意把它们用于

259 教育。为了把大学毕业生限制到政府雇佣能够使用的水平,他强收学

费；当申请者的数量无论如何都在增加时，他提高了学费。克罗默在自己的书信中鼓吹道："在英国占领的早些年，几乎所有考人政府学校的学生都接受免费教育。很多年过去了，目前大部分学生都要为他们的教育付费。"英国人从未把多于3%的财政预算用于埃及的教育事业。他们忽视人们对国家大学的需要，害怕它会变成民族主义的中心，并相信埃及的有效发展不需要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当一所国家大学最终于1908年建立起来时，那完全是埃及人主动和自力更生的结果。

随着越来越多的英国军官到达埃及，他们集结成了一个独立的社区。在较早几代英国旅行者和旅居者当中，很多人至少已经从表面上渗入到了埃及社会里，熟悉了埃及语，学习了一些阿拉伯语，甚至采用了东方的服装和生活方式。而此时的英国旅行者和旅居者都不再这样做了。除了那些他们在政府部门里一起工作的埃及人和在他们家中照顾他们的仆人们，新的英国管理者几乎与埃及人没有任何接触。他们被鼓励保持与埃及社区的分离状态；他们的妻子不能与埃及妇女群体建立联系。种族隔离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社会一以贯之。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的卖淫场所包含很多欧洲国家的妇女，但克罗默禁止英国妇女在埃及从事贸易活动。

公共教育部的英国顾问道格拉斯·邓洛普竭力打消那些进入他的部门的英国人学习阿拉伯语的兴趣，因为"阿拉伯语仅仅使他们了解当地人的浪漫主义思想，而且他们将浪费时间地用阿拉伯语解释他们教给当地人的内容，而没有使当地人学习英语"。大多数新上任的官员都要经历他的部门，因为教育通常是分派给新上任的英国官员的任务。当邓洛普接见申请者时，他拒绝考虑来自剑桥大学阿拉伯专业的毕业生。幸运的是，邓洛普的观点并没有绝对地占统治地位，因为克罗默的行政部门给予那些学习阿拉伯语的官员以200英镑的资助，但所有语言机构仅仅为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服务，而没有与埃及社会联系起来。

种族隔离被开罗的大量机构强化了。扎兹拉运动俱乐部于1882年在扎兹拉宫殿后面一小块土地上建立起来，具有非常明显的英国俱

乐部特征,建有18个洞高尔夫球场、一个跑道和一个马球场。人们把它视作开罗的国家俱乐部。开罗有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俱乐部。而特夫俱乐部几乎绝对是英国俱乐部,其中心设在市中心,位于今日犹太教会堂旁边的阿德里大街。参观者会注意到:“几乎上流社会的所有英国人都属于这个俱乐部。”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晋升到了行政文职的最高位,能讲一口异常流利的阿拉伯语,对中东非常了解,把特夫俱乐部描绘为“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会和民族堡垒”,并解释了它在其同事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 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的英国官员……是艰苦而可敬的工作人员,从清晨到午后严守时刻,一丝不苟地工作。然后,他将驱车或骑自行车到特夫俱乐部或他的公寓吃午饭,在运动俱乐部打网球或高尔夫球直到夜幕降临,之后返回特夫俱乐部讨论白天的事务,并在这里或在他的公寓里吃晚餐。因此,埃及高级官员或低级官员对普通英国官员的所有认识是每日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在办公桌旁凝视着他的那张熟悉的面孔,星期五除外。非官方埃及人甚至连这都看不到。[36]

正是在这些俱乐部里,很多管理埃及的实际业务得以执行,而且来自英国的新事物被引入到社会体系当中。俱乐部也支持欧洲人和埃及人之间的种族隔离,因为扎兹拉运动俱乐部和特夫俱乐部都仅仅象征性地吸收少量埃及人作为成员。根据斯托尔斯的记载,“对于外国人来说,选举入会是很难的;对于埃及人来说,使用任何一个俱乐部都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当我与几位埃及人成员中的一位一起进来打网球时,我发现很多双眼睛在注视我”。而这个埃及人是未来的总理。其他机构,诸如谢菲尔德旅馆和新塞米勒米斯宾馆这样的大客栈(在11月到来年3月的“旅游季节”容纳旅游者),也为欧洲社会和商业目的服务,并帮助使欧洲社区变成埃及内部的独立世界。在一些官方职责方

261

面，英国人与埃及人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使这些相遇也被保持在最小的程度上。克罗默的继任者是埃尔顿·乔斯特，他每日邀请如此多的埃及人共进午餐，每周还邀请很多埃及人共进晚餐，他因此受到其英国下属的严重批评。

泰乌菲克死于1892年，由他17岁的儿子阿巴斯·希尔米二世继承，后者当时正在奥地利学习。泰乌菲克是很容易相处的。克罗默给英国外交大臣写信说："我在幕后操纵"。克罗默认为新埃及总督也是容易控制的，但很快他便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阿巴斯比他的父亲强硬。第一次碰撞就在一年之内发生了，当时圆滑的穆斯塔法·法米病倒了，阿巴斯想任命他自己的首席大臣。克罗默坚决反对，并获得了伦敦的支持，成功地要求阿巴斯撤回他的任命；而且，阿巴斯不得不许诺他将始终"最情愿地接受英国的建议"。

在下一年，阿巴斯进行了一次军事视察，并说了一些对军队和他们的英国军官的贬损之话，他认为他们的表现达不到标准。克罗默正在等待机会再次战胜埃及总督，从而对阿巴斯的言行非常气愤，要求公众支持军队，废除阿巴斯的军权。因为克罗默的要求得到了伦敦的支持，而且威胁要把埃及军队从形式上和实际上都放在英国人的控制之下，所以阿巴斯除了遵从别无选择。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钦佩地写道："我们的总领事那么充分地利用了这次机会，向埃及总督诠释了英国与埃及的真正关系，对于双方来说，这种彼此支持的关系是必要的。"

克罗默当时正获得胜利，但他也正在得到阿巴斯的持久敌视。阿巴斯的地位显然是尴尬的，因为克罗默是他的对手，而埃及政府和军队只服从克罗默，而不服从他。几年以后，阿巴斯回忆道："因此，我在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统治，持续地焦虑不得不保护自己以避免被那些显然针对我的伏兵伤害。我身边尽是些无能之辈，他们习惯于在外国强权面前卑躬屈膝、为自己寻找保护者和朋友，但外国强权对埃及的图谋却早已昭然若揭。我只能时刻保持警惕，避免出现任何能够毁灭我梦想的大错。"[37]

262 阿巴斯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和憎恶驱使他求助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正作为一种力量在埃及再次兴起。事实上,阿巴斯就是埃及民族主义的早期倡导者之一,他本人还领导了一个秘密民族主义社团。年轻的穆斯塔法·卡梅尔也热心地参与其中。民族主义运动对更西化的富裕的中产阶级有吸引力,但大量宗教思想家也支持它。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通过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而且极为坦率直言的埃及出版社宣传开来,克罗默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控制这个出版社。这或许是因为克罗默拥有出版自由的思想;更可能的是,他认为既然如此少量的埃及人能够读写,那么它的影响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无论如何,他低估了这个出版社的力量。到1909年英国人试图驾驭埃及人的出版社时,它已经变得难以控制了。

民族主义者也获得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鼓励,尽管这种鼓励源自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法国人希望为英国人制造麻烦,而非真正地同情民族主义者的理想。阿巴斯与这第二群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很多根本分歧,他们最终只能分道扬镳。阿巴斯是一个真正的埃及爱国者,比很多民族主义者更爱国,而很多民族主义者也涉足于泛奥斯曼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教;作为穆罕默德·阿里的真正继承人,阿巴斯的首要目标是恢复埃及总督在埃及的权威,而很多民族主义者更关心舆论和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但就当时而言,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是阿巴斯的唯一出路,这也符合双方的直接目的。

到1890年,英国人对苏丹地区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新首相索尔兹伯里不加掩饰的帝国主义代替了格莱斯顿遮遮掩掩的帝国主义。索尔兹伯里根本不打算从埃及撤出,实际上已经决定把埃及作为再次征服苏丹地区的根据地。他的这种思想获得了他的保守党和普通民众中兴起的帝国主义情绪的支持,他们仍然想向戈登的谋杀者复仇,他们听说了很多关于苏丹地区的恐怖条件和哈里发的残暴专制统治的事情。当马赫迪在喀土穆陷落之后不久去世时,哈里发掌握了权力。苏丹地区实际上是坚定谋求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就是彻底控制从河

流上游源头到大海的尼罗河，这个野心最终被实现。克罗默一直留心他所统治的埃及水利文明的本性，一旦他确信埃及政府能够为这些野心提供支持，那么他就会支持他的政府彻底控制尼罗河。他说："当从湖泊到大海的尼罗河水域最终被彻底控制时，我们完全有可能自豪地说，人类——在这个事例中指的是英国人——已经把自然的赐予转变成了最可能的利益。"

263

虽然决定确定下来了，但在苏丹地区遭到英国人的入侵之前，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是因为埃及政府不得不为战斗支付资金，而且只有在 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一系列财政预算剩余的情况之后，战斗才能够进行。直到 1896 年 3 月，索尔兹伯里才命令埃及的英埃军队司令赫伯特・基钦尔爵士向尼罗河上游进发。大约三分之一的远征军是英国人；其余的是埃及人。军队的前进速度很缓慢，遭到低水位和霍乱爆发的阻碍，后者比战场上死的人还多；而且，埃及政府也出现了财政赤字，债务清偿委员会拒绝批准远征军的进一步前进，迫使基钦尔停止前进，直到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铁路不得不在努比亚建筑，以便支持入侵，这导致了进一步的耽搁。

英埃军队与哈里发军队的第一次主要会战于 1898 年 4 月 8 日发生在阿特巴拉河和尼罗河汇合处，这是一次激烈的肉搏战。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尽管苏丹人的损失比例更大，死 3000、伤 4000；而英国人伤亡总数只有 551 人。决定性的战斗于当年 9 月 2 日发生在乌姆杜尔曼（从喀土穆穿过尼罗河就可到达这里）。哈里发的六万苦行僧战士装备着长矛和步枪，与不到三万的训练有素的英埃军队展开激战。英国军队人数虽少，但装备着现代来复枪、大炮和机枪。在大约五个小时的时间里，勇敢的苦行僧战士一再发动进攻，但被英埃军队猛烈的火力摧毁。一位英国参战者回忆道："他们未被驱赶回去；他们都在进攻中被杀死。"当战斗结束时，乌姆杜尔曼战役使苏丹人至少死一万一千人、伤一万六千（这些伤员中的很多后来也被杀死了），而英国军队总共死亡 49 人、伤 382 人。

当哈里发率领着他的残余军队撤退到科尔多瓦时,英埃军队进入了喀土穆,抢劫了城市。根据基钦尔的记载,基钦尔下令毁掉了马赫迪的坟墓——"朝圣和狂热情感的中心",并把马赫迪的尸体抛入尼罗河。基钦尔保留了马赫迪的头骨,当维多利亚女王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非常恐惧。尽管乌姆杜尔曼战役粉碎了马赫迪国家的政权,但抵抗运动一直进行到 1899 年 11 月 24 日哈里发在乌姆·迪维卡拉特战役中战败被俘。战斗结束以后,人们发现他死在了他的祈祷垫子上。

264

苏丹地区的再次征服产生了一个需要处理的直接问题。在英国人看来,像以前那样,恢复埃及人对苏丹地区的统治是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的做法,但这也是在冒险,会使事情再次变得糟糕不堪。除此而外,苏丹地区近期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是针对埃及人的。正是为了反对埃及人的统治,苏丹人首先发动了起义。在 19 世纪末期,将苏丹地区合并进大英帝国这样的主张对很多英国政治家具有吸引力,但这也将冒犯埃及人的意愿,因为埃及为战争贡献了大多数金钱和人力。克罗默的解决方式是英埃共管。根据这个 1899 年获得批准的策略,苏丹主权被埃及总督和英国王室分享。英国和埃及的国旗肩并肩地在苏丹地区的上空升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任何主张都得不到重视。苏丹政府由一位大总督统治,这个大总督由埃及总督任命,但由英国政府提名。共管地区不允许有任何欧洲人的特权存在,例如混合法庭和领事裁判权,埃及的英国人对此是如此的恼怒。

尽管英国人和埃及人享有表面的平等,但从一开始英国人就在共管中占据主导地位。所有大总督都是英国人,而且所有高级官员也都是英国人;埃及人被安置在较低级的岗位上。不允许埃及为苏丹地区制定法律。共管很快变成了埃及人持续痛恨英国人的源泉,尤其在埃及人获得了对自己事务的控制权,并徒劳无益地争取在苏丹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实现与英国真正平等地分享权力之后。无论如何,共管一直持续到 1956 年。

苏丹地区的第一个大总督是基钦尔,但他很快就被雷金纳德·维

哥特爵士继承。雷金纳德·维哥特非常成功的任期从1899年延长到1916年。维哥特获得了他的能干的大检查官鲁道夫·萨拉丁的辅助，后者是一位具有独特气质的人。当马赫迪战争爆发期间萨拉丁被捕时，他正作为达尔福尔地区长官在苏丹地区服役。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变成了哈里发的奴隶，获得了很多见识，而当他逃跑以后，他的这些见识对于英国人处理苏丹地区的事务是非常有用的。英国人通常在这个大国家采取两种政策。在北部，他们主要通过占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机构工作，并用阿拉伯语处理业务。然而，在南方，基督徒的数量更多，英语得到鼓励，基督徒的传教活动得到支持，而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受到压制。这种分歧对苏丹地区的内部事务产生了持久影响。

为苏丹地区的行政管理提供人才的需要导致了克罗默最后一个主要措施，即英埃文职的创建。当然，英国年轻人早就已经受雇佣在埃及和苏丹服务几年，但还没有任何成套的标准用于规范他们的选择任用或之后的生涯。克罗默以他在印度的文职经历为基础，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根据几个标准对申请者(大多数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进行仔细筛选。这些标准包括智识、个性和健康。理想的新成员被描绘为“拥有真正精力和管理能力”的年轻人。新官员一旦被选中，就会被分派到埃及或苏丹地区——他对这两个地区没有任何选择权——并作为检查员，拿着最低工资开始工作，但有希望晋升到一个很好的职位，并领取较高的薪水。英埃文职的标准是很高的，完全堪与印度文职的标准相比美。

尽管英埃文职的创建似乎是一种自然的改革措施，但它进一步使英国的统治制度化，使英国从埃及撤军的期望比以前更渺茫了。英国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埃及官员被进一步边缘化，从而否定了埃及官员的职责和经验。就英国人而言，埃及人根本就没有竞争力，但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种新制度就是进一步剥夺了埃及人从处理他们的行政事务时所犯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机会。新的英国官员不会

作为教师帮助埃及人,想当然也不是埃及人的同事;相反,他们舒服地进驻欧洲私人俱乐部、旅馆和运动组织,而埃及社会和英国社会越来越隔离开来。埃及民族主义者把新的文职看作是巨大的倒退,痛恨它的存在。

266 到克罗默长期有权而无君王称号的统治末期,他越来越独裁了(人们在他背后常常将其称为"扒皮巴林[Over-Baring]",这是对其原名的一种玩弄)。他直接向政府部门签发指令,完全避开埃及大臣们。年龄的增长和健康的恶化使他易怒而暴躁。再者,当英国在埃及统治了 25 年时,他一定感到自豪的是英国人在他的监督下所做的事情,而且他坚信的事情将继续平稳发展。新的文职运转良好,而且当英国和法国因都对德国感到恐惧而被迫联合起来时,英法两国的关系迅速地向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变。在 1904 年签订的《友好协议》中,法国正式接受了英国对埃及的无限制占领。这使克罗默的工作更容易了,消除了法国在官方事务中的障碍和法国对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没有任何广泛不满的迹象,更不用说起义甚或严重骚乱了,这显然证实了克罗默的观点,即如果英国成功地管理埃及,那么人民大众就会感到高兴,并保持沉默,把民族主义者边缘化。民族主义者无论如何仍然是少数人。这种估计被 1906 年发生在三角洲一个村庄中的系列事件颠覆了。

1906 年 6 月 13 日,一群英国军官到丁夏维村庄射猎鸽子。这本身是一种大文化麻木的行为,与走进一个英国农民的畜群场、将其鸡群毁灭掉具有同样的意义。因为埃及人把这些鸽子视作家养动物,所以在锥形窝棚里喂养它们,这些窝棚常常是埃及人房屋的一部分。或许只是运气不佳,一个附近的打谷场在那时恰好着火了。一群愤怒的农民认为这是英国人点燃的,埃及男性农民用粗大的木棍武装起来,涌出村庄,对抗军官,解除了他们的武器。一支枪走火了,一位妇女应声倒地,显然是死了;几个男人被这次射击激怒了。群众怒不可遏,向军官们攻击,打击他们。军官们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尽管一个上尉因中暑,虽然有一个村民试图去帮助他治病,他还是死了。当一支英国士兵到

达现场时，他们认为这个村民杀死了上尉，他们把他打死了。

克罗默正计划像每年那样去英国度暑假。他没有耽搁，把这件事情留给较低级官员处理。他们毫不犹豫地采取迅速而残忍的行动。他们建立了一个特殊法庭，这个法庭不受任何法典限制，没有任何法律可以援引。几乎所有法官都是欧洲人。当年 6 月 24 日，56 名村民被迅速审讯。三天以后，判决结果公布出来。被告中的 31 人被宣告无罪，但对宣布有罪之人的宣判是令人震惊地严格。四个人被处以绞刑。其他人获得从 50 下鞭挞到无期徒刑的判决。惩处在丁夏维村庄外面公开执行，村民被迫观看。 267

国际上对这个案件的反应是厌恶，埃及人的反应是愤怒。穆斯塔法·卡梅尔获得了一次公众支持的洪流；埃及总督和卡梅尔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决裂了，当时则捐弃前嫌。如果克罗默在返回埃及时就迅速而公正地行动，申斥他的官员，对发生在丁夏维的事件表示歉意，即使不是道歉也可以，那么英国人或许还可以从当时的形势中挽救回某些东西，但他决定支持既定事实。丁夏维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埃及人逐渐得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即正义从来就不能寄希望于统治他们国土的外国人。

与此同时，一个新政府逐渐在英国掌握了权力。强大帝国主义者的保守党已经主导了英国政治达 20 年之久，在 1906 年的大选中遭遇惨败。很多关心帝国命运的人害怕新的自由党政府会放弃帝国，但自由党人士并没有这样的意图。他们的改变仅仅是程度问题，而非根本的帝国政治问题。在埃及，当面对民族主义的明显上升时，自由党的策略是吸收足够缓和的民族主义者以建立和谐关系，从而使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处于孤立无援和无效能的境地。同时，他们想战胜埃及总督，借以获得他的支持，同时分裂他与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英国的长期目标是为埃及准备更多的自治。新手段失败了，部分上因为英国人不恰当地运用这种手段，部分上因为这种手段几乎没有足够地得到实行，部分上也因为自由党低估了埃及民族主义的力量。

268 克罗默不可能已经意识到，当他于1907年辞职时，他统治埃及的措施的根基已经被那么彻底地破坏了。埃尔顿·乔斯特被任命接替克罗默的职位，这是变化趋势的一个明显标志。与克罗默不同，乔斯特能流利地讲阿拉伯语，并准备做一个更好的调和者。他迅速地与阿巴斯培养起友好关系，他通过授予阿巴斯更多的权力而很容易地把阿巴斯与民族主义者拆离开来，因为他与埃及总督的联盟始终是必要，而非意气相投那么简单。但笼络民族主义者更困难。克罗默已经采取了一些勉强的主动措施，例如鼓励中庸的民族主义者组建自己的政党，任命一位中庸的民族主义者担任教育大臣。乔斯特通过减少英国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和给予立法委员会以及将军委员会更大的任务来加强效果，后面这两个委员会是咨询团体，是英国人在占领埃及伊始解散代表委员会以后建立起来的。这未能满足民族主义者构建以正当立法机关为基础的宪法的需要，这也是乔斯特不愿意让步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也因乔斯特与埃及总督的密切关系所恼怒，他们欢迎乔斯特作为他们的联盟者和民族主义情感的焦点，但并不希望他凭借自己的头衔充当政治表演者，想当然也不希望他增加权力。

1908年，乔斯特任命鲍特罗斯·加利（联合国秘书长的祖父）担任首席大臣一职，这激怒了民族主义者和很多其他人。鲍特罗斯·加利是一位基督徒，曾经是丁夏维审判的法官。这种任命显然是更加笨拙的，尤其当政府正被视作亲基督徒的政府时。随着人们对苏伊士运河公司是否应该出让股份而进行令人厌恶的争论，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之所以苏伊士运河要出卖股权，是因为1969年是苏伊士运河原有股权的最终期限。一些人建议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延长40年。这本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苏伊士运河公司每年给予埃及政府一些报酬，埃及政府也会从运河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但民族主义者在立法委员会里强烈谴责这个建议，并将鲍特罗斯·加利谴责为声名狼藉的叛卖者。所以上述建议最终被拒绝，但1910年一个穆斯林民族主义者对加利实施刺杀。对极端民族主义进行镇压的反冲结果有效地结束了乔斯特逐

渐把职责转交给埃及人的政策，并消除了他的较小成就。乔斯特已经 269 令埃及人失望了，也令英国人失望了。英国人逐渐相信加利放弃了太多的东西，而且他与埃及人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乔斯特作为病人返回英国，并于 1911 年去世。

专制的基钦尔代替乔斯特出任埃及总领事，这标志着英国政府的另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比乔斯特的调和政策更大。新方法是采取更强硬的路线。基钦尔采取严苛的政策对付民族主义者，并且毫不费力地获得了阿巴斯·希尔米二世的支持，虽然他以前一再与阿巴斯·希尔米二世发生冲突。他可能宁愿消除阿巴斯，但他认为对埃及公共情感的冒犯是不值得的。然而，即使基钦尔也不能扭转时局，他只能以谦逊的政治改革前进，创建了一个比旧立法委员会拥有更多选举成员和较广泛权力的立法委员会。与此同时，他密切关注行政管理，尤其关注灌溉和农业，并解除农民的债务。他真诚地实施这些措施。

尽管在丁夏维事件之后，民族主义变得更强大了，但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统一起来。这些运动群体包括那些想要与埃及总督和英国人合作的群体，包括支持议会民主制的那些群体，还包括那些倡导恐怖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极端派别。1908 年，穆斯塔法·卡梅尔的死亡消除了国民党的统一力量，他拥有最广泛的追随者，没有同等地位的领导者可以代替他。乌玛党主要是由地主和知识分子组建的，是更谦逊的党派，包括英国政治和文学生活的几位杰出人物。萨阿德·扎哥卢勒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个富裕村庄首领的儿子，萨阿德·扎哥卢勒于 1882 年如此热心地加入革命运动；当革命运动被镇压时，他勉强地逃过死刑。自那以后，他就作为律师和法官从事更传统的职业。他的关系网极为广泛，能力极强，他的成就证明了这点。克罗默在谈到扎哥卢勒的时候，说："他掌握了为他的国家服务的所有必要品质"。"他是诚实的；他是能干的；他有信仰的勇气。他应该走的更远。" 1906 年，克罗默任命扎哥卢勒为教育大臣。他在这个位置上通过勇敢地抵制他的英国顾问和在政

府办的初等学校坚持用阿拉伯语而非英语作为教育语言,证明了他的270勇敢。1910年,他被给予更重要的部长职位,即司法大臣。作为一位调节者,扎哥卢勒与民族主义者、埃及总督和英国人保持着工作关系;但到1912年,他开始趋向于政治独立和议会民主制。与埃及总督发生冲突以后,扎哥卢勒从政府中撤出,并作为乌玛党的成员获选进入新的立法委员会。

乌玛党控制了立法委员会,扎哥卢勒被选举为该党的副主席。埃及总督在立法委员会中几乎没有追随者。如果埃及总督已经邀请扎哥卢勒组阁,那么他或许还可以挽救某些东西,但他既不信任扎哥卢勒,也不信任乌玛党,反而任命侯赛因·鲁史迪出任内阁首领。侯赛因·鲁史迪的家族长期服务于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不幸的是,鲁史迪在立法委员会中没有稳固的根基,而且从长远来看他是不忠诚的,而扎哥卢勒变成了政府反对派的有效领袖。立法委员会直到1914年1月才开始工作,并仅仅召开了几个月的会议。然而,正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在扎哥卢勒的领导下,立法委员会朝着对内阁和政府管理的控制方向做出了真正的进步。我们很难推测如果这次有限议会民主制的实验没有被欧洲事件所打断,那么它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当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面临着选择与德国还是与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联盟的沉重压力,但大约几周的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人拒绝与任何一方联盟。埃及总督阿巴斯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例行的暑假,因一次遇刺经历而延长了假期。当他完全康复,返回埃及时,英国命令他在战争时期外出。1914年10月29日,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倒向德国一方时,德国人正推进到比利时和法国腹地,把英军和法军压制到了极限。这威胁到了埃及和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在当年11月2日,英国在埃及宣布战时法。他们解散了立法委员会,并强制实施审查制度;持不同政见者被软禁起来;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活动被迫中断。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英国宣布为敌人,英国不再仅仅通过占

271

领埃及而伤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利益了。1914 年 12 月 18 日，英国宣布对埃及实行保护国制度。遮遮掩掩的保护国制度被撕去了面具。在第二天，另一份宣言废除了阿巴斯·希尔米二世，因为他“明确地与陛下的敌人联盟”。从继承制度着手，就像这个制度在 1866 年建立时那样，英国人用他的叔叔侯赛因·卡梅尔代替了他。侯赛因·卡梅尔是一个年迈的人，容易控制。作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一记耳光，侯赛因·卡梅尔被给予苏丹的头衔。阿巴斯再也未返回埃及，在放逐生活中度过了他的余生，1944 年死于日内瓦城。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主要军事目标之一便是重新征服埃及。然而，他们沉重地执行对抗俄罗斯的战争，英联邦军队对加里波利的攻击尽管没什么效果，但牵制了大部分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如何也不能准备进犯埃及的战斗了。即使如此，1915 年 2 月，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埃及开始了令人震惊的进攻，进攻到了苏伊士运河的东岸，甚至打到了苏伊士运河的西岸，但他们太虚弱了，不能控制他们的占领地，不得不撤出巴勒斯坦。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司令下令于 1916 年 2 月对埃及进行大规模攻击，但因缺乏运输，从而一直耽搁到灼热的仲夏季节。埃及的防御非常牢固，奥斯曼土耳其人损失惨重。即使如此，大约两年的时间，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迫使英国沿运河地区驻扎了大批军队。1917 年，英国进犯巴勒斯坦，经过最初的几次拉锯战之后，把奥斯曼土耳其人推了回去，并于当年 12 月 11 日占领了耶路撒冷，确保了埃及的安全，使其免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攻击。

战争对埃及的最大影响不是来自埃及国土上的军事战斗，而是源自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出现在埃及和保护国对埃及的控制水平越来越高。成千上万的英国战士和同盟国军以及水手在战争期间不时地驻扎在埃及，这把埃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成群的公务员从英国来到埃及，为埃及提供文职人员。在保护国制度时期，埃及的首席英国官员是一个高级专员。当战争爆发时，基钦尔正在英国，并没有返回埃及，被任命为国家战争秘书，因此埃及的第一个高级专员是亨利·麦克

马洪爵士。他的继任者是雷金纳德·维哥特,后者于1917年上任。高级专员运用比克罗默所拥有的更大的权威进行统治,不受法国人或埃及人的干涉,埃及人表达反对的措施遭到镇压。新苏丹侯赛因·卡梅尔几乎不会制造麻烦,他是英国人的傀儡,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幸的是,麦克马洪缺乏经验,维哥特缺乏以埃及人的利益为基础进行统治的个人技能。英国人的注意力几乎绝对地聚焦于战争事业。

272

埃及为英国人的战争事业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经常是在极端强制的情况下做出的贡献。在战争时期,埃及人的税务繁重,生活费用急剧上涨。埃及人的食物供给和建筑物被征用。在这种等同于强制劳役制度复苏的制度下,大量男士被征募到诸如骆驼兵团和劳动兵团这样的辅助军队里。从1916年开始,令战士们绝望的是,英国人开始把埃及人吸收到军队中。英国人也征募埃及人的牲畜,带走驴子和骆驼,而这些经常是埃及人的生活必需品,却不给予埃及人足够的补偿。这些艰难情况部分上被越来越高的繁荣所抵消,这种繁荣是由埃及内部的军费开支造成的。例如,英国人意识到埃及棉花作物的重要性以后,为了确保他们可以购买到生死攸关的日用品,便开出了合情合理的优厚价格,尽管这种行为也是由确保战略物资供应的需要造成的,并最终导致了食品的高价格,因为土地被用于棉花生产。

1917年10月苏丹侯赛因·卡梅尔去世时,英国对埃及控制的紧密程度变得更明显了。英国人再次更改了继承条款,结果侯赛因·卡梅尔的继承者不是他儿子(英国人认为他是反对英国的),而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阿赫迈德·福阿德。最初,福阿德足够好地为英国服务。但时间证明,他是野心勃勃的、专制的和偏执的。首要的是,他不想仅仅充当傀儡角色。为了获得联盟者,福阿德开始与萨阿德·扎哥卢勒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后者正获得更强大的追随者。但福阿德并不热衷于议会民主制,接下来的事件一再表明了这点。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尽管埃及存在对保护国制度的广泛仇视,尽管埃及在战争时期忍受了多方面的艰难困苦,但

埃及几乎没有发生抗议或争议。伦敦和开罗的英国官员认为他们已经把埃及的民族主义力量控制住了。事实上，民族主义因战争经验变得更强大了，并将进入其最大的爆发阶段。

第十七章　议会时代

273　当英国人在1914年宣布实施保护国制度时，他们许诺这仅仅适用于战争时期。但当和平到来时，他们却根本不打算兑现他们的诺言。他们相信，埃及没有准备好自治。从战略上考虑，尤其考虑到苏伊士运河的战略意义，局势不允许他们早早撤出。他们可能愿意调整他们对埃及的控制程度，但英国人绝对没有放弃对埃及控制的想法。

在埃及，越来越大的舆论与英国人的想法恰恰相反。早在1917年秋季，各种民族主义者（包括萨阿德·扎哥卢勒在内）就讨论要派遣一个代表团（*wafd*）去把他们的提案陈述给英国人。这个代表团也将会把埃及的提案呈递给战后建立的和平委员会，甚至呈递给全世界。1918年11月13日，欧洲停战两天以后，扎哥卢勒与英国高级专员雷金纳德·维哥特爵士会晤，要求埃及实行自治，接下来进行了谈判。扎哥卢勒告诉维哥特：埃及人是"一个古老能干的种族，拥有辉煌的历史，比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更能组建秩序井然的政府，这些人在最近都已经获得了自治的承诺"。扎哥卢勒也与代表团到英国 274 陈述了他的意图，表达了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英国外交部根本不理会这些，对扎哥卢勒的访问申请置之不理，并说每个人都忙于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没时间与埃及人谈话。

扎哥卢勒通过组织全埃及民族主义者委员会的方式作出回应。一

份请愿书是为代表团争取替埃及人民讲话权力的，获得了十万个签名，这激发了反英、亲民族主义者的情绪。这是朝着一个有组织、有追随者的党派前进的巨大运动。当形势恶化时，英国人尽力采取强硬路线。在 1919 年 3 月 8 日，扎哥卢勒和一些同伴被逮捕，并被转送到马耳他。埃及人的反应令英国人十分震惊。在几天之内，起义席卷全国。学生罢课，政府职员、法官、律师相继罢工，然后全社会很多其他人也相继罢工，展现了令人震惊的民族团结。科普特人和穆斯林都鼓吹统一，对抗英国人。女权主义领袖霍达·沙拉维主持抗议活动。游行演变成了暴力事件，商店被抢劫，电报线被切断，铁路被炸翻，建筑物被焚烧。六位英国官员在有轨电车中被杀害。到英国人用军队镇压并在月底恢复秩序时，一千多名埃及人死于暴力冲突，36 位英国军人和四名英国公民也死于暴力事件。

1919 年 4 月 7 日，扎哥卢勒和他的党派被赦免，并直接到达巴黎，和平会议正在那里进行。他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抱有很高的希望，后者是“十四条款”(Fourteen Points)的作者，“十四条款”高唱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的赞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他以前的行省都在巴黎和会中获得了独立；事实上，埃及的案例比他们的案例更强烈。他的希望破灭了。在扎哥卢勒到达巴黎那天，威尔逊认可了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国身份。威尔逊的眼睛正盯着其他目标，尤其是他抱有希望的国际联盟，根本不关心埃及发生了什么事情，巴黎和会的其他任何人也不关心这种事情。然而，尽管扎哥卢勒失败了，但当他返回埃及时，他获得了英雄一样的欢迎。新的游行在全国爆发。英国人发现难以劝说任何人出任首席大臣。这个职位太危险了。

形势变得非常明显了，英国将不能保持保护国制度了。英国人做了一些努力，以便签订终止保护国制度的条约。但埃德蒙德·艾伦比勋爵不愿意与扎哥卢勒相处，并想粉碎扎哥卢勒的权力。艾伦比勋爵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前英国司令，已经代替了维哥特，具有更高的头衔“特殊高级专员”。然而，埃及人民如此支持扎哥卢勒，以至于没有他

275

的参与，就不会有任何条约可以有效地签订。为了打破这种僵局，艾伦比决定英国应该单方面授予埃及独立，并到伦敦去劝说政府接受他的方案。外交大臣表示反对，首相劳埃德·乔治不愿意接受他的方案，但内阁同意。据此，英国政府于 1922 年 2 月 28 日宣布："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国身份结束，而且埃及被宣布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但有一些限制条款。宣言继续："接下来的事情绝对由陛下的政府判断，直到陛下的政府和埃及政府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讨论和友好协调，并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为止。"根据这些限制条款（这些条款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保留条款"），英国保有维持英帝国通过埃及（例如苏伊士运河）的交通安全的权利；英国可以出面保护埃及，使其免受外来入侵或干涉；埃及的外国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群体的权利得到保护；英国单独决定苏丹地区的状态。因此，埃及被赋予了这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最好被描述为民族自治，而非真正独立，因为如此多的主权因素都受到限制。很多埃及人也受到这样的侮辱，即他们的"独立"是靠另一个国家的宣言获得的。

直到 1923 年 4 月 19 日，一部新宪法才被起草和通过。它确立了制宪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下，立法权力归属一个由上院和下院构成的议会，尽管国王被授予广泛的权力，例如任命大臣的权力，否决立法的权力和解散议会的权力。他甚至能够在议会休庭时颁发敕令。这些权力与国王家族拥有埃及约十分之一的可耕地的事实一起，足可以使他成为政府和国家的有效首领。即使如此，福阿德还是非常仇视 1923 年宪法，并试图推翻它，他的继承者法鲁克也是如此。另外，通过使大臣们对议会负责，但又使他们为国王服务，宪法的制定者创造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状况，后者可能是持续不断的冲突的原因。

276

然而，最终消除了这个宪法的是三个势力之间的相互牵扯关系。如果竞争仅仅是埃及国王与议会之间进行的，那么一者或另一者会不时地占据上风，但英国作为第三个因素加入到这种不稳定的力量关系之中，这预示着进步宪法的发展。英国人在宣传自己的愿望这方面做

得也不是很微妙。当英国人希望一个有争议的决定得到执行时，英国皇家海军战船便出现在亚历山大城的宫殿面前，这种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一支强大的英国军队驻扎在埃及，不仅驻扎在运河区，还驻扎在亚历山大城和开罗。英国军队的兵营就位于开罗城镇的中间部位，这个遗址现在被尼罗河希尔顿大酒店占据。一位英国高级专员也继续驻扎在埃及，而且他十分愿意干涉埃及事务，只要他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即便如此，宪法从一开始来看还是有前途的。1924 年 1 月，萨阿德·扎哥卢勒返回埃及，参加议会选举。华夫脱党当时是一个正式政党，获得了下议院 214 个席位当中的 190 个席位，几乎占到了总数的 90%。国王任命扎哥卢勒为首相。这个党派对国家充满了自信，完全控制了议会，由一个地位显赫的政治家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华夫脱党为了解决问题而做了一些事情，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埃及社会的建设之中。

埃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埃及的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从 1900 年的大约一千万，到 1950 年增长了一倍。然而，大多数埃及人仍是贫穷的农民，尽管富裕地主的数量正在增加，贫富差距在扩大。根据一份统计报告，75%的埃及可耕地由大约十五万人以大地产和中规模地产的形式所拥有。剩下的 25%的可耕地大多数是非常小的份地，只能维持生计，由一百多万人所拥有。足足五分之一的乡下家庭根本没有土地。当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大萧条袭击埃及时，棉花价格急剧下降，乡村穷人的困境更加恶化。人们强烈要求土地改革、作物多样化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当时的土地生产力不能与人口增长保持同步。公共健康和卫生也是重要问题，尤其当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机会而离开乡村时，埃及两个大城市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的人口比埃及的总人口增长得还快。

277

商业和工业显然是雇佣正在增长的人口的方式，但埃及在这方面的起点非常晚，因为英国人曾经把阻碍埃及的工业化作为一个政策问题。埃及存在的很多商业都归外国人拥有。经济发展很慢。那些拥有

资本的人们宁可把资本投入到土地上或其他保守的投资领域,而非工业;进口货物、工业和商业不得不忍受税负的冲击,而土地税始终很低。有一些成功的故事,例如塔拉大街和他的联合大企业密斯儿集团。密斯儿银行是完全用埃及人的资本建立起来的。但这些是特殊事例。

直到议会时期末期为止,政府才开始强烈地努力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但为时已晚。一些谴责提到了华夫脱党的自满,华夫脱党的议会成员当中的很多是大地主,他们愿意看到农业的迅速变化,不关心工业发展。但这也是国王、议会和英国之间不稳定的三方关系的一种作用,这意味着引人瞩目的对外政策问题和宪法危机倾向于以重要的国内事件为代价引起国际政治家们的注意。

教育方面的记录稍好一些。萨阿德·扎哥卢勒始终是教育促进发展之观念的强烈信奉者,他的政府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教育从1920年的国民预算4%上升到1951年的13%。在高等教育中,埃及大学自从1908年建立以来就在衰落。吉萨的一个新校园重新建立起来,它就是福阿德一世大学(现在的开罗大学),它的圆屋顶是一个显著的地标。但在非常改善了的教育制度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即毕业之后,等待他们的工作数量非常有限。

对于那些有钱而能够参与其中的人们来说,以前的埃及民族提供了一种刺激性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新闻媒体随着议会政府的出现而迅速发展;文学和政治评论得到增加和扩散;开罗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出版中心。纳吉布·迈哈弗兹(1911—2006年)的长期文学生涯于1988年被冠以诺贝尔奖。教育家和作家塔哈·侯赛因(1889—1973年)被称为"阿拉伯文学的泰斗"。阿赫迈德·肖奇(1868—1932年)被视为"阿拉伯诗歌王子",尽管他的对手称他为"阿拉伯王子的诗人",因为他与王室关系密切。肖奇的对手哈菲兹·伊博拉希姆(1871—1932年)被称赞为"尼罗河的诗人",具有更大的民族主义倾向。最著名的视觉艺术家或许是麦哈姆德·穆克塔尔(1883—1934年),他的很多作品都

278

可以在开罗最显眼的地方看见，例如《埃及的呼唤》(*Egypt's Awakening*)。大歌唱家乌姆·库尔图姆(1904—1975年)完全称得上是国际巨星。

埃及人的电影和无线电广播在阿拉伯世界是最有影响力的。电影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非常流行的，而且埃及在第一位埃及导演穆罕默德·埃尔-贝尤穆的指导下开始创作自己的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几个电影公司在埃及建立起来。塔拉大街的密斯儿集团提供资金，并负责分配利润。当1932年开罗无线电台建立起来时，埃及国家广播开始出现。

议会时期也是埃及学术的伟大时代。埃及学历史上最轰动的事件发生在1922年11月4日。霍华德·卡特于这一天在帝王谷发现了图坦卡蒙的坟墓。国际关注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埃及。但那仅仅是秩序井然地持续探索埃及历史的进程的一部分，甚至并不是其最重要的部分。埃及学的事业受到西方学者的控制，但大量当地埃及人也开始在他们国家的古代史研究中留下自己的标志，例如拉比布·哈巴奇。

政治发展并没有与文化发展保持同步。尽管萨阿德·扎哥卢勒在议会中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但他为期11个月的首相任期是非常艰难的。这部分上是因为国王的蓄意阻挠，国王厌恶宪法，并仇恨这样的事实，即议会不受他的控制。扎哥卢勒如此严格地控制议会，以至于一些成员开始对议会产生怨恨。但正是三角势力关系的第三点英国过早地结束了扎哥卢勒的政府。扎哥卢勒决心消除“保留条款”，未能实现访问伦敦的目标，从而他支持在埃及和苏丹地区发生的反对英国人的游行。在1919年革命期间，很多秘密恐怖主义组织组建起来；一些这样的组织当时仍在活动。1924年11月，一个秘密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位穆斯林成员刺杀了李·斯戴克爵士，后者是埃及陆军首席司令和苏丹地区长官。一些身居高位的华夫脱党党员也受到牵连。艾伦比勋爵是英国高级专员，以破坏性的最后通牒进行报复，亲自向下议院通报了最后通牒的内容。最后通牒的要求包括一大笔赔偿金和公开道歉以及

279

起诉谋杀者。苏丹地区获得了更多的尼罗河流经地区。更糟糕的是，最后通牒明显暗示埃及人不是文明民族。或许扎哥卢勒应该坚守岗位，但他却选择辞职，不到一年的时间以后就离开了政府，再也未掌握权力。甚至当华夫脱党决定性地在 1926 年 5 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时，英国高级专员拒绝让扎哥卢勒出任首相职位，并调用一艘炮艇到亚历山大城以强调他的主张。萨阿德·扎哥卢勒在 1927 年去世。

国王憎恶扎哥卢勒，并嫉妒他的声誉和权力，所以对于扎哥卢勒的去世并不痛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福阿德试图获得王权。随着扎哥卢勒的死亡，华夫脱党的领导权落到了穆斯塔法·埃尔-纳哈斯的手中，他暂时出任首相之职。福阿德剥夺了他的权力，尽管埃尔-纳哈斯在接下来 25 年里将是埃及政治中反复出现的因素；福阿德还解散了议会，终止宪法达三年之久。1929 年 12 月，埃及进行了另一次议会选举，而华夫脱党在当时以极大优势获得胜利，获得了下议院 90% 的席位，从而埃尔-纳哈斯再度掌权。他正与英国人就“保留条款”的谈判取得进步，尽管他没有使英国人在苏丹地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六个月以后，他就被福阿德赶走。福阿德用伊斯梅尔·塞德奇代替埃尔-纳哈斯，后者组建了一个亲宫廷政府。议会再次被解散，一部新宪法起草完成，这部宪法使国王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宫廷政府在接下来五年里实施统治。

宫廷统治的这五年(1930—1935 年)并不是特别专制的，甚至获得了一些小成就，例如调整了关于尼罗河水域的协议。但人们的不满开始出现，学生暴动。国王受到恢复 1923 年宪法的压力。英国人也向他施加压力。英国人考虑到欧洲正在堕落的政治形势，想与埃及进行谈判。他们希望与一个更稳定的埃及政府进行谈判。福阿德于 1935 年屈服。他恢复了 1923 年宪法，并建立了一个看守政府。埃及与英国的谈判开始了。

280

相互的利己主义使条件不寻常地有利于达成协议。英国唯恐德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渴望确保他们在东地中海的地位，并渴望

即使发生战争也能控制苏伊士运河。埃及人也担心利比亚的意大利人和(1935 年以后)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人。他们的预计是,如果战争的确爆发了,那么一份协议条约能够阻止英国人对埃及进行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进行的那种程度的干预。福阿德于 1936 年 4 月因死亡而被解除公职,尽管谈判仍在进行。华夫脱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另一次彻底胜利。埃尔－纳哈斯重新担任首相,王室的蓄意阻挠没有起作用。他亲自率领埃及代表团;英国代表团由外相安东尼·艾登领导。1936 年英埃条约在 8 月 26 日签订。

尽管埃及人后来逐渐对条约采取了敌视的观点,但他们认为它是他们当时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它为英国和埃及提供了一个 20 年的联盟时期。英国驻军减少到 10000 人,并限制在运河区的基地里,英国人将占据这里 20 年。英国高级专员职务被废除。英国人许诺处理投降条约中的一些事情(投降条约在很大程度上赦免了 25 万外国居民对埃及法律的义务),并提高埃及人在国际联盟中的成员身份。苏丹地区的问题推迟解决;与此同时,苏丹地区的现状得以保持。1936 年的英埃条约的确不能满足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但至少确定了英国占领埃及的结束时间,而且埃及的完全独立有了明确的时日。

另一个明显的更好变化是 17 岁的法鲁克登基为王。法鲁克在英国沃尔维西军校接受教育。他英俊、善于言谈、有宗教信仰。他似乎具有真正政治家的素质。他的前任们讲土耳其语。与他们不同,他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埃及人这次是真正热爱他们的新君主。另一个改进出现在 1939 年的《蒙特勒公约》(*Montreux Convention*),后者最终废除了投降条约,并提供了混合法庭,这个法庭直到 1949 年才结束。英国人履行承诺,支持埃及的申请,使埃及变成了国际联盟的成员,这是英国在 1937 年完成的事情。埃及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自己的对外政策。它首先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大使馆。

281

当法鲁克在 1937 年达到 18 岁成年年龄时,宫廷再次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年轻的国王很快就展现了与他父亲一样的专制倾向。他不喜

欢华夫脱党,他尤其不喜欢埃尔－纳哈斯。18个月以后,埃尔－纳哈斯辞职了,这使国王和宫廷内部人员能够通过与反华夫脱党的大臣们建立联盟的方式完全控制政府。当华夫脱党在1938年4月份的议会选举中因为腐败丑闻而遭受选举失败时,国王和其联盟者的工作更容易了。法鲁克与英国人的关系也是糟糕的。他把英国人视作权力竞争对手,而英国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的态度最多也就是让人领情的。兰普森总是称法鲁克为“男孩”,甚至当国王长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他还这样讲。国王——议会——英国之间这种动荡的权力关系在议会时期一直保持下来,从来不会为了建设事业而允许制度习惯于平衡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颠覆了平衡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这一天攻打波兰,迫使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和法国对纳粹党的威胁警醒得太晚了。埃及没有变成正式交战国,但根据1936年英埃条约,战时法律被颁布,埃及的港口设施转归军用,审查制度被强迫执行,整个埃及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但战争本身还很遥远,而且未对埃及人产生直接影响,因为德国人占领波兰以后,就在1940年春季转向西方。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成功的闪电战中,希特勒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并攻入低地国家和法国。法国人因为没有准备好应对德国的闪电战术,并强调装甲军和空军,从而遭到了战争的重创。仅仅通过明显的奇迹,英国人才能够把敦克尔克海滩的英军撤出,沿途丧失了大多数装备。英国单独对抗德国,其命运处于危难之际。1940年夏季,德国空军无情地用炮弹轰击这个岛国。入侵是完全有可能的。德国空袭被挡开,但德国潜水艇正在以这样的速度使英国船只沉入海底,以至于这将使英国人因饥饿而投降。

埃及突然变成了关键战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领袖墨索里尼为了给他的新罗马帝国争夺大量战利品,于1940年6月站在德国一边加入战争。意大利很好地立足于它的利比亚行省,而且最近已经征服了埃塞俄比亚。它能够从两个方向威胁埃及。但当意大利人在那些地区拥有50万人时,并获得大量军需物资时,英国人能够在埃及和苏丹地区

聚集大约五万五千人。英国几乎不能运输士兵或供给，而英军运送的东西不得不在穿越地中海时经历交叉射击，地中海的大部分地区都由敌人控制着。很多保卫埃及的战士都来自英联邦和英帝国，尤其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而且这些军队直到9月初还未到达。从现在开始，当谈到英国军队时，我们应该能够理解，他们大部分是来自英联邦的战士。1940年6月，意大利人从埃塞俄比亚转而攻打英国的索马里，这威胁到了苏丹地区；当年9月份，他们从利比亚侵入埃及。至少可以说，英国人在埃及面对的形势是令人沮丧的。这个国家的丧失，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丢失和英国在中东的整个地位的丧失，是难以挽回的，或许是不可能挽回的。埃及落入了一些占据者的手中，这些占据者比英国人更坏。

当意大利人侵入埃及时，英国人后退到马萨·马特鲁，这里大约在三角洲三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意大利人已经向前推进，那么很难估计人数匮乏的英国军队怎样阻止意大利人，但意大利人在向尼罗河进军之前，停在了西堤·巴拉尼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并准备设防的基地和奢侈舒服的物资。意大利司令过分谨慎，并因英国人一系列大胆的欺骗战斗而更加犹豫不决，这些战斗揭示了同盟军的虚弱，并促使他更多地加强防守。与此同时，英国人通过他们迅速的战术，在意大利前线发现了一个巨大空隙，这允许英国人偷偷地潜入，从后方袭击意大利人的阵地，获得了大量俘虏和战利品。到1940年年末，意大利人已经被赶出埃及。同时，英国人从苏丹地区进行反攻，也在南方重创意大利人，并恢复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 283

英国人继续在北方进攻，攻下了意大利人在昔兰尼加建立的严密设防的根据地。昔兰尼加是利比亚的东部地区。1941年1月21日，托布鲁克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陷落了；英国人继续向班加西进军，占领了整个昔兰尼加地区；他们俘获了13万意大利战俘。在这个紧急时刻，北非的彻底胜利掌握在英国人手中。的黎波里是轴心国军队的一个进口港。从陆路来看，这个港口距离西边的班加西大约七百公里，位于锡

德拉湾的另一面。距离很长,但意大利人一直在逃窜,而且如果英国人进行一次坚决的攻击,那么或许已经严格地关闭了轴心国军队进入非洲的大门。但整个战争场面中的事件都遮掩了关键问题,使机会稍纵即逝。德国人对希腊的入侵即将进行。尽管希腊已经一再拒绝英国人的要求,即联合起来对抗轴心国,但它现在则转而求助英国。英国人能够向希腊派军队援助的唯一出发地是北非,因此向利比亚其他地区进军这次机会不得不延迟,而军队被徒劳无益地转移去挽救希腊,使其免于德国的征服。

这次停顿几乎是灾难性的。希特勒不愿意看到他的意大利同盟被打败,派遣一支名叫非洲军团的装甲军进入利比亚,由欧文·隆美尔[1]将军率领。1941年4月1日,他开始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德国式进攻。通过大胆而创新的战术,隆美尔粉碎了一支不协调的英国防卫军,向东扫荡,直到埃及边境的哈法耶隘口。利比亚人要塞城市托布鲁克的英勇防御扭转了英国人的局势,这次防御威胁到了隆美尔的供给线,并使他的进攻停下来。新英国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在1941年11月中旬实施了一次十字军行动,迫使隆美尔撤离埃及,撤回到他在托布鲁克西南的起点。

十字军行动缓解了英军的紧急形势,但英军在埃及和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仍然不稳固。隆美尔仍是很危险的对手,而且经验表明他会进行迅速而有效的进攻。1941年12月7日,日军攻打太平洋的美军和英军。这次攻击的长远影响对英国是非常有利的,把美国带入了不仅针对日本也针对德国的战争,但从短期效果来看,日军在西太平洋和东南亚获得了一系列令人惊慌的胜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面临被切断联系和遭受入侵的危险。它们的政府被迫从埃及撤回军队以保卫自己的祖国。

284

① 欧文·隆美尔(Erwin Rommel,1891—1944年),纳粹德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北非战场德军司令官,后来图谋推翻希特勒,被逼自杀。——译者注

为了挽救正在破碎的战略形势，英国人决定在埃及建立一个支持1936年条约的政府。法鲁克已经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反英活动；当时他想替换他的亲英国的首相。公元1942年2月4日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事件，后来被称为大羞耻。迈尔斯·兰普森爵士用坦克围住阿布丁宫殿。在宫殿里面，他命令“男孩”做出选择：是任命埃尔－纳哈斯和华夫脱党内阁，还是退位。尽管埃尔－纳哈斯具有令人愤怒的反英言论，但英国人知道他会支持他自豪地签订的条约，而且他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法鲁克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英国人认为在危难时刻运用暴力维持其存在是正确的，但埃及人因为自己独立国家的君主在枪口下被迫任命政府这件事而痛恨英国人。对于法鲁克来说，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转折点，他从此开始了一条漫长的精神堕落之旅。他因玩女人（经常令人发指）和赌博而变得臭名昭著。他在夜总会里度过了自己的很多时间。或许是因为腺体功能紊乱，他变得非常胖。刚刚登基时年轻阳光的国王与中年邪淫的花花公子的照片形成了鲜明对照。埃及君主制又持续了十年，但大羞耻致命地伤害了它。

1942年5月24日，隆美尔开始了一场新的攻击；他再次突破并扫荡了英军防线。最不聪明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命令英军坚守托布鲁克，尽管托布鲁克绝没有准备好抵抗另一次围攻。当年6月21日，城市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包括三万战俘和大批物资，这使隆美尔能够攻入埃及。当英国人蹒跚地向东撤退时，一切似乎都丧失了。国家文件燃烧发出的浓烟从开罗的英国大使馆升起。反英群众高呼：“隆美尔，继续进攻。”墨索里尼骑着一匹白马从意大利奔向非洲，为了胜利地进入开罗。当英国人从三角洲向苏伊士运河进军时，他们最后准备从侧翼攻击德国人。但英国人在埃尔－阿拉曼站住了脚，埃尔－阿拉曼位于亚历山大城以西不多于一百公里的地方。在这里，南方的卡塔拉大洼地和北方的地中海限制了德军的战斗范围。1942年7月，战斗的运气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每一方都未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和遭受彻底的失

285

败。隆美尔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进军埃尔－阿拉曼的胜利,但他的军队因迅速行军而出现了如此长的战线,结果他不能在英军重整旗鼓和开始反攻之前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果不是因为消息错误,那么英国人的反攻应该已经毁灭了非洲军团。

双方都精疲力竭,着手在埃尔－阿拉曼修建战壕和布雷区,以便在另一次战斗中恢复势力。这次停顿对英国的目的比对德国的目的更有利,因为英国人距离他们的供给基地只有很短的距离,美国的大量军品正流入到这个基地。另一方面,隆美尔处于供给线的终端,这条线沿非洲北海岸几百公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利比亚,并通过一个最不稳固的海路与欧洲连接起来,德国人没有成功地占据马耳他的岛屿要塞。另外,希特勒也没有在非洲掌握战争的战略地位,并且正在把他所有可得到的资源用于对苏联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他几乎没有给隆美尔派送什么东西。奥金莱克抓紧时间准备作战,希望掌握一次极好的机会彻底消灭非洲军团。

如果丘吉尔没有丧失耐性,并用伯纳德·蒙哥马利代替奥金莱克,那么决定性的战斗应该很快就来到了,因为尽管蒙哥马利从本质上遵从奥金莱克设计的方案,但他用自己习惯的谨慎发展了方案。与此同时,隆美尔意识到时间对他不利,便不顾一切地努力突破英军的左翼,匆忙地冲向开罗和苏伊士运河。这是奥勒姆·哈尔法战役,从 1942 年 8 月 30 日持续到 9 月 6 日。但隆美尔的攻击早就被英军预料到了,遭到英军布雷区和大量、布置完好的储备军的打击。结局来自当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3 日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当时蒙哥马利最终开始了对 286 德国人的大举攻击。尽管蒙哥马利的军队占优势,但他的战术是如此保守,以至于隆美尔几乎击退了他的攻击。隆美尔战败以后,他甚至以更值得注意的技术成功地使自己的军队从埃及撤出。埃及免于纳粹的征服,阿拉曼战役是同盟军运气转好的转折点。德国在俄罗斯的失败和日本在中途岛战斗中的灾难结局结合在一起,标志着轴心国不可避免的衰落。

埃及在战争的剩余时期起到了支持作用，作为北非和地中海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基地而起作用。1943 年 11 月，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中国的蒋介石在开罗召开会议，决定了战后亚洲和太平洋的很多重要问题。埃及的英国军队最多时达到了 25 万人。埃及人们遭受的困苦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要轻一些，并部分上被新工作的创造和一些制造业的刺激所抵消；经济的服务行业是特别活跃的。工资提高了，但物价上涨得更快，战后发生了广泛的失业。埃及在战争时期以总数达 40000 万英镑的贷款为英国财政注入了更必要的活力，但直到 1945 年 2 月埃及才变成正式参战国。大多数战斗都是由英国和英联邦军队进行的，埃尔－阿拉曼的英联邦公墓的几何形十字架验证了这一点。埃及人对战争的态度是复杂的。诸如年轻军官安沃尔·埃尔－萨达特这样的一些人积极地配合德国人，更多的不是因为他们是纳粹同情者，而是因为他们把德国人看成一劳永逸地把英国人赶出埃及的手段。但从来没有更多的人对德国人给予真正的同情，大多数埃及人对德国人不比对英国人寄予更多的希望，或许认为德国人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埃及的政治环境常常是肮脏的。当 1928 年埃尔－纳哈斯被迫辞职时，他已经被牵连进一场严重的腐败丑闻之中。当他恢复权力以后，他又因裙带关系而变得臭名昭著。华夫脱党一再表明自己是腐败的和无效能的。华夫脱党曾经是民族主义政党，依靠英国人的枪杆子掌权。卓越的华夫脱党人与埃尔－纳哈斯发生争执，并组建了小党派。很多像年轻军官伽马尔·阿布德·埃尔－纳赛尔这样的埃及人开始感到厌烦，不是厌烦华夫脱党，而是厌烦他们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整个制度，并开始考虑根本变革。

287

埃尔－纳哈斯与国王的关系是恶意的。事情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英国人允许国王免去他的职位。华夫脱党联合抵制 1945 年 1 月的议会选举，使华夫脱党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党派——协会党获胜，而它的领袖阿赫迈德·马赫尔变成了首相。一个月以后，当马赫尔为了使埃及能够变成联合国的发起人而表达了自己对德国宣战的倾向，并离开

议会大楼时,被一个埃及纳粹主义者暗杀。他的继承者是马哈穆德·法米·埃尔-努克拉什,后者曾经被牵连进李·斯戴克爵士的谋杀案,三年以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场谋杀的牺牲品。

当人们越来越对华夫脱党觉醒时,全新的政党表现出了所有政治色彩。埃及共产党成立于1949年,但一支更可怕的政治力量早就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获得了力量。这就是穆斯林兄弟会,1928年由哈桑·埃尔-巴纳创建。在某些方面,把穆斯林兄弟会描绘为一个政党是误导的做法,因为它在议会制度之外工作,并与所有世俗政党为敌。它的目标是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宗教的方面——建立伊斯兰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已经从生活的各个领域吸收了一百多万追随者。埃尔-巴纳早在战争时期就组建了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恐怖主义者派别。他支持轴心国,并督促人们不要帮助英国人。穆斯林兄弟会的运动在战后就达到了其最强大的程度,因为它从事从游行到恐怖主义的广泛破坏活动。埃尔-努克拉什正确地把穆斯林兄弟会看做一种革命威胁,在1948年11月运用他的战争法权威解散了穆斯林兄弟会。当埃尔-努克拉什一个月以后被一个归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学生暗杀时,政府用谋杀哈桑·埃尔-巴纳的方式做出回应。穆斯林兄弟会被镇压,尽管它将再次作为埃及政治的一个因素而出现。

战后几年应该是议会政权允许国内政治进程自我发展,并转向解决很多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的时候,但外国事务始终占据主要日程。288 自从战争结束,要求修改埃及与英国的条约的压力便越来越大。到1946年,暴动和示威游行时有发生。当年2月21日,一群有组织的工人攻击了伊斯梅利亚的英军大营。战士们用机枪扫射,杀死23人,伤120人。英国的新工党政府试图通过从开罗和亚历山大城撤军,并把士兵安置在运河区的方式,解决当时的形势,尽管这使那一地区的英国军队数量比1936年条约授权的军队数量多出几倍。埃及人也受到苏丹地区问题的阻扰,埃及人与英国人就该问题进行谈判那些年,除了推

迟，没有任何实质成效。就埃及人而言，苏丹地区属于埃及，是埃及靠征服获得的；英国人剥夺了恰恰属于埃及人的权利。

除了正在解决的埃及与英国人的问题，重要灾难也在巴勒斯坦发展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和法国在瓜分战利品过程中，法国获得了这样一些地区，这些地区后来变成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分得的那部分地区是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在这些地区中，外约旦（后来改名为约旦）和伊拉克很快就变成了主权国家，尽管英国的监护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但巴勒斯坦始终是一个英国托管区。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一场运动爆发出来，旨在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然后，因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可怕政策，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迁移到巴勒斯坦，这些人遭遇了巴勒斯坦人，后者把他们的出现看做是对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抱负的一种威胁。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在巴勒斯坦爆发。犹太复国军形成，包括恐怖主义者群体，他们采取对抗英国人的活动。1944 年 11 月，当中东地区的英国最高官员莫伊内勋爵在开罗被斯特恩派暗杀时，埃及是这些对抗英国人的活动的场所之一。后来的以色列首相伊扎克・沙米尔与斯特恩派关系密切。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战斗阶段进行恐怖主义行动。对于埃及来说，这并不是它最后一次被恐怖主义行动造访，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对埃及的犹太人发动了进攻，恐吓他们离开埃及到以色列去。不幸的是，这些恐吓行为获得了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勒斯坦的形势迅速恶化。英国人决定撤出，把巴勒斯坦的问题交给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大会在 1947 年 11 月 27 日投票，决定把巴勒斯坦分为犹太国家和巴勒斯坦国家。英国宣称委任托管权将在 1948 年 5 月 15 日结束。在第二天，大卫・本－古里安和他的同事宣布创建以色列国家。内战立即在巴勒斯坦爆发。

289

在萌夏斯宫殿的一次会议中，法鲁克已经同意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参战，阻止巴勒斯坦的分裂和犹太国家的建立。首相、内阁和总参谋部都认为埃及没有准备好，但人们对参战的支持是强烈的。穆斯林兄

弟会甚至在英国人撤离之前就开始往巴勒斯坦派遣志愿者了。法鲁克看到了为君主制开辟良好形象和在阿拉伯国家里起领导作用的机会。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

两支埃及军队进军巴勒斯坦,一支沿海岸通过加沙直奔特拉维夫市,另一支通过内盖夫向耶路撒冷进军。其他各种规模的阿拉伯军队从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集结。然而,阿拉伯人统一而强大的表象是欺骗性的,因为他们受到协调缺乏和目标不一的困扰,而以色列共和国民进行了认真规划,具有清晰目标和更多配备着精良武器的战斗者。很快,阿拉伯人就几乎全线溃退。

反对者被证明是正确的。埃及还没有准备好作战。法鲁克是一个讨厌的、好干涉他人的自大的战略家;装备是低劣的或不足的,支援总是不足。埃及军队被赶回到加沙,而以色列共和国民则已经侵入西奈,而且如果他们不是被英国人阻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埃及人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一定已经进军到了苏伊士运河。英国人威胁以色列共和国民说,他们将援引1936年英埃条约的相关条款参战。埃及在这场惨败中唯一光彩的一点是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在巴勒斯坦法卢杰村庄领导的一场英勇抵抗战斗。到1949年年初,埃及签约休战时,阿拉伯人已经被打败了。以色列共和国民建立了他们的国家,并预示着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涌入加沙,埃及对这里实施行政控制。埃及在战争中的损失是两千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和失踪。军队对政府十分恼怒。丑陋的谣言散布开来:宫廷成员和高级官员串通起来,为了个人利益而为军队提供低劣装备。

290

当1950年1月议会选举举行时,华夫脱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因为那些使华夫脱党痛苦不堪的所有丑闻和缺点而只有40%的公民投票。埃尔-纳哈斯恢复了首相职位。随之而来的国内司法改革是议会时代最有趣、最革新的一些措施,例如土地改革,社会安全,学费的废除等。如果这些措施被更早地提出来,那么它们完全会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但正是因为它们来得太晚了,才挽救了议会君主制。

与此同时,埃尔－纳哈斯与往常一样陷入了腐败之中,逐渐被人们抛弃。为了从他的个人问题上转移注意力,他恢复了往常的反英言论。1951年10月,他单方面废除了1936年英埃条约以及英国与埃及之间的政府协议,这些是1899年双方签订的共管苏丹地区的协议。尽管英国人拒绝认可条约地位的变化,但埃尔－纳哈斯的行为暗示出英国军队对运河区的占领不再是合法的,鼓励军事基地的埃及工人进行罢工。当地商人拒绝提供货物和服务。英国人的反应是控制运河区的交通中心,促使埃及政府通过解雇运河所有英国雇工的方式进行报复。这也鼓舞了激进主义分子(包括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组建游击队,攻击运河区的英国军队。英国人通过对伊斯梅利亚的警署进行攻击的方式作出回应,他们把警署看作是麻烦点,杀死了五十多个埃及人。

第二天,即1952年1月26日变成了众所周知的黑色星期六。游行示威者聚集在开罗大学(当时那所大学仍然叫福阿德一世国王大学),并向市区前进。暴力事件爆发了。暴徒集结,狂暴地穿过街道,携带数桶煤油,点燃建筑物。这样,很多众所周知的开罗地标都燃烧尽了,例如特夫俱乐部和古老的谢菲尔德旅馆。大约四百多个建筑物被毁掉,而且三十多人丧命。几个小时无障碍的暴力冲突和掠夺之后,军队恢复了秩序。 291

暴乱之后,法鲁克开除了埃尔－纳哈斯。在做国王的最后六个月里,他任命了四个内阁。一个王子回忆说:"然而,越来越多的动荡迹象是清晰可见的:大学生的暴力游行示威、政治暗杀(很不幸的是,这些暗杀大多数都是值得的)、秘密地自由出版诽谤、然后诽谤越来越公开、所有形式的稳定、最后——最重要的——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和持续的政府更改。似乎任何人都不再能够掌舵了。"[38]政权不能修复了。到1952年夏季,几乎没有背景信息的参观者对君主制受到的重要挑战惊奇不已。但是,当变化来到时,它却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

埃及的自由军官组织是一个年轻军官的阴谋组织。它是怎样起源的?记载是各种各样的。安沃尔·阿达特宣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初创建了它,但它更可能结合了巴勒斯坦战争的结果,这个结果使军队中的很多人确信,古老的政权是如此的腐败,以至于它不得不被推翻。正如纳赛尔希望的那样,军队是“唯一能够行动的力量”。自由军官组织的心脏是一个由九个成员构成的中央委员会,六个来自陆军,三个来自空军。它的主席是伽马尔·阿布德·埃尔-纳赛尔,尽管他用了很长时间才完全控制了其他成员。中央委员会控制了一个单元网络,这些单元扩展到各个服务部门,总共涉及到几百个官员。因为他们年轻和涉世不深,他们选择纳吉布将军做他们的名誉领袖,他是一位战争英雄和极正直的男人,他是整个军队里最著名、最受羡慕的人。其他阴谋群体在埃及活动,但自由军官组织在规划、组织、时间选择和幸运方面都超过了它们。

自由军官把 1952 年 8 月 5 日作为他们的政变时间,但国王获得了关于将发生之事的消息。自由军官得到警告,即国王将对付他们,所以他们决定在 7 月 22 日晚间采取行动。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的关键岗位几乎毫无抵抗地被占据。到 7 月 23 日早晨,自由军官们掌控了局势。诸如埃尔-纳哈斯这样的大多数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可能已经对动乱感到苦恼,他们当时正在欧洲度暑假。舆论早就厌倦了旧政权,乐意看到它倒台。

292

关于如何处置法鲁克,自由军官们进行了简短的争论。一些人支持公审和死刑,但纳赛尔和大多数人坚持认为他应该为了他年幼的儿子而放弃权力,并离开埃及。[①] 当年 7 月 26 日,法鲁克乘坐国王游艇驶离亚历山大城,开始了不光彩的流放生活,这段流放生活以 18 年以后他死在罗马的夜总会里而结束。当他离开时,他告诉纳吉布:“你的任务将是艰难的,你知道,统治埃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

① 从技术上来讲,埃及始终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在第二年国家被正式宣布为共和国之前,法鲁克的儿子阿赫迈德·福阿德仍是国王。

第十八章　纳赛尔时期

当时自由军官中央委员会称自己为革命指挥委员会(RCC)。革[293]命指挥委员会已经控制了埃及国家,但它没有内在一致的议程或明确的目标。它的成员在思想上是各不相同的,而且这些思想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纳赛尔开始时是一个强烈的民主制支持者,但当他变成总统时,他专制地统治国家。纳赛尔不是革命指挥委员会公认的领袖,而且几乎不被普通民众所知。纳吉布是一个公众人物,变成了首相和总统。纳赛尔的官职是代理首相和内务大臣。军队最初的计划是保持三年的权力,之后将建立某种形式的宪制政府。但纳赛尔和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掌握了权力之后,便迅速地要求掌握政权。

纳吉布威胁到了这种权力。自由军官组织希望他做的与他认为他应该扮演的角色之间存在冲突,他不打算做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他威严,但和蔼可亲,很快就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他对怎样统治埃及有清晰的看法。他强调进行连续不断的改革,即建立一种与古老议会制相似的议会制度,但不要腐败和妨碍发展的因素。为了达到这个目[294]标,他与很多现存政党领袖建立了工作关系。这是对纳赛尔的强烈谴责。纳赛尔决定彻底与过去决裂,而非改革过去。

纳吉布与纳赛尔之间的冲突在两个阶段展开,纳吉布从一开始就占据上风。纳吉布反对纳赛尔对抗传统政党的强硬措施——包括建议

逮捕埃尔-纳哈斯——和其他高压行为,从而纳吉布于1954年2月发布了辞去总统职位的辞职信。革命指挥委员会迅速得到了令人震惊的教训,即他们表面上的领袖非常受欢迎。支持纳吉布和议会民主制的抗议和示威游行爆发出来。更糟糕的是,军队内部的重要群体采取相同立场,并大声表达这种立场。纳赛尔和其同僚们慌忙放弃他们的想法。纳吉布返回来做总统,他许诺在不久的将来选举议会。

但是,对于纳吉布来说,这似乎是战略性的胜利,而对于纳赛尔来说,这仅仅是战略撤退。随着纳吉布麻痹大意错误地感到安全了,纳赛尔作为一个老练的阴谋家,在背后静静地行动,逐渐消除或边缘化纳吉布在军队和政治中的支持者,并在商业协会中发展追随者。当时机成熟时,肃清了纳吉布支持者的军队展示了对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支持,而且商会组织协调一致地罢工和示威游行,抓住了纳吉布,并使议会民主制的游击队放松了警惕。在3月末,革命指挥委员会宣布自己掌权,而且议会选举不会举行。纳吉布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1954年11月,他被剥夺了权力,并被软禁起来,直到纳赛尔死后,他才获得自由。纳赛尔变成了代理总统,并最终掌握了总统职位。

1954年10月,当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城做演讲时,遭到一个穆斯林兄弟的暗杀,幸免遇难。这提供了坚决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的借口。穆斯林兄弟会或许是革命指挥委员会最危险的反对者。在全国范围内对穆斯林兄弟会非常残忍的镇压中,或许五万多人被逮捕,一千多人被送上法庭;六个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绞死。萨义德·库特布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成员继承了哈桑·埃尔-巴纳的职位,接下来的六年里在监狱里度过。在一个月之内,所有政党都被取缔,政党领袖被打入监牢。持反对意见的出版社被关闭。

295 到当时为止,纳赛尔从一个不显眼的人物变成了焦点人物。实践中,他发展成了政治家,彰显了一种与人民交流的天赋,使人们强烈地认可他。尽管他仍然不得不考虑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意见,但权力的主要构成要素——政府部门、军队和安全局——越来越多地落到他的手

中。政党已经被解散；当时凭借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他镇压了当时的反对意识，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主动权掌握在他手中。

纳赛尔作为政治家采取的第一批重要措施是从外事领域开始的，这些举动也与国内事务息息相关。他的外事活动明显要从英国着手。英国仍在埃及土地上保持着一支强大军队。为了代替 1936 年英埃条约而进行的谈判进展顺利。英国军队将在两年之内撤出埃及。尽管条约有一项不受欢迎的再生条款，即允许英国人在战争时期返回埃及，但这个困难因美国许诺条约一签订就对埃及提供援助而抵消。条约在 1954 年 10 月签订。1956 年 1 月，英国最后一支军队如期撤离埃及，结束了对埃及七十多年的占领时期。然而，1956 年结束之前，英国和埃及之间发生了一次更暴力的军事冲突。

英国仍然控制着苏丹地区，关于这一地区的谈判几乎没有向着有利于埃及的方向进展。自从法老时代以来，苏丹地区和埃及的历史就已经密切地纠缠在一起。19 世纪 20 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吞并北部苏丹以后，埃及就认为苏丹是埃及人正常征服的地区。但英国采取对埃及管理而对苏丹共管的分裂政策，这已经削弱了这些联系。苏丹人也把自己经受的一些委屈归因于埃及，包括尼罗河最重要水域的划分。他们尤其因纳吉布的遭遇而痛恨埃及，纳吉布是半个苏丹人。即使如此，埃及仍很乐观，似乎在与不情愿的英国人谈判中，通过利用苏丹自决的权利作为筹码而占了上风。但英国通过鼓励苏丹独立而进行反击，苏丹于 1956 年 1 月 1 日宣布独立。

纳赛尔把埃及（和他自己）视作阿拉伯世界天然的领袖，变成了泛阿拉伯主义的热心支持者。纳赛尔的信息被无线电广播传播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纳赛尔在埃及之外获得了很多阿拉伯支持者，也在一些阿拉伯人当中招致了不少敌人，他们被广播中常常刺耳的口气所冒犯，他们唯恐纳赛尔会搅起他们国家的混乱。这在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上层社会尤其是事实。纳赛尔强烈反对英国、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订立的巴格达公约，因此激怒了英国和其同盟伊拉克，因为公约有利于

296

维持英国在中东的影响。美国也受到搅扰,因为美国把巴格达公约视作对抗苏联的防波堤。

当纳赛尔到阿拉伯世界之外的非西方国家和共产主义阵营时,他获得热烈欢迎。纳赛尔是 1955 年 4 月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不结盟会议上最年轻的国家领袖,这是令纳赛尔兴奋的经历。不结盟会议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领袖,他们试图避免在越来越两极化的地理政治环境中被吸引进苏联或美国的重力场。纳赛尔把不结盟运动看做是他能够在上面成为一个明星的舞台。他会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周恩来很尊重地对待他,这是他从未从英国或美国那里获得的,因为那些国家对他的行为越来越不满。

纳赛尔曾一度试图从西方国家获得武器装备。1955 年 2 月,以色列共和国在加沙对埃及军队进行了一次重要袭击。这次袭击明显地表明了埃及军队设施现代化和陈旧装备废弃的必要性。美国虽然已经许诺援助埃及,但形势具有如此的限制性,尤其考虑到援助埃及就可能会牵涉进以色列问题当中,所以美国根本没做什么事情。纳赛尔经中国与苏联接洽,虽然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向埃及提供了武器。西方对这样的事情惊骇不已,它认为苏联的影响扩展到中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对于纳赛尔来说,这恰恰是一个必要的国事问题。正如他后来讲的:"我们应该愿意对抗西方,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尽管纳赛尔的外交成就是令人满意的,但他作为政治家的成功和他的政治延续依赖于他在埃及国内获得的成就。他已经把人们的期望提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革命指挥委员会早在 1952 年 9 月就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把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限制在 200 或 300 费丹(feddan)。这给予埃及地主阶级重重的一击。这在受到禁止的华夫脱党内部产生了很高的影响,纳赛尔不是很重视这点。但这项措施对埃及的整体影响是有限的。根据一种估计,它仅仅影响到埃及 10%的可耕地和 20 万农民,因此它只对一小部分无地的农村人口有利。

297

但埃及最需要的是工业化。埃及的工业化是英国人已经系统地否定的，然后在议会时期得到缓慢发展。埃及存在的私人资本没有投入到工业中，而且埃及越来越矛盾的政策也不愿意把私人资本投入到国际财政市场上去。纳赛尔不得不寻找某种方式为埃及最野心勃勃的公共工程项目——阿斯旺大坝的构建——提供资金。阿斯旺大坝不仅会极大地提高埃及的农业生产力，还会为埃及工业发展生产巨大数量的电力，更会提高人们的整体生活质量。

纳赛尔从世界银行为阿斯旺大坝的修建借贷资金，美国也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英国也做出了相对美国较小的贡献。美国最初支持这个项目，是一种平衡手段，因为美国察觉到社会主义阵营在埃及的影响越来越高，但保留意见和反对观点也出现了。性格内敛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①]认为地缘政治形势就像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斗争，美国就是善者，而苏联则是恶者。这种观点不允许中间立场的存在。杜勒斯因纳赛尔反对巴格达公约而愤怒。杜勒斯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如此声名狼藉地拒绝与周恩来握手，对于纳赛尔在外交上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十分不悦。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游说议员们也正在对美国上议院施加否定性的压力，美国上议院中的美国南方成员担心埃及的灌溉棉花可能与他们的棉花竞争，而棉花是美国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美国在支持埃及的同时，强加了如此多的附加条件，以至于纳赛尔认为它们侵犯了埃及的经济主权，但他勉强地同意了这些条件。然而，纳赛尔最终被杜勒斯告知，美国正在撤出交易。

杜勒斯认为这将是事情的结局，但纳赛尔迅速而果敢地作出反应。298 1956 年 7 月 26 日，他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从此以后这一天变成了埃及的国庆节。埃及将利用从苏伊士运河上获得的利润建造阿斯旺大坝。英国政府义愤填膺，但英国在几个月前就已经从运河区撤出了最

---

①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 年)，曾于 1953—1959 年出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后的英军。英国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撤走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欧洲领航员，希望苏伊士运河的交通会停止。恰恰相反，为数不多（两百多个领航员里面仅有40位埃及领航员）的埃及领航员留了下来，那么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结果运河交通得以继续运行。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渴望用军队对付埃及，但军队移动到位需要时间；除此而外，英国没有足够的借口：运河在运转，世界商业在通过运河进行，而且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一个国家有权力使其边境内的机构国有化。

与以色列和法国（法国对纳赛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乱而愤怒）勾结起来，艾登发现了入侵埃及并掌控苏伊士运河的借口。根据约定，以色列将攻击和掌握加沙和去往西奈半岛途中的沙姆沙伊赫（这是以色列所渴望的领地，因为它将打开通往以色列南部港口埃拉特的通道），并进军苏伊士运河。英国和法国然后将签发最后通牒给双方，令他们从运河撤出。以色列已经获得了加沙和沙姆沙伊赫，从而它会遵从英国和法国的最后通牒，但埃及注定会拒绝，英国和法国将以此为借口攻击埃及，占领运河，废黜纳赛尔。这个计划因当年10月29日以色列共和国的攻击而得到实施；最后通牒在第二天送达双方。当埃及拒绝它时，英国和法国的攻击开始了。纳赛尔很吃惊，埃及军队战败了。每件事情都按原计划进行。

然后，艾登的计划开始实施。尽管埃及军队被打败，但他们顽强地战斗，获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埃及人也在运河沉船，阻断运河，切断欧洲的石油供给。国际舆论强烈谴责英法对埃及的入侵。苏联威胁用原子弹攻击伦敦，但更现实的是用中东的骚乱去转移注意力，同时残忍地镇压了其卫星国家匈牙利的一次起义。与苏联一样，美国谴责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共和国的行动，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愤怒，他认为英、法和以色列一直在进行秘密的外交活动。他抱怨道："美国在这些行动的任何阶段都未被咨询，这种咨询与联合国的原则和目的不一致。"在英国，议会对政府的支持迅速降低，艾登被迫在议会上撒谎，谎称这次入侵计划没有事先预谋。当油供给的丧失导致英镑流失时，美国明确

表示自己不会给予英国以支持。英国地位的衰弱暴露出来，这使艾登除了停止入侵埃及别无选择。法国和以色列共和国不得不相继停止了入侵。如果他们在没有英国参与的情况下行动，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坚定不移地攻打埃及。

为了报复埃及遭受的众所周知的三方侵略，埃及政府没收了法国和英国在埃及的所有财产。这些国家居住在埃及的公民被命令立刻整理行装离开埃及；那些正在埃及之外的人们不被允许返回埃及，因为很多人正在度暑假。苏伊士运河直到 1957 年 3 月才重开。它的关闭或许对英国比对埃及的经济伤害更大。纳赛尔理应已经从确保国内权力危机中恢复过来，事实上他正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反西方阶段，而他的声誉在国外获得了极大提高。艾登原打算压倒纳赛尔，但他自己却被迫辞职，被哈罗德·麦克米兰代替，后者最初是一位强烈的入侵支持者，但也是一个熟练的政治家，他知道怎样有效地转变自己的姿态。

尽管纳赛尔在苏伊士危机开始时主张用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修建阿斯旺大坝，但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阿斯旺大坝的修建费用，埃及也没有掌握建筑大坝的足够的技术资源。资金和工程是由苏联提供的，苏联认为这能扩展苏联在埃及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种估计证明是稍显过于乐观了。1958 年，苏联人宣布他们对这一纪念性工程的支持。九万埃及工人提供劳动。工程建筑开始于 1960 年。四年以后，苏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权力被剥夺之前访问埃及，庆祝工程第一阶段的完成：水库开始蓄水，结束了埃及尼罗河每年的泛滥。阿斯旺大坝完成于 1970 年；水库在 1976 年达到最大容量。

阿斯旺大坝在量级上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大坝。阿斯旺 300 大坝长 3600 米，地基宽 980 米，高 111 米，包含 4400 万立方米的原料，其体积相当于 18 个金字塔的大小，这是那些认为纳赛尔具有法老倾向的人们给出的适当比较。水库在纳赛尔死后被称为纳赛尔湖，容纳 1690 亿立方米水，相当于尼罗河两年的流量；它往南方扩展 550 公里，经过埃及的努比亚全境，越过第二瀑布（它淹没了第二瀑布），进入苏丹

地区。埃及的努比亚地区的所有人口几乎不得不迁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领导的相关国际援助挽救了大量重要古代纪念物,包括阿布·辛拜勒神庙,它被迁移到了更高的地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执行了广泛的紧急抢救性考古活动,但古代努比亚被淹没造成的考古学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阿斯旺大坝的其他负面影响包括渗流和蒸发导致的水遗失。在大坝修建之前,每年河水泛滥都会在下游田地里储存数百万吨营养丰富的淤泥。大坝投入使用之后,大多数营养丰富的淤泥都作为沉积物沉入纳赛尔湖的湖底。化学肥料必须用在田地里,田地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盐分的破坏,因为这些盐分不再能够被泛滥洪水冲走。尼罗河谷沿岸的很多困难都是由尼罗河水位持续不变造成的高水床导致的;三角洲的海岸线也恶化了,而且毗邻地中海水域的捕鱼业也受到破坏。然而,这些都不是阿斯旺大坝独有的缺点,因为四季不断的灌溉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较小的水坝和拦河坝早就在尼罗河上建筑起来。水上疾病(例如血吸虫病)造成的恐慌越来越高,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疾病没有具体化。

尽管很多作家常常抱怨阿斯旺大坝,但如果没有它,今日埃及的状况是难以设想的。大坝无疑引起了很多问题,一份细致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利远大于弊,事实也证明了这点。阿斯旺大坝使埃及可耕地的数量增加了近一百万公顷;上埃及现在一年可以生产三季作物,而非一季作物;阿斯旺大坝为埃及每年增加一百亿千瓦小时的电量储备。几乎所有埃及村庄都有了电。在 21 世纪初,大约三分之一的埃及电力是由阿斯旺大坝提供的。当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大旱给很多非洲国家造成饥馑时,阿斯旺大坝几乎立即显示出了自己的价值。埃及能够利用水库,持续不断地给农田供水。另一方面,埃及也遭受了超高洪水的毁坏性结果,包括 1975 年那次洪水,这是有史以来第三次最高洪水。

苏伊士危机的结果之一是革命指挥委员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消失

了。它的一些成员继续身居高位，并保持影响，例如纳赛尔的老追随者阿布德·埃尔－哈稀姆·阿穆尔就是特别重要的人物，但这只是个人影响，而非集体影响。权力现在被严格地巩固在纳赛尔手中。很久以前就承诺的新宪法最终得以起草，并获得全国认可。它提供了广泛选举权和代表委员会，但在新制度中几乎没有民主制的成分：委员会是咨询机构，而非立法机构；政党被禁止，只允许国家控制的民族团结党存在。在1956年6月的公民投票中，纳赛尔以99.9%的选票当选为总统。他是唯一候选人，毫无疑问，他受到人们欢迎。苏伊士危机之后，他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然而，尽管纳赛尔是总统，但他的权力和地位实际上超越任何机关部门的权力。他是领袖，是掌权之人。正如一位卓越的埃及学者描述的那样，在纳赛尔统治的最后几年，“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甚至第四种权力，即出版权，都融合在了一起。它们变成了领袖的四肢，国家的意愿就是领袖的意愿。”

权力的合并使纳赛尔能够着手实施重要项目，这些项目最终转变了埃及政府和经济。1956年宪法向埃及人承诺了社会福利。纳赛尔通过建立最低工资制度、使卫生保健为更多的人服务、建立低收入家庭的信贷住房制度，很好地实现了这个承诺。教育得到大大扩展。然而，几乎在每个领域，财政、职工和执行问题都严重地限制了这些措施的利益。

教育形势具有说明性。在纳赛尔时期，小学入学人数增加了三倍，302 尽管他们仍然仅仅是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中等学校入学人数增加了八倍，而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近五倍，1952年的情况是这样。显然，教育带来了一些利益；到纳赛尔去世时，大约一半的埃及人有读写能力了。但学生数量的增加并没有与资金的增加、新教学设施或新教职员工雇佣制度的构建配合起来。教室非常拥挤。大学标准垂直下落。教职员工的工资始终是令人沮丧的低。很多埃及教授最终到国外寻找更好的机会。如洪水般增加的大学毕业生或者中等学校的毕业生们到哪里找工作呢？教育已经提高了他们的期望。

纳赛尔解决埃及经济问题的努力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957年,其特征是国家监督。苏伊士危机的解决使埃及继续把经济与运河的国有化和大量英国和法国财产的广泛没收混合起来,英国和法国财产包括大商业财产,例如巴克利斯银行和里昂纳斯信用社的财产。阿斯旺大坝项目也加深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经济发展组织于1957年建立起来,负责监督这些方面的经济,并创造新经济领域,有权进行必要的资本投资。大海尔万钢铁工厂就是在它的支持下开始的。国家的商业所有权大大增加,但仍有私人商业活动的空间,纳赛尔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当国家干预工业时,这根本不意味着国家是唯一的资本家。"

人们可能希望苏伊士危机之后埃及与美国之间会相互和善,但由于很多原因,这并没有发生。纳赛尔可能是难相处、刚愎自用的人,他并不总是容易相处的。他在中东地区的粗暴外交导致了美国和其西方同盟(尤其英国)的严正干涉。埃及和以色列共和国之间越来越敌视,这阻碍了开罗与华盛顿之间更好的关系,因为以色列在美国拥有强大的政治支持。303 但最严肃的问题是理解,即埃及正加深对苏联和共产主义传播的兴趣,甚至正滑人苏联的影响范围。纳赛尔通过与俄国人建立商业关系、用埃及棉花换取苏联武器装备、在埃及加速实施社会主义项目,加强了人们的上述印象。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来,纳赛尔对不结盟运动的拥护只能加强苏联的势力,因为在杜勒斯的极化世界观里,任何人不与西方站在一起,那就是反对西方的。

更深入的分析将揭示出更复杂的画面。正如纳赛尔公开表达的那样,他宁可从西方购买武器装备,但它们不会到来。他与苏联的关系并不像华盛顿认为的那样亲密。他与莫斯科的不和越来越严重了,而且他坚定不移地拒绝允许俄罗斯军队在埃及登陆。苏联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范围通常被高估了。华盛顿战略家始终没有意识到,像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这样的国家都曾一次或另一次地被归入俄罗斯阵营,但他们恰恰在为了一切值得的东西而玩弄共产主义的赞助人。正如一位

沮丧的苏联外交家在谈到他的叙利亚联盟时说的："他们从我们这里接受每一样东西，除了建议。"

就埃及社会主义和整个阿拉伯社会主义而言，很难说它是苏联或马克思主义的分支。阿拉伯社会主义者拒绝阶级斗争的思想，确信非教旨主义，认为有更好的方式生产和分配资源，而且这些可以通过国家管理来获得。作为穆斯林，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强硬地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后者在中东地区从不会有任何机会。然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把这个地区看作适合共产主义者进入的领地。出于这个原因，艾森豪威尔主义在 1957 年 1 月发布出来。它宣布对任何受到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国家的攻击或威胁的中东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很容易理解，这适用于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野心，纳赛尔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他并不关心这个。1956 年 11 月，纳赛尔在对埃及人民的演讲中，声称："无论华盛顿什么时候讲(艾森豪威尔主义)，我都将告诉他们：'盛怒之下便是死亡'。死亡优于耻辱。"纳赛尔作为泛阿拉伯领袖的地位是依靠他从共产主义阵营购买的武器装备确立起来的。他受到苏伊 304 士危机的警醒而购买武器装备。纳赛尔不诚实地告诉一个外国记者："我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但阿拉伯人们感到我们在埃及做的事情反映了他们的集体希望和渴望。"埃及的确是纳赛尔能够依靠其捍卫泛阿拉伯事业的良好根据地。1956 年宪法提到，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我们能够注意到，这正式表明了一个重要出发点：二十年以前，几乎没有埃及人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同盟在开罗设立总部。埃及在出版、电影和广播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散布纳赛尔信息的手段，很多信息都激怒了他的很多阿拉伯敌人和竞争对手。恰恰不是在埃及，而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很多人欢迎纳赛尔，他们认为——也使他认为——他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事实上，他一路走来，一路弥补着这种信念。

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杰出倡导者，纳赛尔经历了一些上升时刻，

也经历了一些极度的失败。与叙利亚联盟的思想实际上不是他提出来的，而是新的叙利亚政权提出来的。新的叙利亚政权需要政治保护伞，并求助于纳赛尔。这种邀请来自中东泛阿拉伯主义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国家，是难以拒绝的。纳赛尔接受了，但主要以他的条件为基础：充分联盟，而且他将严格掌控联盟。据此，1958 年 2 月 1 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宣布成立。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受到了叙利亚人民极为热情的欢迎，它的成立在整个中东地区引起了轰动。一时间，纳赛尔、纳赛尔主义和他的标志泛阿拉伯主义似乎席卷整个中东地区。在黎巴嫩（大多数叙利亚人认为黎巴嫩是叙利亚的正常组成部分），纳赛尔的代理人煽动的亲纳赛尔示威游行在穆斯林当中爆发，他们求助纳赛尔对抗他们的敌手马龙派基督徒。巴勒斯坦人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视作恢复其家园的前奏。也门在当年 3 月正式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尽管他的加入仅仅停留于口头承诺。

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反应是惊慌，而西方国家的态度是敌视。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梭德做得更彻底，贿赂一个叙利亚人去暗杀纳赛尔。这是他的几个愚蠢行为之一，这些行为最终使他付出了丧失王位的代价。约旦和伊拉克匆忙结成应急同盟，这种行为遭到了纳赛尔的强烈谴责。这个应急同盟在 1958 年 6 月 14 日解散，当时一次残忍的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伊拉克君主制。关于伊拉克是否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有一次严肃的讨论，但利己主义占据上风。当时，伊拉克的新领导人阿布德·埃尔－卡里姆·卡西姆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巨大石油财富，决定不与埃及的好几百万人口分享它。黎巴嫩的基督徒总统卡米尔求助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对他的请求作出反应，于 1958 年 7 月派遣陆军和海军特遣队到达黎巴嫩，维持这里的局势。约旦国王侯赛因降服了他的亲纳赛尔官员，尽管他感到必须寻求英国军队的支持，这种措施对于侯赛因来说一定是特别耻辱性的，因为就在两年前，他开除了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司令帕夏约翰·格拉布爵士。但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海

军和英国伞兵，黎巴嫩和约旦早已发现自己是纳赛尔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员了。

埃及与叙利亚的联合后出现了大量困难。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有着广泛的差异。它们中间是一个一千公里见方的敌对国家以色列。相邻的国家大多数都反对这种联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运转需要不同寻常的政治技术和认真的外交。事实上，埃及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处理是笨拙的。

尽管不是那么平等，但是，叙利亚人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里面发挥主要作用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纳赛尔是总统，叙利亚的舒克里·埃尔－库瓦塔里是副总统。联合国家委员会由三百个埃及人和一百位叙利亚人构成。但很快情况就明了了，即埃及以武断的方式统治它的“北方行省”。在政府里面，埃及保持着国防和外交事务等主要部门的部长职位；叙利亚人本来希望至少拥有一个这样的职位，但搪塞着给了几个较低的职位。一个累赘的、埃及类型的官僚体系强加给了叙利亚，大多数由埃及人出任官职。叙利亚政党被废除，地方政治人物被边缘化。叙利亚军队因埃及军队的控制而沮丧。尽管比起埃及来叙利亚可能是更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它也有更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这种发展受到埃及越来越严格的控制和限制，埃及的控制在 1961 年的 7 月法令中达到顶点。黎巴嫩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造成的麻烦作出的反应是关闭黎巴嫩与叙利亚之间的边境。与此同时，叙利亚还发生了干旱。这两者加重了叙利亚的经济恶化。很多叙利亚人感到失望，因为其他国家并未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把他在自由军官组织中的老朋友阿布德·埃尔－哈稀姆·阿穆尔任命为叙利亚特殊专员，这件事起到了非常负面的效果。

306

到 1961 年，叙利亚的所有权力中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商业社区、官僚机构和军队——都有了足够多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员。当纳赛尔最后意识到问题，并试图在 8 月改善叙利亚在联合共和国中的地位时，已经为时太晚而不能挽救形势了。叙利亚军队在 1961 年 9

月28日发动了一场政变,宣布结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仍在叙利亚享有很高程度的欢迎,暂时考虑运用军队恢复秩序,但接下来就得重新考虑这种方式了。他谴责叙利亚资本主义者分裂行为的影响,但他得比任何人为导致了这种局面负更多的责任,他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在反省时说:“这种局面是多年来逐渐造成的。”两年后,当叙利亚和伊拉克经历了进一步政变以后,叙利亚怀着复活和扩大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思想靠近纳赛尔时,他很谨慎地行事,所以当联合未能实现时,他的境地没有那么尴尬。

正当埃及与叙利亚的联合开始紊乱时,纳赛尔的经济政策也进入了最根本的阶段。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失败促使纳赛尔采取更强烈的措施,而且他拥有强烈的控制欲,所以他加强了对埃及经济的控制,这是不可避免的。变化的迹象已经呈现出一段时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口号是“自由、社会主义和联合”。经济发展项目委员会已经通过较严格的私人商业许可和新国有企业的创建,稳定地扩展了国家的控制范围。在1959年,宣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纳赛尔的目标是增加国民收入两倍。他的专家告诉他,这将至少花费二十年时间;然而他说这个目标不得不在十年内完成。即使如此,几乎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纳赛尔心里怀有彻底变革的思想。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对权力的掌握是一场军事政变,而革命则开始于1961年的七月法令。

这些措施使埃及的工厂、银行、保险公司、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口公司、大旅馆、印刷和广播媒体和很多其他经济领域都国有化了。那些处于国家所有权之外的也都被控制在综合规章制度下。5000埃镑的最307 高工资得赋税。收入多于一万埃镑的赋重税。埃及600个最富有家庭的财产被没收。很多人被逮捕和投入监狱。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人被允许拥有多于100费丹的土地;其他土地被分给无土地的农民。所有外国人拥有的农田都被没收。1961年,埃及国家总共掌握了三百多家商行。1963年,另一轮国有化收进了另外三百家商行。

1964年的最后一系列敕令实施以后,国家对经济的接管便完成

了。古老地主贵族的权力被一劳永逸地打破。很多曾经富有的家庭遭受着不必要的羞耻和困顿。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严重的连续性的中断。在古老的制度中，有一些方面没有完全混乱或未受改革的影响。但整个古老制度被消除了，它将一去不复返。古老政权当中大多数政治活跃成员都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很多机构被拆除。纳赛尔正在进行豪赌，他的试验将奏效。从长远来看，试验的结果令人非常失望。

从短期效果来看，生产力、雇佣和收入的提高都是有可能的。从长远效果来看，政府拥有的商业将是经济的拖累。国有商业从来就没有赚钱，政府还不得不给其补贴很多资金。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当纳赛尔为了满足大学生的希望，而保证为越来越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工作（如果必要的话，就在政府或公共经济部门内给他们安排工作）时，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1967 年，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是 150 万。

在政府膨胀过程中，一个更险恶的方面是安全部和文化部的扩大与侵扰。纳赛尔最关心的是防止军队阴谋，但安全部在整个社会达到了普遍深入的程度，以至于要求看门人报告建筑物内部人员的活动。人们与外国人的联系特别受到猜疑，并可能是极端危险的。埃尔－阿卡巴尔的前出版商穆斯塔法·阿敏 1965 年的审判和定罪并不是孤立事件，他的罪名是“他是美国间谍”。尽管仍然鼓励外国旅游者来埃及旅游，花费埃及人急需的硬通货，但他们被严格禁止经过开罗和卢克索这样的地区，卢克索是古代底比斯的一个遗址。埃及人到国外旅游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为了到西方大学学习而提交的申请也可能被拒绝。影响是负面的。人们害怕公开讲话。他们的恐惧不是没有理由的。武断的逮捕和入狱经常发生。那些落入安全局手中的人们的命运可能是拷打，甚至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躲过监视的眼光。纳赛尔获得关于他最高和最亲密伙伴的报告。因为纳赛尔是通过密谋和伪装上升到权力顶峰的，所以他始终保持着这些特性，事实上是加强了这些特性，甚至在他的地位不再受到严肃威胁之后，他还保持着这些特性。纳赛尔

308

的肖像、半身像和雕像到处可见,这使人们能够随时见到他。

与叙利亚联合的解体和埃及内部彻底的经济变化意味着纳赛尔政府不得不起草新宪法。纳赛尔尽量地展现了自由主义的姿态:他撤销了战争法(尽管第二天他就以不同的态度再次强化了战争法);穆斯林兄弟们在监狱里苦思了十年,现在被释放,并被允许继续他们的宣传活动。但1964年宪法几乎没有民主制因素。几乎所有权力和动议权都掌握在总统手里。有一个选举出来的国家委员会,但它最多只能责难政府或其大臣;总统能够随意解散国家委员会。纳赛尔的权威未受到挑战。在接下来的公民投票中,他像往常一样获得了99.9%的选票。

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另一个革新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创建,代替了民族团结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国家政党与国家官僚机构的单一联合,它的代表(包括选举出来的"农民和工人")将为政府和越来越国有化的经济提供桥梁,同时规划国家政策,借以使它与国家委员会建立模糊的关系。它的组织是非常严密的,从总统职位直到村级官员,呈金字塔结构。它为全国的经济和社会提供多种联系。然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不是协商和咨询团体,主要是为中央政府实施其政策提供媒介。尽管纳赛尔建立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但他逐渐把其视作潜在威胁力量的基础,并用怀疑来对待它,他的继承者安沃尔·埃尔-萨达特也是这样做的。

纳赛尔能够使选举符合他的愿望,但他很少在经济上取得成功。1965—1966年是一个延长的经济危机期,部分上是因为七月法令造成的转变。乡下居民的新组织并没有很好地运转。很多国有商业需要繁重的补贴,而且新国有商业的建立需要投入资本,这些投入资本总是埃及很难动员出来的。与此同时,从政治上考虑,更多的钱应该投入到像住房这样的领域当中。纳赛尔政府不得不稳定物价,也不得不提高工资。始终膨胀的官僚机构占去一大部分财政预算,而军费也增加到了财政预算的四分之一。埃及不能通过国内税收满足这些费用。埃及只得向国外举借大笔外债,以便创造严格的支付平衡。到1967年,埃及

的债务达到了 20 亿美元。

因西方从经济上对埃及进行联合抵制，埃及的形式变得更糟糕了。美国和埃及之间的关系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时期并不是十分糟糕，但在约翰逊总统时期开始恶化。约翰逊总统结束了美国剩余小麦的转运，这些小麦曾帮助埃及弥补了越来越大的农业短缺。农业短缺是埃及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新麻烦。首相扎卡里亚·穆利·埃尔－丁采取极端措施，完全废除了移民控制，埃及工人开始了大规模“出埃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日。这为埃及减轻了一些下岗压力，逃往国外的工人的汇款变成了埃及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也意味着有价值技术的持续耗竭，这些技术本应该用在国内的。

纳赛尔的健康正在恶化，但这是民众不知道的秘密。他可能在 1965 年夏季患上了轻微的心脏病。然后，在当年 8 月，官方突然宣布穆斯林兄弟会策划了一场刺杀纳赛尔的阴谋，而且几个高级大臣也参加了阴谋。或许确实发生了一场阴谋——考虑到当时埃及的国家形势，一定有一些秘密反对意见。但当纳赛尔的项目陷入麻烦时，他总能有法摆脱困境，表达他个人的沮丧，并把公众对其失败的愤怒转嫁到其他靶子上。两百二十多位穆斯林兄弟被逮捕；七个人因叛国罪而被绞死，包括萨义德·库特布。但纳赛尔的愤怒并不局限于穆斯林兄弟会。所谓的共产主义者被逮捕，乡村的“封建主义者”也被逮捕。

310

除了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和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不乐观，纳赛尔越来越陷入另一次运气不佳的外交活动中。埃及与也门的联合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崩溃而结束。无论如何，这仅仅是形式问题。也门十分保守的统治者伊玛穆·阿赫迈德公开批评纳赛尔的政策。在一段时间里，阿拉伯半岛西南角这个孤立的国家越来越不稳定了，因为进步因素要求现代化。当政教领袖伊玛姆艾哈迈德于 1962 年 9 月 19 日去世时，将军阿布达拉·埃尔－萨拉尔领导的一群军官发动了一场暴力政变，很可能是受到了埃及的鼓励。人们认为艾哈迈德的继承者穆罕默德·埃尔－巴德尔王子已经被杀死了。官员们把自己组建为革命委员

会。他们杀死了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忠诚的领导者,并请求纳赛尔帮助对付他们宣称的几个顽固的反动分子。

纳赛尔是有同情心的。也门的形势是他很少知道的。也门的形势似乎与他掌权时的埃及的形势很相似。这是他在阿拉伯半岛扩大影响的一个机会,具有特别令人动心的前景,因为也门正好毗邻英国在亚丁的大基地。纳赛尔认为只要投入很少的士兵和物质支持,他就能够维持这个初生的政权,提高他的泛阿拉伯思想(这个思想已经因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失败而失去了光泽)的认可程度,并抵制其西方对手的影响。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估计,他后来承认了这点。埃尔-巴德尔没有被杀死;他逃到了也门多山的内陆,在那里,忠诚的部落集结起来支持他的事业,并继续战斗。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保皇主义政权决定抵制纳赛尔共和主义的传播(而且早就对开罗“阿拉伯之声”广播节目导致的敌对宣传感到愤怒),慷慨地帮助埃尔-巴德尔的队伍。在一定程度上,英国、以色列和伊朗也这样做了,他们都不喜欢泛阿拉伯主义。到 1963 年末,两万埃及军队在也门战斗;一年以后,战斗军队增加到了七万,是埃及军队的三分之一,而且看不到战争结束的迹象。如果埃及撤退,那么埃尔-萨拉尔的政权将被推翻。

在很早的时候,纳赛尔就开始寻找解脱的方式,并建议如果约旦从也门撤军,那么埃及也从也门撤军,但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政权不打算配合他。如果纳赛尔单方面撤军,那么他的泛阿拉伯主义声誉将进一步受损。如果他耽搁,那么他很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制造麻烦,因为他将把资源用于明显无望的战斗中。埃尔-巴德尔和他的人们利用游击战术和熟悉的地形进行战斗,完全能够亲自战胜无能的埃及军队,埃及军队由纳赛尔腐败而无能的追随者阿布德·埃尔-哈稀姆·阿穆尔领导。也门战争最终耗费了埃及一万人和大量金钱,在协议最终达成,埃及得以于 1968 年从也门撤军之前,埃及几乎不能支付战争费用了。

使纳赛尔从也门解脱出来的是 1967 年 6 月埃及与以色列更糟糕

的战争灾难。尽管1948年对以色列的战斗是纳赛尔政治激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足够现实地接受了新国家建立的既成事实，而且他认为它具有某些进步性，这种进步性是腐败的阿拉伯政权应该很好地效仿的。一场初步对话开始了。但是，很快一个更强硬的政府就在以色列掌权，而埃及号召整个阿拉伯反对以色列，令人烦恼的巴勒斯坦问题强化了这点。纳赛尔对阿拉伯各国领袖职位的觊觎意味着他将牵涉进任何一个发展问题中，甚至牵涉进那些不会直接影响埃及的问题中。他在1960年再次表达了这点："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巴勒斯坦人们的权利，因为正如我在以前说过的那样，巴勒斯坦人们的荣誉是阿拉伯民族的荣誉。"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已经加深了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敌视态度，但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驻扎在两国共有边界上，极大地降低了两国进行另一次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尽管这些年纳赛尔关于以色列的言论越来越刺耳了，因为他把它谴责为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并号召解放巴勒斯坦，但他不一定倡导绝对毁掉巴勒斯坦。如果埃及追求一种 312 更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政策，那么或许埃及已经提出了一个对以色列更有建设性的政策。事实上，纳赛尔作为阿拉伯领袖的突出地位严重地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

纳赛尔对以色列的反对行为大多局限于刺耳的言论，因为他试图维持他在阿拉伯世界的优势地位，但在1966年年初，新派军官在叙利亚掌握政权，并开始支持巴勒斯坦人从约旦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这导致了1966年11月以色列对约旦城市的严重报复。叙利亚人从他们在戈兰高地居高临下的根据地炮轰加利利的以色列社区。在1967年4月对大马士革的空战中，几架叙利亚米格式战斗机被打落。不久之后，叙利亚和埃及建立了一个联合军事指挥部，相互保证：如果一方与以色列发生战争，双方便共同战斗。纳赛尔认为这次联盟能够使他抑制叙利亚；事实却相反，这次联盟使纳赛尔处于他不能控制的可悲事态之中。

1967年5月，苏联出于一些不太清楚的理由通知叙利亚，以色列人对叙利亚的攻击即将开始。叙利亚人要求纳赛尔信守承诺。尽管纳

赛尔军队最优秀的部分远在也门,但他被迫应诺。他最信任的朋友阿布德·埃尔-哈稀姆·阿穆尔是武装部队的司令,也是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阿布德·埃尔-哈稀姆·阿穆尔向纳赛尔保证埃及军队已经准备好了。纳赛尔或许估计战争不一定发生;恰恰不得不在两线作战的威胁可能足以阻止以色列攻击叙利亚。(纳赛尔认为)美国和苏联的国际压力将会阻止事态的恶化。纳赛尔把埃及军队调动到西奈,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约旦人和沙特阿拉伯人嘲笑纳赛尔躲藏在联合国部队后面。纳赛尔需要做一些事情去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因此他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乌散特撤走一部分军队;乌散特的反应是撤出了所有军队,这是纳赛尔始料未及的。埃及军队在是否占据空出来的地区方面稍有迟疑。纳赛尔宣布重新利用海军封锁亚喀巴湾,这威胁到了以色列从伊朗的石油供给。在当年 5 月 30 日,约旦和埃及结成联合军事司令部。以色列开始动员备战。

313

关于公元 1967 年战争之前埃及和以色列的意图,很多人已经被以十分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阐释。纳赛尔的言论是好斗的火药味——"我们像热碳一样在燃烧,希望战斗"。但他坚持认为埃及不会首先开战,而且他的行动比他的言论更不明确。甚至当他实施海军封锁(这种海军封锁从来没有实质意义)时,埃及在联合国的外交家还在寻求折中的方式对待战争。当战争开始时,纳赛尔没有打算攻击以色列。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人确信以色列纯粹是为了抵抗周围不安分的敌人致命的联盟而进行的自卫,而其他人认为以色列共和国民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扩张主义的。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在当年 7 月 5 日早晨,埃及没有准备攻打以色列。正是以色列首先开战。

埃及完全没有准备。在战争的第一个小时,埃及的空军被摧毁,大多数飞机还停在跑道上未来得及起飞就被毁掉了。据说,埃及人甚至没有使自己的雷达运转起来。埃及陆军被剥夺了空军掩护以后,处于无助的状态。当他们在密如雨点的凝固油炸弹和子弹攻击下从西奈山撤退时,完全暴露于敌人无情的空袭下。当埃及陆军迅速地进入苏伊

士运河东岸时，以色列陆军便几乎没有机会进攻了。在另外的前线，以色列共和国民从约旦占领了整个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并从叙利亚占领了戈兰高地。当埃及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号召在 6 月 8 日停火时，它已经丧失了西奈的所有地区；两万埃及战士阵亡，至少还有五千埃及士兵被俘或失踪；埃及的整个空军几乎都被消灭了，还丧失了大批战略物资，例如坦克和大炮。埃及在战后荒谬地报告获得了重大胜利，这使灾难更恶化，这种报告在完全失败后被广播出来。

纳赛尔遭受了灾难。当他于 6 月 9 日向他的国家发表演说时，他可能是真诚的，尽管他并没有说明事件的真相。他为失败负责，他告诉埃及人们，他不再有资格领导他们，他将辞去总统职位。他的职位将被总理扎卡里亚·穆利·埃尔－丁代替，后者是自由军官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反应是瞬间的。人们挤满街道，高喊："我们需要纳赛尔！"成千上万的人们（包括穆利·埃尔－丁）聚集在开罗郊区赫利奥坡里斯纳赛尔住宅的周围，要求他担任原职。

314

民众对纳赛尔倾注的支持令人愉悦，但这也给他倾注了沉重的压力，他必须找到摆脱混乱的方式。纳赛尔首要关心的是像往常一样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尽管埃及人们支持他，但当他们了解到失败是多么糟糕时，非常沮丧，并要求对其作出解释。学生的不安状态表现为不寻常的喧嚣。纳赛尔通过解雇几千个军官而缓解了公众对军队失败的愤怒，这种行为使他消除了持不同政见者。纳赛尔与阿布德·埃尔－哈稀姆·阿穆尔的长期合作最终失败了，纳赛尔对阿布德·埃尔－哈稀姆·阿穆尔的失败长期以来都是视而不见的。根据官方报告，他被软禁在家中以后就自杀了；根据谣传，他被谋杀。当持续的报仇情绪演变成工人和学生的示威游行时，纳赛尔自从 1954 年纳吉布危机以来第一次亲自面对示威游行者，并在 1968 年 3 月 30 日纲要中对自由主义做了让步。然而，当纳赛尔说了和做了所有事情时，他仍不愿意在政治自由化方面走得太远，结果事情仍然与它们以前的状态一样。尽管纳赛尔的政治地位因他所说的 1967 年"挫折"而想当然地降低了，但他摆脱

了灾难，他的权威完整无缺，而这种灾难可能容易地结束任何政治领袖的生涯。

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个困难时代。埃及摇摇欲坠，几近破产。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关闭，埃及不能从这个资源获得硬通货收入；旅游者不再来到埃及；埃及石油生产的一半掌握在以色列手中；农作物的生产是糟糕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的补助金维持着风雨飘摇的埃及经济。与此同时，纳赛尔的健康持续恶化。由于疾病加重，他不得不于1968年夏季到莫斯科接受长期医疗护理；国家被告知纳赛尔感染了重感冒。在下一年的9月份，他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这迫使他远离工作达六个星期之久。他返回来时，遇到了学生的再次抗议，这次学生抗议组织更完善，比以前更强烈。纳赛尔这次作出的反应是严厉的镇压。

1967年6月失败以后，在阿拉伯国家的喀土穆会议上，与会国保证一致行动，共同对付以色列，不会一对一地与以色列谈判。步骤是“没有战争，没有和平，没有赞誉”。其他阿拉伯国家许诺给埃及金钱以弥补运河关闭造成的损失。埃及同意从也门撤军，这结束了埃及在那里的财政外流。但是，当纳赛尔遭遇与以色列的持续军事冲突的艰难压力，于1969年12月在拉巴特召开的另一次高峰会议上，要求阿拉伯国家给予物质援助和真正联合战斗时，他几乎什么也没得到，这迫使他求助于苏联。苏联的帮助是以埃及付出代价为基础的。首要条件是苏联军队驻扎在埃及。到1970年，埃及的物质损失得到补偿，还赚取了一些物资。

既然纳赛尔不能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那么他便求助国际外交。他获得的最重要外交成绩是联合国安理会的242号解决方案。该方案要求以色列从它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地区撤军，因为任何国家只有在安理会认可的疆界内才是正当的。这个方案也是为了解决难民问题而提出来的。当这个方案没有带来实际结果时，纳赛尔在1969年3月发动了消耗战，估计以色列将因在苏伊士前线的持续冲突而毁灭，这种冲突将迫使以色列保持一种难以维持的战备状态。然而，尽管埃及能

够在跨越运河的炮弹战斗中获胜，但以色列能够用空袭击打埃及的阵地，并炮袭埃及内地。伊斯梅利亚、萨义德港和苏伊士等城市都遭到毁坏；一百多万人不得不转移。

埃及因消耗战而变得更糟糕，但它导致越来越多的国际势力牵涉进战争的解决过程。1969 年，理查德·尼克松成功地接任林顿·约翰逊就任美国总统，他想在中东地区实施“更加不偏不倚的政策”。和平福音计划冠以尼克松的国务卿罗杰斯的名字，这是一个主要以 242 号解决方案为基础的行动方案。它对纳赛尔有吸引力，因为它为纳赛尔提供了无须战争便能收回失地的希望，使埃及从立即与以色列非常必要的停火中解放出来。他在 1970 年 7 月 23 日接受了罗杰斯和平福音计划。两周以后，停火得以实现；消耗战没有再次发生。

然而，一场危机刚刚平息，另一场危机又起。巴勒斯坦人认为纳赛尔接受罗杰斯和平福音计划的行为是对他们的事业的出卖。激进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迅速采取行动，把约旦作为他们主要的行动基地。316 他们在约旦劫持了几架飞机，并把它们毁掉以后，国王侯赛因命令军队全面进攻他的国家内部巴勒斯坦商业总部和几个市民帐篷营地。战斗激烈，人员伤亡惨重，这次战斗后来被称为黑色九月。叙利亚准备干预，支持巴勒斯坦人，这场行动可能已经毁掉了侯赛因的政府，并使以色列和美国发生冲突。

在这场对外政策危机（这也是纳赛尔的职业生涯中最后一次对外政治危机）中，纳赛尔以某种方式继续发挥阿拉伯领袖的作用。他于当年 9 月 27 日在开罗召开了一次阿拉伯峰会。值得怀疑的是，其他每个人是否都在阻止约旦和巴勒斯坦之间可怕的冲突失控方面持有自己的目的。会议日程太紧张了。当年 9 月 28 日，会议刚刚结束，纳赛尔就遭受了致命的心脏病。四百多万人挤满了开罗的大街小巷，参加伽马尔·阿布德·埃尔－纳赛尔的葬礼。纳赛尔是两千多年来埃及第一位真正的当地埃及籍统治者。

第十九章　萨达特时期

317　当纳赛尔去世时，安沃尔·埃尔－萨达特变成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早期生涯是出入政治麻烦和监狱。他是自由军官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在纳赛尔统治时期，他从未感到纳赛尔的支持，他也未曾动摇过对纳赛尔的忠诚，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被嘉奖以大量高级官阶，在 1969 年 12 月被选举为副总统而达到了嘉奖的顶峰。但人们认为纳赛尔不打算让萨达特做他的继承人，而且很多政治内行预期他不会在总统职位上工作很长时间，或者最多他也就是集体领导群体背后有名无实的人物。

萨达特证明他比人们预想的更能干，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国家首领。政府最高层的很多职位都由纳赛尔派占据，他们认为自己比萨达特更适于统治国家，萨达特通过最初保持他们在原有的岗位上而诱使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安全感；但挑战和反应很快就到来了。当萨达特表现出太多的独立迹象时，他的反对派采取集体辞职的方式逼他就范。318 然而，如果他们认为萨达特没有他们就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萨达特仅仅接受了他们的辞呈，并用他自己的人代替了他们，加强了他的地位。

萨达特最可怕的反对者是阿里·萨比利，后者是前总理和萨达特的副总统之一。更重要的是，萨比利掌握着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

这一关键职位。这是埃及唯一的政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是政权运行的中心。萨比利也是统治圈内左翼的领袖，萨达特特别怀疑他。萨比利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削弱萨达特的努力被萨达特熟练地化解了，萨达特曾是它的主席，非常熟悉它的内部运作规则。然后，在1971 年 5 月，当萨达特感到时机已经成熟时，开始实施他的矫正革命。他解除了萨比利的职务，并以叛国罪逮捕了他。在下一年的 12 月份，萨比利和其他 90 人，包括高级大臣和前武装部以及安全部的头目，被审判，并定罪为颠覆国家未遂罪。判决是严厉的。萨比利被判处死刑，尽管萨达特将判决减轻为死缓，并最终宽恕和释放了他，但他也在监狱里度过了几十年。不管萨达特一开始表现得多么软弱，他手中掌握着两张王牌。首先，他是总统，大多数埃及人宁愿接受活生生的宪法和制度事实，而不愿涉足未知的政治浑水。总统职位也给予他一些高压统治的权力，这是其他政治人物无法匹敌的。其次，萨达特注意确保军队对他的支持，而最终这次革命的成功也与军队有关。

萨达特严格确立了他的权威之后，便开始消除笼罩在埃及上空的高压和武断统治的感觉。没收过程被勒令停止。在没收过程中，个人仅仅因为受到不忠的怀疑就被没收私人财产。一些没收来的财产被返还给个人，并给予一些补偿。萨达特以非常公开的方式焚毁了电话窃听的录音记录和手稿。纳赛尔复杂的国内安全设施也被拆除，但这个过程是部分的和有选择的；没有人天真到以为安全部不再工作了，它也的确没有停止工作；萨达特一再适时地表现出他可能是非常铁腕的。但萨达特统治时期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们开始谈论他们的思想，并且更自由地交往。埃及出版业仍是附属性的，但与以前相比，层次有所提高，而且外国记者不再受到审查。

319

不带任何炫耀，事实上几乎未引起注意地，一个去纳赛尔化的过程已经在进行了。大量繁殖的埃及电影院生产出了很多间接批评旧政权的电影，并标明事情已经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那些使纳赛尔看似无处不在的肖像开始消失，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没有纳赛尔肖像的地

方倒显得很突兀了。最重要的埃及纪念物是以纳赛尔的名字命名的纳赛尔湖,这是一个阿斯旺大坝后面的水库;纳赛尔城市不重要了(开罗的一个郊区被称为纳赛尔城),而且纳赛尔的雕像没有矗立在开罗最显眼的地方。甚至曾经最好拍纳赛尔马屁的唯唯诺诺的人,即萨达特,也平静地批评他。萨达特在 1975 年说:"阿布德尔·纳赛尔是一个人,因此说他做了正确事情和他做了错误事情,并不意味着轻视他。"

降低纳赛尔是提高萨达特的政策的一部分。尽管萨达特的制度权力等同于、有时超越了纳赛尔的权力,但他痛苦地意识到纳赛尔的权威并没有那么依赖于制度(纳赛尔在其 16 年不容置疑地掌握权力时期制定了至少六部宪法),而是依赖于他的人格。纳赛尔是一个很难被效仿的演员,这对于萨达特来说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因为萨达特曾经想做一名演员,他的自传就是以《不成功的演员》(*Acteur manqué*)为标题的。在效果上,萨达特为自己创造了两种角色,我们确信它们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展示。一个角色是不受影响的乡下人,是村庄之父,而村庄是埃及人的国家。但在另一种角色中,他陶醉于炫耀,通过穿戴更复杂考究的制服寻求威望和威严。据说,在他被杀害那天,他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制服,如此彻底,以至于当人们看到他的穿着时,都惊讶得喘不过气来。这两种角色是自相矛盾的,最终它们都不能令人信服。从短期效果来看,埃及人们得到了放松,并享受着摆脱了纳赛尔时代的高度紧张之后的变化。但从长远效果来看,他们厌倦了萨达特及其夫人贾汉,并最终对他们感到愤怒。贾汉也迅速地形成了渴望关注的心理,与她的前辈塔西亚·纳赛尔形成了鲜明对照。

另一个早期变化发生在宗教政策领域。萨达特鼓励甚至支持保守的伊斯兰教群体,包括穆斯林兄弟会。他的战略是利用他们作为政治砝码与左翼和纳赛尔派对抗,他认为左翼和纳赛尔派给他提出了更严重的挑战。他低估了穆斯林组织在力量和发展方面增加的多么快速,而事实上这也促成了他的个人死亡。到 1975 年,好战的穆斯林群体在大学里获得一些学生联盟的选举,促使他解散学生联盟;在 1977 年 7

月，穆斯林恐怖主义者绑架并谋杀了华夫脱党的大臣。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缺乏特权的社会阶层发生的社会问题，为伊斯兰教的宣传提供了肥沃土壤，埃及大批新征入伍的军队也是伊斯兰教宣传的良好土壤，他们是穆斯林兄弟会劝诱改宗的目标。萨达特的安全设施仍在实施控制，但他的宗教权权力的释放产生了深远后果。

然而，萨达特总统任期伊始最重要的是对纳赛尔政策的公开继续。泛阿拉伯主义在宣传中仍然占明显高的地位。1969 年，当一场军事政变使穆扎马尔·卡扎菲在利比亚掌权时，另一次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议论开始盛传。恰恰在纳赛尔死后的两个月里，利比亚、苏丹和埃及开始组建国家联盟的计划，这件事被公布出来。苏丹很快从方案中撤出，但叙利亚代替了它，结果阿拉伯共和国联盟在 1971 年 4 月 17 日宣布成立。阿里·萨比利和其他人对这个联盟的强烈反对是矫正革命的表面理由之一。卡扎菲正在提供更多的东西，为埃及提供一个完全有组织的联盟，受埃及的领导。阿拉伯共和国联盟在 1973 年 9 月 1 日就生效了，但随着卡扎菲与萨达特的关系开始恶化，联盟从未实现。萨达特痛恨卡扎菲干预乍得湖和苏丹地区的事务，并被卡扎菲暗杀其政治反对者所激怒，这些反对者曾在埃及寻求庇护。最终埃及 - 利比亚的关系恶化成了 1977 年的短期边境战争和长期的警惕敌对。很少轰动但更重要的是 1971 年 5 月萨达特把埃及的官方名字从“统一阿拉伯共和国”改成了“埃及阿拉伯共和国”，统一阿拉伯共和国这个名字在埃及与叙利亚的联盟破裂以后就一直在使用。现在回顾起来，这是一个标志，即埃及追求泛阿拉伯主义的不明亮的幻想并作出牺牲之后，逐渐把它自己的利益作为首先考虑之事。

到当时为止，最紧迫的国际关系是以色列，以色列对西奈的占领所制造的形势是埃及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能容忍的。在对待这件事情上，萨达特似乎也遵循纳赛尔的方式，重新采取停火的方式，但警告说重要的进程一定得实现。他希望美国加强干涉，建议重开苏伊士运河，同时以色列部分撤军，这是利用 242 号解决方案的第一步。美国没做

出反应,而以色列总理称萨达特的建议是“对我们智能的一次侮辱”。遭到回绝以后,萨达特称1971年为“决定年”。他一再表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在七月革命一周年的国庆致辞中,他许诺:“我们不会允许1971年在没有决定重大问题的情况下流逝,无论通过和平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即使这意味着牺牲一百万生命。”然而,1971年却在没有任何决定的情况下来到又流逝,萨达特无力的解释是事件被裹挟在国际“烟雾”中了。他的强烈声明变成了怀疑和嘲笑的口实,不经意间为最终付诸的行动提供了伪装。

从表面上看,萨达特也将遵循纳赛尔的先例,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事实上,人们很难想象,如果他不这样做,他还能怎么做。苏联是他的武器装备来源;一万五千人的俄罗斯军队正驻扎在埃及,他们中的一些人正驾驶飞机执行轰炸以色列的战斗任务;俄罗斯人出现在埃及政府的每个领域,包括它最敏感的部门;莫斯科是埃及的首要贸易伙伴。埃及能转向其他什么地方呢?埃及甚至与美国根本就没有外交关系,美国被认为是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当埃及和苏联在1971年签订为期15年的联盟条约时,埃及似乎比以前更依赖于它的共产主义联盟了。1972年5月初,萨达特在向国会陈词时,宣布:“我将采取强烈措施对抗那些批评埃及的主要联盟俄罗斯、而非开罗的敌人美国的人们。”

所以当萨达特在1972年7月18日驱逐大多数俄罗斯人,并限他们两天后离开时,埃及、苏联和西方的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他激动地对他的部长们喊道:“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已经让他们滚蛋了!”萨达特在埃及的受欢迎度迅速升高。埃及人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俄罗斯人。西方分析员感到困惑:他为什么在没有利用机会获得美国的外交支持的情况下就做了这件事情?这似乎是一种冲动,而非理性的行为。但萨达特在做决定时有更多的考虑,而非仅仅一时兴起,因为他已经得出结论,俄罗斯人不会给他提供越来越多的武器装备,而且他们既不愿意也不能为埃及收复失地提供必要的外交支持。

然而，人们通常认为，埃及对俄罗斯人的驱逐会使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埃及将更软弱；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萨达特正在甩掉那个阻止他投入战争的限制因素。

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了。与以色列的双边谈判是不可能的，消耗战争和国际外交的选择权已经被用尽。以色列不打算从西奈撤军；它正在那里建立定居点，并谈论更多的事情。时间正在流逝。埃及的军事压力是难以承受的，尤其在不能从旅游业、苏伊士运河或西奈石油获得收入的情况下。美国小麦供应的中止意味着埃及不得不用硬通货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谷物，埃及几乎没有多少硬通货了。埃及军队保持在战备的紧张状态达到了爆发的极点。当萨达特决定战争时，他正在赌博中打出他最后的王牌，如果战争失败，他将丧失一切。

在整个 1972 年，萨达特经常说对抗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可能是必要的，但人们以前已经听到很多次这样的话了；除此而外，他也谈到了他对和平的渴望。但这两种情感是自相矛盾的。他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两种情感。与苏联决裂以前就已经尽可能多地补充了他的军械库，萨达特在 1973 年与哈菲兹·埃尔－阿萨德会谈了几次，计划对以色列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哈菲兹·埃尔－阿萨德最近已经在叙利亚掌权。秘密被严格地保持着。1967 年，他们的前同盟约旦的国王侯赛因才获得消息，沙特阿拉伯国王菲沙尔也是这样，后者的财政和外交支持是关键性的，但没有其他人的支持。利比亚的卡扎菲或许将热情地加入其中，但他被认为太不可靠了。1973 年 10 月 6 日清晨，攻击开始了。非常巧合的是，这天既是赎罪日（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犹太节日之一），也是巴达尔战争的纪念日。在巴达尔战争中，预言者穆罕默德和他的穆斯林追随者们获得了对麦加对手的第一次胜利。那年的 10 月 6 日也是伊斯兰教的斋戒月，是个停滞时间比做决定时间更多的时期。然而，选择这个时间的主要原因或许是这样的事实，即月亮几乎要圆了，当埃及人穿过苏伊士运河时，圆月将有助于埃及人。

这次该是以色列人被震惊了。在攻击到来之前，以色列人的智能

没有探查到即将到来的攻击。甚至没有时间提醒前线的战士。以色列人在苏伊士运河东岸构建的巴列夫防线是一个致命的障碍,位于 12 米多高的地方,但守卫的人很少。在霍斯尼·穆巴拉克率领的埃及空军毁灭性的炮弹射击和精密攻击的掩护下,训练有素的埃及士兵在膨胀的救生筏上划桨跨过运河。以色列防线被掀翻,他们的坦克被火箭队破坏。当以色列人试图确立空中优势(这在 1967 年的战争中对于他们来说是决定性的)时,他们遭遇了密密麻麻的地对空导弹的袭击。高压水泵冲垮了陡峭的运河防洪堤和以色列人堆起来用于保护坦克的高高的沙堆。(欧洲供应商曾感到迷惑,为什么埃及人突然想买如此多的高压水泵。答案是埃及消防队需要它们。)埃及工程师迅速地用浮桥横越运河。战争第一天结束之前,五百辆坦克和五个师的埃及军队已经在运河东岸深入西奈大约十公里的范围内站稳了脚跟。

在北方,叙利亚人也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线,占领了他们在 1967 年丧失的戈兰高地的很大部分,但没有入侵以色列,他们转向防守。即使如此,由于害怕他们通往内地的路被切断和占领地区难控制的巴勒斯坦人口的暴动,以色列首先集中军队攻打叙利亚人,对整个叙利亚进行空袭,驱逐叙利亚军队在激烈的战斗中撤离新占领地区。直到 10 月 10 日,以色列人才能够把大多数资源用于西奈战场,重型坦克战斗在这里开始了。这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埃及人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进军,掌握半岛中部的战略关口,减轻他们的叙利亚盟军的压力?当埃及人在这个方向上努力时,已经为时太晚了。以色列人容易地击退了埃及人,使埃及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萨达特的基本目标是有限的:获得足够的军事资源,并控制足够多的地区,以便他能够在国际上以一种强大的姿态进行谈判。他恰恰能够做到这点。

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事情已经朝着比埃及人能够合情合理地希望的更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 10 月 17 日,阿里尔·沙龙(未来的总理)领导的一小股以色列军队,偷偷地穿过运河,在西岸建立了据点,这是两支埃及军队之间的一个缺口,而埃及在这里的储备物资是以耽搁

向西奈内地进军为代价完成的。在形势需要时，埃及司令部没有严格而迅速地作出反应，而是耽搁了时机。以色列人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匆忙地构建了一个土桥，把人和坦克推过运河，结果他们实际上在运河西岸的军队数量上占据优势，恰好位于东岸埃及主要军队的后面。一支往南进入苏伊士的以色列军队有效地截断了西奈埃及军队的主力。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正在变得极端危险。尽管美国在战争开始的几天踌躇不前，希望以色列能够解决问题，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最后同意对以色列给予大规模军事援助，促使 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苏联通过倾注军队进入叙利亚而对抗美国的行动。当苏联有核弹头的导弹被发现正穿越土耳其海峡时，尼克松命令世界各国进行核戒备。但没有任何超级大国想进行核战争。苏联和美国异口同声地行动，迫使以色列、叙利亚和埃及在 10 月 23 日接受联合国支持的停火。

到停火付诸实施的时候，埃及军事形势已经恶化，但十月战争作为一次伟大的军事成功而在整个国家传唱。喜洋洋的战士们返回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军队还做了一些辩护，因为他们打了一个胜仗，至少部分消除了 1967 年的凄凉记录。没有十月战争，萨达特后来的外交成就可能至少是困难的。10 月 6 日变成了埃及一个重要的国家节日。萨达特每年都以大规模的军事游行庆祝它。当他被谋杀时，他正主持其中的一次庆祝活动。

十月战争也使萨达特把国际外交带入他重获西奈的寻求当中。即使如此，道路是艰难的。美国的亨利·基辛格在 1974 年初期把敌对的军队分离开来，以色列从运河东岸后撤几公里，逐步地开始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战前萨达特建议的相似。当尼克松在 6 月访问中东并获得热情欢迎以后，1967 年以来冻结的外交关系开始恢复，而美国恢复了对埃及的援助。1975 年，在福特总统的控制下的往返外交中，基辛格安排以色列中途撤军到半岛的吉迪和密特拉隘口。萨达特同意在他的战线一方限制军队数量，并断绝战争，作为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

突的方式。苏伊士运河在 1975 年 6 月重新开放。即使如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解决,以色列仍然牢牢地控制着西奈的东部;巴勒斯坦正在进行的问题未被解决;而且萨达特招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严肃批评,因为他许诺的事情与他做的事情一样多。

十月战争以后,萨达特开始了对经济前线的进攻。与军事行动一样,萨达特的经济行动也是惊人的,也是他自己行为的结果。这种行动也是由可怕的必要性促动的。纳赛尔已经实施的国有的和国家管理的经济已经明显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它最切实的结果是一个膨胀的官僚机构和改革方案的窒息;国内资本加在一起也不能满足埃及的需要,而且外国投资几乎不存在。从经济上看,埃及国家只能维持生存,甚至这都不能维持了。埃及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经济的重大发展。

埃及于 1974 年颁布的第 43 号法律开始了"开放"政策。开放政策不仅仅是一个政策,而是很多政策的复合体,其首要目标是鼓励私人资本互相增援,并通过广泛的经济自由主义吸收外国投资。时机的选择似乎是无可挑剔的。需要是迫切的。萨达特的权威因去年 10 月份的跨越苏伊士运河而被提高,因此现在他能够领导一场后来被称为"经济跨越"的运动。生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已经把原油的价格提高了四倍,想把他们的金钱投资在一个阿拉伯国家里,尤其投资在一个提供优厚条件和大量廉价劳力的国家。贝鲁特作为中东卓越的银行中心的地位正在下降;开罗可能会代替它。然后,埃及也有与西方的联系越来越多的前景。苏伊士运河的重新开放势在必行。随着和平的恢复,恐怖主义者将聚集到埃及。西方政府和私人在埃及更高水平的消费是可以预期的。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已经导致西方投资者不再关顾埃及了;历史进程的变化又会诱使他们返回埃及。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期望。

开放政策的效果是复杂的。埃及的很多事情已经被它转变了。但它造成的很多希望从未变成现实,而且远没有解决所有老问题,它还造就了一些新问题。观察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放政策实施十年之后)的开放政策的结果,代价和利益明显是混合的。萨达特的意图是门户

开放政策将吸引外国投资，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大多数钱流入了旅馆、旅行社、软饮公司以及类似行业。投资在基础工业或农业项目上的资金比例比预想的要少。在很多事例中，开放政策实际上通过鼓励大规模地进口外国消费品而降低了国内工业和商业，这些进口品把地方生产的商品驱逐出市场。小部分人口掌握住机会，发财致富了，形成了一个新富有者阶级，这个阶级被称为“肥猫阶级”。从总体上看，西方化的精英和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们或许改善了物质条件；但大多数人或许 80% 的人口的物质条件几乎没有更好的变化；甚至对于一些人来说，生活条件恶化了，尤其当他们不断地看到那种超越他们能力范围的生活方式，而感到被嘲笑时。未得到满足的希望造就了爆炸性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这在部分上可以说明基督教正统派运动的兴起，这种运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变得显而易见。

如果不是因为越来越大量增加的劳动力移民，埃及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能更恶化了，这种移民状况是由开放政策进一步放松了对移民入境和移民出境的限制而导致的。这对于社会的冲击也是复杂的。在较早些年，埃及人非常不愿意迁离尼罗河；村庄和家庭的纽带太强烈了。327 埃及人具有强烈的思乡病，这是传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向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劳动移民已经成为三百多万埃及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埃及经济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赚取的工资是埃及支付的所有薪金的七倍。他们的汇款变成了埃及最大的外汇来源，比位居第二位的旅游和苏伊士运河收入的总和还多。平均起来，每个移民送回家(并且持续送回家)的钱足可以供养一个六口之家，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通常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以后，当他/她返回埃及时，他/她通常可以储存几千美元，这笔钱比他们在埃及受雇十年或二十年所赚的钱还多。但这笔钱中的大多数没被用作国内投资资本；相反，它被花费在了外国提供的消费品上。与此同时，技术劳动的短缺在埃及发展起来，因为埃及人到国外寻找工作，他们经常是高资历的，而资历很低的人在国内代替他们工作。

国家经济未被摧毁,并继续吸引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可能已经投资在其他地方了。然而,埃及稳定地丧失金钱,这引起了批评。持批评意见的一方针对的是经济自由主义没有扩展的足够远。另一方——不是民族统一主义的纳赛尔派——的反斥是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内的财政赤字进行足够深入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可以提供一些东西。对资源的进一步缩减源自埃及繁重地补贴生活必需品的政策。这些必需品当中最重要的是面包——在埃及被称为"生命",这为政府施加了双重压力。埃及政府不得不从国外购买小麦,然后以人为的低价把它提供给公众。但埃及政府还补贴很多其他物品——大米、糖、滨豆(小扁豆属的一种)、罐装液化气,这里只提这几种。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些补贴的公共开支每年累计大约五万万英镑。无论如何,外国投资没有像萨达特希望的那种水平地流入埃及。如果不是因为富有的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埃及国库完全可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已经破产了。

328 到 1977 年年初,埃及已经处于对自己的财政命运失去控制的危险中。外债压力是决定性的。埃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后者则对埃及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埃及不得不理顺它的经济机构,而且着手之处便是津贴。在 1 月 17 日提出的节俭项目中,政府试图尽可能地弱化冲击。在宣布缩减 50%津贴时,最基本的项目保留下来了,对其他项目的支持水平也降低了,但没有消除。为了使更苦的药丸尽量美味可口,津贴缩减的同时,公共部门雇员的薪水增加 10%。

公众保持怀疑了一段时间。尽管不是严格真实的,但报告称面包的价格翻倍了。一个人只有生活在贫穷的埃及,才能知道几个比索能够制造什么样的差别,甚至今日也是如此。1977 年,每人每年的收入大概是 100 埃镑,大约相当于 35 美元—40 美元,而官方最低工资是每月 12 埃镑。当津贴缩减政策被宣布时,暴力冲突便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城爆发了,这是 25 年来最糟糕的一次。商店遭到掠夺,尤其那些储存着进口商品的商店;甚至萨达特在阿布丁宫殿的办公处也受到攻击。愤怒的群众高喊:"萨达特穿着考究,而我们却七人共居一室。"(萨达特

被意大利高级服装协会选为世界上十个穿着最好的男人之一，这使他受到了埃及民众的厌恶。）萨达特夫人也是辱骂的目标，她越来越高度公开的形象正在引起愤恨。人们高喊：“纳赛尔！纳赛尔！”军队不得不被召来以恢复秩序。官方死亡数字或许低估了，三天暴力冲突中，一百五十多人死亡。1 月 19 日，津贴缩减政策被匆忙废除，但工资增加的政策没有被废除，这使财政形势比缩减政策宣布之前更糟糕了。

或许正是国内经济前线的失败促使萨达特寻求另一种国际突破。与以色列有关的形势始终是严肃的。收复西奈其他地区和重建和平将消除埃及军队的压力，这显然是最重要的。然而，以色列拒绝进一步退让，当 1977 年 5 月份的大选之后走强硬路线的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掌权时，前景似乎变得更黯淡了。新总理是梅纳赫姆·贝京。他是前犹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者，他为 1948 年戴尔·雅兴大屠杀负责。在这次大屠杀中，两百多名——这个数字根据述说这件事情的人不同而各异——巴勒斯坦市民（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妥协态度非常明显地表现于他不可更改的习惯，即把西岸视作“朱地亚和撒玛利亚”，西岸是以色列在 1967 年战争中夺取的。他说，巴勒斯坦国家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将是恐怖主义的基地。他对埃及也没有任何好的说辞。在美国，在 1976 年的总统大选中吉米·卡特获得胜利以后，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被置换，萨达特已经与亨利·基辛格建立了一种温和的关系。对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迫切需要的决定性和平而言，如果有一个不幸的年份，那么它似乎应该是 1977 年。

329

但是，萨达特已经一再证明自己能够制造奇迹，他在 1977 年 11 月 9 日的国会致辞结束时表述了一句令人惊奇的话。在追求与以色列的和平方面，他说：“我准备走到地球的末端。当以色列听到我现在在你们面前发表的言论时，它将会震惊。我准备到他们家中，到以色列议会上，与他们谈话。”埃及公众被惊呆了，萨达特最亲密的顾问也震惊了，萨达特事先没有向他的顾问们暗示他要说什么。他的外交大臣辞职了；各个阿拉伯政府以沮丧作出反应；很多国内人士力劝他不要去以色

列。然而,大多数埃及人尽管把以色列视作敌人,但愿意看到萨达特能够实现的事情。注意力转向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总理贝京说他将欢迎萨达特的访问。当萨达特在大卫·本-古里安飞机场接受一个国家首脑的所有欢迎礼遇时,一些观察员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萨达特不是伟大的演说家,但他在以色列议会面前做了一次杰出的演讲。他重申自己的要求,即以色列从占领地撤军和巴勒斯坦人们自决的权利,并坚持认为不可能有孤立的和平。他的出现向着满足以色列长期以来坚持的"直接谈判"迈出了一大步,而且他愿意认可以色列的存在。

330

> 是的,今天,我告诉你们,我也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接受与你们在以正义为基础的持久和平中共同生活。我们不想用即将登陆的毁灭性的导弹包围你们或者被包围,也不想用不满和仇恨的炮弹包围你们或者被包围。
>
> 我已经不止一次宣布以色列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已经被世界认可,而且两个超级大国为它的安全负责,并负责保护其存在。因为我们真正而真实地寻求和平,所以我们真正而真实地欢迎你们与我们生活在和平与安全当中。[39]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但如果以色列愿意做出与他的让步相当的让步,那么冒险将是非常值得的。

当萨达特返回埃及时,他获得了埃及人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厌倦了与以色列的对抗。如果他在没有十月战争的成功的情况下去了耶路撒冷,那么不管他多么有资格,埃及人或许都会批判他,军队可能会叛乱。事实上,他似乎站在一个强者的立场上提出建议,并且一种光荣结局的前景还是存在的。萨达特的举动也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杰米·卡特总统的新政府正在准备一个重要的中东和平议案。然而,尽管萨达特反复宣传不存在孤立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将得到支持,但各个

阿拉伯政府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敌视。利比亚的卡扎菲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对其进行痛斥;叙利亚在萨达特去耶路撒冷的当天举行全国哀悼活动。萨达特的反应是放纵的,至少可以说:他宁愿中东领导人们把他批评为"老鼠或蠢驴"。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事实证明,如果埃及保持坚定不移,那就有希望从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获得大量经济援助;如果埃及自乱阵脚,那么它将不得不在阿拉伯世界支付沉重的外交代价。事情似乎从来就没有能达到这种程度。

人们普遍认为萨达特的让步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以至于以色列将不得不以类似的方式作出回应。然而,以色列的总理贝京却完全不同地看待这些事情。萨达特的姿态是一个大方的赠礼,它给予以色列存在之权利以事实上的认可,并破坏了对抗以色列的阿拉伯阵线。贝京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很多东西。他为什么还要返还任何东西呢?在亚历山大城和伊斯梅利亚的两次会晤——伊斯梅利亚的会晤是以色列政府首脑第一次访问埃及——之后,形势明朗化了,以色列不仅打算保持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现状,还想加强对它的控制,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政治权利。就西奈而言,以色列在这里的殖民地将被保持。一个以色列外交官甚至鼓吹他打算在其中一块殖民地里就寝。如果埃及人要想获得任何成功,他们将不得不做更多的让步,这些让步是萨达特不愿意做的,事实上也不能做的。1978 年 1 月,萨达特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贝京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正是我给了他一切。我给他提供了安全和合法性,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萨达特命令正在以色列的埃及谈判代表团回国。结果是埃及人的努力被以色列人回绝了。在 1978 年 6 月,萨达特告诉驻守在西奈的埃及士兵,他们可能被号召"完成解放战争"。贝京反击说萨达特已经违背了他最近的承诺:"将不再有战争"。

当年 8 月,僵局被美国打破。吉米·卡特总统认为萨达特提供的这个机会不应该浪费掉,或许也考虑到了他在国内政治民意调查中支持率的下降,他邀请贝京和萨达特与他一起在戴维营美国总统行宫举

行高峰会谈。这是十分危险的。专家认为卡特提前在那里做了准备;他没有做准备,但他打赌在田园式的马里兰举行的面对面的会谈能够产生一些结果。萨达特接受了邀请,希望美国将为问题的解决施加一些压力,因为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一直处于低谷。贝京或许不愿参加,提前声明他的立场不会改变,但他几乎不能拒绝邀请。事实证明,贝京是明显的获胜者。

最初当双方在 1978 年 9 月初僵持了一周多的时间时,僵局似乎是不可解开的。突破仅仅在最后时刻才出现,即萨达特原希望会用于贝京的压力反而被用在了他自己身上。结果就是另一个埃及外交大臣伊博拉希姆·卡梅尔的辞职。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在协议签订的一天之内,以色列的理由与美国人和埃及人的理由存在分歧。但当卡特理解了这点时,他们已经苦心想出了一个方案,通过这个方案,一个完全自治的巴勒斯坦政权将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起来,而且 242 号解决方案将被实施。这可能在一个为期五年的转变时期发生。在这个时期,以色列将不会在占领区建立新殖民点。在以色列-埃及前线,以色列将从西奈撤军,并解除他们的殖民点;埃及将允许以色列船只和货船自由地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这样的水道。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将建立。正式条约将在三个月内签订。卡特作为和平缔造者而受到欢呼。萨达特返回埃及时再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几乎所有阿拉伯和中东政府都谴责这个协定,但世界舆论压倒性地支持这个协定。萨达特和贝京共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戴维营协定几乎立即开始分裂。第一个问题是殖民点。贝京声称他仅仅同意到 12 月 17 日条约签订之前的三个月内"冻结"新殖民点的建立;与此同时,现有殖民点将"增加人口"。而且,以色列政府还宣布了一个建立 84 个新殖民点的方案。这是萨达特无法忍受的情况。如果他在没有保证与以色列关于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的协议安全的情况下就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他就是制造埃及与以色列"孤立和平"的人,而与以色列的"孤立和平"是他保证不能制造的。他要求

以色列给出一个确切的联系点和时间表；以色列拒绝了。在当年12月，贝京在奥斯陆单独接受了和平奖。萨达特更值得这个奖项，但不愿意出席受奖仪式。12月17日和平条约的签订没有发生。根本分歧太大了。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隔阂被扩大。以色列没有让步，甚至要求埃及保证继续向以色列出售石油，因为以色列的伊朗石油供应已经因1979年年初伊朗国王的倒台而被切断了。这将用西奈油井的石油来代替，以色列人自从1967年占领这些油井以来就全力以赴地开发这里的石油。萨达特拒绝了，但他倾向于进一步与以色列建立联系，给出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建议，即埃及至少要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联络处”。以色列甚至不会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联络处可能会变成巴勒斯坦国家的基础。吉米·卡特不顾一切地挽救和平条约，他亲自到耶路撒冷和开罗，这个赌注甚至比戴维营高峰会谈更危险，但他或许感到这不会丧失任何东西。贝京知道他正在驾驶席上。来自美国和埃及不得不让步。卡特愿意通过施压和奖励作为促成这些让步的报酬，他劝萨达特同意。

333

根据1979年3月26日在华盛顿白宫草地上最终签订的条约，埃及和以色列将在以色列从西奈撤兵的第一个阶段之后立即互派大使，这个第一阶段的过程将在未来三年内完成。加沙联络处将是针对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中讨论的问题之一。美国支付费用，并提供财政激励。以色列从西奈撤军的费用是大约三十亿美元，将由美国支付。如果以色列不能从埃及获得石油，那么美国保证给它供给15年石油。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被授予埃及。除此而外，美国开始对埃及和以色列进行经济援助，每个国家每年获得的援助数量达到20亿到30亿美元。这些项目持续到今日。

巴勒斯坦人谴责萨达特出卖了他们，并制造了孤立的和平，而且以色列接下来的活动给他们的谴责提供了口实。当条约被提供给埃及议会时，总理穆斯塔法·卡利尔尽力给它以最好的面貌，并强烈否认它是一个孤立的和平。相反，卡利尔宣称以色列将撤出耶路撒冷，巴勒斯坦

人将在被占领的地区建立他们的国家。贝京在第二天对议会的演讲中反驳了这一点。他轻蔑地提到"亲爱而可敬的卡利尔先生",并坚持声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内部首都",而且"一个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国家从来就不会建立"。自治的许诺仅仅适用于巴勒斯坦人民,不适用于占领区,以色列对占领区的严格控制将被保留,而且新的殖民点将被建立。贝京声称:"以色列绝不会返回到1967年6月4日的边境"。为了强调这一点,以色列宣布条约签订的前一天在占领区建立十个新定居点。这当然是对埃及政府的故意侮辱,这也严重地破坏了条约,但它也通过强调如下事实而更严重地破坏了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盟,即埃及的确制造了孤立的和平,这种和平没有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任何好处。

334

中东地区大多数其他政府的反应都是非常否定的,但埃及和美国都没有预料到否定反应的猛烈程度。阿拉伯联盟停止了埃及的成员国身份,并把总部从开罗迁到突尼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开除了埃及的成员国身份。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断绝了与埃及的外交关系。沙特阿拉伯取消预定的军事援助。萨达特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叛国者。中东地区全面和平的前景似乎根本不会取得进展了;埃及可能是更安全的,但很多阿拉伯国家领袖认为,对于每个打乱队形的国家来说,它将面对更危险的形势。他们的理解很快就在1980年6月被证实了,当时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道法令,宣称耶路撒冷是"完整而统一的",它是"以色列永远的首都"。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事实上的吞并发生在1981年12月。当以色列于1982年开始大规模入侵黎巴嫩时,并在毁灭性地炮轰贝鲁特的高潮阶段,埃及仅仅谴责以色列的这次军事行动,没有调动军队对以色列南方边境施加军事压力,后者可以使以色列停止对北方的猛烈军事行动。以色列在占领地区的殖民一直迅速发展。巴勒斯坦人们的"自治"化为泡影。

在埃及国内也有很多人批评萨达特,在最有限的程度上表达这样的观点是可能的。这种批评来自所有政治派别,从穆斯林兄弟会到纳

赛尔派；甚至四个仅存的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也写了一份反对条约的声明，说以色列已经从条约中获得了一切，而埃及什么也没得到。萨达特迅速地通过使议会以压倒性赞成票（只有三十个议员投反对票）批准条约的方式掩盖不满，然后他便解散了议会，并确信三十个反对者中除了一个人都将在新的大选中被打败。然后，问题递交给埃及民众，由他们投票决定。根据官方统计结果，90%的选民参加投票，99.5%的选票支持条约。换言之，埃及四千万人当中只有五千人投票反对条约。这是荒谬的；知情的观察员确信仅仅一小部分符合条件的选民愿意参与投票，而参加投票的人们当中多于 0.05%的人投了反对票。但政府的选举威力确实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大多数埃及人或许想要结束与以色列的长期敌对关系。人们普遍感到埃及已经为巴勒斯坦人民牺牲了太多的金钱、武装和人力。对于统一的阿拉伯阵线而言，这带来了更多的祸害，而非利益。条约是另一个信号，表明埃及将把它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这当然是大多数埃及人支持的。这似乎值得一试。他们想当然不希望再有战争了。

在埃及之外，人们常常认为安沃尔·萨达特通过去耶路撒冷而签署了他的死刑执行令，可以说，他为了和平牺牲了自己。但萨达特是这样一些 20 世纪领导人中的一位，即他们的声誉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在美国比在他们的国内更高。萨达特的确冒犯了很多埃及人，但更少的是通过他与以色列的和平，更多的是通过很多其他行为，尤其是通过他的专制政府。纳赛尔也按他喜欢的方式做了很多事情，但他总是想方设法与埃及人民联系起来，至少传递参与和目标共享的幻想，无论在顺利时刻，还是逆境时刻。然而，萨达特因为钟爱于自己普通人的身份，用他的话讲，他是“一位农民”——几乎无人相信这一点，他在最后几年几乎完全与人民隔离开来，并做了很多事情以远离民众。那些暗杀他的战士中的一位说：“我杀了法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萨达特在内心里并没有纳赛尔更专制。1972 年和 1976 年的议会选举越来越多地摆脱了政府的

控制。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人怀疑政府的党派将容易地获胜,但很多选区的选民被猛烈地争夺,问题被公布于众,非常少数的非政府选民被选举。1976 年的议会可以准确地描绘为"1952 年以来最独立和最有问题意识的议会"。庞大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纳赛尔创造的,是纳赛尔派的据点。萨达特得不到这个党派的支持。萨达特把这个超级党派分裂为三个竞争的"平台",最终用他的新党派国家民主党代替了它。在 1977 年,萨达特趁着因耶路撒冷之行而高涨的受欢迎度,许诺通过独立的政党增加活跃性。华夫脱党与很多老领袖和仍然存在的自由主义的平台一起再次出现。一个左翼民族进步党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被允许在一个较自由的出版社鼓吹他们的政策。但当他们展现出朝着团结高效的对手发展的迹象时,萨达特便通过他的很多国民投票之一取缔了他们,这个禁令禁止"无神论者"和那些在 1952 年之前活跃于政坛的政治家。1979 年议会选举被严密地控制着。即使如此,而且直到他死的时候,萨达特还喜欢把埃及说成是"民主制之岛"。

336

他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出版业的。萨达特用越来越多的自由在出版业做实验,但当他的政策和行为受到争议时,他坚持认为出版自由不能发展为"不负责任的批评"。几家令他讨厌的报纸被迫停止出版;过度批评时局的记者被从他们的岗位上开除。萨达特在整个总统任期内摇摆于对埃及出版业的自由和控制之间。但是,1980 年 4 月 29 日通过的羞耻法令,令人震撼。羞耻法令对出版业进行攻击,包括一些模糊的罪名,例如"广播或出版物粗俗或下流的语言或图片可能会冒犯民众的敏感度或削弱国家的尊严",并"通过批判流行的、宗教的、伦理的或民族的价值观,或通过在一个公共的地方树立坏的事例,而允许孩子或年轻人步入歧途"。这些类型的约束几乎能够涵盖所有类型的思想表述。所有检举和定罪都是迅速而即时的;惩罚是严肃的。萨达特说:"我们已经容忍了,并将继续容忍,但不要让任何人激怒我们。"

萨达特也因为他对美国的支持而远离了埃及人。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似乎认为他对美国和西方的认可甚于埃及。当他的朋友吉米·

卡特在1980年的总统改选中被罗纳德·里根打败时，萨达特遭遇了不幸，但他利用后者对冷战的强硬态度获取越来越多的军事援助。他欢迎美国军队驻扎埃及。萨达特然后谈到了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个人愿望。在1981年9月，他驱逐了苏联大使和大使馆的几个公职人员，他命令一千名仍在埃及的苏联技术人员离开埃及，这个举动几乎没有建设性的目的，而是表明他与美国更密切的联盟。另一个亲西方的行为是为被废黜的伊朗国王提供安全的避难所，后者受到美国的支持。萨达特通过使他的前盟友能够在相对尊严和安全的状况下度过最后几个月而给美国帮了大忙，但这在埃及或中东几乎没给他带来任何荣誉。当伊朗国王去世时，他被埋葬在利菲清真寺里，在城堡脚下，紧挨着中世纪苏丹哈桑的伊斯兰大学。萨达特在西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级英雄，《时代》(*Time*)杂志已经把他选为它的"年度人物"。他几乎是在国外而非在他自己的国家培养选民。

337

萨达特可能认为他通过一系列普通投票保持着与他的埃及伙伴的密切联系，这些投票是他强加给国家的，为了表明人们对其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通常都拥有99%以上的支持率，尽管对羞耻法的支持率降到了不寻常的98.56%。他也可能幻想他对国家经常的电视讲话使他与他的人民联系起来，但这些散漫的活动经常长达几个小时，在这些活动中，他经常忘记自己的身份，甚至思维混乱，最好的情况也是疲惫不堪。他妻子的文学硕士论文答辩会的电视直播也是如此——她没有满足学位水平的所有要求，这个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播放，并重播了几次。

萨达特后来意识到他最严肃的危险不是来自自由主义者或左翼，而是来自好战的宗教右派。从他掌权的早些年开始，萨达特通过积极地鼓励伊斯兰教而远离了世俗主义政策。他称自己为"虔诚的总统"，他或许对他的信仰是真诚的，尽管在这方面他也增加了自己与民众的隔阂，因为很多人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过火了。他肯定在头脑中有实际的目的，试图利用保守的宗教政治情感对抗他的左翼和纳赛尔派对

手。当他意识到事情发展的已经比他希望的更远的时候,他通过压制与安抚相结合的方式作出反应。穆斯林兄弟会被禁止,他长期以来对他们的活动视而不见。其他激进的宗教组织被解散,他们的清真寺也被国家接管。但他也试图加强主流穆斯林对政府的支持。在1980年的夏季,萨达特允许议会修订宪法,使宗教法成为所有立法的基础,这对于埃及大量的科普特基督徒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举措。大约与此同时,增加津贴和控制物价的政策也制定出来。

338

1981年夏季,在穆斯林-科普特教徒之间发生一系列暴力的、有时致命的冲突,激进伊斯兰教群体的阴谋公之于众之后,萨达特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在9月份的第一周,政府突然监禁了15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认为是穆斯林好战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确实是这样的人,但他们是各个政治领域的人们聚拢到一起的,包括众所周知的记者穆罕默德·哈撒内因·海卡尔和女权主义领导者纳瓦尔·埃尔-萨达维。160名科普特人也包括在这次清洗当中。科普特主教谢努达三世被软禁在纳特仑干河谷的一个修道院里,并被彻底解除了主教职位。主要科普特报纸被查封。与纳赛尔相似,萨达特经常焦虑的是有一场针对他的阴谋。这次他是正确的。

在1981年10月6日,跨越苏伊士运河的第八个周年纪念日,安沃尔·埃尔-萨达特坐在赫利奥坡里斯一个金字塔形的无名战士坟墓前的观礼台上观看盛大典礼,观看军队阅兵,长达17公里的军队从他面前经过。这支军队已经走了近两个小时,而且大多数人的眼睛已经转移到空中观看特技飞行表演。萨达尔看到一辆卡车停在观礼台面前,一队战士向他跑来。他认为这是预先安排好的敬礼仪式,站起来向他们回礼。他们用子弹射穿了他的身体,并把手榴弹扔到观礼台上,杀死了他和其他七个人。

萨达特的葬礼与纳赛尔的葬礼之间的比较本来不应该非常明显。当萨达特被埋葬时,开罗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除了肃穆的安全部队。埃及人民的主要态度或许最好描述为冷漠。从国际上来看,反应截然

相反。很多西方国家感到萨达特的去世是一个悲剧，一个伟大的人物丧失了。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他的三位前任总统代表美国出席葬礼。但阿拉伯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苏丹和阿曼——派代表出席葬礼。诸如叙利亚、黎巴嫩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的情绪是庆祝这个人的去世，他们称他为叛徒。 339

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安沃尔·埃尔-萨达特和他的前辈伽马尔·阿布德·埃尔-纳赛尔的成就进行估价才是可能的。纳赛尔制造了一场革命；萨达特巩固了这场革命，并使埃及国家适应后革命时代的现实。他与以色列的孤立和平能够在很多细节上受到挑剔，但它使埃及摆脱了几十年军事对抗的压力，并收复了它在 1967 年"挫折"中失去的土地，这些都不是小成就。很多困难始终保留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之中，但萨达特使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比他刚刚掌权时更好了。他足够远见卓识地意识到，埃及对苏联的依赖是一个死角，必须及时彻底地从其中摆脱出来，甚至以向其他方向倾斜过多为代价。同样地，尽管他的远见卓识的经济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们创造了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里，埃及能够与世界经济相互作用，而非被大大地孤立在世界经济之外，后者是纳赛尔去世时的状况。尽管萨达特的政治自由化更多的是理想，而非现实，但理想从未消失，而且它为一个更加多维的制度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将为埃及在未来几年提供更多的选择，如果国家决定采用它们的话。或许萨达特最大的成就是他留给他的继承者霍斯尼·穆巴拉克的任务，即全身心地管理，不必革命、改革和大胆行动。

第二十章　穆巴拉克时期及其后

341　根据既定的宪法程序，副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被国会提名为总统，并通过萨达特被刺杀一周以后的选举确定。穆巴拉卡在萨达特受到攻击时也受了轻伤。穆巴拉克于1928年出生在三角洲的敏努菲亚省，于1950年毕业于空军军官学校。因此，他是革命时代军政领袖的最后一位。然而，他太年轻，而且级别太低，不能深入地参与自由军官组织的运动，也不是发动1952年政变的核心人物之一，更没有在共和国早些年实施如此大的影响。他做过战斗引航员和轰炸员，在也门战争中指挥战斗。他迅速地晋升，部分上因为他拥有特殊的才能，部分上因为很多认可旧政权的军官被代替而为他打开的晋升机会。随着1967年的“挫败”和新军官团体的清除，穆巴拉克于1967年被任命为空军军官学校的司令官，并在1969年他41岁的时候被任命为非常年轻的空军司令。他在十月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以前就被注意到了)使他晋升为空军元帅。

342　然而，1975年，萨达特任命穆巴拉克为副总统以代替老自由军官组织的侯赛因·沙菲，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穆巴拉克不是政治圈内的突出人物，而且他来自空军，空军不比陆军那样积极地参与政治。尽管萨达特说有必要让“新一代人逐渐进入国家领导层”，但一些人已经推测他就像纳赛尔那样是在选择一个容易控制的人，这个人不

会对他构成威胁，他不可能希望这个人成为他的继承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萨达特也与纳赛尔一样低估了他的人，因为穆巴拉克是一个辛勤工作的人，并认真履行副总统的职责，当他出去旅游、出席会议和参观时经常做笔录。当意外时刻在1981年10月6日到来时，他准备好了工作。

相较于他的前辈，穆巴拉克是一个学生。萨达特热爱公开自己，如此喜欢摄影，以至于他有时允许他们随自己进入浴室。穆巴拉克在最小的程度上保留照片，他不会出现在华而不实的场合，他的妻子苏扎妮也不喜欢扮演卖弄的第一夫人角色，第一夫人角色是贾汉·萨达特喜欢的。穆巴拉克不穿鲁塞尼亚服装和设计师的服装，而是穿着普通的西装。他的官方肖像描绘了一个令人愉快、平易近人的人，直到人们注意到他的眼睛时，人们才知道他是一个专心而聪明的人。这样一个平静、几乎单调乏味的个性反映出的也是一种政治氛围的变化。埃及人拿他们不令人兴奋的总统开玩笑，但几乎没有人愿意回到萨达特的华丽时代。

继承是顺利的，但穆巴拉克首先关心的事情是安全。针对萨达特的阴谋比它最初出现时更广泛了。尽管萨达特的围捕已经阻止了很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活动，但其他人仍在活动。国家紧急状态的宣布——这从未提出来过——给予总统职位的权力比它已经拥有的权力范围更广了，包括任意逮捕、监禁和军事审判。穆巴拉克严格地运用他的权威，镇压了10月份在阿西尤特发生的一次起义，处死87人，在全国监禁了2000人。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萨达特的清洗太不分青红皂白了，而且非常不受欢迎，因此他以非常公开的方式释放了大多数坐牢者，尤其像纳瓦尔·埃尔－萨达维这样的突出人物，把他们中的一些直接从监狱里带到总统府，并接待他们。1982年4月，萨达特的刺客的公开审判和接下来的死刑没有引起新的反对。即使如此，伊斯兰好战者给穆巴拉克造成的困难远没有结束。 343

在对外事务中，就像在政府的其他方面，穆巴拉克的方式是继续和

调整他从萨达特那里继承下来的政策。埃及与美国的关系保持密切,并更深入地确立下来,但穆巴拉克没有冲动地拥抱西方。在早期,他开始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因为据说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有一段不悦的时期。这使他能够面对诸如埃及欠苏联的大批债务这样紧迫的问题,而不愿意充当美国地理政治游戏的棋子。另一方面,他与埃及共产主义者前赞助人的亲善不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当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衰落,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崩溃时,埃及陷入了孤立状态。到那时为止,埃及的西方经济和政治联系被严格地建立起来。埃及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自从 1981 年就一直进行,而美国对埃及的军事和财政援助是规模庞大的。据估计,埃及在 1975 年和 2004 年之间获得了美国五百多亿美元的援助,而当间接援助和非政府资源被计算在内时,总数便更高了。以色列从美国获得了更多援助。开罗的美国大使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使馆,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

埃及对外关系中的荆棘是以色列,但穆巴拉克在这方面的工作被这样的事实简化了,即以色列从西奈撤军这件事到萨达特去世时就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它在穆巴拉克担任总统的七个月里被完成。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经过三十多年的兴衰变迁保存下来,并很可能在未来保持住,但它提出的很多希望从未实现。今日的埃及人们或媒体几乎都不支持它,而且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把这种形势视作“寒冷的和平”。最初,相当大量的以色列人利用机会访问埃及(但埃及人却没有访问以色列,埃及人没有回报以色列,这可能归因于用于旅游的收入相对缺乏和埃及人对以色列的厌恶)。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巴勒斯坦的第一次暴动和 20 世纪 90 年代埃及的恐怖主义事件(这些事件是以以色列人为目标的)之后,埃及的以色列旅游事业降低到了微不足道的程度。埃及在 1982 年从以色列撤回大使,抗议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对和平条约规定的巴勒斯坦自治会谈的中止,但大使在 1986 年又返回埃及。

344

以色列的很多发展事件,例如 1982 年的入侵黎巴嫩和暴动,已经

在埃及制造了深深的仇恨，大多数埃及人或许乐意看到戴维营协定被推翻，但几乎没有任何人想要恢复到与以色列对抗的局面。事情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就巴勒斯坦人民而言，埃及代表他们在与以色列达成的孤立和平中获得的最小限度的让步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利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件事情变得显而易见了，即在这个地区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有效地推动他们的事业。事实上，正如美国的积极参与那样，对于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而言，美国的干预也是必要的，或许唯一一个能够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就是美国。与此同时，埃及为其他国家逐渐与以色列形成较好的合作共荣关系指出了方向。1994 年，约旦与以色列签订了条约，而其他国家也已经与犹太国家建立了实际的关系。

穆巴拉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交政策成就是把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从萨达特与以色列缔结条约以后的最低点挽救回来。可悲的是，萨达特的遇刺减弱了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僵局关系，因为如此多的阿拉伯人已经把他视作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穆巴拉克没有背萨达特消极的政治包袱，他比萨达特更具调和性，更有耐心。伊朗 - 伊拉克战争始于 1980 年，并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那十年当中的大多数年份，也帮助提高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沙特阿拉伯王子塔拉尔·宾·阿布德·埃尔 - 阿兹兹在 1984 年 1 月访问埃及，这是自 1977 年以来沙特阿拉伯国家第一次访问埃及。随着贸易协定的缔结，埃及与约旦的外交关系也在 1984 年末得到恢复。在 1987 年至 1990 年这些年里，埃及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都恢复了。埃及在 1988 年被重新接纳为阿拉伯联盟的成员，而且联盟的总部也于 1990 年返回开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接受埃及的返回。不管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变得多么尖锐，关系的断裂从未达到极限。对于很多阿拉伯国家来说，对埃及严厉而长期的毁坏方式是驱逐几百万脱离国籍的埃及工人，埃及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工资。但是，这从未发生。

埃及与美国的关系在 1990 年受到考验，当时一场危机因为伊拉克

针对盛产石油的邻国科威特的主张而爆发。穆巴拉克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积极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斡旋,并宣称伊拉克不会入侵科威特。当这个预言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谴责入侵,并对联合国阵地和接下来由美国领导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最终把四万埃及士兵投入到联合军队里。这在埃及国内并不受欢迎,埃及大量公众进行抗议,要求撤回军队。宗教极端主义者响应萨达姆·侯赛因推翻政府的号召,制造了大量麻烦,而当几千名埃及工人逃离伊拉克和科威特以后,埃及的财政条件受到重创。伊拉克 2003 年的入侵没有获得埃及的支持,而且埃及政府允许民众反对这次入侵的示威游行。

穆巴拉克低调甚至谦虚的风格也表现于国内事务中。尽管人们听说他认为埃及是难管理的,但他是自穆罕默德·阿里以来统治埃及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这一事实验证了他的政治技能,也验证了埃及自 1952 年以来享有的最强烈的政治稳定。三个强有力的总统已经统治了埃及,扫除了对他们权威的挑战,获得了埃及人民压倒性的认可,甚至当民意几乎想当然地已经宁愿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时。那个宁愿辞职也不愿意与萨达特去耶路撒冷的外交大臣伊斯梅尔·法米描述了"事情在埃及运转的方式"。他解释道:"一旦一个领导人掌握了权力,那么人们就持续地支持他,没有很多争议或疑问。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统治者是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他最知道什么事情是对国家有力的。结果就像在很多国家那样,在埃及,领导者能够在不考虑民意的情况下采取重大决策。"[40]

346 尽管穆巴拉克在 1987 年以 97%以上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并以类似的多数票获得了另外三次总统选举的胜利,但他的总统任期有一些崎岖不平的瞬间。最严重的政治骚乱发生在 1986 年 2 月 15 - 27 日,新入伍的秘密警察当时每个月的薪金是 6 埃镑。他们举行暴动,起因是一个谣言称他们的义务期限将从三年延长到四年。几家旅馆被烧掉;几十人被杀死,三百多人受伤。军队奉命参加行动。1300 人被逮捕以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在穆巴拉克统治时代，埃及的经济为政府提出了持久问题。一个特别困难的年份是1986年，这年出现了严重的不景气现象，苏伊士运河和石油出口的收入降低，成群的埃及工人从一些阿拉伯国家返乡，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也在经历减速。劳动力动荡的局面越来越突出。通货膨胀率高达25%。薪金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活费的增长，而且埃及也正接近偿付外债的危机，外债利率消耗了埃及每年外汇的一半。这迫使埃及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政府谈判以便重订外债偿付时间表。一些债务被减免，但这是有代价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项目委员会(在1991年5月解散)要求国内改革:征收较高税务，取消消费津贴，消除物价管制，消除外贸限制，劳动力政策改革和私有化。这些措施中的一些(尽管绝对不是全部)得到实施。有意思的是，当埃及的经济政策脱离了埃及人的控制时，几乎没有人对这种与19世纪晚期的形势相似的历史现象进行评论。

穆巴拉克政权面对的最严肃的挑战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因为萨达特为了抵制他的左翼政治对手而曾对保守的宗教因素进行培养，这造成了更恶劣的后果。穆巴拉克在他掌权的第一个十年里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态度可以描绘为“勉强容忍”，但在1993年，他开始对这个组织进行大规模进攻，把它谴责为“违法组织”，并控诉它“与极端主义组织有关联”。事实上，这一举措不是由穆斯林兄弟会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促动的，而是由于它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接受和合法化，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以至于穆斯林兄弟会能够对政府表达严肃而主流的反对意见。不 347 管原因是什么，但一轮接一轮的逮捕之后，几百个嫌疑犯被投入监狱，并在军事法庭上受审。

极端主义者对政府的攻击是由伊斯兰组织充当先锋的，后者从20世纪80年代活跃的各种好战的学生组织中成长起来。它与那个牵涉进萨达特暗杀活动的组织——吉哈德恐怖主义组织——紧密联盟。吉哈德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教长奥马尔·阿布德·埃尔－拉曼领导的，后者因参与1993年对美国世贸中心大楼的轰炸而正在美国服无期徒刑。

到1992年,伊斯兰组织 Gamaa 一直在从事暴力恐怖主义活动,主要打算阻碍旅游业,既要消除埃及的外国因素,也要通过剥夺有利收入的经济而达到伤害政府的实际目标。

当这个伊斯兰组织在接下来两年里逐步增加其恐怖主义活动时,埃及的旅游业的确受到了破坏。到上埃及旅游是一件可怕的经历,本书作者和儿子在1994年就经历了这件事情,并目睹了游客的缺乏。帝王谷在平时都挤满了游客。在我们去帝王谷那天,我们是那里仅有的两个参观者。另一次,当我们经历了几周艰苦的田野工作之后,到阿斯旺最豪华的旅店住宿时,我们是仅有的顾客。当我们在晚上回房间就寝时,我们的脚步声在空荡的大厅里回响。在1994年的恐怖主义暴力袭击中,至少八十人被杀害,五十多个恐怖主义者被处死。

当穆巴拉克在1995年出现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峰会时,一个暗杀队试图刺杀他。高级政府人物是刺杀目标;在一个自杀式爆炸者对开罗市区中央政府办公处一个区的轰炸中,一位内阁大臣惊险地逃过了死亡。爆炸者仅仅成功地把自己和一些无辜的旁观者炸死。当一个高级反间谍活动官员死于他家外面发生的一场枪战时,一种寒意席卷了整个统治圈。他真正的身份是保存国家秘密,这表明了持不同政见因素的广泛渗透。

旅游业在20世纪90年代断断续续地恢复,受到恐怖主义轰动性的行为的阻碍,包括1997年发生的一次对开罗旅游大巴的致命攻击。1997年年末,暴力事件的顶峰是发生在戴尔·埃尔-巴哈里哈特舍普图特神庙的大屠杀。在这次大屠杀中,58位游客被残忍地射杀,而且大量埃及人被杀害和射伤。事情已经发展的过火了。大多数埃及人憎恶暴力,并因他们遭受的财政艰难而痛恨暴力,财政艰难是由恐怖主义者的活动造成的。戴尔·埃尔-巴哈里事件以后,暴力减少了。埃及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确保安全以恢复信誉,深入到秘密的好战社团(在埃及,保守秘密是很难的,因为埃及的社会和家庭联系是如此的大量而密切),并审判、监禁和处死被告。好战团体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348

伊斯兰组织的领导层因为逮捕和死刑而萎缩了，在 1999 年号召停火。然而，这绝不是埃及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终结。“9.11 劫机事件”中的四个人是埃及人，他们在 2001 年摧毁了美国世贸中心大楼。阿赫迈德·埃尔－马斯里（“埃及人阿赫迈德”）是 1998 年达尔萨拉姆、坦桑尼亚和奈洛比的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所谓同谋，其脑袋值 500 万美元。埃及外科医生和教授阿伊曼·埃尔－扎瓦希里是基地组织的主要成员，因涉嫌参与萨达特的刺杀而被捕，但后来被释放。随着人们对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反应，更多的问题将会发生。

几乎所有埃及人都强烈地不赞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方式，但毫无疑问，在最近这些年，埃及的宗教态度已经经历了重大变化。任何熟悉埃及的人在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埃及时，都会注意到主流伊斯兰教的力量在增加，表现于更正规的星期五祈祷仪式、更严格的斋月仪式和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最明显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妇女蒙上了面纱。这可能采取简单的头巾的形势，但它经常通过 *hijab*（头巾）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头巾不仅覆盖头发，还覆盖脸的很多部分。整面罩布数量不多了，但是正在增加。在 20 世纪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压力要求妇女从工作岗位撤回到家庭生活这种与社会隔离的状态，这威胁到很多在埃及进行长期的性别平等斗争而来之不易的成就，但工作妇女对家庭经济的重要贡献和他们追求职业生涯以及保持财政独立的决心已经阻止了这种压力。伊斯兰组织已经展示了在越来越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时代提供精神和经常提供物质支持的能力。1992 年 10 月的大地震以后，他们在提供援助方面的高效反应使政府因更慢的反应而感到含羞。这种宗教情感的明显增长还没有表现在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中。

349

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冲突已经变得更常态了。尽管暴力的顶点在 1981 年到来并过去，但基督徒抱怨自己被剥夺了分享埃及某种政治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他们对社会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相称的。科普特人口统计在埃及一直以来就是有争议的。1976 年关于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的官方数字是大约 250 万，但很多科普特人声称正确的数

字高达 800 万,而后者可能更接近事实。然而,没有一个科普特人在那年的议会选举中当选,在 1995 年的议会选举中也没有一个科普特人当选。1952 年的自由军官组织的革命指挥委员会中没有一个科普特人,而基督徒在公共政治和管理体系中大部分被边缘化。没有一个科普特人掌握国防、外事等最重要内阁部长或低级职务。主教谢努达三世自从 1971 年当选以来就保持着保卫科普特人利益的先进政策,这个政策在 1981 年被萨达特中止,后来在 1984 年年末被穆巴拉克恢复。科普特人普遍支持穆巴拉克,把他视作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人物。当穆巴拉克在 2005 年实施宪法赋予他的权利,任命十个成员加入国会时,其中包括四名科普特人和五名妇女。

大约两千多年来,犹太人始终是埃及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埃及的犹太人很少保留下来,而且那些保留下来的犹太人几乎是不显眼的。在那些与以色列国家建立相关的事件发生期间,很多犹太人离开了埃及;其他犹太人在三方侵略战争之后被迫离开埃及。这个现代的"出埃及"是双重悲剧,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埃及国家一个有价值的资源,还导致埃及的犹太人现在几乎不能获得埃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享有的地位。

政府的国内管理政策继续在自由与控制之间摇摆。国家指导的国家民主党始终容易获胜,但一些其他党派的活动也得到容忍。例如,新华夫脱党就通过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盟而展现了突出的生命力和多功能[350]性,尽管这以远离它的科普特支持者为代价,这是双方的分离点,因为这意味着华夫脱党放弃了世俗主义,也意味着穆斯林兄弟会出现在正规的政治活动中。在 1984 年的选举中,国家民主党因得到国会 448 个竞争席位当中的 391 个而获胜,但华夫脱党获得了 57 个席位,这使它成为最强大的反对党。然而,政府已经采取积极措施阻止华夫脱党的复兴。

1995 年的议会选举部分上因为欺骗和暴力而特别声名狼藉。国家民主党获得了它寻常的多数票,但埃及的最高法庭裁定选举未得到

正常监督。穆巴拉克后来通过了一项选举改革法，并许诺接下来的选举将是自由而公正的，宣称“国会选举将标志着新的开始，证明埃及是一个民主制国家。”2000 年 11 月份的选举的确比以前的选举更自由、更公正，但穆斯林兄弟会的候选人和支持者被阻止和限制，甚至被阻止进入投票站，促使人们抱怨选举是“内清外浊的”。反对党获得了总共 34 个席位，而国家民主党和它的联盟则获得了 388 个席位。通过边缘化反对党，政府已经为伊斯兰教徒留下了大量空间，如果他们组织起来，那么他们就可以变成一支潜在的政治力量。

直到 2005 年，埃及的总统都通过公民投票来选举。在这些投票中，仅仅对议会任命的候选人投是或不是，才是可能的。然而，在 2005 年 9 月，埃及举行了第一次表面上竞争的总统选举，尽管候选人的选举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根据官方统计结果，穆巴拉克获得了 88.6%的选票，尽管非官方统计数字给予他的主要敌手未来复兴党的阿伊曼·努尔的选票数是 13%，另外 7%的选票落到了新华夫脱党的努曼·伽马手中。尽管毫无疑问穆巴拉克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但对选票造假、威迫和其他选举无规则的指控太普遍了而不能被忽略，投票出席者的人数很少也受到指控。很多埃及人声称只有不投票，才是最有效的投票。351 选举三个月以后，努尔的逮捕和五年监禁的判决给埃及人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即民主制在埃及还没有繁荣发展。

埃及在 1952 年以来突出的政治稳定主要依赖于总统职位和埃及人接受总统权威的意愿。没有其他可比较的制度或宪法力量基础。但这不一定确保连续性。当穆巴拉克在 2003 年向国会致辞时突然病倒了，乌云笼罩在城市上空，警察和军队控制着大街小巷，停止了一切活动。惊慌的人们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他的前辈不同，穆巴拉克从未任命副总统，使总统继承空位以待。各种相关人员都存在。很多上流或中等阶级的埃及人喜欢看到事情保持在它们本来的状态。如果大多数埃及人掌握了权力，那么埃及将变成一个更神权政治的国家。然后是军队，军队在这些年保持着相对低的地位，但仍足以决定埃及的

政治命运。

埃及的经济面貌是复杂的。尽管 1991 年的财政改革被勉强地实施,而且它们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但经济的国有部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减少了,而私有部分大大扩展。国民收入已经升高。债务时间表的推迟为埃及提供了喘息空间,当美国取消了大部分债务,作为对埃及参与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奖赏时,债务减少了。旅游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恐怖主义者对它的袭击中幸存下来,而且比以前更强大了,尽管它的最大潜力还没有实现,尽管游牧部落还占领着一些地方。新恐怖主义者对红海的攻击在 2004 年和 2005 年进行,尽管杀死了一百多人,伤了更多的人,但没有导致旅游业的急剧下降,而之前那十年的类似事件之后便是旅游业的急剧下降。苏伊士运河继续是世界上重要的运输要道之一。运河在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最鼎盛时期,每年可提供两万两千多艘船只。交通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稍微降低了一些,但随着运河的拓宽很快就会恢复,运河的拓宽能够使满载货物的巨型油轮通过。在 21 世纪初,运河每年赚取 30 多亿美元。尽管被它的一些中东和非洲邻居超过,但埃及也生产和出口大量的石油。越来越多的国内消费已经减少了出口,但这些损失依靠世界市场上油价的大量增加来抵消。与此同时,埃及天然气的保有证明比之前认为的更广泛,结果埃及国家开始在 2005 年出口液化天然气。外援的水平保持不变。

但很多与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相关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那些从变化中获益的人与那些始终贫穷的人们之间的财富差距正在逐渐拉大,越来越高的希望与艰难的现实之间潜在的差距具有爆炸性。根据国际标准,埃及生活在贫困状态的人口百分比已经从 1990 年的 20% - 25%增加到了 1997 年的 45%强。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已在稳步下降。失业率已经迅速上升,公开的数字维持在 9% 到 10%之间,但这些数字是低报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应该向上提高 5%。形势的可怕进一步被广泛的低雇佣和低工资掩饰了,这迫使很多人为了供养家庭而去寻找兼职工作甚至第二份全职工作。报道

的通货膨胀率低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膨胀水平，但对正在工作的邻居进行的最正常的调查表明食物价格已经增加到了令人忧伤的水平，占用家庭预算的较大部分。关键项目——例如面包和汽油——的持续补贴(这受到国际财团的严肃反对)阻止了广泛的公共抗议。四百多万国外埃及工人的汇款继续成为埃及经济的主要或根本组成部分。穆巴拉克通过惩罚腐败和鼓励地方生产而非进口的方式纠正了一些对门户开放政策最喧嚣的谴责，但根本困难始终未得到解决。

埃及总体经济形势的任何改善都存在被它迅速增长的人口腐蚀的危险。在 20 世纪初，有大约一千万埃及人。到 1952 年君主制结束时，人口已经上升到了两千二百多万。在 2000 年，埃及人口近六千八百万，几乎每十个月增加一百多万。正如穆巴拉克总统在 1991 年承认的那样，“过多的人口阻碍了发展。它影响到几百万埃及家庭的生活标准，它限制了政府为其公民增加服务的能力。”相较于中东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埃及的出生率并不是特别高，而且有迹象表明计划生育项目至少产生了边缘性的影响，但很多更必要的事情需要去做。与此同时，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为了保持和改善生活标准，经济必须更快地发展。

353

埃及的人口增长在大都市开罗是最明显的，开罗的人口已经膨胀到了 1600 万，严重限制了城市的都市结构，这个城市在最初设计时只希望容纳更少的人口。开罗在过去三十年交通量的增加也是令人惊愕的，这样大规模的交通应该已经使很多大城市陷入绝对的瘫痪状态了，但开罗的交通仍然继续运转。这部分上因为埃及人不可思议的合作精神，部分上因为巨大数量的交通警察和大量劳动力负责看管诸如停车这样的事情。由于主要高速公路的修建，交通堵塞正在缓解(尽管一些人可能认为它正在恶化)。开罗地铁是由法国人修建的，于 1987 年开通，正在迅速拓长。城市陈旧的下水系统大部分被美英联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更换，而且是准时更换的。全面地考虑，开罗的指数发展还没有被很多寻常的都市疾病入侵。例如，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说，

开罗的犯罪率是突出的低。

埃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最令人震惊的逆转几乎没有引起评论。在纳赛尔时期,埃及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食物生产者,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食物进口国。埃及曾经不仅为自己也为很多其他国家提供食物,当时却不再能供养自己了。到萨达特总统任期结束时,埃及谷物的一半以上都要依赖进口。甚至在美国的援助下,这些进口的谷物每年也要花费埃及 20 亿美元的巨款。红海港口萨法伽高耸的谷物升降机是埃及依赖外国食物资源的纪念碑。在过去 20 年里,这种形势稍有改善,但埃及远不能自给自足。阿斯旺大坝修建以后增加的可耕地数量比都市化消耗的可耕地数量多。当一个人每天生活在开罗西南部时,他就会痛苦地发现世界上最肥沃的一些农田正稳步地消失在密密麻麻的公寓大楼的下面,这些大楼有时是用这些农田的泥土做的泥砖建筑的,这还不算,那些直到这最后一刻还在耕种的田地很快就要遭受同样的命运。这样的发展最好在沙漠里进行。

354

当埃及人口继续增加时,埃及国家遇到了生死攸关的资源——尼罗河水的限制,因尽管埃及与狮谋水,但这些水没有对埃及做出任何贡献,同时上游那些国家的人口比埃及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它们不可避免地利用更多的尼罗河水,同时对河流实施越来越多的控制。对于大多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埃及是尼罗河谷中唯一重要的农业国家,因此它必须有效地利用河水。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埃及必须确保获得足够的尼罗河水,这种认识增加了,这是以英国水利工程师在英国占领早期阶段对尼罗河水的认真计算为基础的。但是,逆流水力控制的缺乏意味着埃及继续无障碍地获得整个水流。英帝国对几乎整个尼罗河盆地的控制也保证了对河流实施的统一政策,这最终有利于埃及。当尼罗河流域的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独立时,外交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在尼罗河水的分配方面,1959 年埃及与苏丹的“尼罗河水协定”是最重要的。它以阿斯旺的平均自然流量为基础,这个流量据估计是每

年 840 亿立方米。[①] 根据 1959 年协定，埃及被分配给 555 亿立方米；苏丹被分配给 185 亿立方米；另外 100 亿立方米水被用于在阿斯旺大坝后面计划修建的水库的蒸发和渗流。这是苏丹非常愿意接受的，苏丹获得的水份额比 1929 年那个协定的份额大大增加了，那个协定给予苏丹不足 5%的水份额。但它也有利于埃及，因为苏丹受到经济和政治问题以及恶化的农业设施的阻碍，从来没有充分利用它的水份额；因此，其余的水作为一个免费礼物向下游流入埃及。埃及领导者的行为表明他们似乎认为水资源是无限的，尤其在阿斯旺大坝的建筑方面。萨达特淡定地谈到为了表示友善而把尼罗河水送给耶路撒冷，这些话激怒了很多埃及人。

事实上，甚至当阿斯旺大坝建成时，很多工程师都警告，随着灌溉、水电生产、个人和工业消费的需求越来越高，埃及将依靠超过其水利平均值的水生活。到 1980 年或更早，埃及水与人口的比率是惊人的低。20 世纪末的统计数字表明到 2025 年，每个埃及人的可净化的淡水数量将不足一千立方米，一个处于这种水平的国家被认为是缺水的国家。与此同时，重大变化已经在上游发生。苏丹可能在接下来几年更多地使用它那部分水，它在第四瀑布附近构建的宏大的麦罗埃水坝也将对尼罗河水流产生重大影响。其他河边国家都被排除在 1959 年协定以外。它们也要求分享尼罗河水，尼罗河流经甚至起源于某些国家的国境内。埃塞俄比亚的要求必须给予特别严肃的对待，因为埃及尼罗河水的 84%源自埃塞俄比亚。

即使如此，埃及继续给尼罗河施加更大压力。托斯卡工程始于 1997 年，计划到 2020 年竣工，是自阿斯旺大坝以来埃及最大的工程项目，将使埃及被分配的每年 555 亿立方米水中的大约 10%从纳赛尔湖

① 尽管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但它携带的水量却没有其他河流多，因为它在同样规模的积水区域浪费了水量，大部分因为它流经如此长距离的沙漠，而且没有支流或降水。相比较而言，Amazon 亚马逊河每年流注 55180 亿立方米的水，而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河的水量是每年 5260 亿立方米。

改道,流入西沙漠,远及哈噶绿洲和达赫莱绿洲,通过灌溉150万费丹的土地而有效地创造第二个尼罗河谷。除了增加农业生产,新河谷还旨在为几百万埃及人提供家园,减轻拥挤的尼罗河谷的人口压力。对356 托斯卡工程的批评包括这样的怀疑,即是否有足够的水,但埃及政府坚信它能够从埃及目前的水份额中获得足够的水。托斯卡工程的成功和埃及整个水利活力的维持将依赖于仔细管理和有力的气候条件以及机敏的外交。

预测未来,很明显,21世纪将为埃及带来某些最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是埃及在其几千年动荡的历史中未曾遇到过的。埃及国家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埃及人民的适应性和能力一再得到了证明,国家保留着巨大未开发的潜能。当一个人站在穆卡塔姆丘陵——异教徒哈里发埃尔-哈稀姆常常在夜晚孤独地骑着驴在山上闲逛——上,朝着蔓延的城市向前瞭望,观看银带般的尼罗河、金字塔、沙漠等等时,他就不得不相信埃及大地不知何故仍然充满玛阿特。自奥西里斯时代以来的秩序一直会存在下去。



注　　释

1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3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 1980), vol. 1, 189.

2 Jaromir Malek, *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6), 40 - 42.

3 Jaromir Malek, *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 118.

4 Stela of Irtisen, The Louvre.所引内容由本书作者翻译。

5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2, 176 - 177.

6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 Aubrey de Sélincour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188.

7 Flavius Josephus, *Contra Apionem*. 所引内容由本书作者翻译。

8 John H. Taylor,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Ian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37.

9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 Walter Blanco; Walter Blanco, and Jennifer Tolbert Roberts. ed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85 - 86.

10 Garth Fowden, *The Egyptian Hermes: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Late Pagan Mi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1 - 22.

11 Alan K. Bowman, *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69.

12 Polybius,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 trans. Evelyn S. Shuckburgh,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89), vol. 1, 453.

13 Polybius,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 vol. 2, 405 - 406.

14 Alan K. Bowman, *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218.

358

15 From Kircher, *Oedipus Aegyptiacus*, quoted in Franci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4), 417 - 418.

16 Lionel Casson, *Ships and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4), 123 - 124.

17 Eusebius of Caesarea, *History of the Church*. 所引内容由本书作者翻译。

18 Tim Vivian, "St. Antony the Great and the Monastery of St. Antony at the Red Sea, ca. A. D. 251 to 1232/1233," in Elizabeth S. Bolman, ed., *Monastic Visions: Wall Paintings in the Monastery of St. Antony at the Red Sea* (Cairo: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2002), 7.

19 Pierre Chuvin, *A Chronicle of the Last Pagans*, trans. B. A. Arch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8.

20 André Raymond, *Cairo: City of History, trans. Willard Wood*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1), 74.

21 Francesco Gabrieli, *Arab Historians of the Crusad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97 - 298.

22 Bernard Lewis,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2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vol. 1, 84-85.

23 Peter M. Holt,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London: Longman, 1986), 126.

24 André Raymond, *The Glory of Cairo: An Illustrated History*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2), 269.

25 H. R. Trevor-Roper, *Historical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957), 24-25.

26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1325-135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9), 50.

27 Sir John Maundeville [pseudo.], *The Voiage and Travaile of Sir John Maundevile, K'* (London: J. Woodman, D. Lyon, and C. Davis, 1725), 63-64.

28 Robert L. Tignor, ed., *Napoleon in Egypt: Al-Jabartī's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Occupation, 1798*, trans. Shmuel Moreh (Princeton: Markus Wiener, 1993), 36.

29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83.

30 Edward William Lane, Description of Egypt, Jason Thompson, ed.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05.

31 Samuel W. Baker, *Ismailia: A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entral Africa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lave Trade*,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1874), vol. 1, 22.

32 Florence Nightingale, *Letters from Eghpt: A Journey on the Nile, 1849-1850*, ed. Anthony Sattin (London: Parkway, 1987), 19.

33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Notes of A Journey*from*

Cornhill to Grand Cairo, *by way of Lisbon*, *Athens*, *Constantinople*, *and Jerusalem*: *Performed in the Steamers of the Peninsular and Oriental Company* (London: Champan and Hall, 1846), 278 - 279.

34 Lucie Duff Gordon, *Letters from Egypt*, Sarah Searight, ed. (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335.

359

35 Evelyn Baring, Earl of Cromer, *Modern Egypt*,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08), vol. 1, 567.

36 Ronald Storrs, *The Memoirs of Sir Ronald Storr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37), 88.

37 Abbas Hilmy II, *The Last Khedive of Egypt*: *Memoirs of Abbas Hilmi II*, trans. And ed. Amira Sonbol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6), 97.

38 Hassan Hassan, *In the House of Muhammad Ali*: *A Family Album*, *1805 - 1952*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0), 128.

39 Moustafa Ahmed, ed. *Egypt in the 20th century*: *Chronology of Events* (London: MegaZette Press, 2003), 458.

40 Anthony McDermott, *Egypt*: *From Nasser to Mubarak*, *A Flawed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8), 56.



推荐阅读书目

Baines, John, and Jaromir Malek. *Atlas of Ancient Egypt* (rev. ed.).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2.

Bolman, Betsy (ed.). *Monastic Visions: Wall Paintings in the Monastery of St. Antony at the Red Sea*. Cairo: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2002.

Bowman, Alan K. *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Doxiadis, Euphrosyne. *The Mysterious Fayum Portraits: Faces from Ancient Egyp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0.

Fahmy, Khaled.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oldschmidt, Arthur, Jr. *Modern Egypt: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Stat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Hewison, R. Neil. The Fayoum: History and Guide (3rd ed.).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1.

Hölbl, Günther. *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Translated

by Tina Saavedra. London: Routledge, 2001.

361 Holt, P. M.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Near East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to 1517*. London: Longman, 1986.

Holt, P. M. *Egypt and the Fertile Crescent 1516 - 1922: A Poli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Hunter, Robert F. *Egypt under the Khedives, 1805 - 1879*.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4.

Kamil, Jill. *Christianity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2.

Lehner, Mark. *The Complete Pyramid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7.

Lewis, Naphtali. *Life in Egypt under Roman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Malek, Jaromir. *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 Egypt during the Old Kingdo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6.

Midant-Reynes, Béatrix. *The Prehistory of Egypt: From the First Egyptians to the First Pharaohs*. Translated by Ian Shaw. Oxford: Blackwell, 2000.

Petry, Carl F.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if, Stefan C. *A Jewish Archive from Old Cairo*.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0.

Sampsell, Stefan C. A Traveler's Guide to the Geology of Egypt.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3.

Shaw, Ian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Tignor, Robert L. *Modernization and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Egypt, 1881 - 191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Grigger, B. G., B. K. Kemp, D. O'Connor, and A. B. Lloyd. *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Vatikiotis, P. J. *The History of Egypt* (3r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85.

Winter, Michael. *Egypti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1517 – 1798*. London: Routledge, 1992.

图片来源

Bevan, Edwyn. *A History of Egypt under the Ptolemaic Dynasty*. London: Methuen & Co., 1927.

Colvin, Auckl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2nd ed.). New York: E. P. Dutton, 1906.

Coste, Pascal. *Architecture arabe*. Paris: Firmin Didot Frères, 1839.

Firth, Francis. *Lower Egypt, Thebes, and the Pyramids*. London: W. Mackenzie, 1862.

De Guerville, A. B. *New Egypt*. New York: E. P. Dutton, 1906.

Hassan, Hassan. *In the House of Muhammad Ali: A Family Album, 1805 – 1952*.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0.

Hay, Robert. *Illustrations of Cairo*. London: Tilt and Bogue, 1840.

Lane, Edward William.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 Egyptians* (3rd ed.). London: C. Knight, 1842.

Lepsius, Richard. *Denkmä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

Berlin：Nicolaische Buchhandlung，1849－1856.

Nicol，Norman D. *Sylloge of Islamic Coins in the Ashmolean：Volume* 6，*The Egyptian Dynasties*. Oxford：Ashmolean Museum，2007.

Penfield，Frederic Courtland. *Present-Day Egypt*（rev. ed.）. New York：Century Co.，1903.

Roberts，David. *Egypt and Nubia：from drawings made on the spot*. London：F. G. Moon，1846－1849.

索　　引

（索引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370

376

381



译名对照表

A. Siliotti 锡里奥提
Aaron 亚伦
Abbas Hilmy II 阿巴斯·希尔米二世
Abbas Hilmy I 阿巴斯·希尔米一世
Abbasid family 阿巴斯家族
Abbas 阿巴斯
Abd al-Aziz 阿布德·埃尔-阿兹兹
Abd al-Hakim Amer 阿布德·埃尔-哈稀姆·阿穆尔
Abd al-Karim Qasim 阿布德·埃尔-卡里姆·卡西姆
Abd al-Latif 阿布德·埃尔-拉提夫
Abd al-Rahman al Jabarti 阿布德·埃尔-拉曼·埃尔-贾巴尔提
Abdallah al-Sallal 阿布达拉·埃尔-萨拉尔
Abdallah ibn Saad ibn Abi Sarh 阿布达拉·伊本·萨阿德·伊本·阿比·萨拉
Abdallah ibn Saud 阿布达拉·伊本·梭德
Abdera 阿卜杜拉
Abdin Palace 阿布丁宫殿
Abdin 阿布丁
Abdullah Jacques Menou 阿卜杜拉·雅克·梅农
Abu Mena 阿布·美纳
Abu Qir 阿布·基尔
Abu Rawash 阿布·拉瓦什
Abu Simbel 阿布·辛拜勒
Abu Sir 阿布·希尔
Abu Zabal Hospital 阿布·扎巴尔医院
Abydos 阿拜多斯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Acre 阿克里
Actium 亚克兴
Adli Street 阿德里大街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Aegean Sea 爱琴海
Africa 非洲
Afrika Korps 非洲军团
Afro-Asiatic 亚-非语系
Agathocles 阿贾托克勒斯
Agathos 阿迦图斯
Ahmed al-Masri 阿赫迈德·埃尔-马斯里
Ahmed Fouad 阿赫迈德·福瓦德
Ahmed Fuad 阿赫迈德·福阿德
Ahmed ibn Tulun 阿赫迈德·伊本·图伦
Ahmed Maher 阿赫迈德·马赫尔
Ahmed Pasha 帕夏阿赫迈德
Ahmed Shawqi 阿赫迈德·肖奇
Ahmed Urabi 阿赫迈德·乌拉比
Ahmose I 雅赫摩斯一世

Amqa 阿穆卡
Amr ibn al-As 阿穆尔·伊本·埃尔－阿斯
Amratian 阿姆拉文化
Amun-Ra 阿蒙－拉
Amun 阿蒙
Amyrtaios 阿米尔泰奥斯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Angela T. Thompson 安吉拉·汤普森
Anglo-Egyptian Condominium 英埃共管
Ankhesenpaaten 安克森帕阿吞
Ankhtifi 安柯提斐
Anna Ziajka 安娜·扎吉卡
Anthony Eden 安东尼·艾登
Antigonus Gonatus 安提葛努斯·格纳图斯
Antinoopolis 安提诺坡里斯
Antinous 安提诺斯
Antioch 安提俄克
Antoninus Pius 安敦尼
Anwar al-Sadat 安沃尔·埃尔－萨达特
Aphrodite 阿芙罗狄蒂
Apis 阿匹斯
Apollonius 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 阿波罗
Apries 阿普里斯
Apuleius 阿普琉斯
Aqaba 亚喀巴
Arab League 阿拉伯同盟
Arab Republic of Egypt 埃及阿拉伯共和国
Arab Socialist Union 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Arabian Peninsula 阿拉伯半岛
Arabian Sea 阿拉伯海
Aragon 阿拉贡
Araldo De Luca 阿瑞达·德·卢卡
Arargaris-Bethynnis 阿拉加里斯－贝斯尼斯
Archimedean Screw 阿基米得式螺旋抽水机
Archimedes 阿基米得
Ariel Sharon 阿里尔·沙龙
Aristarchus 阿里斯塔库斯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Arius 阿里乌
Armant 阿尔曼特
Armenia 亚美尼亚
Arsinoe II 阿尔西诺二世
Artaxerxes III 阿塔薛西斯三世
Ascalon 阿斯卡隆
Asclepius 阿斯克勒庇俄斯
Asia 亚洲
Assassins 刺客派
Assembly of Delegates 代表委员会
Assurbanipal 阿舒尔巴尼拔
Assyria 亚述
Aswan High Dam 阿斯旺大坝
Aswan Dam 阿斯旺水坝
Aswan 阿斯旺
Asyut 阿西尤特
Atbara River 阿特巴拉河
Aten 阿吞
Athanasius Kircher 阿塔纳西乌斯·基切尔
Atlantic 大西洋
Auletes 奥勒提斯
Aurelian 奥勒良
Australia 澳大利亚
Austria 奥地利
Avaris 阿瓦里斯
Awibra Hor 阿韦布拉·霍尔
Aybeg al-Turkumani 阿伊贝格·埃尔－土尔库曼尼
Ayman al-Zawahiri 阿伊曼·埃尔－扎瓦希里
Ayman Nour 阿伊曼·努尔
Ayyubids 阿尤布王朝
Ayyub 阿尤布
Ay 阿伊
Baath Party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Bab al-Futuh 巴布·埃尔－浮图
Bab al-Nasr 巴布·埃尔－纳斯尔
Baba Ahmed 巴巴·阿赫迈德

Carthage 迦太基
Catulus 卡图鲁斯
Central Asia 中亚
Central Europe 中欧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
Ceylon 锡兰
Chakmak al-Zahiri 柴科马克・埃尔－扎赫利
Chalcedonians 査尔西顿派
Chalcedon 査尔西顿
Chaldeans 卡尔迪亚人
Chamber of Haute Couture 高级服装协会
Charles George Gordon 査尔斯・乔治・戈登
Charybdis 卡律布迪斯
Chauceria 乔叟
Cheops 基奥普斯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China 中国
Chosroes II 乔斯洛斯二世
Chou En-lai 周恩来
Christodoulos 克里斯托多罗斯
Churchill 丘吉尔
Cilicia 西里西亚
Circassian 切尔克斯人
Circassia 切尔卡西亚
Circus Maximus 马克西姆斯马车竞赛场
Claude Auchinleck 克劳德・奥金莱克
Claude Étienne Savary 克劳德・埃特纳・萨瓦里
Claudius Ptolemaeus 克劳迪・托勒麦斯
Claudius 克劳迪
Clement 克莱门特
Cleopatra VII 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Cleopatra's Needles 克里奥帕特拉之针
Clot Bey 克劳特・拜伊
Cloud-Catcher 捉云者
Coele Syria 科勒・叙利亚
Colvin 科尔文
Commodus 科莫多斯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Constantin Volney 君士坦丁・弗尔奈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
Coptic Museum 科普特博物馆
Coptos 科普图斯城
Copt 科普特人
Cornelius Gallus 科尼利厄斯・加鲁斯
Corrective Revolution 矫正革命
Coste 科斯特
Cos 科斯
Council of Clermont 克莱蒙特会议
County of Edessa 埃德萨伯国
County of Tripoli 的黎波里伯国
Credit Lyonnais 里昂纳斯信用社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Cromer 克罗默
Crusades 十字军东侵
Cyprus 塞浦路斯
Cyrenaica 昔兰尼加
Cyril I 西里尔一世
Cyrus the Great 居鲁士大帝
Cyrus 赛勒斯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Dahesh Museum 达赫什博物馆
Dahshur 达赫淑尔
Daimon 戴蒙神
Dakhla Oasis 达赫莱绿洲
Damascus 大马士革
Damietta 达米埃塔
Danube 多瑙河
Dar al-Salaam 达尔萨拉姆
Darfur 达尔福尔
Darius I 大流士一世
David Ben-Gurion Airport 大卫・本－古里安飞机场
David Ben-Gurion 大卫・本－古里安

Fifth Cataract 第五瀑布
First Cataract 第一瀑布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第一中间期
First Triumvirate 前三头政治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Flavius Josephus 弗拉维乌斯・约瑟夫
Flemish 佛莱芒
Flinders Petrie 弗林德斯・皮特里
Florence Nightingale 佛罗伦萨・南丁格尔
Fort Qaitbay 魁特尔堡
Fourth Cataract 第四瀑布
Francis Frith 弗朗西斯・弗里斯
Franklin D. Roosevelt 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s 法兰克人
Frederick Barbarossa 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
Frederick Lewis Norden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诺登
Free Officers' Movement 自由军官运动
Frith 弗里斯
Frunze Military Academy 伏龙芝军事学院
Fuad I University 福阿德一世大学
Fuad 福阿德
Fustat 福斯塔特
Gaius Popillius Laenus 加伊乌斯・珀庇琉斯・列努斯
Galen 伽林
Galerius 盖勒留
Galilee 加利利
Gallienus 伽里恩努斯
Gallipoli 加里波利
Gamal Abd al-Nasser 伽马尔・阿布德・埃尔－纳赛尔
Garnet Joseph Wolseley 加内特・约瑟夫・沃尔斯利
Gaul 高卢
Gaza 加沙
Gazira Palace 扎兹拉宫殿
Gazira Sporting Club 扎兹拉运动俱乐部
Gebel al-Silsileh 凯拜尔・埃尔－希尔希勒
Gebel al-Teir 凯拜尔・埃尔－戴尔
Gebel Barkal 凯拜尔・巴卡尔
Gebel Dokhan 凯拜尔・铎克罕
General Assembly 将军委员会
Geneva Conference 日内瓦会议
Geneva 日内瓦
Geodia Edizioni 乔迪亚・埃迪左尼
Gerald R. Ford 福特
Germany 德国
Gerzean 格尔塞文化
Geta 盖塔
Ghad Party 未来复兴党
Ghengis Khan 成吉思汗
Gidi 吉迪
Gilf al-Kebir Plateau 大吉勒夫高原
Giza 吉萨
Gnaeus Pompey 格涅乌斯・庞培
Golan Heights 戈兰高地
Golden Horde 金帐汗国
Golossi of Memnon 门农巨像
Gospel of Thomas 托马斯福音书
Goths 哥特人
Great Humiliation 大羞耻
Great Insurrection 大起义
Great Persecution 大迫害
Greco-Roman Museum 希腊－罗马博物馆
Greece 希腊
Greek 希腊人
Guerville 古尔韦勒
Guildhall 市政厅
Gulf of Aqaba 亚喀巴湾
Gulf of Sidra 锡德拉湾
Gulf of Suez 苏伊士湾
Gustave Flaubert 福楼拜
Guy 盖伊
Habiba 哈比巴
Hades 哈德斯
Hadrian's Villa 哈德良别墅

Hafez al-Asad 哈菲兹·埃尔－阿萨德
Hafez Ibrahim 哈菲兹·伊博拉希姆
Hakare-Ibi 哈卡尔－伊比
Halfaya Pass 哈法耶隘口
Hall of Records 记录大厅
Hapsburg 哈布斯堡帝国
Harar 哈拉尔城
Hariese 哈瑞斯
Harold Macmillan 哈罗德·麦克米兰
Harry Boyle 哈里·波义耳
Harun al-Rashid 哈伦·埃尔－拉希德
Hasan al-Banna 哈桑·埃尔－巴纳
Hasan Pasha 帕夏哈桑
Hasan 哈桑
Hashemite 哈桑王族
Hathor 哈托尔
Hatshepsut 哈特舍普苏特
Hattin 哈丁
Haussmann 豪斯曼
Hawara Channel 哈瓦拉水渠
Hawara 哈瓦拉
Hebrew 希伯来人
Hecataeus 海卡泰俄斯
Hekanakhte 赫卡纳赫特
Heliopolis 赫利奥坡里斯
Helwan 海尔万
Henry Kissinger 亨利·基辛格
Henry McMahon 亨利·麦克马洪
Heptastadion 海波塔斯塔
Heraclius 赫拉克利乌斯
Hera-Isis 赫拉－伊西斯
Herakleopolis 赫拉克利奥坡里斯
Herbert Kitchener 赫伯特·基钦尔
Herihor 赫利霍尔
Hermanopolis Magna 赫尔曼奥坡里斯·麦格纳
Hermes Trismegistus 赫耳墨斯·特里斯美基图斯
Hermes 赫耳墨斯
Hermeticism 赫耳墨斯教(主义)
Hermopolis Magna 赫尔摩坡里斯·麦格纳
Herod Agrippa 赫罗德·阿格里帕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rod 希律王
Herophilus 赫罗菲拉斯
Hibis Temple 希比斯神庙
Hiera Sikaminos 希拉·锡卡米诺斯
Hierakonopolis 希拉康坡里斯
Hijaz 汉志
hill of Sheikh Abd al-Qurna 阿布德·埃尔－库尔纳首长山
Hitler 希特勒
Hoda Sharawi 霍达·沙拉维
Holocene Period 全新世时期
Homer 霍默
Horace 贺瑞斯
Horemheb 郝列姆赫布
Horus 荷鲁斯
Hosni Mubarak 霍斯尼·穆巴拉克
Hôteld' Orient 东方旅馆
Howard Carter 霍华德·卡特
Hülegü 旭烈兀
Hunanup 胡纳努普
Hungary 匈牙利
Huni 胡尼
Hurghada 胡尔加达
Husein Kamil 侯赛因·卡梅尔
Husein Rushdi 侯赛因·鲁史迪
Husein Shafei 侯赛因·沙菲
Husein 侯赛因
Hyksos 希克索斯人
Hypatia 西帕提亚
Ibn al-Athir 伊本·埃尔－阿提尔
Ibn al-Furat 伊本·埃尔－弗拉特
Ibn Battuta 伊本·巴图塔
Ibn Hawkal 伊本·豪卡尔
Ibn Khaldun 伊本·哈尔敦
Ibn Tulun 伊本·图伦

Ibn Wasil 伊本·瓦希尔
Ibrahim Bey 拜伊伊博拉希姆
Ibrahim Kahya 卡亚伊博拉希姆
Ibrahim Kamil 伊博拉希姆·卡梅尔
Ibrahim Pasha 帕夏伊博拉希姆
Ice Age 冰河时代
Ikhshidids 伊赫什德王朝
Ikhshid 伊赫什德
Imam Ahmed 政教领袖艾哈迈德
Imbaba 伊穆巴巴村
Imhotep 伊姆霍特普
Inaros 荫阿罗斯
Indian Ocean 印度洋
India 印度
Indonecia 印度尼西亚
Ineni 荫伊尼
Inner Oases 内部绿洲
Inshas Palace 荫夏斯宫殿
Institute of Egypt 埃及研究所
Intef II 荫特夫二世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Liquidation 国际债务清偿委员会
Ipuwer 伊普味
Iran 伊朗
Iraq 伊拉克
Irtisen 伊尔提森
Irtjet 伊杰特
Isaac Casaubon 艾萨克·卡索本
Isis 伊西斯
Ismail Bey 伊斯梅尔·拜伊
Ismail Fahmi 伊斯梅尔·法米
Ismail Sidqi 伊斯梅尔·塞德奇
Ismailia 伊斯梅利亚
Ismaili 伊斯玛仪派
Israelis 以色列共和国民
Israel 以色列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Isthmus of Suez 苏伊士地峡
Iuput 伊乌普特

Jaffa 迦法
James Bruce 詹姆士·布鲁斯
Janus 詹努斯
Jaroslaw Dobrowolski 亚罗斯塔乌·多勃罗沃尔斯基
Jason Thompson 詹森·汤普森
Jawhar 雅瓦尔
Jean-Baptiste Kléber 让-巴普提斯特·克莱伯
Jean-Léon Gérôme 让-莱昂·杰罗米
Jeddah 吉达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sus 耶稣
Jewish Revolt 犹太叛乱
Jewish Synagogue 犹太教会堂
Jill Kamil 吉尔·卡梅尔
Jimmy Carter 吉米·卡特
John Feeney 约翰·菲尼
John Foster Dulles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rederick Lewis 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
John Gardner Wilkinson 约翰·加德纳·威尔金森
John Glubb 约翰·格拉布
John Murray 约翰·默里
John Ruffle 约翰·拉斐尔
Jordan 约旦
Josephus 约瑟夫斯
Joseph 约瑟
Josiah 约西亚
Judah Kingdom 犹大王国
Judea 朱地亚
Julian Calendar 朱利亚历法
Julian 朱利安
Julius Caesar 尤里乌斯·恺撒
Jupiter Capitolinus 丘比特神殿
Justinian 查士丁尼
Kafur 卡福尔
Kalabsha 卡拉巴沙

Lyndon Johnson 林顿·约翰逊
M. Aemilius Lepidus 雷必达
Maadi 马阿迪
Macarius 玛迦里乌斯
Macedonia 马其顿
Maciej Jórdeczka 麦希杰·乔德左卡
Maghreb 马格里布
Mahdi 马赫迪
Mahmud Fahmi al-Nuqrashi 马哈穆德·法米·埃尔－努克拉什
Mahmud II 麦哈姆德二世
Mahmud Mukhtar 麦哈姆德·穆克塔尔
Mahmudiya 马赫穆迪亚
Mai 马伊
Malawi 马拉维
Malikshah 马利克沙
Malta 马耳他
Mamluks 马穆鲁克
Mamun 玛穆恩
Mandulis 曼杜里斯
Manetho 马涅陀
Manichaeism 摩尼教
Mansura 曼苏拉
Manuel the Augustulis 曼纽尔
Manzala 曼扎拉湖
Manzikert 曼兹凯尔特
Marcian 玛西安
Marcus Antonius 马克·安敦尼
Marcus Licinius Crassus 马克·李锡尼乌斯·克拉苏
Margaret Ranger 玛格丽特·朗格
Marj Dabiq 马里·达比克
Mark Linz 马克·林茨
Maronite 马龙派基督徒
Marsa Matruh 马萨·马特鲁
Marsilio Ficino 马尔西诺·菲西诺
Mars 马尔斯
Martin Bernal 马丁·伯纳尔
Marwan II 马尔万二世
Marwan I 马尔万一世
Maryland 马里兰
Maurice 毛瑞斯
Maxime du Camp 马克西姆·坎普
Maximianus 马克西米安努斯
Ma 玛
Mecca 麦加
Medes 米底人
Medina 麦地那
Medinet Habu 美蒂奈特·哈布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Mehmed II 穆罕默德二世
Meidum 美杜姆
Meketaten 麦克塔吞
Meketra 梅克特拉
Melchites 麦勒卡派
Melissus 梅里苏斯
Memnon 门农
Memphis 孟菲斯
Menachem Begin 梅纳赫姆·贝京
Menes 美尼斯
Menkaura 孟考拉
Menkheperre 孟凯皮拉
Mentuhotep II 孟图霍特普二世
Merenra II 麦然拉二世
Merenre 麦然拉
Merimda 梅里姆达
Meritaten 美丽塔吞
Merneptah 美楞普塔
Meroë Dam 麦罗埃水坝
Meroë 麦罗埃
Meroitic Kingdom 麦罗埃王国
Meruitensi 梅鲁腾斯
Mesehti 梅赛提
Michael Jones 迈克尔·琼斯
Middle Egypt 中埃及
Middle Kingdom 中王国
Miles Lampson 迈尔斯·兰普森
Minshat Abu Omar 明沙特·阿布·奥玛尔

Necho II 尼科二世
Nectanebo II 涅克塔尼布二世
Neferrohu 涅菲尔胡
Nefertem 尼菲尔泰姆
Nefertiti 涅菲尔泰提
Neferure 涅菲尔鲁拉
Negada II 涅迦达文化 II
Negada I 涅迦达文化 I
Negev 内盖夫
Neil Hewison 尼尔·赫威森
Neil Ranger 尼尔·朗格
Neolithic 新石器时代
Neoplatonism 新柏拉图主义
Neos Dionysus 尼奥斯·狄俄尼索斯
Neotera 奈奥特拉
Nepherites I 尼弗里提斯一世
Nero 尼禄
Nestorius 奈斯托利乌斯
Netjerykhet 涅铁莱凯特
New Kingdom 新王国
New Stone Age 新石器时代
New Waft 新华夫脱党
New York 纽约
New Zealand 新西兰
Niankhptah 尼安柯普塔
Nicene Greed 尼西亚信经
Nicolaus Copernicus 哥白尼
Nicol 尼古尔
Nicopolis 奈克坡里斯
Nikita Khrushchev 赫鲁晓夫
Nikiu 尼基乌
Nile Hilton Hotel 尼罗河希尔顿大酒店
Nile Waters Agreement 尼罗河水协定
Nile 尼罗河
Nineveh 尼尼微
Nitiqret 尼托凯尔悌
Nizam al-Mulk 尼扎姆·埃尔－穆尔克
Nizar 尼扎尔
Nobel Peace Prize 诺贝尔和平奖
Nobel Prize 诺贝尔奖
Nofret 诺夫瑞特
Normandy 诺曼底
Norman 诺曼人
Northern Pyramid 北方金字塔
Norway 挪威
Nubar 努巴尔
Nubia 努比亚
Numan Gomaa 努曼·伽马
Nur al-Din 努尔·埃尔－丁
Ochus 奥库斯
Octavian 屋大维
Octavia 屋大维娅
Old Kingdom 古王国
Old Stone Age 旧石器时代
Oman 阿曼
Omdurman 乌姆杜尔曼
Operation Crusader 十字军行动
Opet festival 欧佩特节
Opet 欧佩特
Organization for African Unity 非洲统一组织
Origen 奥利金
Orpheus 俄耳普斯
Osiris 奥西里斯
Osorkon II 奥索尔康二世
Ostia 奥斯提亚
Ottomans 奥斯曼土耳其人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Oxyrhynchus 奥克西林库斯
Ozymandias 王者之王
P. Clodius Pulcher 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
Pachomian 帕克米安
Pakistan 巴基斯坦
Paleolithic 旧石器时代
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rina 帕莱斯特里那

Palmyra 帕米拉
Panhellenic Games 泛希腊运动会
Papyrus Westcar 韦斯特卡尔纸草
Parmenides 巴门尼德
Parthian War 帕提亚战争
Pax Romana 罗马和平
Pelusium 玻琉修姆
Penfield 本菲尔德
People's Crusade 人民十字军东侵
Pepy II 珀辟二世
Pepy I 珀辟一世
Pepynakht Heqaib 珀辟纳赫特・海凯布
Percy Bysshe Shelley 谢莉
Pergamum 帕加马
Peribsen 帕里布森
Persia 波斯
Peter 彼得
Petronius 皮特鲁尼乌斯
Pharos Island 法罗斯岛
Pharsalus 法萨鲁斯
Philadelphus 菲拉戴尔弗斯
Philae Temple 菲莱神庙
Philae 菲莱岛
Philip Augustus 菲利普・奥古斯塔斯
Philippi 腓力比
Philomater 菲洛玛特尔
Philometor 菲洛密托尔
Philopater 菲洛帕特尔
Philo 菲洛
Phocas 福卡斯
Phoenicia 腓尼基
Physcon 菲斯孔
Piankh 皮安柯
Pinudjem I 皮努杰姆一世
Pi-Ramesses 培－拉美西斯
Piye 辟伊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
Plato 柏拉图
Plotinus 普罗提诺
Plutarch 普鲁塔克
Poland 波兰
Polybius 波里比阿
Pompeii 庞培城
Pompey's Pillar 庞培柱
Port Said 塞德港
Portland 波特兰
Praeneste 普莱奈斯特
Praxagoras 普拉克萨格拉斯
Pre-dynasty 前王朝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安条克公国
Probus 普洛布斯
Prusa 浦路撒
Psusennes I 普苏森尼斯一世
Ptahhotpe 普塔霍特普
Ptah 普塔
Ptolemaia 托勒密亚
Ptolemais 托勒麦斯
Ptolemy Apion 托勒密阿比翁
Punic War 布匿战争
Punt 蓬特
Pyrrhic War 比鲁斯战争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Qaitbay 凯特贝
Qalawun 卡拉乌恩
Qasr al-Aini Hospital 卡斯尔・埃尔－埃尼医院
Qasr al-Sagha 卡斯尔・埃尔－萨迦
Qasr Ibrim 伊卜里姆堡
Qattara Depression 卡塔拉大洼地
Qena Bend 基纳湾
Qena 基纳
Qertassi 凯尔塔西
Qeytas 凯塔斯
Qift 吉夫特
Queen Victoria 维多利亚女王
Quran《可兰经》
Qurqumas 库尔库马斯
Quseir 吉赛尔

R. Neil Hewison R.尼尔·赫维森
Rabat 拉巴特
Radio Cairo 开罗无线电台
Radjedet 拉杰迭特
Rahotpe 拉赫特普
Rajan Patel 拉詹·帕特尔
Ralph Abercromby 拉尔夫·阿伯克鲁比
Ramadan 斋月仪式
Ramesses II 拉美西斯二世
Ramesses I 拉美西斯一世
Raphia 拉菲亚
Rashid 拉希德
Ra 拉
Reconquista 再征服
Red Pyramid 红色金字塔
Red Sea 红海
Reginald Wingate 雷金纳德·维哥特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Revelation of St. John 圣约翰的启示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 革命指挥委员会
Rhakotis 拉考提斯
Rhodes 罗德斯岛
Rhomboidal Pyramid 长斜方形金字塔
Richard Nixon 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Pococke 理查德·鲍考克
Richard 理查德
Ridwan Bey al-Faqairi 瑞德万·拜伊·埃尔-法凯瑞
Ridwan Kahya 卡亚瑞德万
Rifaa al-Tahtawi 瑞法·埃尔-塔塔韦
Rifai Mosque 利菲清真寺
River Mamluk 河流马穆鲁克
Robert Hay 罗伯特·海
Robert K. Vincent, Jr.小罗伯特·文森特
Robert K. Vincent 罗伯特·文森特
Roda Island 罗达岛
Roda 罗达岛
Rogers Peace Plan 罗杰斯和平福音计划
Rohotpe 罗赫特普
Ronald Reagan 罗纳德·里根
Ronald Storrs 罗纳德·斯托尔斯
Rosetta Stone 罗塞塔石碑
Rosetta 罗塞塔
Royal Road 王室大道
Rudolf Slatin 鲁道夫·萨拉丁
Russia 俄罗斯
Ruthenia 鲁塞尼亚服装
Saad Zaghlul 萨阿德·扎哥卢勒
Saadist Party 协会党
Saddam Husein 萨达姆·侯赛因
Safaga 萨法伽
Safavid 萨非帝国
Sahara 撒哈拉沙漠
Said Qutb 萨义德·库特布
Saint-Simonians 圣西蒙学派
Sais 舍易斯
Saladin 萨拉丁
Salah al-Din 萨拉·埃尔-丁
Salah al-Din 萨拉丁
Salar 萨拉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
Samaria 撒玛利亚
Samothrace 萨莫色雷斯
San Giovanni 圣乔凡尼礼拜堂
Saqqara 萨卡拉
Saracens 撒拉逊人
Sarapis 塞拉皮斯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Savior 救世主
Scottish 苏格兰
Scylla 锡拉岩礁
Sea Peoples 海上民族
Second Cataract 第二瀑布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第二中间期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Sekhemkhet 塞凯姆凯特
Sekhmet 塞克麦特

St. Paul 圣保罗
St. Peter's Square 圣彼得广场
St. Shenute 圣舍努特
Step Pyramid 阶梯金字塔
Stern Gang 斯特恩派
Straits of Tiran 蒂朗海峡
Sudan 苏丹
Suez Canal Company 苏伊士运河公司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Suez 苏伊士
Sufism 伊斯兰教苏非派
Sukarno 苏加诺
Suleiman I 苏雷曼一世
Sulla 苏拉
Sultan Qaitbay 苏丹卡特巴
Supreme Constitutional Court 最高法庭
Suzanne 苏扎妮
Syria 叙利亚
Tabennesi 塔贝尼西
Taha Husein 塔哈・侯赛因
Taharqa 塔哈尔卡
Tahiya Nasser 塔西亚・纳赛尔
Takelot I 塔凯罗特一世
Talaat Harb 塔拉大街
Talal bin Abd al-Aziz 塔拉尔・宾・阿布德・埃尔－阿兹兹
Tamerlane 帖木儿
Tanis 塔尼斯
Tantamani 坦塔玛尼
Tanta 坦塔
Tanzania 坦桑尼亚
Tanzimat 坦兹麦特
Tarsus 塔尔苏斯
Tauret 陶瑞特
Taz 塔兹
Tefnakht 泰弗纳赫特
Tegran 塔干
Tel Aviv 特拉维夫市
Tell al-Fara 戴尔・埃尔－法拉
Tell al-Kebir 戴尔・埃尔－凯拜尔
Temple of Fortuna Primigenia 福耳图那女神庙
Teti 泰提
Tewfiq 泰乌菲克
Thebaïd 特拜
Thebes 底比斯
Theocritus 提奥克里图斯
Theodosius 提奥多西乌斯
Theon 提昂
Theophilus 提奥菲洛斯
Third Cataract 第三瀑布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第三中间期
Thoeris 特厄里斯
Thoth 托特
Tiberius Julius Alexander 提比略・尤里乌斯・亚历山大
Tiberius 提比略城
Tivoli 蒂沃里
Tiye 提伊
Tobruk 托布鲁克
Toshka Project 托斯卡工程
Trajan 图拉真
Transjordan 外约旦
Treaty of Amiens 亚眠条约
Tripartite Aggression 三方侵略
Tripoli 的黎波里
Tudela 图德拉
Tughril 图格里尔
Tulunids 图伦王朝
Tumanbey 图曼贝
Tunisia 突尼斯
Tura 图拉
Turf Club 特夫俱乐部
Turks 土耳其人
Tusun 图苏
Tutankhamun 图坦哈蒙墓
Tutankhamun 图坦卡蒙
Tutankhaten 图坦卡吞

尔甘

Zenobia 季诺碧亚

Zeus-Amun 宙斯－阿蒙

Zeus 宙斯

Zifta 兹夫塔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埃及史 从原初时代至当下
作者=作者:（美）汤普森著
页数=409
SS号=13219872
出版日期=2012.07
出版社=北京市：商务印书馆